周作人文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周保中文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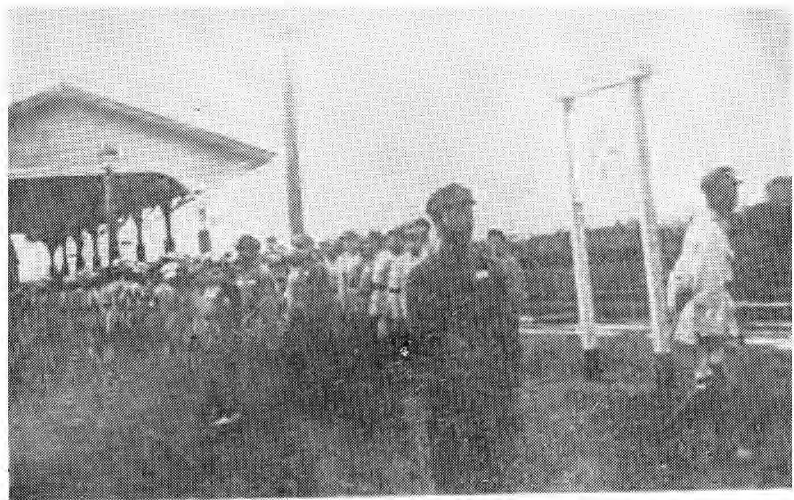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周保中一九四五年照片

(中国革命博物馆供稿)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解放战争初期，周保中同部分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车站

（东北烈士纪念馆供稿）



周保中兼任过当时设在延吉的民主学院院长

（前排戴帽的是周保中）



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在吉林市召开的省民族工作座谈会留影
（二排中后戴风雪帽的为周保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供稿）





一九三四年六月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独立师三团和绥宁反日同盟军攻打汪清县罗子沟（房子为当时周保中的指挥所）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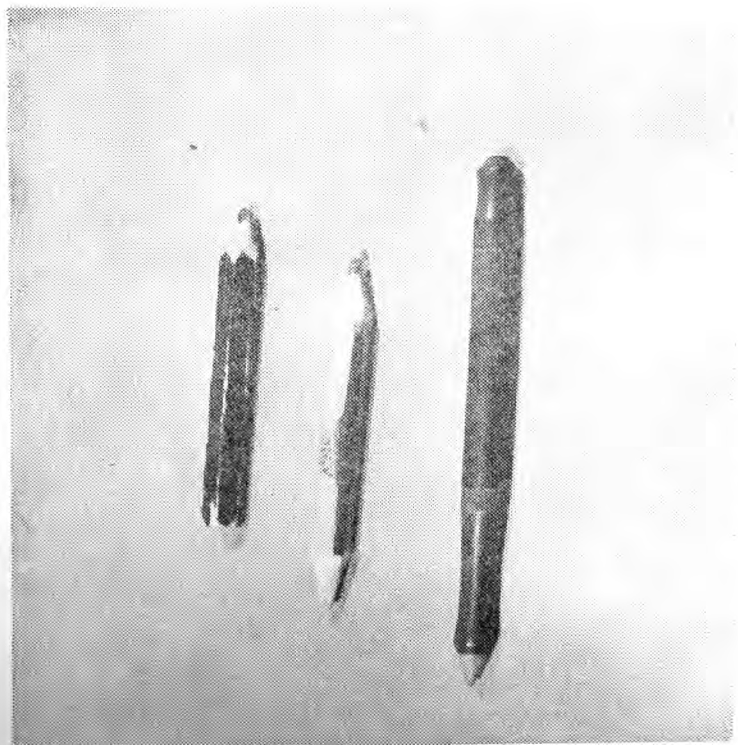
周保中一九六一年“九一八”三十周年时在纸扇上题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



周保中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用的饭盒
（东北烈士纪念馆供稿）

周保中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用的口缸和调羹

（东北烈士纪念馆供稿）



周保中在东北「抗联」时用的铅笔

（东北烈士纪念馆供稿）

杨靖宇同志秉承共产主义伟大战士的高贵品德：为河山复还，为民族解放，英勇战斗，壮烈捐躯，使后人永怀敬仰。

周保中

一九六三、五、廿五

已寄吉林博物馆

周保中手迹

—偶感—

人生那能就這麽？
　就這麽你可又奈何。
年華好景像風捲殘雲般的度過！
　這可奈何！？
　這又怎麽！？
人生真是神秘麽？
　神秘是人生的做作。
活動呵！
　事物的影兒受時光層々不斷的
　翻映着；
遠的河海洶濤，
近的山岳嵯峨，
　縱横往復跋涉征戰過。
前進呵！
前進呵！

步々緊跟上去，
把這一切景物，
把這一切時光，
　吻合，
　消磨。
為當大民族解放，
為先進階級革命，
那怕顛簸，
經得住九天九地的坎坷。

紀念林於次年一日
1936年28/8

夜戰

（記古城鎮北沟日寇宇備伴地襲击）
　緊急傳令，四方八面步騎兵奔
來会合，
　狂風作起，烏雲遮蓋了天上星河。

周保中手迹

目　录

（四）

我们所知道的周保中同志

王敖明　王一知

周保中同志是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周保中同志因长期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64年2月21日，在北京不幸逝世。

我们是周保中同志的亲密战友。他逝世二十年来，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周保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当我们回首往事，就仿佛见到他：在大革命激流中，搏浪进击的身影；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时，浴血奋战的雄姿；在解放战争峥嵘岁月里，顽强斗争的革命风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奋力拼搏的崇高形象。

（一）

周保中同志原名奚李沅，字绍黄，白族。1902年2月7日生于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幼年时，他家境贫寒，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在外祖父的资助下，才勉强读了几年书。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锻炼，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耿直倔强的性格和助人为乐的品德。村里穷苦人家有事相求，他都尽力相助。而反动军队欺压百姓，他却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众乡亲都夸

他是好孩子。

少年时代，周保中同志曾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1917年2月，刚满十五岁的周保中就抱着富国须强兵的愿望，虚报了两岁，毅然从军，参加了"靖国护法"战争。经过三年多战火的洗礼，于1923年春又去云南讲武堂学习了三年军事。这期间，他南征北战，目睹了广大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也目睹了滇桂军阀借"靖国护法"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的丑恶嘴脸。社会现实推动他去思考和探求革命的真理。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和文章，如《新青年》、《新潮》等，逐步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自由平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产生了改造现实社会的强烈愿望。

1926年4月，周保中同志来到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从此，他踏上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光辉道路。同年7月，周保中同志随北伐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地。在打吴佩孚、攻孙传芳的历次激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立下了赫赫战功。1927年3月，已任六军五十六团副团长的周保中参加了指挥攻打南京近郊牛头山和奇袭南京雨花台的战斗，均获得成功。这两仗使南京守敌大为震恐。防守南京的直鲁联军副司令褚玉璞慌忙渡江逃往浦口。一系列的战斗，使周保中同志所率部队声威大震，同时也使他成为公认的六军中骁勇善战的指挥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撕下伪装革命的面纱，举起屠刀，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镇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周保中同志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战争的锻炼，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对共产党的信仰更加坚定。他坚信，革命的失败

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继续下去，取得最后胜利。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国民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因此，在共产党人被大批屠杀，不坚定分子纷纷动摇脱党，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周保中同志于1927年7月申请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正如1928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的："在我个人有了这种认识定要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这并非我个人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好乱以流血为快，实乃物质环境所驱使，历史使命所昭示，更加上现制度的摧迫着；于是乎毫不犹移的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的对着目标走。"

大革命失败后，周保中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进行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12月，他担任了六军十八师副师长，率两个团驻防醴陵。翌年二月，在组织全师起义的工作中，由于叛徒出卖，周保中同志被反动当局通缉。不久，他由党派来的交通员护送，秘密地到了上海。后来，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曾秘密到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地从事兵运和联络工作。

1928年底，党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党派他到东北参加对东北抗日战争的领导。

（二）

1932年1月，周保中同志到了哈尔滨。在这里，他渡过了一生中最艰苦最有意义的岁月，投入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在十四年的抗日斗争中，周保中同志历任满洲省委委员、

军委书记；绥宁反日同盟军军长、党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党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吉东省委（旧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共三十多个县）书记；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书记，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

在艰苦的斗争中，周保中同志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以自己的果敢行动和光辉的业绩，书写了一首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壮丽诗篇。

周保中同志在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协助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起草了《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提纲和《义勇军组织法》，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东北广大群众，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正确策略。同年4月，为争取和领导自卫军、救国军等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罗登贤同志派他到宁安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

五月的一天，周保中同志正在宁安花脸沟进行群众工作，被自卫军当地驻军发现。他们认为，操着南方口音的周保中是个日本特务。于是就把他抓去，从排、连、营、团一直押到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部。自卫军的将领们听说抓到一个日本特务，非常高兴，集体"审讯"了周保中。其中一个将领问周保中："你是日本特务吗？！""我不是，而是从关里来这抗日的。""既然是来抗日的，那为什么不参加抗日队伍？""我原想找马占山参加抗日队伍，但马占山投降了日本人，听说你们抗日才奔你们来的。"周保中同志对答如流，态度镇静从容。那个将领问了一会，见周保中没有任何破绽，说话的语气也就不那么硬了。但他仍半信半疑，随后又问周保中对东北局势有何见

解。周保中不慌不忙地从世界形势讲到东北形势，从自己的抗日主张讲到自卫军应采取的救国方案，整整讲了两个来小时。在场的自卫军将领为周保中深刻透彻的分析所震惊，因此，确信他不是日本特务，而是有胆识的爱国志士，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派来的。自卫军将领在东北民众和士兵抗日热情推动下，尽管举起了义旗，但实际上执行的仍然是消极抗日的方针。所以，虽然他们很佩服周保中同志的胆识和才能，但却不肯重用，只让周保中在宣传部作指导工作。周保中到宣传部后，开展了抗日救国，进行民族战争，团结群众一致抗日的宣传，得到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拥护，但引起了自卫军将领们的不满，最后解散了宣传部。

7月，周保中同志离开自卫军，来到救国军，当了总部的总参议。不久，他又来到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当了参谋长。周保中同志到前方后，立即组织救国军向日寇发动了一系列的战斗，先后攻打了东京城、安图、敦化、宁安县城。在战斗中，他勇敢善战，指挥果断，关心士兵，深受救国军将士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戴。

在两次攻打宁安时，他的顽强精神被传为佳话。1932年10月的一天，周保中指挥部队攻打宁安县城。他亲自带领敢死队冲入城内，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击毙敌酋小岛少佐若干人。在战斗中，他腿部受伤，一颗子弹卡在小腿的两根骨头中间。但他忍痛指挥部队，直到战斗结束。周保中同志负伤后，大家都劝他到后方去治疗。他坚持不下前线，在没有医疗器械和麻药的情况下，让人用铁工钳子把子弹拔了出来，并用刮刀刮去了被子弹打烂的皮肉。当时，疼得他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往下直淌，可他硬是咬紧牙关不哼一声。他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在

场的战士。大家称赞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真豪迈，胜过昔日的关云长。"周保中同志负伤后十二天，伤口尚未痊愈，就不顾疼痛，又指挥了第二次攻打宁安的战斗。结果，消灭了数百敌人，并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

周保中同志尽管在自卫军和救国军中作了大量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但由于自卫军和救国军的头目们各怀鬼胎，争名夺利，自相残杀，在日寇的大举进攻下，部队终于相继瓦解和溃散。头目中有的投降日寇，有的逃到国外。这时候，周保中同志鼓励和协助吴义成（不久，吴义成也逃跑了）搜集了救国军的余部，重新编制了队伍，继续开展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攻占了安图，控制了安图县全境和桦甸、抚松、敦化、蛟河等县的一部，建立了辽吉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冬，周保中同志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和吉东局的决定，带领一部分辽吉边区军赴宁安着手组建党领导的反日同盟军。翌年二月，成立了宁安反日同盟军办事处。1935年2月，宁安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不久，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1936年底，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下属四、五、七、八、十军及救世军。

周保中同志带领抗联五军和抗联第二路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动人事迹到处传颂。

1937年3月，依兰、勃利地区日伪冬季大"讨伐"被我军粉碎后，周保中同志制定了袭击依兰县城，并诱使双河镇敌军出援，我军半途伏击的作战计划。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500多名，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5挺、步枪590余枝、子弹7

万余发、步兵炮3门、狙击炮7门、军马60多匹。这一仗大挫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气焰，大大提高了下江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7年8月20日，周保中同志指挥五、八军部队在依兰五道岗又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他派一支骑兵部队进至孟家岗，诱使寇军追击；同时，将主力部队隐蔽在五道岗北麓。上午九时半，敌黑石骑兵部队700多名猛追我诱敌部队，进入伏击圈。周保中同志一声令下，伏兵以猛烈的火力痛击敌人。这次战斗，除二百余敌人拼命突围逃跑外，其余四百多名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我军还打死了二百多匹战马，夺获马枪220多支、轻机枪15挺、战马50多匹，还有很多马刀、弹药。

在上述两次战斗的沉重打击下，伪军惊慌、动摇，大批哗变。由于我党的积极工作，牡丹江北方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700人，在李文彬同志领导下，举行了暴动；驻依兰工区的伪三十八团哗变；号称"满洲帝国御林军"的伪军二十九团1700多人，在团长赫奎武领导下，在勃利县起义。后来，他们都参加了抗联五军。上述伪军的起义和哗变，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也使吉东地区的伪军发生了动摇。

日本侵略者对周保中和他领导下的部队又怕又恨，他们大量增兵，频繁地对抗联部队进行"讨伐"。1938年，仅在三江地区，日寇就调集了五万日军和一万多伪军。我抗联部队的斗争进入了艰苦的阶段。面对着多于我军几十倍的兵力的"讨伐"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周保中同志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常说："我们是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战，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周保中同志曾五次受伤，其中三次是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有一次，他的肚子

被子弹打穿，肠子都流了出来。他忍痛用手把肠子塞进肚子里，又继续坚持作战。事后，同志们劝他好好休息，但他婉言谢绝了，仍废寝忘食地工作、学习。

在战斗中，周保中同志从来就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奋斗。有一次他指挥部队突围的经历，真是惊心动魄。

1938年2月，周保中同志在寻找党中央的关系返回七军的路上，遇到了企图捉拿他（可以领赏五万元）的大批日伪骑兵。周保中同志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在深可没人、茫无人迹的大雪中艰难地行进了三天，胜利地到达了七军驻地。在七军，周保中同志了解到，在宝清一带活动的五军，几乎每天都要同多于自己几十倍的敌人发生激烈战斗，处境很危险。周保中同志心急如焚，狠不得立即赶到宝清。同志们劝他说：“敌人四处在捉拿你，路上很不安全，还是等一等再说吧。”周保中同志硬是不肯久留。第二天清晨，他只带着六名随行人员，冒着大雪，向宝清方向前进。由于叛徒的出卖，下午五时左右，他们走进了敌人预先设置的包围圈。当周保中同志发现时，已被敌人重重包围。在敌人指挥官“要活的！要活的！谁把周保中打死就枪毙谁！”的叫喊中，敌人端着枪向周保中他们逼来。周保中同志命令随行人员赶快突围。他断后，边还击边打马疾进。不料，马被坎坷拌倒，他被摔在雪地上。追赶上来的几个敌人和那个叛徒动手来抓周保中。周保中同志抬起手，一钩板机，啪啪啪几枪，这几个敌人连同那个叛徒，都应声而倒。这时，由于长途跋涉，极度劳累，周保中同志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可他全然不顾，从地上爬起来，仍然边跑边向后面的敌人射击。最后，在随行人员的支援下，他脱离了险境，来到了五军部队。到五军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和五军负责同志一起

制定了新的战斗计划。五军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绕到敌人的背后，开展游击活动去了。周保中同志继续留在宝清坚持斗争。

1938年8月，周保中同志率领二路军总部离开宝清，向西面的依兰、勃利地区转移。敌人企图捉住周保中，"讨伐"的重点也随之西移。同年11月，日寇集中兵力，以围歼二路军总部和五军主力为主要目标，对依兰、方正、林口和勃利等县的牡丹江两岸进行了长期的大"讨伐"，并悬赏10万元要周保中的首级。一次，周保中同志率领的二路军总部和直属队共80余人，被敌人严密包围在直径只有20里的小圈子内。他们和敌人周旋了近30天，后被迫转入一座天然山洞里。敌人的指挥部就设在离山洞不远的地方。在周保中同志机智、沉着指挥下，他们在山洞里坚持了18天，一直未被敌人发现。周保中同志根据敌人队伍中被抓来背给养的劳工人数，飞机的频繁出动，以及到后来不再搜寻他们等现象，曾在第十五天就断定敌人很快就要撤退。果然第十八天敌人撤退了。周保中同志随即率部队主动出击，打死打伤日本侵略者数十人，并缴获一批枪枝弹药。

12月下旬，周保中同志率领二路军总部转移到牡丹江东岸，同五军、九军和救世军军部取得了联系，积极策划突围战斗。斗争越来越艰苦。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和空前严重的困难，一些干部、战士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无耻地投降了敌人。周保中同志命令抓捕并枪毙了这个民族败类。日本侵略者又羞又恼，更加仇恨周保中。他们以更高的价格悬赏捉拿周保中，甚至提出用周保中的肉换金子，一两肉换一两黄金。敌人对周保中的仇恨更激发了抗联将士对他的信任和爱戴。大家说："有周指挥领导，我们一定会胜利。"

处决关书范后，周保中同志带领二路军总部、九军和救世军向方正县方向突围。1939年2月，他们在原始森林中连续行军7天，到达方正县陈家亮子附近，奇袭了伐木场，打死打伤日伪军近200人，俘敌200余人，解放了千余人的采伐工。战斗刚结束，周保中同志得到情报：驻守在大罗勒密的寇军骑兵300余人，步兵五、六百人驰援陈家亮子。他见陈家亮子地形对我军不利，便指挥部队按原路东撤。二月二十一日午前六时，我军到达老爷岭顶四道河子上掌的阎王鼻子处。在这山岭急峻、险要的追兵必经之地设下了埋伏。下午二时，寇军果然跟踪追至。当敌人先头部队300多人进入我军埋伏圈时，战士们一齐开火，步枪、机枪、手榴弹密如雨点，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激战两个小时，敌先头部队全部被歼灭，后续部队也被打得狼狈逃窜。

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是抗联二路军的斗争最残酷、最尖锐的四个月。这期间，周保中同志指挥部队与敌人进行了37次战斗，破坏集团部落11处，共打死寇军2000余人，伤300余人，消灭和俘虏伪军700余人，击落敌机1架，毁汽车12辆……。

1939年3月30日，在牡丹江西岸的四道河子，周保中同志主持召开了吉东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新的突围计划。会后，他指挥部队分散突围。在突围中，他带领二路军总部和五军主力在葫芦崴子又伏击了尾追的日寇，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抗联二路军主力部队于5月1日前完成了突围任务，粉碎了敌人全歼抗联主力的阴谋。

1940年，东北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包围和封锁，抗联部队人员锐减。一些重要领导干部

相继牺牲。抗联将士面临着严重挫折和严寒冰雪、无衣断粮的罕见困难。当时，部分抗联领导人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甚至有人提出取消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主张。在这关系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时刻，周保中同志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批驳了这种取消主义的错误主张，从而使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坚持抗日斗争而未溃散。1942年8月1日，在失去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东北抗联主力部队改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又称国际旅），并建立了中共东北委员会。至此，统一了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撤消后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东北党组织，也统一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未曾统一过的东北抗联组织。

在中共东北委员会和周保中同志领导下，抗联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们学习《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等文章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学习"战斗规程"，练习射击、滑雪、跳伞和无线电通讯、医护等技术，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周保中同志还派出十多支小部队在东北各地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牵制了日寇关东军的兵力70—80万人，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

（三）

"八一五"后，在周保中同志的主持下，中共东北委员会认真研究了新形势下东北党和抗联的任务和方针，这就是：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区的革命秩序，肃清日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主要交通

线以外的军事根据地；迎接党中央派来的领导干部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如国民党占领东北，则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部分抗联战士随红军一起作战。8月22日，周保中同志带领抗联干部、战士按计划分赴56个重点城市。它们都是东北的大中城市和军事要地。周保中同志率100多人来到长春，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司令，并兼任苏联红军长春中央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派往56个点的抗联负责同志均担任了该地区的警备副司令。

抗战胜利后的东北面临着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关内往东北调兵遣将。他们在长春设立了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并派遣“接收大员”收编土匪和日伪残余，企图以与苏联建立中苏友好条约的“合法”身份及优势兵力独占东北。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综观全国形势，为使抗战的胜利果实不落在国民党、蒋介石手里，也积极向东北派领导干部和八路军。

周保中同志到长春后，一方面协助苏联红军接管日伪政权，收缴敌伪武装和物资；一方面以原抗联部队为骨干，在东北各地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人民武装，肃清日伪残余，建立地方民主政府。同时，他派冯仲云等同志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战情况和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形势，接来了彭真、陈云、李富春、林枫等十八位中央委员。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经过周保中和广大抗联将士的努力，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创建起以东北抗联为基础的十余万人的武装，成立了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同志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吉辽军区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吉林省委委员、常委，吉林省政

府主席。1946年4月，根据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周保中同志指挥攻打了长春。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因此，国民党以重兵防守。这些防守部队，除蒋介石空运来的以外，还有伪满军，地痞流氓，宪兵，特务等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铁师军，约数万人。周保中同志指挥部队，经过激战，歼灭敌人两万四千人，于4月18日解放长春。

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东北领导权的斗争中，周保中同志迎接和协助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十几万八路军、新四军和数万党政干部迅速进入指定地区，及时地掌握了这些地区的领导权。同时，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政策。当时的东北，尽管我党领导的部队发展很快，但总的说仍是敌强我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明确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可林彪却拒不执行这一正确指示。他将我军主力放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不重视发动群众和巩固两厢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在围困长春时，林彪不许老百姓出城，声称要老百姓与国民党争粮吃。周保中同志对此十分不满，早在1945年11月30日就曾写信给林彪，提出了关于东北地区战略方针的正确意见。即：发动农民群众，建立东满、黑龙江、嫩江、通化四大根据地，准备与国民党作长期斗争。周保中同志的意见被林彪否定。可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林彪不得不将部队从长春、四平等大城市撤出。我军主力一部留南满坚持敌后斗争，大部转移到北满地区休整。

1946年5月28日，在老爷岭地区的战略要地拉法、新站地区，周保中同志指挥部队痛击了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队，消灭

敌人四个营，严重地挫伤敌人的嚣张气焰，稳固了我东满根据地的西部防线，并迫使敌军退回老爷岭，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

1947年5月13日至6月30日，我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周保中率领由吉辽军区改编为吉林军区的部队，不断袭击吉海铁路沿线守敌，先后解放了桦甸、伊通、双阳、盘石等县和拉吉线南北广大地区，使东满解放区大为扩大，南北满连成一片。在解放桦甸的战斗中，周保中同志正患痢疾，每天解大便二十多次，拉下的又是血又是脓。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得皮包骨头。当时，部队没有治痢疾的药品，他只好硬挺着。紧张的战斗和疾病的折磨，使周保中同志的身体异常虚弱，连坐着都困难。同志们劝他回后方治病，可他却说："现在战斗那么紧张，我怎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周保中同志躺在吉普车上（胜利品）在前线指挥战斗，直到战斗胜利结束。

在解放东北的三年战斗中，周保中同志指挥部队与国民党进行了800多次战斗，歼灭敌人4万多名，缴获各种枪枝2万8千多支。同时，他还为主力部队输送了18万9千余人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四）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周保中同志调云南省工作。

周保中同志到云南后，担任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

云南委员会委员、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统战部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云南大学校长等职。因省政府主席、军管会主任陈赓同志有繁重的军事任务，所以，周保中同志主持省政府和军管会的工作。

周保中同志坚持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他常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

周保中同志的工作态度和顽强精神是催人下泪的。1952年3月的一天，他在省政府党组扩大会上，正在部署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说着说着，心脏病复发，一头栽倒在会议桌上，处于休克状态。开会的同志都大吃一惊，赶忙去找医生。过了一会儿，周保中同志慢慢地苏醒过来，他挣扎着又坐起来，微笑着说：“我现在感觉良好，请同志们继续开会。”同志们都劝他回去休息，会议明天再开。可周保中同志说：“还是抓紧时间开会吧，以免耽误工作……如果在战争年代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与敌人斗争了!?”同志们见他执意不肯休息，只好同意他的意见，继续开会。周保中同志又接着发言。从他那微弱的声音和痛苦的表情中，大家都感觉到他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周保中同志会议中休克之后，心力衰竭愈益严重，浑身浮肿，四肢无力，心脏病发作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但他仍不肯放下工作。直到被迫躺在床上，连用手拿一张纸的力气都没有时，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才住进医院。

1952年11月，周保中同志被调到重庆任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区行政委员会委员、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部长。在调动之前，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一个月再去重庆，但他只“休息”了十来天就上任去了。在他“休息”的十来天里，

照常批阅文件，照样接待来访，没有一天真正休息过。

在重庆工作期间，周保中同志还是老样子，宁肯不吃不睡也要把工作作好。1953年6月，经医生检查又发现他患有胆结石病。每当胆结石病发作，疼得他满头大汗，有时双手抱着腹部在床上打滚。胆结石病的发作又严重地影响着心脏。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同志十分关心周保中同志的健康，命令他到贵阳花溪去休养。周保中同志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决定，离职休养。他身体极为虚弱，病情越来越严重。当时，他的心脏已扩大为自己正常心脏时的四倍。1954年夏，周恩来总理亲自派自己的专机将周保中同志接到北京治疗。

1954年后，周保中相继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委、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周保中同志在患病疗养期间，坚持每天看报，看文件，并经常参加有关会议。他还在病榻上撰写了《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情况》等十数万字的回忆文章。有的老战友说：“您是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令人赞叹不已，应写出来留给后人。”周保中同志却说：“个人的功绩离不开党的教育和人民的支持。要写的恰恰是人民和先烈们的英雄业绩，至于我自己的功劳那是微不足道的。”那位老战友十分感动，称赞周保中同志是位有功不居功的民族英雄。

1959年，周保中同志病情恶化，卧床不起。这时，东北来了两位同志要访问他。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病情已不允许他会客，就拖延了几天才告诉他。周保中同志得知后，批

评工作人员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远道来的同志应及时接见才对。我不能起床，躺着不是可以谈嘛……过去打仗和群众在一起，今天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和群众疏远。"随后，他叫工作人员立即约见了东北来的两位同志。

周保中同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党奋斗到最后一息。

周保中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他不朽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草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最初短时间内基本奉行全国一致的革命路线。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后，依照中央新的指示，在东北贯彻执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过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前后十四年，东北党组织和东北人民写下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历史篇章。但是，这一段历史，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来加以系统的总结，有待于各方面的及早努力。本文仅仅用单纯的回忆形式，并偏重于军事方面作概括的叙述，为了解、研究东北人民革命历史提供参考素材。

一、东北一般状况

旧时代人们常说：“关东山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不如说：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世界闻名的原始森林参天高。东北地区虽然处于严寒地带，因为冰雪覆盖着广阔的原野，滋润了肥沃的土壤，风调雨顺，水利丰富，实为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好乡土。能供应现代化需要的地下矿藏，种类几乎应有尽有，数目非常之多，真是一块半开发或未开发的处女地。就这样，“匹夫无罪，怀璧为罪”，

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日本军阀首相田中义一奏折称："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把侵略东北当成推行其"大陆政策"，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首先必须夺取的扩张基地。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反动派通过诱使张学良"易帜"，加强了他们东北地区（包括原热河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危机的爆发，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相对稳定，促使美、英、法极力拉拢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拉拢奉系军阀张学良。这样就加剧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一方，以美、英、法帝国主义为另一方，为争夺中国和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尖锐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以旅大及附属地为立脚点，在东北有近三十年的经营，尤其在南满更握有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控制权，当然不能容忍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推进和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家越来越巩固。以美、英、法为背景的，由蒋、张发动的反苏进攻又遭挫败。中国土地革命在长江流域正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差不多都错综复杂地集中到东北，或直接、间接地影响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进攻苏联，特别是它认为要推行大陆政策侵略中国，同时为扑灭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尽其宪兵作用，反对它的竞争者美、英、法帝国主义，那就非发动武装侵略，占领东北不可。日本帝国主义也估计到：一旦战争爆发，南京蒋介石是会"逆来顺受"，宁肯对外不抵抗，对内也毫不放松对人民革命的镇压；而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英、法操纵

的“国际联盟”也会袖手旁观，放任日寇为所欲为的。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走钢丝”当作坦途，向东北进行武装进攻。

二、事变的突发

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炸毁了沈阳北柳条湖火车道，然后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制造了所谓“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开炮袭击奉军北大营和兵工厂，占领了沈阳市。当时南京政府蒋介石总司令命令东北的张学良副司令采取不抵抗的方针，一味“退让”，助长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于是日寇很快占领了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翌年一月进占哈尔滨，①大体上控制了满洲战略地区。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建立伪满洲国，抬出傀儡溥仪做“执政”。从此东北沦陷，东北人民蒙受了做牛马奴隶的奇灾大难。当时民间曾传诵着这样的一首歌谣：

日寇袭来莫慌忙，
攘内安外蒋主张。
御敌有术不抵抗，
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命，
叫尔小民做羔羊。

① 日寇攻下哈尔滨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周保中同志此处是指进攻哈尔滨的时间。

亡国恨，空前绝后！
要生存，惟有自强！

三、党的主张

在中国大革命以及土地革命时期，东北虽然没有象长江流域那样掀起过大的风暴，但东北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影响下与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曾经在南满和北满一些地方发生过规模较小的反帝反封建、反买办阶级的革命运动。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与奉系军阀合流以后，这一斗争日趋尖锐。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指使，向苏联进行试探进攻。中国共产党特别指出：东北的外来危险，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阴谋；东北人民和土地有被蒋介石反动派出卖的可能性。不幸而言中，“九一八”事变，证明了这个预断，同时也表明了东北人民对日寇侵略东北，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不是没有革命行动的。

事变后两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宣言。九月二十一日满洲省委发出紧急通告，强调指出：日寇侵略东北其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并为进攻苏联做准备；中国人民、东北人民的民族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卖国投降政策给带来的，不能对它寄予任何幻想；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自己起来救国自救，组织民众政府，自动抵抗日寇进攻，才是唯一的出路。党的这一号召，深入东北民心，因而掀起了东北初期抗日救国高潮，武装军队纷纷起来抵抗日寇，给日寇军以最初的打击，迫使日寇不得不推迟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计划。

四、初期抗日，旧军队的崩溃

事变爆发后，东北广大军民，对南京政府的“镇静”、“不抵抗”感到非常失望，因而激起了义愤。在日寇还未占领的北满、吉东地区，掀起了自动抵抗的浪潮。黑龙江地区马占山所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①揭起抗日旗帜，部队开往嫩江桥前线，英勇地阻击进攻的寇军。继之而起的有：苏炳文的东北屯垦部队（黑龙江省抗日军）；中东铁路护路军丁超军两个旅②；镇守依兰的李杜二十二旅③；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④；守备吉林市的冯占海、李海青⑤等的警卫队（吉林自卫军）；辽宁旧东边道地区的奉军唐聚五、李春润部队（辽宁民众自卫军）等都宣布“抗日救国”。驻在延边的原吉林陆军第三旅第七团的“老三营”⑥，以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为首，在事变后不几天就暴动起来了，刹那间卷入数万之众，组织救国军到处打击日寇。辽南三角地带有邓铁梅、苗克秀、王凤阁等部；辽西和辽热边境有耿继周等部义勇军。此外各地保

---

① 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正式爆发是在十一月三日，但在十月间北部边防军黑龙江军已经同投降日寇的张海鹏部逆军交战，周保中同志说十月揭起抗日旗帜亦可。

② 此处应为中东路护路军丁超的二十八旅和赵毅的二十二旅。

③ 李杜所部应是二十四旅，此处作者记忆有误。

④ 此处应为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六六〇团。

⑤ 李海青，原名李青山，又名李忠义。他原是黑龙江万福麟部下营长，事变前因事系狱，为马占山放出抗日，他并未充任吉林军里的警卫队，周保中同志此处记忆有误。

⑥ 王德林的“老三营”原属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二十七旅六七六团，此番号之前为吉林陆军第十三旅第七团，六七六团是后改成的全国统一番号。周保中同志沿用的是旧番号，但又把十三旅误为三旅。

安队、警察武装也纷纷起来抗日。有些地区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起来积极抗日。就是那些由畸形社会条件造成的“胡匪”队伍也都打起“反日山林队”旗号，阻扰日寇的行动。从事变后到一九三二年初，北满、吉东、东满地区的抗日武装达三十万人，辽东南和辽西近十万人。其中五分之三是旧东北的正规军，人员配备很完整，有相当的战斗素养。军事后备潜力是很大的，仅民间枪械就近百万支。作战可以依据和回旋的地区也是很广的。这四十万左右的军队受到全东北人民沸腾的抗日情绪所鼓舞，斗志是高昂的。中国共产党满洲地区组织当时的力量虽然还微弱，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但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共青团员，曾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在各地给这些抗日武装军队以各种支援。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抗日援马代表团”的名义，到黑龙江战地进行慰问和宣传鼓动，并派志愿兵参加战斗。翌年一月，曾在哈尔滨宣传和组织各阶层群众支援吉林自卫军在双城、榆树地区的作战，组织各界群众协助自卫军保卫哈尔滨的活动。当救国军在延吉暴动前夜，中共东满特委派遣有力干部多人，参与暴动和组织救国军的计划。在救国军进攻敦化、额穆、东京城、宁安、汪清地区行动中，党的干部同该军的上层领导左倾激进分子互相配合，树立了坚强作战指挥，并动员东满革命群众组织义勇军参加作战，或担任交通运输，以及敌后的别动游击。中共南满特委和吉奉铁路线的党组织以同样的积极行动，对辽宁民众自卫军——辽东、辽西反日义勇军给予支援。各级党的活动干部，曾向这些旧军队的上层领导恳切地提出过建议：抗日军队必须依靠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必须团结一致，分区活

动，统一指挥，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并采取机动作战，放弃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党曾经耐心地开导和不倦地宣传解释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首先是发挥朝鲜族的抗日积极性，使他们广泛地参加抗日斗争。但是这些旧军队的上层领导们，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影响，往往拒绝党的主张，有的人口头上接受，暗地里还是坚持自己那一套，或者接受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拒绝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在某些领导上层人物中，虽然没有执行公开的"反共"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自动组织武装抗日是违法的，因此最初时期，党所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海伦游击队、汤原游击队被黑龙江抗日军摧毁了。穆棱和密山游击队被吉林自卫军缴械了。磐石和海龙游击队两次受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延边各县的游击队受到救国军的限制。有的救国军领袖还不止一次的阴谋暗杀党在该军中的领导干部和左倾激进分子。

这些旧军队上层领导们，虽然揭橥着抗日救国的旗帜，军队下级军官、战士和人民群众还跟着他们走，但他们并未脱离旧军阀的老路。他们之间经常为了抢夺地盘扩充个人势力、争夺关内外爱国捐款、分配驻地、军事物资等而进行内部斗争，甚至互相火并。在军事上，每与寇军接触，士兵在前线奋战，有的将领就在后方逃亡。各军之间没有相互支援，甚至有些将领"身在曹营心在汉"，早与日寇特务勾勾搭搭，或者促使抗战行动垮台，或者一遇局势稍稍不利就动摇投降日寇。

当着黑龙江抗日军正在嫩江桥声势浩大地抗击日寇的时候，海拉尔屯垦区苏炳文等以及吉林省丁超、李杜等的自卫军静静地作"壁上观"。等到日寇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丁、李、苏等才不得不起来抵抗。而声震一时的"民族英雄"马占山却

与日寇谋妥协。日寇正准备从牡丹江西岸向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进攻的时候，救国军孔宪荣谋杀了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①，给日寇造成了进攻的有利条件。

总之，初期抗战的最大弱点是：第一，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影响，在这些抗日旧军队中的上层领导人物的头脑中，占着一定地位；第二，广大群众和爱国战士，还没有能够从反动统治传统思想下解放出来，束缚了高昂的斗志；第三，共产党在东北组织的革命武装力量——人民游击队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在这些旧军队里起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关东军最初仅仅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发动事变，并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地。以后寇军增加到四个师团向北满和吉东、东满举行进攻。日寇充分地利用了抗日旧军队上层领导的腐败和弱点，施展政治分化、特务渗透、挑拨离间和收买诱降等手段，配合着正面的军事行动。这些庞大数量的抗日军队，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被各个击破，并使之趋于瓦解和崩溃。日寇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东北地区的整个局势。虽然在嫩江地区，吉林、长春地区，奉吉铁路沿线，牡丹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曾对日寇军进行过无数次的激烈抵抗，牺牲了不少的英雄人物（日寇死伤亦达二万余人），但是由于丁超、王之佑等投降，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的逃跑，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宣告挫败，影响所及，使东北广大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浪潮趋于低落。

---

① 马宪章，字则周，时为左路总指挥。杀害马宪章者为刘万奎，外号刘快腿，此人后来投日。当时风传刘万奎杀马系孔宪荣唆使，但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确实证据。

五、抗日游击战争新高潮

以军队为主体的抗日斗争过程中，虽然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受到少数上层领导的反对、阻挠、破坏，但是东北党组织坚持不渝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路线，组织人民群众，组织人民武装，以坚决彻底地进行抗日自救、收复失地为使命。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间，党组织在南满、东满、北满各地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青年、爱国人士中不倦地宣传鼓动，组织群众性的、公开的、秘密的“反日会”和“农民义勇军”。延边、磐石、海龙、宁安、穆棱、密山、饶河、汤原等县组织了人民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限制，几经被破坏，但仍然主动地、勇敢地参加旧军队的抗日作战，在斗争中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到达满洲省委，这正是旧军队崩溃瓦解之后，人民群众悲观失望，而日寇额手称庆，进犯热河，巩固长城线，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缔结“塘沽协定”的时候。满洲省委号召与督促全东北党组织，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加强扩大各地人民游击队；另一方面在溃散后的各色反日武装部队中积极开展工作，以挽回东北抗日消沉和混乱的局势。在三万左右武装救国军中，加强党的领导，重新建立救国军总司令部，整编各路军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在救国军总部直接指挥下，第二次攻占安图县城，控制了全县和邻近的抚松、桦甸、敦化、蛟河各县的一些小城镇和地区，建立起“辽吉边区”根据地，不断袭击京图铁路沿线的交通运输和寇军据点。在宁安县境，新编的救国军

——游击军司令部的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干部，组织了党委。他们团结了救国军、自卫军残部和反日山林队约二万人左右。在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下，攻占了东京城、南湖头，袭击了宁安县城，展开了牡丹江流域的对敌游击战，不断打击出扰的日寇，威胁中东铁路东线地区。东满延边各县的人民游击队，揭穿了日寇进行民族挑拨的阴谋，变民族歧视、对立，为民族团结合作。他们与救国军和各种反日山林队相互支持，西至“辽吉边区”，东达中东铁路。这里的朝鲜人民游击队，团结好，纪律好，战斗力强，成为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核心力量。南满方面自一九三三年夏，海龙和磐石游击队合并改编为磐石人民游击队，同年秋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在这过程中，由于该部队的积极活动，联合与支持着吉奉铁路沿线最大的反日山林队“殿臣”、“双江”（罗明星）、“老双胜”、“德林”等约万人的抗日武装，不断破坏铁路交通，伏击日寇。吉奉铁路交通曾被割断半年之久，吉林市和抚顺矿区经常受到威胁。磐石人民革命军分遣部队扩大活动到达通化及安奉铁路线，联合着那个地区的王凤阁部队，以及辽宁自卫军的残余部队——邓铁梅、苗克秀残部约七八千人，坚持抗日游击斗争。

由满洲省委直接指导的珠河县中心县委，一九三三年成立了“珠河游击队”。在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右岸、中东路两侧，展开游击斗争，不断获得胜利，吸引着自卫军的残余部队李华堂、于海云、考凤林及其他反日山林队，共约一万多人的武装。从珠河游击队——哈东支队为中坚，继续同日寇对抗。远在饶河中心县委领导的饶河游击队，支持着救国自卫军陈东山、高玉山等四、五千人的抗日部队联合行动，曾经攻占虎林

县城及团山子等地，不断打击乌苏里江左岸的寇军。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南北满由旧军队留下来的，以新的组织形式出现的抗日武装总计十余万人左右。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影响不再起领导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它的威望提高了，统一战线政策思想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行动主张，大体上为他们所接受；（二）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游击队逐渐扩大加强了，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比较系统的、高级的组织形式，并成为各种抗联武装的榜样和核心力量；（三）南北满各地的抗日武装开展规模不同、作战方法不同的游击战斗，使日寇军到处遭受打击，兵力损折越来越多，迫使日寇改变以往的作战方式——由以静制动，以少胜多，分进合击，各个击破，不得不增加兵力，分散到广大地区，处处防守，陷入被动，随时随地有遭受袭击的危险；（四）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以后，不仅在游击地区的人民群众几乎普遍地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直接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就在寇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沿线据点，也都建立起地下"抗日救国会"和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短时间挫折之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日寇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人民游击战争，为了更残酷地压榨和欺骗东北人民，为了混淆国际视听，表示侵华反苏的决心，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组"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开始实行保甲制、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批地掠夺民族工商业；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支；并施行武装移民。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向人民加紧压迫；同时不断地增加日寇关东

军，改组伪军（一九三四年初日寇达二十余万人，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达五十万人）。在军事行动上，以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攻对象，不断地进行大“讨伐”。日寇计划在较短的时期内达到“治安肃正”，巩固“满洲国新秩序”，但是情况的发展与日寇的意愿相反。由于民族的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政策，人民觉悟的提高；新型抗日军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东北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经过短暂时期的挫折之后，又重新高涨起来了。

一九三四年初在依兰县土龙山区，为反对日寇收缴地照和枪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数万农民大暴动。在不到十天之内，一个县区就打死打伤日寇饭塚大佐以下三千余人①，暴动很快蔓延到松花江右岸的桦川、富锦、同江、宝清、勃利各县。在这同一时期，正是南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部队占据着广大农村地区，向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铁路沿线据点，不断地袭击，粉碎了敌人的历次出击和“大讨伐”，形成了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七年间抗日游击运动的高潮。在这一长时期内，东北地区党组织基本掌握并贯彻执行了中央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中央《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的《告全党同志书》。这些指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抗日联军的建立

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中共

① “三千余人”应是“三十余人”之讹。据载土龙山暴动打死日寇饭塚以下二十三人，还击毙伪军盖文义大队长以下五十余人，说“三千余人”，当系笔误。

东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时期，在延边和绥宁以及吉海铁路各地区，曾组织起农民和工人的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卫队。它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反对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东北地主和军阀。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使用原始武器，活动不经常，而且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对于群众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东满延边各县的反日游击队，吉海铁路——磐石、海龙县反日游击队，密山、饶河、汤原反日游击队等，迅速地建立起来。虽然受旧军队和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破坏、阻挠，但这些游击队有斗争历史渊源，直接从革命群众中产生，因此颠扑不破，在抗日的内部斗争中，在同日寇的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不象“巴彦游击队”那样，缺乏斗争经验，加上该部队领导干部又执行错误路线，脱离群众，结果使时机成熟、人数众多、枪马齐全、地域条件优良的部队，经不起风险，很快地瓦解无遗了。

一九三四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根据抗日新高潮及人民武装斗争的新发展，把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等队伍，逐步着手进行统一军队建制，使人民武装游击运动日益加强起来。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醉心于侵略的日寇，借口南京蒋介石卖国政府履行“塘沽协定”不力，以军事重压加于平津和整个华北，引起全国愤慨。中共中央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主张全民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东北人民武装就在这前后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如下：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一九三一年末在伊通、磐石、海龙建立了反日的赤色游击队。一九三二年春，磐石哈马河子中

朝农民暴动以后，地下人民武装——自卫队，和义勇军这些队伍合并为磐石一赤色游击队（红32军南满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二周年，在磐石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有三个团和师直属队；一九三四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十七周年，扩建为二个师和军直属警卫团、少年营。并在通化地区、鸭绿江左岸、安奉铁路两侧，以统一战线形式，编建了十个游击支队，以联系辽宁民众自卫军和东北反日义勇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一九三五年秋，增编为三个师，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一军。

抗日联军第一军最初的根据地在磐石的二、三区，即玻璃河子、石虎沟，桦甸县的票河、横道河子、色洛河、红石砬子，辉南县和金川县的大房身、二岔沟以及抚松、通化、临江、集安、长白各县的山区。基本的游击区扩大到吉奉铁路、安奉铁路和通化地区、鸭绿江西岸地区二十余县。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九一八”事变前以及以后不久，曾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在一些山区建立过“苏维埃”和赤色游击队。救国军王德林暴动起来以后，中共东满特委除派遣干部参加该军活动外，并指示各县游击队积极加强反日游击战争，并从汪清县里的赤色游击队里选派五十人左右的一支小部队，参加救国军的“别动队”。一九三二年各县赤色游击队及别动队都有相当的发展。一九三三年初，东满特委正式取消各地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改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会和人民代表会议，把各县的赤色游击队、反日游击大队，于一九三四年春建立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延吉大队编为第一团六个连，和龙大队编为第二团七个连。一九三四年末至一九三五年初，以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为基

干，改造成功了救国军的一个旅，扩编为两个师，一个警卫营，一个青年义勇军大队，正式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二军。一九三五年末，扩编为四个师和军直属警卫团、青年义勇军大队（教导队）。

抗联第二军最初的根据地是：延吉县的腐湾沟、倒木沟，海兰江山区和哈尔巴尔山区，汪清县的大小汪清，绥芬河山区、八人沟、对头砬子、腰营沟、大黄崴子以及汪清和珲春之间的山区。后期的根据地是安图县、敦化县、桦甸县交界及抚顺、长白山区。基本游击区是中东铁路东线以南，图佳铁路、牡丹江市以南，京图铁路老爷岭以东到图们江。西部为抚松、濛江、长白、临江、集安等约二十个县。

抗日联军第三军。一九三三年初，满洲省委鉴于巴彦游击队和珠河工农反日义勇军与孙朝阳救国义勇军失败的教训，指示珠河中心县委坚决执行组织人民武装——“反日游击队”。这个部队初期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把从孙朝阳部队分离出来的李启东等同志的武装，和珠河地方武装合并组织起来。大力开展珠河、阿城、双城等地区游击战斗，队伍迅速壮大。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在珠河县宣告正式建立“珠河反日游击大队”，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一九三四年六月因战斗不断胜利，队伍发展壮大，扩建为“哈东反日游击支队”。下分九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迫击炮队，一个教导队。同时以哈东游击支队为基础，联合其他各色队伍建立统一战线性质的“东北反日联合军”。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建立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同年八月一日，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三军。初编九师之众，后缩编为六个师。

抗联三军的根据地最初在珠河、延寿、五常以及方正县大

小罗勒密一带。一九三六年以后，主要根据地移转到松花江左岸汤原、东兴、庆城以及北安、绥化以东山区。该军基本游击区最初为哈尔滨以东松花江右岸十余县，以后扩大移转于松花江左岸、绥化、佳木斯铁路沿线及黑龙江右岸之萝北、佛山、绥滨县等，共达三十余县。

抗日联军第四军。"九一八"事变，王德林暴动组织救国军以后，组织了许多次的重大战役，如攻占敦化、额穆，伏击天野部队，进攻宁安以及中东路磨刀石车站的寇军等等，救国军总部直属的补充团起着骨干作用。这个团始终在党的政策思想指导之下行动。王德林、孔宪荣逃亡后，这个团成为救国军新编的游击军的基干，在绥宁地区联合救国军和自卫军残部以及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新的抗日战斗，掀起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新高潮。但是，由于救国军游击军司令部党的组织领导意见不集中，没有坚决执行吉东党的军事指示，从宁西南部轻易地向中东路以北移动，结果遭到寇军多次阻击，部队受到一些损失。一九三三年冬，游击军司令部和补充团到达密山和林口以东地区，部队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四年秋，中共密山县委领导的密山游击队合并编入游击军，增加了新的核心力量，建立为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并开展了密山、林口、勃利、依兰、方正以及东部宝清、虎林、饶河一带的游击活动。一九三五年冬正式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初编为两个师，一九三七年扩编为三个师。

抗联第四军最初的根据地为方正县与依兰县的山林地区，大小罗勒密一带。一九三七年以后移转至富锦、宝清、桦川交界地区。游击区为牡丹江——佳木斯铁路两侧及北老爷岭东西地区，宝清、富锦、密山一带十余县。

抗日联军第五军。这个军是在救国军辽吉边区部队、绥宁地区部队以及吉东游击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宁安县委、吉东县委、吉东局、吉东特委、东满特委以统战方式在整个救国军中积极活动，在该军前方司令部和一些部队里建起党的组织。经过宣传部，在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并动员革命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该军，有的当战士，有的做其他各种工作。当时的方针是：一方面直接促使救国军"左倾"革命化，坚持抗日；另一方面造成有利条件，以便东满延边各县游击队以及吉东地区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易于成长壮大。在三年多的过程中，这一方针基本实现了。但也有失败的经验教训。例如，一九三三年秋李光"别动队"受袭击，一九三四年夏末"工农义勇队"被奸细拉走，救国军总司令部上层统一战线不能不破裂。但是，从全局看，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是成功的。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和第四军的建立，都是有救国军的工作渊源。第五军的多数部队还是由救国军部队彻底改造过来的。

一九三三年冬，党估计到救国军内部的分化，上层统一战线存在的破裂危机。在宁安东部（平日坡），以辽宁边区部队"工农义勇队"、"宁安游击队"为基础与救国军总司令部相平行的建立起"吉东抗日同盟军"，并设军事委员会。党的同志完全掌握了领导。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同盟军军事委员会联合了宁安、敦化、额穆、舒兰、苇河、牡丹江等地的救国军和自卫军残部以及大量的"反日山林队"，开展了不断的游击战斗，锻炼了人民革命武装。一九三四年秋，为接受失败的教训，把辽吉边区部队和"工农义勇队"失败后所有的干部都加强到宁安游击队，并把它扩编为"吉东游击大队"。一九三

五年二月在宁安三道河子区域宣布建立抗日联军第五军。初编两个师，第一师三个团，第二师三个团。军直属一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抗联五军南面与抗联二军联络，北面与抗联其他军队呼应，在不断胜利地打击日伪军中充实壮大。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伪满驻牡丹江森林警察大队七百余人举行暴动，参加抗联五军，接着在林口地区也有伪军起义来投。于是扩编为第三师，军属教导团，警卫营。

该军最初的基本根据地在宁安、额穆、镜泊湖沿岸以及牡丹江西岸老爷岭和东岸老松岭山区。一九三五年夏移转至北部牡丹江西岸和刁翎地区。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延伸到勃利县东部，富锦、宝清南部，完达山脉两侧山区。基本游击区是：西南起敦化、额穆，沿牡丹江两岸，北达依兰，再从方正松花江右岸直达桦川、富锦、宝清，中间有图佳铁路、中东铁路、林虎铁路、穆棱铁路。一九三八年曾伸张到哈尔滨东南及中东铁路两侧和拉滨铁路以东，共二十余县地区。五军一师于一九三六年曾跨过松花江，一度进出东兴、庆城、铁骊地区。

抗日联军第六军。"九一八"事变前，中共地下党汤原县委，就曾经在汤原的西北和西南农村中，组织过地下武装和徒手的农民义勇队。事变后根据省委的指示，组织反日会和人民武装——汤原游击队。一九三二年夏，省委巡视员到汤原后，县委即积极着手新的武装组织。是年十月十日组织起人数不多的一支武装——汤原游击队。但是因为领导干部缺乏经验和许多"反日山林队"抱着反共的态度，这支初生的队伍被山林队"荣好"缴械了。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秋收运动、募捐购械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开展了汤原、萝北、通河地区的游击活动，队伍获得发展壮大。但是由于党的干部

缺乏阶级警惕性，被容留的土匪“老来好”暗中在队伍中拉拢落后分子，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队内发生叛变。“老来好”等杀了党的干部把队伍拉走，致使汤原县委检讨两次建军失败的经验，后派出党团员七十多人做骨干，并以县委主要领导人为指挥员，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初，这个部队以汤原为基地跨越松花江两岸，扩大游击战争，不断获得胜利。队伍人数和夺自敌人手中的武器大大增加，同时得到第三军的支援，于一九三五年底在汤原建立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下属六个团。一九三六年队伍发展到八个团，一个青年教导队，遂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下属四个师，每师两个团。

抗联第六军在松花江左岸、黑龙江右岸、小兴安岭和其以西配合第三军行动；在松花江右岸配合联军其他部队行动。最初的根据地为汤原县西北和西南六个县区。在松花江南岸为依兰、桦川的双鸭山和太平川一带。

抗日联军第七军。中共饶河县委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在该县朝鲜族农民中及少数汉族农民中，建立地下武装组织形式——“农民反日自卫队”，但不久即被当地旧东北军的“自卫军”和“救国军”所破坏。一九三二年秋组织了六十余人的以党团员为骨干的“饶河反日游击队”。该队公开活动，对乌苏里江左岸饶河、虎林等地抗日活动有较好的影响。但一九三三年一月受到该地区救国自卫军陈东山、高玉山部队的压迫，饶河县委指示该队，在保持一致抗日和共产党组织独立的条件下，接受救国自卫军军事的统一指挥，因而被收编为一个“独立营”。但是，“饶河反日游击队”因战斗力强，组织纪律好，在群众中有深刻印象，事实上保持了军事上的独立游击活

动。一九三四年陈东山、高玉山军瓦解后，它成了乌苏里江岸唯一的一支中坚队伍，人数迅速增加。一九三五年一月吉东特委指示，将该部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第四团。不久该团扩展发展编成一个师(两个团一个营)。一九三六年正式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编制三个师（每师三个团）和一个独立团。最初的根据地为饶河县的小佳河、八响地、大菜子沟及同江县的大旗杆。游击活动北达同江、抚远，西到宝清、富锦，南至虎林、密山。

抗日联军第八军。一九三四年初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编成二万左右人的“民众军”。在一个月内对日寇展开了广泛的游击作战，寇军曾遭到惨重的打击和损失。但是，该军的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指挥为地主阶级分子所掌握。最初农民自发地、主动地到处打击日寇，扩大活动地区，以后地主阶级领导分子，在军事上转为消极的防守行动；同时领导成员间在战斗紧迫的环境中，侵吞农民暴动“果实”，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暗中勾结日寇特务。党在“民众军”中，缺乏领导干部，只有个别党员参加该军做局部工作。这样，“民众军”经过三个月的作战，在日寇不断增强军事压迫和使用政治分化收买之下，趋于瓦解状态。一九三四年秋只剩下六、七百人，由谢文东[1]率领东走，企图渡过乌苏里江逃往苏联。在饶河县委与饶河游击队积极支援之下，稳定了该军的士气，劝阻了该军领导人逃亡的意图。年末该部返回依兰、勃利、桦川，得到我

---

[1] 谢文东一九三九年四月在牡丹江北刁翎为警卫营长姜××胁迫投降伪满洲国，后积极“反共”。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谢在依兰、牡丹江市之间为国民党反动派地下军首领，有千余武装。一九四六年春被我军消灭。

反日联合军第三军及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的协助，并得到联军各部队的支援，在方正、延寿及北牡丹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吉东和北满党加强对该军政治和军事领导，在军队中建立政治领导工作系统，该军人枪大增，逐渐恢复壮大，编为三个师。一九三六年底，正式宣布建立抗日联军第八军。一九三七年八月增编第四师。

抗日联军第九军。吉林自卫军李杜等部于一九三三年初崩溃后，在宝清地区留有一个团。团长李华堂①坚持抗日，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间，在松花江下游左岸地区得到我抗联三军及五军的支持，党在该部队中加强领导，建立政治制度。一九三六年末，该部人数发展到四个团，编为两个师，并正式宣布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日联军第十军。一九三三年，在拉滨铁路沿线的冯占海、李海青②、宫长海等的吉林自卫军和其他救国义勇军等崩溃瓦解后，在该地区残留着上万的“反日山林队”。报山头“双龙”（汪雅臣）③，就是该地区最大反日山林队之一，人数近二千。一九三四年珠河中心县委曾派党员干部去进行统战工作，政治影响虽好，但组织效果不多。最主要的是缺乏更多的干部人员派到那里去。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该部人数减到千人左右。一九三六年末，吉东党和军的领导继续派干部去

---

①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进攻方正县陈家亮子，李华堂负伤，送西凤沟里密营养伤，为日寇俘去后投降。一九四五年末，在依兰、方正间为国民党反动派地下军“司令”。一九四六年被我军消灭。

② 周保中同志此处记忆有误。李海青没有参加吉林自卫军，他独树一帜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和李杜等吉林自卫军没有联系。

③ 汪雅臣非党人士，接受党的领导，坚持抗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在舒兰县冲河山区英勇战死。日贼对汪烈士深为衔恨，将其首级割去。东北光复后在哈尔滨重新安葬。

联络帮助，稍稍获得发展。同年十一月宣布取消山头，正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重新开展了拉滨地区的游击战斗。一九三八年配合第四、五军西征部队，活动到哈尔滨附近的阿城、榆树、双城等地。

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在土龙山农民暴动直接影响下，桦川县、双鸭山煤矿三百余名矿工，在祁致中同志①倡导和率领下，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举行起义，组织“反日山林队”，推祁致中为首领，报山头“明山”。桦川、富锦、勃利的一些农民踊跃参加，很快就达五百余人。一开始这一支队伍是拥护“民众军”的，其成分多数是工人、农民，领袖是矿工。因此政治思想没有受束缚，游击行动非常积极。活动范围，西达方正、延寿，东到富锦、宝清，南到密山。“民众军”崩溃时，这个队伍正在发展。一九三四年秋，中共密山县委、勃利区委都派了干部到该部中进行统战工作，开始接受党的政治影响。一九三五年冬季之后，经常配合联军第三军和第五军行动，并得到支持。吉东党的工作深入到下层战士，部队在游击战斗中，不断进行改造作风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人数扩大到千人左右。一九三六年春在勃利宣布取消“明山”山头，改编为抗日联军独立师。同年夏队伍扩大。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富锦成立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编为四个团，一个独立营。

“九一八”事变初期，以东满延边为中心，在东北各地少数民族——朝鲜居民中组成“反日会”，不久，改组为“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团结着广大的朝鲜爱国志士，以联盟形

---

① 祁致中同志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在黑龙江右岸萝北地区游击战斗中牺牲。

式同中国人民团结合作，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抗联第二军同时也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在“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民族革命群众活动的基础上，创建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他各军领导干部成员和战士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会员参加。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中朝人民为共同事业，把鲜血凝结在一起。除上述抗联十一个军以外，参加联军的队伍，还有救国军残余姚振山司令（救国军起义首领之一）所部编成游击军，约六百余人。其中包括孔夫人、闵宪仁营长，他们从来是同情共产党的。在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副总司令孔宪荣及代理总司令吴义成先后向关里逃亡以后，他们团结在一起，立志不投降，不逃亡。在宁安以东，穆棱以南，东宁以西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接受吉东党的领导。一九三七年参加抗联第二路军。一九四一年春，孔夫人及姚、闵与日寇作战阵亡，所部大部战死。第二部分是迷信组织的“救国军”（山西五台山系）王荫武部队六百余人，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依兰、方正、延寿地区的农民组成的。一九三六年参加联军，接受党的政治军事的领导。一九三九年该部因作战人员锐减，十月间王荫武失踪，所部多战死，少数逃散和投降日寇。

在辽东和安奉铁路地区，有王凤阁的救国军千余人。一九三五年以后参加联军。一九三九年该部因战斗缩减，人数降至四百余人。一九四〇年完全战死。在辽宁旧东边道地区有反日山林队——“老双胜”（祁永全），一九三六年以后，正式参加抗联，人数多时曾达三千之众，一九三八年降至数百人。一九四〇年冬，“老双胜”部队除战死者外，瓦解星散。独“老双胜”一人坚持到最后，在桦甸、敦化交界的新开岭上的大森林

中一棵青松下冻饿而死。

在辽吉边区的救国军残部李洪滨（万顺）旅长，于一九三八年（吴义成逃关里后）约千余人参加抗联接受统一指挥。一九四一年以后，李洪滨负重伤离队，所部除战死以外，所剩不多，自行瓦解星散。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成经过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三年，由赤色游击队到反日游击队；第二，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初，由反日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第三，一九三五年初到一九三六年底，统一了军队建制，编为抗日联军十一个军。由第一军到第七军，从创建开始，就在党组织领导下，并得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反日会”、“抗日救国会”的支持，受到广大群众和“抗日救国会”的拥护。各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关，亲密团结。部队有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和士兵的群众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这七个军是抗联的基本力量。第一、二、三、五各军战斗力最强，富有活动力，政治素养较高，内部团结巩固，纪律严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又属第一、二、五等军。抗联各军的武器装备绝大多数是夺自寇军手中的新式武器：三八式步枪、四四式马枪、轻机、阻击炮、步兵炮、重机、迫击炮等。抗联各军在军制上，基本实行“三三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不设营）有五个连到七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分三组，班有十至十二人。但有个别军只编两个师，或编四个师到五个师。三军在一九三六年曾一度编到九个师，但很不巩固，一九三七年底定为四个师。

一九三七年抗日游击战争最高潮的时期，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人数发展到五、六万人。此外在统一战线影响下，固定地接

受统一领导指挥的约五千人，不固定的约万人左右。人民喜悦联军的壮大，当时在辽、吉、黑各省民间广泛地歌唱着：

十大联军十万人，
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
铁骑纵横扫妖氛。
但愿民族获解放，
白山黑水庆升平。

一九三五年秋，党中央指示撤销旧满洲省委，建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并将联军编为三个“路军”。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金川县河里地方，召开东、南满党和第一、二两军高干会议。决定：东南满合组为“东南满省委”。第一、二军编为第一路军。魏拯民同志担任东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同志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担任副总指挥。在通化地区、吉海铁路及安奉铁路的救国军、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很多参加了第一路军。游击地区西起辽沈，南达安东（今丹东市）及鸭绿江右岸，东到牡丹江至宁安以南。中间横贯图佳铁路，南段到京图铁路，东段到奉吉铁路北段约三十余县。

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依兰县的四道河子，吉东省委会上决定：以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军编成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姚振山、王荫武部队参加二路军，此外还有一些反日山林队和救国军残余不固定地接受二路军领导。周保中同志担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二路军的游击地区包括中

东铁路的哈绥线两侧，拉滨铁路以东各县，沿牡丹江整个流域及方正县以东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约二十余县。

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初，北满党组织和三军党委在汤原汤旺河建立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抗联三、六两军及松花江左岸的抗联其他部队。因内部思想混乱，组织纠纷，迟迟没有执行中央指示，建立“路军”。延至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会才发通告，正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以张寿篯（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许亨植同志任参谋长。当时政治委员未确定。第三路军下辖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游击活动区域沿松花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以东、黑龙江右岸，远至黑龙江平原，跨过中东铁路的哈满线到达嫩江下游三肇地区，共三十余县。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情绪更加振奋，“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发展了，许多游击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抗联的士气更加昂扬，如火如荼的游击战斗，燃遍了东北大部地区。尤其是在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下江地区的伪“三江省”，广大农村布满了抗联的“铁骑”，纵横不断地进攻和袭击寇军，使它遭到无休止的打击与损失；伪满军普遍动摇，成连、成营、成团的举行暴动投向抗联；有的消极、观望，不肯与抗联作战；有的被日寇暗中包围监视，不许他们和抗联接触。日寇认为这是必须“根除”的心腹大患，于是增加寇军关东军达五十余万之众，厉行法西斯恐怖统治，首先消灭抗联的基础，即支持抗联的人民。

七、斗争尖锐化

以旧军队抗日为主体的初期，因上层领导脱离群众，缺乏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没有持久抗战的决心，因而战略上是盲目的，作战方法是陈旧的与消极防守的。日寇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以部分寇军为基干，走狗伪满军为前驱，几乎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损失很少，收获很大。以至在旧军队崩溃以后，曾使人民群众抗日热潮受到打击，一时出现“谁做皇上给谁纳贡”的沮丧情绪。但是很快地代替旧军队而起的是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日同盟军、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这是新型武装——东北人民子弟兵，有高度的政治素养，有广泛的群众依靠。兵员的构成是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战士，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骨干。部队是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成立，在人民抗日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它具有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愿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思想基础。部队组织和军事生活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榜样的。满洲党组织和抗联领导干部，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必须在东北坚持进行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且这一斗争是同全国全局相连系的。因此认识到在游击战略上是持久的，必须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巩固自己，为争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在作战方法上，必须有高度机动性、灵活性，避强攻弱，避实乘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而自己则要尽可能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同时在游击作战过程中，利用东北农村人口分布及自然条件的特点，在靠近山区的地带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并不断地扩大新的游击区，使游击部队获得更多

的有利军事行动条件，人员物资补充有经常来源，作战后能获得休整训练场所。

日寇碰到的是这样新型的革命的人民武装，所采取的军事对策，也就不同于以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日寇开始在我根据地周围的基本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并初步实行消灭山边地区农民散户，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以图摧毁我游击部队与人民的联系。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深仇大恨，配合着游击部队行动，有组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敌人开展了争夺游击区域的斗争。南北满的游击地区不仅没收缩，反而扩大。在军事上，抗联部队更加机动灵活，主动的采取伏击、袭击和突然地进攻，使寇军兵力损失增大，军事设施不断遭到破坏。抗联部队从敌人手中夺取的精良武器装备不断增加，人员大量获得补充，部队不断扩大。游击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接之而来的就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游击战争高涨形势。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区卷入了游击战争的浪潮。但是，敌强我弱，敌人处于军事上、经济上绝对优势的地位依然持续，更因为日寇侵略我全国计划势在必行，因此对于巩固基地“满洲国”，以解除“心腹之患”的企图也就更加迫切，对我抗联的围剿就更加残酷。一九三六年开始，在南满和吉东地区，日寇厉行法西斯统治。

第一、加紧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保甲制、连坐法。把游击区的农民散户，一律迁移到便于日寇控制、监视的铁路、公路沿线指定地点，构筑集团部落。在部落周围，挖深沟、筑高垒、设自卫团、派日寇特务直接控制。各部落之间，互相呼应联络，以防抗联之袭击，也便于监视群众的行动。在

交通沿线及据点附近，禁种高秆农作物。农民的春种秋收，渔牧采伐，行商走贩，婚丧庆吊，亲友往来，甚至饮食起居，无一不在日寇特务监视之下。靠近游击区的城镇管制办法，也和集团部落相同。此外用抓丁、抓兵、抓“勤劳奉仕”的办法，控制青年于日寇掌握之中。凡集团部落以外的游击地区，一律焚烧。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散居着的农民田园庐舍化为灰烬，变为无人区。当时农民对日寇这种残酷的暴行编有两首小唱。（东北烈士纪念馆收集）

第一首：

（一）“九一八”事变，
民国二十年，
锦绣的东北日本来侵占，
小家底眼看就要完。

（二）门牌钉的紧，
户口勤调查，
十家连坐安上警察，
保甲费全得一齐纳。

（三）满洲狗官们，
丧心病狂了，
领导着日本鬼，缴枪又缴照，
反抗者杀的不能饶。

（四）汉奸走狗们，
狼心真可恨，
烧杀那农村他们的导火线，
全东北遍地狼烟。

（五）见人就屠杀，
无故被活埋，
市镇乡村遍地成了灾，
强奸妇女谁能忍耐！

（六）荒旱的年景，
人们过贱年，
吃穿不够还纳大租钱，
活倒霉捐税又增添。

（七）坚壁清野策，
强迫归大屯，
家业扔下全部进阴城，
城关上小鬼把门。

（八）实行挑兵制，
抓走青年人，
全家老少落进囚牢中，
眼睁睁无处逃生。

（九）看起来这个景，
大家都来干，
携手反日理所当然，
小家底搭上也合算。

（十）先为我们国，
后为我们家，
收复失地建立新中华，
唱歌跳舞锣鼓响乒乓。

第二首：

说起归屯泪淋淋，
东北民众们，
痛恨日寇来归屯，
归屯最难忍。
先归吉林省，
后归奉天境，
归成大屯，
屠杀我们中国人！
吉林归了屯，
全家归日本，
日本人按上衙门，
出入看得紧。
出门得挂号，
回来报原因，
要有一时错误，
全家性命难保存。
同胞弟兄们，
万众一条心，
联合反日的人，
奋起打日本。
收回东北地，
才有合家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才有中国人。

第二、厉行经济封锁，制定“经济犯条例”。抗联所需的粮食、服装、医药以及经费等等，凡来自民间募捐者或代为购办者，日寇一律加以禁绝。集团部落收秋时，经过特务清查地亩，做到颗粒归屯入仓，防止农民暗中留粮食给抗联游击部队。一切生活必需品施行“配给制”，特别是布匹、棉花，各有限额，若多购一尺、半斤，即做违法论。凡以粮食物资供给抗联或代采购者，一律枪杀，甚至牵累亲人，连坐邻里。

第三、加强政治措施，严厉惩治“政治犯”。在城市，特别在农村，大力摧毁共产党和抗日救国会地下组织。经常进行定期的或临时的大检查，拘捕“共匪”或“抗日匪”以及嫌疑分子，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强迫供认。凡被认为是革命的骨干分子就成批的公开屠杀或暗害，嫌疑分子被集中强迫劳动。在城市强迫各阶层上层分子参加“协和会”、“协和青年团”、“国防妇人会”等等，培养一部分走狗来钳制大多数。在农村利用少数地主、富农分子，给予特权引诱，迫使他们成为统治农村、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的支柱。以城乡的忠实走狗为骨干组成“宣抚班”、“工作班”，在宪兵和特务指挥下，跟随日寇“讨伐队”行动，专做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日部队工作，收买叛徒、逃兵等变节分子，以及派遣特务混入抗联内部，进行刺杀重要干部、策动叛降等等。从外部和内部动摇联军士气，瓦解联军。

第四、管制思想，推行奴化教育。凡是对日寇侵占、残酷压榨、侮辱、毁损等稍存异议，情绪表示稍有不满者，或对反对抗联的各种措施执行不力者，一律视为“反满抗日”、“思想犯”，其罪与政治犯、经济犯等同。重者处死刑，或被秘密押往杀人工厂抽血致死；轻者关监坐牢，或流放远方。伴之而来

的是奴化教育，伪造历史渊源，篡改地理沿革，使汉文变体，汉语成为“协和语”。风俗习惯强制效法日本，使长者“三缄其口”，青少年忘却祖宗。在社会上大肆宣扬“日满一体”，倡导“天皇至上”，说日本武士道的使命是要“黄种人自强”、“日满协和”、“满洲王道乐土”、“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满提携”等等。甚至欺骗世人，诡称日本是帮助满洲国走“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宣扬“日本皇军”的使命是反对“中国赤祸”，反对“苏联赤化”等等。

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日寇“中国通”从蒋介石反动派“剿共”那里学来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釜底抽薪”手法，加上日本法西斯自己的精心炮制，用来对付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毒辣手段，企图使抗日联军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赞助，孤军作战。

日寇不仅使用法西斯统治手段，还不断增加关东军兵力。在军事行动上也大有改变，在重要的地区，集中重兵，把伪满军控制在后面，以便于监视和使用，而以日寇充当第一线；同时分地区包围封锁，依靠集团部落坚壁清野、稳扎稳打，长时期的对我军搜索进攻。在一地区内不断来回拉网，甚至采取“篦梳式”、“踩踏式”步步前进，肃清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向其他区域进攻。

日寇虽然采取异乎寻常的法西斯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一切恶毒手段，来进攻抗联，但是他们的所谓“满洲国治安肃正”、侵华“后方基地巩固”这一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七七”抗战初期，抗日游击区域虽然开始不稳定，后方根据地屡屡受到破坏，但是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加紧打击与牵制敌人，南满我军迫近沈辽地区，扰乱安奉铁路沿线，进出鸭绿江

岸；东满部队活动于吉辽边区，不断袭击京图铁路沿线敌人据点、吉东及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右岸。各军展开积极活动，不断打击敌人，挫败敌人的围攻，致使伪满军成营成团的大批哗变、起义，投向我抗日联军。一九三八年间，吉东部队冲破敌人大包围，突入敌后，回到老游击区，开展靠近哈尔滨、吉林间的胜利活动。松花江北岸部队主力，越过小兴安岭，进入黑龙江平原，开辟了二十余县的新游击区。一九三九年攻克克山、北兴镇、讷河、德都。一九四〇年活动伸张到嫩江下游，突入三肇地区，攻占肇州、肇源，震动了长春、哈尔滨，引起了伪哈尔滨航空学校学生三百余人哗变出走。

这一尖锐斗争，自一九三七年起持续到一九四〇年底，虽然使敌寇受到严重的挫折，侵华与反苏基地遭受巨大牵制与破坏，但我联军各级干部、战士也不断蒙受牺牲损失，广大民众受到空前的摧残、压制。由于联军同人民群众的隔绝，游击作战的困难越来越多。

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以后，日寇为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增加到七十余万。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我联军虽在游击战争方面仍有新的发展，但东北游击战争处境已十分险恶，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急剧趋于低落，接着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时，日寇增兵满洲数达百万左右。这样大的兵力，在日寇进攻苏联处于待机期间，便把它使用来对付抗联，迫使我军陷入窘境，造成抗联后一时期的挫败。

八、坚持苦斗，东北光复

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整个形势，实际上已趋向于急转直下，处于不断遭受挫败的形势（黑龙江省游击部队暂时例外）。我联军游击部队已逐渐丧失机动灵活的战术活动，每每不得不在被迫情况下作战。战斗部队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裂肤的苦境。即使是胜利的战斗，给敌人以惨重的打击，但我方损失仍极严重，得不偿失，人员减少，得不到补充。武器虽多，但大部分埋藏或毁坏。在这样情况下，根据地完全丧失，游击区受到破坏，问题严重到了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地步了。

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以“吉林省委”、“北满省委”集会讨论，估计到满洲新的情况，提出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方针，重新配置力量，制定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开始积极着手将第一路军各军缩编为一、四、七三个支队。第二路军各军缩编为二、五、八三个支队。第三路军各军缩编三、六、九、十二四个支队。部队经过初步调整之后，人员虽然锐减，但政治情绪稳固，思想坚定，组织和纪律更加严明。在游击活动上以保存实力为主，采取高度的运动，远距离的“游走”，以避免敌人的围攻和追逐，特别是在敌人最容易活动的冰雪季节，避免与敌人接触。此外在条件有利，不易为敌人侦察发觉的林区，各部队派出相当人员，散种农作物，自己准备必需的粮食贮藏。只有在明了敌情，情况十分有利的条件下（春夏之交及夏季易于隐蔽），才能迅速集中兵力，对敌人的孤立据点，或远距离脱离据点的敌人，给以意外的歼灭性打击。打

了就走，使敌人不易跟踪反击。

对党和群众工作，首先对被敌人摧毁的老游击区的党团组织以及抗日救国会的组织，进行严格的整顿，完全采取地下深藏的方式，并且不得与游击部队发生联系。

一九四〇年的一年，抗联就这样紧张地机敏地进行了东北各地区的游击战争。但是仍然不能避免继续遭到严重的损失。黑龙江省平原游击活动在这时期曾有开展，但到一九四一年急剧趋于恶化，仗打的越多，敌人的损失虽然不少，但我方的困难有加无已，因死伤减员得不到新的补充，部队日趋缩小。

一九四一年初，中共东北各省委再度集会商讨，正确估计全国抗战所处的形势、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影响及发展的前途与东北抗日斗争的远景；同时克服了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中所发生的取消主义，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革命旗帜，坚信最后胜利的远景，坚决贯彻保存实力保存干部的方针。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初，坚决实行合并东北三个省委为一个"东北党委会"，合并现有抗联各军为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部队。把这个部队的主力两千多人，完全控制于黑龙江下游深山密林与日寇完全隔离的地带，专门进行党的思想、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教育训练，认定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新时期、新变化到来时新的斗争种子，非必要时绝不滥用一人。另外分编了十五个小部队①，每一小部队由十五到二十人组成。分遣于北满地区者四，吉东和延边者八，吉辽边区者三。这些小部队的基本任务是：（1）侦察敌伪统治状况（以军事设施为主）；

① 小部队不止十五个，周保中同志这里所指的是经他负责由抗联野营部队中派出活动的那部分小部队，其余部队未有涉及。

（2）准备局势新变化时期，大规模游击部队的临时依据场所；（3）秘密联系群众，进行地下党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作；（4）可能条件下在群众中组织地下武装。这些小部队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经过挑选的中级干部，而战士是更能吃苦耐劳的优秀分子。这些小部队的活动是和主力分离开的，由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直接领导。

一九四二年“八一”是有历史意义的节日，主力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训练教育，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底，整整三年，部队干部和战士有系统地学习了党的革命历史和重要文献。依据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对照东北实际斗争情况进行了“整风”。在干部教育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与战术著作。这一时期部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士，在政治思想修养方面，及革命文化水平方面都有所提高，身体有了很好的恢复，特别在现代化军事战术、技术、技能方面有较好的锻炼和收获。从过去因战斗负伤和患病人员中，选拔出成百的人员补充部队。这支部队在数量上同一九三七年高潮时期，是不可比拟的，但在质量上焕然一新，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指挥能力、作战能力和工作能力增强百倍。

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这一时期东北的游击运动，虽然消沉，但并不是象日寇所宣布的什么“满洲国共产党根绝”，“匪患肃清”，“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一九四二年伪北安省区、伪吉林省区仍有我小部队突然出现袭击日寇据点，以及伪三江省区，密山、宝清、佳木斯间的交通运输被我小分队截击。驻兴河镇的伪军一个连起义投向我二路军二支队。一九四三年十月末，哈绥铁路线乜河站南沟日寇据点被我小部队袭

击，二十余日寇被歼灭。该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伏击追兵又消灭日寇百余人。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吉辽地区、伪通化省区，我小部队也有个别袭击活动。甚至在奉吉铁路线和拉滨铁路线，以抗联名义突然出现的自发游击斗争时有所闻。在日寇心脏区伪满新京及沈阳、阜新、抚顺、本溪等地，受我党地下活动影响，怠工、罢工、集中营里集体反抗、逃亡等等抗日的政治性事件仍不断发生。

燎原的烈火，虽然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期间，被日寇暂时遏阻，但是更大的燃烧正在新的酝酿着，最后焚毁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侵略者，恢复东北锦绣江山，解放东北人民的信心和斗志是坚定不移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末，当我们从无线电收听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及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摘要时，东北党和抗联领导同志，就预想到未来的新任务。接着就是五月九日苏联攻克柏林，结束了反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战争。东北党委会和抗联指挥部欢欣鼓舞，认真研究了新形势，动员主力部队和分散活动的各小部队全体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在一致行动计划下，加紧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全线攻入我国东北。中日矛盾交错复杂的纽结被苏联红军万钧重锤打开了。东北抗日联军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与来自华北的八路军东进部队汇合，踊跃地协助苏蒙军作战，消灭了盘据东北十四年之久的日寇百万关东军，捣毁了傀儡满洲国，解放了东北人民，使长白山重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黑龙江扬起了响彻云天的巨浪。中共中央象“九一八”事变当时一样关心东北，为了保证光复后的东北领

土和获得解放的东北人民，不重蹈历史覆辙，不被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出卖，在全国抗战胜利之后，领导东北人民高举民主旗帜，谱写了东北人民自卫斗争的新诗篇。

九、战例

敦化——额穆地区连续攻击作战

一九三五年十月，东满延边、吉东、牡丹江和宁安地区的日寇进行冬季“大讨伐”。我抗联第二军、第五军部队分散活动。二军突破汪清、延吉敌人的包围，五军突破宁安敌人的包围。二军四师与五军一师在镜泊湖左岸汇合，接着在敦化、额穆两县地区开展活动。这一地区敌人的兵力配置和防守都相当薄弱。

十一月下旬，我二军四师第十团向敦化县以东地区佯动，袭击沙河防所、大石桥车站，并越过京图铁路向大荒沟前进。我二军主力十一、十二两团及五军一师一、二、三团集中兵力统一行动，由李荆璞、陈翰章等同志任指挥，准备袭取官地，打击通沟岗子的寇军。十二月七日四时，我二军十一团，五军一、二两团约九百余名兵力，由二道沟方面秘密运动，绕过官地赶到通沟岗子以北，潜伏在大沙河沿岸柳丛中。午前六时，我二军十团、五军三团逼至敌官地街东口和北口防所，我攻击部队用集束手榴弹猛炸防所，并施以火力打击。两个防所的自卫团除被打死者以外，都向我军交枪投降。在小街中心，日寇教官三人率伪军中队据守抵抗。激战不久，西防所亦为我军攻破，伪警察队一个排也缴枪投降，其余敌人在中队部顽抗。激

战一小时，日寇教官被打死，敌人停止抵抗，我军完全占领官地街。此次战斗打死日寇三人，伪警察队及自卫团二十二人，伤十五人，其余一百五十人全部被俘虏。我军占领中队部以后，即威逼伪警官用电话向通沟岗子的日寇说："'共产军'袭击官地被击退，仍有继续进攻的模样，请求火速增援。"通沟岗子驻有日寇小林部二百名，闻讯后，慌慌张张全部出动，午前七时向官地大道前进。敌人的部队刚要拉长行军的序列，就遭到我潜伏在通沟岗子东北面的伏兵猛烈的袭击，敌人一部就地抵抗，大部企图退回通沟岗子村边反击。但通沟岗子小街已为我二军九团完全占领，从南面集中火力袭击敌人。敌人陷入包围圈中。激战至午前九时三十分，战斗胜利结束，除漏网逃脱的寇兵十余人以外，全被我军歼灭。此役计缴获三八式步枪一百六十余支，杂色枪五十余支，重机一挺，迫击炮四门，轻机枪九挺。通沟岗子自卫团四十余人全部投诚。

我军在官地、通沟岗子连住三天，召开群众大会，打开敌人仓库，把粮食物资分给群众，并发动群众清除走狗，布置了地下抗日救国组织工作。

十二月十七日，敦化县寇军联队部派出一个大队约七百人，以伪警察大队三百人为前驱，经黑石屯向通沟岗子、官地进犯。同时延吉明月沟日寇已越过哈尔巴岭西向大石头、沙河沿、大桥铁路线增兵封锁，以防我军闯过铁道。但我军并无此打算。月底，寇军以三个中队约五百余人兵力及伪满教导队、警察大队魏部（绰号蒙左）三百余人，防守官地及通沟岗子。另一个日寇中队约一百五十人及额穆伪警察大队的一中队一百余人，驻黑石屯镇。该警察大队约四百人驻守额穆索，组成敦化东北和西北的连络网，互相策应，但不敢远出。

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我二军二师第四团，四师第十一团，五军一师第二、三两团千余人的主力部队，在南湖头江西岸——马家屯附近秘密集结。二军四师第十二团，五军一师第一团约六百名兵力，于一月四日自二道梁子方面向官地以东沙河沿佯动，吸引官地、通沟岗子敌人。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将向铁道移动，拟在铁道线夹击我军。一月六日傍晚，我二、五两军主力四个团沿牡丹江西岸强行军。一月七日黎明前绕至距黑石屯西街口三里之土岗潜伏，按事先侦察清楚的敌情部署进攻。二军两个团担任攻击西南面，五军二团担任东北面。第三团为预备队，控制黑石屯东牡丹江岸，准备阻击官地和通沟岗子方面的援军。午前六时，敌西防所发现我军行动，向我首先射击，我军西南进攻部队即展开勇猛进攻。西防守所伪警察队不敢抵抗，当即交枪投降。我进攻部队直迫日寇防所，该敌利用房屋设置街垒，在屋内挖枪眼、堆沙包顽固抵抗。我进攻部队将敌人截为东西两段加以压缩，并占据屋顶及控制街口，用猛烈火力及手榴弹逐段扫荡前进。激战至午前十时，寇军一百五十名完全被我歼灭，伪警察大队及自卫团二百人除死伤二十余人外，全部投降。

当黑石屯镇被攻击时，我二、五军南进部队正展开对沙河沿、二道梁子各防所及大石头车站进行积极扰乱破坏活动，攻克沙河沿小街。因此通沟岗子及官地的日寇不敢出援，仅仅派出伪警察队二百多人向黑石屯试探前进。但经我江岸部队迎头痛击，战斗半小时，敌人即狼狈逃归官地。

午前十一时，我军完全占领黑石屯镇。配置警戒，处理战利物资，召开群众大会，部队进行大休息。

一月八日午前十一时我军撤离黑石屯镇，估计官地、通沟

岗子敌人不敢出动，乘额穆索(老县城)守备伪军动摇，决心攻打额穆索。一月九日午前五时，我二、五军主力前进至额穆索附近，首先沿河岸北面，将城西和城南包围。突击部队沿通往黑石屯镇、官地的大道向城东防所攻击前进。伪军关大队长率警察大队二百余人死守顽抗，但城西南面防所已被我河岸攻击部队突破。我迅速向街东敌大队部压缩，激战二小时，敌人支持不住，伪军关大队长率一个中队九十余人突围狼狈南逃。午前八时战斗结束，将额穆索完全占领。此役计打死日寇指导官一名，教官二名，宪兵六名，击毙击伤伪军官兵五十余人。俘虏伪警察大队人员二百七十名，伪警察四十名，自卫团六十名。夺获敌人的各种枪支三百八十余支，重机二挺，轻机五挺。解放了在监狱内关押的“人犯”百余名，没收了敌人遗留下的不少物资，除部队带走外，其余一概分发给地方群众。

午后三时据探报，敦化县敌人从秋梨沟及通沟岗子两路来援兵一千二百人左右，南路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至距县城十五、六里的老岗附近，此时我二、五军部队满载胜利果实向城东北塔拉站方向转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底，两个半月时间，我二、五军联合部队，冲破敌人在东满延边及吉东宁安地区的“冬季讨伐”，进入敦化、额穆地区开展活动。除上述连续作战击毙寇军约四百名，伪军约百名，俘虏伪军约六百余人以外，其他与敌人接触战斗十余次，共击毙寇军二百五十名，伪军五十名，俘虏伪军自卫团二百余人，使敌有生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同时开展了这一地区广大群众中的抗日救国宣传和组织工作，鼓舞了人心，提高了我军士气，总结了战斗经验。部队接受了成百名优秀农民参军，扩大了抗日武装实力。

一月中旬，我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秘书长石光等同志到达镜泊湖北湖头五军军部，召开了东满党委临时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任务。王德泰、李学忠等同志西去敦化。我二军四师全部向东图铁路以南顺利转移。二军二师四团、五军一师全部继续在额穆东及镜泊湖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莲花泡防御战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根据吉东党委和五军军部的指示，我第一、二、三团全部逐渐向镜泊湖及宁安西南转移。一则为了执行新开展五常、舒兰地区的游击活动作准备，再则该师两个多月在敦化、额穆地区的积极活动之后，部队需要整训和休息。但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部队领导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于是造成了莲花泡防御战的惨重损失。

二月二十日前后，正值旧历春节，我五军一师各团从额穆出发，进至距东京城三十余里的吊水楼西北地区。一师六团的干部和战士多半是这一地区的农民子弟。群众欢迎自己的好儿女，杀猪宰羊款待胜利归来之师。白天我们战士串亲戚访朋友，夜晚开军民联欢晚会，唱歌跳舞，尽情欢乐。虽然师部已搞到情报，东京城日寇有“出扰”的消息，但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工作员说：“来了就打，怕什么？”实际上是麻痹松懈，孕育着惨败的危机。

我部队以莲花泡北部石岗子为中心，指定第三团在东北方向的石滩布置警戒；第一团对沙兰站方向配置警戒；师部直属队和第二团驻莲花泡北面。总的估计东京城敌人不敢轻出，如来进犯，即利用莲花泡现地连绵不断的大石滩错综复杂的地形，就地消灭敌人。

二月二十七日夜间，驻东京城的日寇将防务所交给伪军步兵二十七团第一、二营。寇军七百余人及伪军二十七团第三营为主攻部队，夜间出动，向莲花泡秘密前进。另有伪军骑兵第三十三团，骑兵八百余人，自东京城、上马河一带出发，向吊水楼以北地区前进，准备截断我北湖头交通联络。后来寇军指挥改派伪军第二十七团三营转向花脸目方向警戒，防止我军向沙兰站转移。

二月二十八日拂晓五时，敌先头部队进至莲花泡东石港子屯。我第三团前方警戒部队即开展攻击。李荆璞师长命令第三团团长王汝起全部加入战斗。敌军攻势甚猛，激战二小时，我师部及第一团驻地亦受敌人围攻。此时李师长命令第一团就地抵抗，第二团全部自右侧反击。激战至下午二时，我第一、三团大半面被敌包围。我第二团反击屡遭挫折。战斗陷入不利情况，敌人又开始炮击。阵地上顿时烟雾弥漫，战士们均感头昏脑涨，神经麻痹。敌人都戴上防毒面具，步步向我军逼进。我军估计敌人是使用了化学毒气，战斗不能持久，乃下令各团用火力猛烈反击，敌人迅速分路撤退。于是我军亦指派第二团第二、四连掩护，在下午四时许撤出战场。主力撤走后，掩护部队第二团第四连马连长带着十九名战士还深陷在敌人包围圈中，且都处于半昏迷状态。马连长命令战士停止射击，缩紧距离，隐蔽潜伏。寇军指挥村田中佐以为战斗结束，耀武扬威地指挥寇兵，搜索战场。马连长突然以手枪连击，将该中佐击毙。其余战士都发出他们最后一粒子弹射击敌人，给敌人以重创。终因寡不敌众，马长连及战士们壮烈牺牲。

这次作战，虽然寇军被击毙村田中佐以下官兵七十余人，伤二十余人，但我军阵亡亦有七十八名，负伤四十五名。损失

步枪六十支，轻机三挺，消耗弹药甚多。这是游击作战上一个惨重的损失。战斗结束以后，地方抗日救国会代备棺木，埋葬了四十二具烈士尸体（实际上阵亡者不止此数）。日寇卑鄙丑恶，深恨我军猛烈抵抗，尤其他们认为战斗已胜利结束时，村田中佐以下十数名官兵最后被打死，因而大发兽性，破坏我战士尸体。

抗联同志们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牺牲的先烈，写了一首诗，悲壮地悼念他们：

江水映斜晖，黑山云雾飞，
镜泊湖上，涛光苍茫，
白昼起寒微。
山麓列青冢，湖畔碧野，
荒蒿蓬蓬，英雄去不回。
天涯芳草系忠魂，旌旗伟，
义气轻生死，英风永世垂。
壮志未酬啼遍野，
午夜惊闻雁泣西风悲。

二月二十八，追恨志无涯。
血溅青石，尸陈遍野，白骨沉黄沙。
慷慨奋捐生，同志四十又二名。
浩气贯长虹，壮烈长铭齐行，永震敌胆惊。
回首江山易，强奴肆纵横。
新仇旧恨何时了？
墟芜千里遍地起悲声。

敦化寒葱沟伏击战

一九三六年三月，抗联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在敦化马号附近与军长王德泰、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还有一、三、四各师干部，开过了东满省委会议，扩编二军为四个师，规划了游击活动任务：第三师暂留敦化、延吉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第一、四两师向安图、桦甸地区移动，作进攻安图县的准备。首先必须拔除控制敦化、安图、桦甸三县交界的大蒲柴河的敌人据点，但是必然引起敦化敌人的增援。于是决定，先在敦化以南地区命第三师展开积极活动，引诱敦化敌人，并派小部队在大蒲柴河、腰岔子等地作攻击大蒲柴河的活动。把主力一、四两师约一千一百余人秘密控制在敦化玉皇庙、一棵松一带，准备相机打击敦化出援之敌。

二月七日敦化日寇五百余人，伪警察大队二百五十余人果然出动，当天晚上进至马号宿营。经我军探明：敌军将继续向大蒲柴河前进，准备在那里短期驻扎"搜剿"。

二月七日晚，我第一、四两师向寒葱沟移动，拂晓到达岭顶，在北山坡大道两旁，利用森林障蔽，依大树和深沟作掩体，各距离约三十至五十米，布置了伏兵。我第三师十团、十二团亦同时向寒葱沟口移动，准备封锁沟口。

二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寇军尖兵六、七十名，进至寒葱沟口附近搜索，并未发现我军踪迹。日寇在前，警察大队在后，陆续沿着曲折的山道上山，往寒葱沟岭顶前进。正午，敌军完全进入我伏兵线内，尖兵进至距山岭半里，我军土地雷忽然沿大道同时爆炸，伏兵一齐开枪，经十分钟的工夫，尖兵全部被打死炸死，狼藉满道。我三师十、十二两团，在山下封锁了

沟口，并向伪军猛烈射击。激战约一小时，伪军二百余人除被打死十数人，其余全被缴械，并将敌兵运输弹药给养军需品的民伕队三百余人完全卡住。此时寇军主力四百余人，沿路卧倒，死力抵抗。我军组织交叉火力，猛烈射击敌人，并掩护冲锋队前进。激战至下午三时，我军第二次冲锋与顽抗之敌肉搏格斗。敌军死伤过半，残部向山下狂奔，又被我军三师部队截击一阵，敌人仅剩下一百七八十名，向马号方向逃窜。

下午四时，战斗胜利结束。共击毙寇军三百五十余人，伤五十余人，被俘七十名。伪军全部消灭。缴获长枪五百余支，轻机十六挺，步兵炮四门，狙击炮六门，无线电通讯机两部，其他弹药粮食甚多。我军姜指导员、张连长以下二十六名阵亡，伤十余人。

二月九日，我军进行整顿，仍留三师在敦化东南地区活动，军部直属队及一、四两师，十日晚十一时，自寒葱沟岭顶出发，分两路南走，准备乘胜夺取大蒲柴河。军直属队及四师部队主攻大蒲柴河，一师两个团经腰岔绕至大蒲柴河伪警察大队防所西方，沿富尔河设伏，以防敌人向西退逃。十日，拂晓五时，我军主攻部队直迫大蒲柴河东口，将防所攻下。另一部攻下小街西北敌人大部防所。伪大队长率两个中队，果然沿富尔河上游逃遁，为我一师伏兵截击，除伪大长带亲随数人落荒逃脱以外，全部被俘缴械。此次战役，击毙伪军官兵八人，伤三人，共俘虏伪警察大队二百人，自卫团六十人。

我军拔除了敌人据点，一连住了五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地下工作，散发敌伪仓库存粮，清除走狗特务等等。

经过寒葱沟战役，寇军再不作加强大蒲柴河据点的打算，仅

仅派了几名日本特务利用反动地主武装组织"自卫"。反动地主头子也耍两面手法，既敷衍寇军，也讨好抗联，使大蒲柴河在我辽吉边区形成"中间地带"，达两年之久。

猛攻抚松城

抚松县城住有寇军二百五十人，另有敌企业人员（带有武装）二十余人和伪警察大队约五百人。日伪军经常出扰，阻碍我第一军和第二军的联络。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我二军军部放弃了进攻安图的原定计划，将主力第一、四两师及军属警卫团由富尔河、汉阳沟渡过松花江，向万良河、清江甸子、大苇沙河一带移动，准备进攻抚松县城。进攻部队除二军主力一千五百余人以外，还有救国军司令吴义城、李洪滨部队约六百余人参加。五月十五日，我二军主力分两路沿头道江上溯。一路于十九日绕至抚松城南山，一鼓作气先将南山少数守军扫除，占领了南山高地，逐渐扩张占领了东山。救国军部队已从黄泥河子西进到达河叉沟附近。此时敌军将街外据点收缩，以西大街和南街口为抵抗核心，构筑工事，加强城围防御，作固守待援的准备。

我军以全歼敌人占领城市为目的，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南和城西。五月二十日，拂晓四时，我东南山阵地三门迫击炮同时开火，集中射击街西和街南敌防御阵地。敌人迫击炮亦自城内阵地向我回击。攻击部队同时迫近城围施行火力猛攻。激战至九时，我南面及东面攻击部队将敌城攻破，突入南 街 口 及 东街口。敌人退据县衙门和大队部以及西大街，顽强抵抗。敌人几次反击，均被我击退，我各突击队步步逼近守敌。下午一时战斗进行得越加激烈，敌人欺我迫击炮早已不响，诱我大量消耗子

弹，一再举行局部反攻。魏拯民政委留在南山指挥所，王德泰军长、李学忠政治部主任亲自率领预备队警卫团三百五十余人加入突击战斗，前进至市口中心，攻击县衙守敌，打死伪大队长后，转向西街寇军抵抗中心。此时我城东攻击部队亦绕至街北攻入北大街，敌守军伪警察大队被我缴械俘虏者三百八十名，其余全部被打死打伤。寇军受重创，缩至西街，继续顽抗。战斗到下午三时，西街的三个寇军据点全被我军攻破，寇军嚎啕惨叫不绝，所剩无几。下午五时，敌人停止抵抗，寇军官兵被我击毙者二百二十人，活着的三十余人及武装企业人员十四人被我俘虏。伪县长及日本指导官逃跑。监狱里各种“犯人”三百余人被我释放。

猛攻激战，当日胜利结束，除了消灭全部寇军外，还虏获轻重武器及其他胜利品甚多。

战斗至中午，虽然敌机四架轮番在抚松上空向城外我军扫射，但并无损伤。敌人期待濛江方面增援落空。

我军在突击战斗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同志、一师政治部主任周树东同志阵亡。团长负重伤者二人，轻伤者一人，营以下干部和战士阵亡者五十五人，重伤者十人。

此次战役，联军声威大振。寇军经过数日之后，才由濛江调警卫旅一个团，收拾残局，重新布防，但不敢远出骚扰了。

战役胜利，收获虽大，但对伪军抵抗程度估计不足，以至激战延长整日。我方伤亡重要干部和很多战士，这不能不是一个教训。

待马沟——水平站袭击列车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我二、五军联合部队，从牡丹江市地

下组织得到机密情报称：两日内日军将有特别货车一列，傍晚五时左右由牡丹江东站出发，开赴绥芬河国境。该列车由日伪兵混合队护车，兵力不详，但不会很多，估计晚七时该列车到十站（磨刀石站），中途稍停即继续东开。

当时我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二军二师副师长兼四团长侯国忠，在十站以南接获情报后，研究情报，估计敌人护车部队至多不到四百人，预想设伏兵袭击该列车。

我二军二师四团的一、二、四、六、七连及五军警卫营一、二连约四百五十人为主力，附轻机十二挺，狙击枪四门，还有反日山林队黑山部队一百名配合（该队特别熟悉地形）。

九月十一日晚，我军轻装急行军，由十站南沟向预期设伏目的地待马沟车站方向移动。在森林中，经一昼夜的隐蔽行军，于九月十二日上午四时到了距待马沟车站十里左右之南山休息待机。傍晚，张主任和侯副师长详细侦察了地形，并拟出初步计划之后，召集各连党员干部开会讨论，决定在待马沟东七里水平站附近设伏兵袭击夜间通过的列车。入夜，该部队进入水平站附近，进行编组。将二、五军的各连编为四个战斗队。黑山队员分散配属在四个队里为向导。水平站以西铁路两侧地形险要，构成一条深谷，铁道从西往东经过谷底。铁道北侧约一里长的石砬子，顶巅距路面虽然不过六十米，但斜面颇为峭峻，为风化岩石，起伏蜿蜒，地形错杂，三个战斗队即埋伏在这一线上；另一战斗队以错角方向配置在铁道南侧为断绝地。预计将敌人列车巅覆在这里，伏兵准备以猛烈火力消灭抵抗的敌人。

一切伏兵都部署好了，并将铁道外侧线上的道钉转松了。果然十六日夜晚八时四十分，敌人火车从西向东急驶。火车到达

破坏处，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前大半部脱轨颠覆，向路南断绝地倾倒。道北我伏兵一阵猛烈火力射击，我两个战斗队向未倾倒的列车前进。但已经判明，倾倒的前半部列车为日寇军，未倾倒的后半部列车为伪满军和军马车。于是我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专打日本兵"。伪军慑伏车中不敢动弹。日军仓皇应战，有的在车中，有的在铁道上死力抵抗，但终于被我火力压迫于断绝地深沟里。敌仍然拚命抵抗，部分发生肉搏战。激战到半夜十二时，日寇抵抗渐渐薄弱，我军估计牡丹江、乜河等处日寇敌兵可能增援，战斗持续过久，反而不利，于是南北两面的我军各突击队于黑暗中向残敌猛冲前进，用炽盛火力消灭陷于深沟中的寇兵，并将潜伏在火车厢中的伪军百余名如数俘获缴械。同时收缴被击毙的日寇武装弹药，举火焚烧了火车。我军于十七日夜一时撤离战斗，释放俘虏，携带着胜利品，向铁道南泉眼河方向迅速撤走。

此次战斗极为激烈，达五小时之久，敌人遭到沉重打击。除隐藏在深沟里的五十余人寇兵得以幸免，共击毙日寇一百九十余人，伤五十余人。焚烧满载军用建筑物资的火车一列，击毙军马一百六十四。缴获步枪三百五十四支，手枪八支，轻机十挺，狙击炮三门，步兵炮一门，子弹五万余粒。将不能带走的敌人遗弃的武器、装具、器材悉数焚毁。

肉搏战斗中，我二军四团七连连长（模范连长）张颜明、队员梁洪章、张发思等九人阵亡，负伤十二人，失踪一人。

这次战斗的特点：第一，估计正确。虽然牡丹江送出的情报没有说明列车上的兵力，但张主任、侯副师长根据条件和辅助情报推断，该列车不论日军或伪军至多不会超过四百人；第二，选择颠覆列车的地点和破坏铁道的方法非常恰当。水平站地形

良好，适宜设伏，该地西距七河站、十站五十里到七十里，东距老穆棱站三、四十里，到小绥芬河国境线站不到百里，沿站驻有较大兵力的日寇守备队，平时防备较严，敌人“志骄意得”没有设想到我军敢于突然出现，设伏阻击；第三，在列车颠覆后、战斗接触时即用密集火力猛冲猛打，使敌人不能有效的反抗；第四，行动隐蔽、机敏，事先兵力运动，敌人毫无所知；第五，伏兵布置周到，战斗动作快捷勇猛，虽然在夜间作战，但是我方火力联络与行动衔接有条不紊，收到了预期的战斗效果，消除了由于对敌寇兵力和抵抗程度估计不足所产生的缺点。

大盘道伏击战斗

一九三七年一月驻后刁翎街的日寇步兵三百七十余人，准备向林口撤走，勒令居民出爬犁（雪橇）二百余张。消息经地方抗日救国会秘密通知我五军。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就直接收集情报综合研究，认为后刁翎日寇七百余名，约一半多兵力在严寒的季节向林口移动，要是利用爬犁，行驶迅速，至多只要七、八十张就够用的了。现在日寇征发爬犁二百张以上，必定是输送军用物资，其行动不是轻捷，而是笨重。柴世荣同志决心指挥五军二师杨绍成同志的第五团全部及军部警卫营、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共八百余名兵力，于一月二十七日夜晚，自徐家屯附近秘密移动。二十八日午前四时到达大盘道山上。柴军长亲自部署：第五团及警卫营占领大道两旁柳条沟和山坡上的隐蔽阵地；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控制在大盘道北面蛤蟆塘山上。埋伏袭击的准备一切都停妥了。鹅毛大雪满天乱飞，冰雪覆盖着大地。我们的战士静悄悄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

面，忍受着刺人肌肤的猛烈的朔风。从上午七时到正午，还不见敌人的踪影，各部队战士们出现难以忍耐的样子，有的同志埋怨说："白来挨冻，哪来的敌人。"柴军长传令："忍耐着，鱼儿一定来上钩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发现敌人，听从指挥，猛打猛冲。"

果然午后零时三十分从北方传来"吱吱嘎嘎"的声响，我们的战士立刻精神振作，全神贯注地瞅着远方的公路。不一会儿，敌人的尖兵五十人，坐着八、九张爬犁，弯弯曲曲地向盘道上前进。看样子，敌人冻得缩手缩脚的，顾不及警戒搜索了。尖兵过后，寇军大队一张爬犁接着一张爬犁地拥挤前进，都进入了我军的"口袋"。然而敌人什么也没有发觉。午后一时，大盘道西山上的指挥所突然发出信号枪声，指战员们紧张地投入了战斗。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价响。日寇被打得人仰马倒、爬犁翻倒。许多寇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毙命了。有的在公路上狼狈奔窜，还有的顽固抵抗。战士们端着刺刀勇猛地冲上去，寒光闪闪的厮杀里，传来一阵阵鬼子兵的惨叫声。敌人被横冲直撞地扫荡着。我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的同志们象出穴的小老虎一样，猛打猛冲同敌人展开鏖战。

激战到下午四时，战斗胜利结束。日寇官兵三百六十余人全被歼灭。我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生俘日寇二十八人，夺获敌人全部轻重武器和皮大衣、军毛毯、钢盔、弹药、粮食辎重等不计其数。警卫营一个连、青年义勇军、妇女团和第三团、第五团的两个连用缴获日寇军的物资装备了自己。

当晚，我军清扫战场后，就在大盘道村宿营。群众欢天喜地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我军截获拉爬犁的马五百余匹。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反动地主的一律没收，其余农民的遣散回

家。第二天黎明以前，我军向大顶子方向转移。

夜袭前刁翎屯

大盘道战斗胜利后，驻在刁翎的还有寇军二百余人和伪军二十六团一个营，另一个营分驻前刁翎，小心谨慎而又胆战心惊地龟缩在那里，不敢出扰。尤其是伪军心里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高兴我军狠揍了日本鬼子，消灭了那么多人，就象替他们出了气似的；另一方面恐怕我军进攻他们，小心防守。我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估计到了他们的心理，决心趁战胜余威，敌人处于动摇状态的时机，一举歼灭前刁翎的伪军。

二月一日傍晚五时，我三军第四团警卫营和青年义勇军全部，自徐家屯附近集结，强行军走了三十多里，到达前刁翎西山。分配第四团和第五团六、七两连攻打防所伪军。警卫营和青年义勇军布置在前刁翎北面到西小屯，准备阻击后刁翎出援之敌军。预计夜间十一时攻击开始，至多三小时必须解决战斗。

前刁翎伪军二十六团第一营四个连，分驻三处：营部和一连驻北面张家大院；第二、三连驻西防所；第四连驻东防所。伪军士兵虽然心情紧张，但惦记着快过春节了，欲向老百姓勒索。夜十一时三十分，我四团杜团长亲自率领突击队，从屯子北面沿大道隐蔽前进，得到在伪自卫团里做地下活动同志送出的“口令”，并指出伪营部及第一连确切驻地。突击队先头组直接向村里前进，敌人哨兵发觉问“口令”，我突击组随即答应“×××”，敌哨兵接着叫道“站住！干什么的？”我突击组突然向前俘住两个哨兵，将哨兵不声不响地带到一边，得知情况后，急速进至营部大院前门，用事先准备好的梯子搭到墙上，跳入院内将大门打开，一拥而入，扑向院落四角的炮台。伪

军来不及抵抗，均被我缴械。此时，我进攻部队完全包围了整个院子，向伪营长住所及兵舍猛烈打了几排枪，扔了几个手榴弹，同时高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枪不要命！"敌营长从梦中惊醒，指挥住所伪军从屋内往外打枪，妄图抵抗。但被我军集中火力，一阵猛烈打击，伪营长和几十名伪军被打死在炕上。门前窗下横躺满地。其余的伪军全向我举手投降。

此时，我团六、七两连，一枪不放就顺利地将东大院的伪军全部缴械。西防所接连两个院套的两连伪军，在日寇教官督促与日本宪兵小队胁迫下拒守院套，死力抵抗。但前院套被我四、五两团混合部队攻破，俘虏了伪军第二连全体官兵。第一连抵抗已陷于松弛。我军冲入后院，利用俘虏作向导，对日寇宪兵队抵抗据点，加以猛烈火力打击，并投掷手榴弹，放火焚烧被利用作掩体的房屋。激战到二月三日午夜二时，西后院战斗结束。日寇教官五名，宪兵小队十六名，伪营长一人，连长二人，排长三人，士兵二十余人被我军打死。伪军四百四十名全部被俘虏缴械。此次战役我方仅五团六连指导员及战士六人负轻伤。

前刁翎的老百姓知道敌人已被完全消灭，男女老幼都集聚起来欢迎我军。我军打扫了战场，捆载了虏获的武器弹药、粮食、军需物资，向群众散发了传单，讲了话，把日寇和伪军向民间征集的春节"礼品"——"年份子"，即猪羊鸡鸭、白面大米都发还群众。同时给伪军俘虏作了宣传教育，将他们全部释放。

凌晨四时我军向乌斯浑河东岸转移。虽然大雪纷降，气温严寒，却掩不住战士们愉快欢乐的心情，战士们唱着胜利的凯

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

刁翎后岗的日寇等到天明，才勉强凑集到一块。日寇一百多人在后，伪军三百多人在前，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来到前刁翎战地，“兔死狐悲”地收殓尸体。同时向老百姓大发淫威，追查“是谁通匪”。

依兰攻击战役——诱敌及打援

一九三七年三月，日寇在依兰、勃利地区的冬季“大讨伐”已接近尾声。寇军在这个地区的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已向牡丹江和佳木斯两地撤收。驻扎在依兰县城的日寇部分骑兵约七百人，伪军二十二团一个营约五百人，其余有警察队百余人。敌军经过四个月的长期“讨伐”之后，甚感疲惫松懈。据县城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送出来的情报称：伪满军对日寇所给予的待遇极感不满，关系龃龉，士气低落。同时在依兰县城与勃利县城中间地区的双河镇“讨伐”期间，驻有一个日寇步兵大队约七百人，一个骑兵联队之主力已向佳木斯撤收。而步兵大队是否常驻该镇尚在犹豫中。

我抗联二路军总部驻牡丹江西岸西风沟。经分析研究全盘情况，认为“敌分我合，敌退我进”是时候了。并且很快解冻开江，转入游击活动的好季节。于是决定集中牡丹江两岸联军联合行动，袭击依兰县城；同时诱双河镇寇军出援，以便于半途伏击将其消灭。

三月十日开始行动准备。十八日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到达马家大屯南沟。第一纵队、独立支队均隐蔽于指定的集合地点，开始封锁消息。十八日总指挥部下达作战任务，指示：第一纵队于十九日上午三时在苏格屯附近集结，下午三时向依兰东南团

山子倭肯河东方面佯动，十九日夜间强行军，再从倭肯河东岸依兰南方急速隐蔽转移，预定在新卡伦——小河沿中间地区，利用复杂地形，埋设伏兵，伏击由双河镇北进增援依兰的敌人，给与歼灭性的打击。

三月二十日白天，云雾低迷，雪花飞扬，北风飕飕，满天卷起“烟泡”。气温虽然下降，但恰是我部队移动的天然帐子。地上新雪掩盖了行军过后的踪迹。到了傍晚五时左右，天气忽然晴朗，满天星斗。半夜十二时，我独立支队由牡丹江东岸小山咀子进至依兰县城东北郊，沿倭肯河岸占领阵地。我主力第一纵队半夜十一时三十分进入依兰县城关西南及西北边缘，占领阵地。

二十一日午夜一时三十分，攻击开始。我主攻部队首先以南大营寇军驻地为目标，攻击前进。因得到伪军二十二团地下工作同志的内应，首先突入城西北防所，将伪军一个排缴械，然后从城西北和西南向据守在大营南边的伪军围攻。此时。我独立支队从倭肯河岸向城东攻击前进，围攻据守东火磨的寇军。激战至二十一日晨六时，城区大部为我军占领。部队肃清占领区内残敌，散发传单，召集民众进行宣传，收集军用物资。小部地区战斗仍在继续中。七时我军逐渐分别向城西、城南撤退。主力纵队之第五军和第九军军部（七百余人）以极迅速的动作，撤到牡丹江西岸、马家大屯一带，利用复杂地形隐蔽埋伏。其余半数骑兵半数步兵为掩护部队，佯作散乱仓皇撤走模样，诱使敌人出击。十时左右，日寇骑兵二百六十余人，果然出城追击，进入马家大屯东南我伏兵线内。我军突然发出异常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慌乱就地抵抗。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后，寇军被我全歼，逃回依兰者仅三十余骑。我方主力纵队在攻城及设埋伏战斗中，

共消灭日寇三百余人，俘虏伪军一个排，缴获步枪二百三十余支，轻机十挺，重机一挺，弹药五万余粒，军马五十余匹，其他军用品甚多。我方损失甚小。

我围攻东火磨的独立支队在主力纵队撤出城后，未按预定计划向倭肯河东岸撤走，又转向城南苏格屯，为日寇装甲汽车队和骑兵一部所追击，略受损失。但该支队共击毙敌五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收缴步枪三十五支，轻机枪二挺及其他军用物品。

攻城部队开始围攻依兰时，双河镇日寇军闻讯，以三分之二的兵力（约四百余人）出援，其余守备双河镇据点。二十日黎明前四时出发，沿公路急行军向北前进。

我王光宇师长所指挥的第二纵队，于二十日三时即到达新卡伦西北方小河沿附近的预定作战地点，选定公路两旁的有利地形，开始堆垒积雪，掘筑暗沟，埋设伏兵，隐蔽马群。二十一日黎明，封锁交通，断绝来往。下午二时，我伏兵沉着隐蔽，放过敌先头尖兵约五十余人，敌后续部队成双行大胆行进，闯入我伏兵线内。我五军二师部队在公路西侧隐蔽阵地突然出现，齐集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远者百米左右，近者仅五、六十米。敌人心胆俱裂，沿着公路仓皇应战。敌人失去指挥控制，秩序极度混乱，完全暴露于公路线上。有些敌兵在行进中被射死，有些虽然卧地，但未及扳开枪机就送了命。一部分就地卧倒枪火乱发，抵抗无效。被我放过的敌尖兵曾占领一小山向我射击，在我八军部的猛烈打击下，敌兵拚命向北逃去。经两小时的激战，敌军被我完全消灭。击毙敌二百八十五人，其余十余人负伤被俘。我军在打扫战场时，得到攻城部队三、四两军骑兵侦察队联络报告：依兰出击的敌装甲部队及骑兵已由苏格

屯方向向南行进中。我第二纵队的作战任务胜利完成，乃集合各部向西南土城子，牡丹江岸转移。

此次伏击战，在伏兵线共消灭日寇三百五十余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三百二十支，轻机十三挺，步兵炮三门，狙击炮七门，弹药二万粒，钢盔二百八十个，军用无线电报机一台，军马四匹，皮军大衣三百二十件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我方五军二师四团指导员姜万有及八军连指导员王洪山等九人阵亡，负伤战士十一名。

三月二十五日，第二路军总部在牡丹江西岸召开参加作战部队干部会议，庆祝胜利，总结经验教训，分配战利品。经过这次作战之后，双河镇敌人据点撤除了，打通了我军通向图佳铁路以东桦川、富锦的交通封锁。依兰县和勃利县两地敌军龟缩据守，不敢猖狂出扰；同时提高了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积极性，促使伪满军日益消极动摇，便利了我方开展策反活动。七月初，牡丹江北方三道河子森林警备大队七百余人在李文彬、张镇华同志领导下举行暴动，杀死日寇指导官、教官十余人，高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八月，拥有伪满皇帝御林军称号的伪满军二十九团赫奎武部一千七百余人，在依兰起义参加抗日。他们的起义，是我军这次英勇顽强、机敏行动给予日寇以惨重打击所直接促成的。

黑瞎子窖截击战

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张镇华同志率领五、六两团骑兵，由牡丹江岸喀上喀一带渡江东进，拟向图佳铁路以东地区转移，开展游击活动。五军军部带教导团、炮兵团先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在后面跟进。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当地抗日救国会的

同志协助我侦察连逮捕了几名日寇密探。从他们口中得知勃利县的日寇一两天将出动往土城子一带“讨伐”。军部进行了研究，命令二师部队暂在三道岗的钓鱼台、黑瞎子窖一带停止行进，准备截击敌人。五月四日清晨，侦察队报告：汽车十余辆满载着日寇约三百余人，于上午七时由东面开来，到达大兴屯附近，现正向钓鱼台、黑瞎子窖方向前进。我五军军长当即面授指示：第二师五、六两团全部下马，将战马隐蔽起来，作好步战准备，在钓鱼台以西、黑瞎子窖以东，迎击敌人；军直属教导团、炮兵连、青年义勇军、妇女团控制在黑瞎子窖东北面村边。同时派遣了工作队，在选定的汽车道上埋设了土地雷，并将汽车道挖断。蔚蓝的天空，阳光照耀着平坦开阔的原野。我军警戒部队，远远地发现一连串黑点，从南面向北移动，接着就听见隆隆的汽车声。正午十二时，敌人的汽车络绎不绝，一辆接着一辆地进入“地雷区”。先头一辆汽车驶进最北端伪装覆盖着的路面上，突然“喀嚓”一声摔翻了。这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地雷手”一连串地拉动了导火索，埋设的地雷，一阵轰鸣，先头六辆汽车全被炸翻，后面跟着的六辆汽车立刻“卡住”。此时，我伏击兵集中火力猛烈向敌人射击，前面被炸翻的汽车里的鬼子兵全被打死，后面六辆汽车企图往回逃窜，行驶不远，便遭到我黑瞎子窖的伏兵的猛烈袭击。激战四小时，寇军二百五十余人被我军打死，并活捉寇军中村上尉以下二十八人，其余一百多人向双河镇方向落荒而逃。

战斗胜利结束，我军补充了武器弹药。敌人的汽车东倒西翻，堵塞满道，被我一一焚毁。我二师骑兵部队第二天浩浩荡荡地向图佳铁路方向前进了。五军军部直属各队渡江西去，在青岗子一带休整。

这次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组织的援助，情况判断正确，部队调运敏捷，截击地点选择恰当，战士作战英勇果敢。

五道岗子截击战

抗联第五军第三师第八、九两团，是从伪军起义过来的，由五军收容改编的。这个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初期，曾经是吉林自卫军积极抗战的中坚部分。一九三三年，吉林自卫军瓦解，该部为日寇收降。从那时起，我党在该部队内建立起秘密的组织活动。该部的领导干部和战士们既受过初期抗日战斗的锻炼，投降日寇后，又深深尝到了亡国奴的苦头，因此官兵觉悟高，党在该部的秘密工作深入人心。从参加抗联五军那时起，该部就建立起完整的政治组织，群众纪律和军事纪律都很好。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由牡丹江向土龙山移动以来，打了大小七次战斗，给敌人以很大的损伤，真是士气饱满，斗志昂扬，深受群众的拥护，对伪军影响很大。开到土山地区以后，驻太平镇的伪满军三十四团和湖南营的（图佳铁路线上）二十七团都与我三师领导干部通气，大有“跃跃欲试”举行起义趋向。日寇为了防止暴动，把伪满军监视起来，不让与抗联接触，并经常出动骑步兵，不断四出“驱逐”抗联部队。八月十六日，我军与日寇在来柴河打了一战。十八、九两日寇军仍不断在孟家岗与来柴河之间巡逻不休。

八月二十日，我抗联二路军总部命令：五军三师八、九两团（步兵八百余人，骑兵百余人）为主力，上午五时在李红眼屯作战斗准备，五时三十分向五道岗北麓一带隐蔽待机；另派八军刘曙华主任、独立师金正国主任率骑兵进至孟家岗方面，诱使寇军

骑兵、黑石部队七百余人出动。我骑兵部队即绕到来柴河东，将敌诱往五道岗东南通往七虎力河子的大道上，追击我军。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五军三师七团配置于五道岗东北端的监视哨报告，敌骑兵先头部队五、六十名猛追我骑兵部队，已进至五道岗南侧大道。十时，我五军三师七、八两团迅即进入预先勘查好了的五道岗阵地，放过敌先头部队，直到敌骑兵主力六百余人完全暴露于阵地前面时，我军发出信号，一齐射击。在居高临下的三里多长的有利阵地上，以猛烈的火力侧击敌人。敌骑猝然挨打秩序混乱，一小部沿大道控制空马群于道南小高地附近抵抗，另一大部乘骑向我中央阵地冲锋，并抄袭我左侧面。激战两小时，抄袭我左侧面的敌骑，首先被我九团四连及师属骑兵队打垮，退至大道边。此时我八军及独立师骑兵亦从五道岗西南方反击敌先头部队。激战到午后一时，将敌人完全压缩到五道岗南面大道两侧。午后二时，我五军神枪手队（八团一连）投入战斗，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死伤累累。下午三时三十分，我全线发起冲锋，向敌人猛冲压迫，将敌人完全包围，敌骑二百余人拚命突围向孟家岗方向落荒奔逃，抛弃尸体三百五十余具，伤兵五十名，马被打死二百匹左右。战斗到下午四时三十分胜利结束。

我们夺获四四马枪二百二十支，轻机十五挺，钢盔、马刀、弹药甚多。并夺获全鞍战马五十匹。

这次战斗打得敌人丧魂破胆，不敢出扰达半个月之久，伪军受到更大的动摇。八月下旬，有"康德皇帝御林军"称号的伪军二十九团，全部（一千七百余人）在依兰起义，投向抗日联军。游击区的人民受到更大的鼓舞，到处欢唱：

十大联军骑大马，逛大屯，
来往扫荡日本鬼。
要算五军大部队，东冲西闯势难挡。
见百姓叫爹娘，见鬼子逞雄威。
一枪一个送贼命，日本国里招鬼魂。

“十二烈士山”战斗

素为下江一带敌人闻名丧胆的五军三师八团第一连“神枪手队”，全连六十余人，指挥员战斗员都是百发百中的头等射手，连长李海峰是“射击手之王”。他左眼瞎了，可那神鹰般的右眼，明察秋毫，甚至远到八百米之内弹无虚发。全连战士都出生于农村，惯常打猎。自从参加抗联以来，不到一年，打过不少胜仗。日寇官兵仅仅为该连射杀者，不下三百五十人。

伪蒙古“兴安军”骑兵是日寇特别训练的。每个兵士装备着马枪、马刀、手枪、套马索，马上、马下技艺相当娴熟。冬季除了乘马作战以外，还携带着滑雪板，到处滑走。“兴安军”共三个团，每团约千骑，是日寇有力的一支剽悍和野蛮异常的走狗军队。从一九三七年秋开到下江地区以来，在日寇“大亚细亚主义”、“黄种人自强”等口号下，挑起了民族仇恨，兵士们如醉如狂，所到之处，欺压人民，奸淫妇女。人民恨之入骨。抗联的下江骑兵部队，也常常不断遭受打击。

一九三七年十一、十二两月，“兴安军”在富锦地区横冲直撞，嚣张已极。在集贤镇和李金围子一带的几次战役中，遭到我五军三师步兵部队的狠狠打击，消灭了“兴安军”不少官兵，打掉了这支走狗部队的猖狂气焰。从此，他们只要听说

“五军大部队来了”，就不敢疯狂行动。

一九三八年冬季，富锦、宝清一带，降雪甚多，平原积雪深达二尺，山区则湮没人顶。我二路军总指挥部后方及三师部队，以完达山脉密、宝、勃三县交界之兰棒山为根据地。兰棒山山岭重叠高大，溪谷曲折，森林茂密，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宝石河子，蜿蜒向北流往宝清，约百余里。宝石河子两岸谷地平坦开阔，多水藻地，沿河山岗起伏，极目远望，林木扶疏。冬季，这地方有木柴采伐及炭窑作业的农民。最近两年这里成为我根据地与敌军经常出扰的边沿山区。

我五军三师，奉二路军总部指示，集结八、九两团，准备向勃利、密山地区转移。二月七日师长李文彬下命令，要求第八团于十日以前，将住在宝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的尖山子附近的各连的警戒部队撤收，向兰棒山北麓炮营集中。

五军第八团一连连长李海峰、指导员李正浩率领着“神枪手队”驻守尖山子、大顶子北坡最前线。二月九日黎明全部撤收了警戒，为着按预定日期等候总指挥部交通副官张凤春自富锦方面归来，连长和指导员商议：连长带着两挺轻机和十一名战士在原地等候。指导员不放心，想把全连留下一同等候。李连长说：雪下的这么大，你们先走，踩出一条道来，我们在后面赶你们，那不容易多了么？指导员终于同意了，带着连队，冒着满天飞雪，向兰棒山方面行进。

李连长的小队在尖山子等候了两个多钟头，张凤春同志果然出现在眼前，汗珠及呼出的气结成冰溜，一串串的吊在皮帽沿上，好象戴着玻璃冠一样。张副官看见是李连长等候他，特别高兴，把敌情简单地告诉了李连长：“富锦、宝清的敌人四出骚扰，搜查山边。”

上午九时，李连长的小队和张副官离开了尖山子。他们下了高山，沿着谷地走了一个多钟头。虽然连队在前面走出一条路来，但时间不久又为风雪所湮没，行动很不方便。顶头风越刮越大了，几乎睁不开眼睛。小队向南沟走了十多里路，快到十一点钟了，李连长嫌走的太慢，正要超过前边带路的同志，突然出现敌骑兵一股约三百余人。两方距离仅有一千米左右，平行地向南前进；同时在尖山子南面又出现敌骑另一股约百余人，距小队后尾二千米。李连长判定右侧是敌人伪“兴安军”，后面是日寇军，他立刻命令小队同志：步兵不能和骑兵竞走，已被风雪湮没了的踪迹不能再暴露给敌人，防止引敌入山，断然占领左前面的小孤山准备抵抗。

这座小孤山是在大顶子南方十余里平原地带突起来的一座小山，从西北到东南长百余丈，高百米。由平地往山顶，越往上坡度越急峻。山顶棱线上点缀着一些天然的峭壁岩石，这似乎是“天老爷”早已安排好了的良好抵抗阵地。李连长带着十二名勇士，迅速地攀登山顶，在长五十米左右的棱线上利用地形堆筑“雪垒”。射手各自占领阵地，轻机两挺分配在两端。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决一死战。敌“兴安军”首先散开包围，日寇骑兵也加入战斗，敌人认为我们“人数很少”，妄图生擒活捉，以解对五军大部队的刻骨仇恨。战斗在午前十一时开始，第一批敌人约百余人分西北和东南两面乘骑往上冲。陡坡积雪很深，敌人跌跌爬爬快到半山腰了，山顶上突然响起猛烈的枪声，不到二十分钟的工夫，枪声停止了。敌人人仰马翻，滚落山下，有的挣扎逃命，有的被打死了，埋葬在深雪坑里。敌人发疯了，在东面大山上架起骑兵炮向小孤山乱轰，炮弹不是落到山前，就是掉到山后，一发也没命中。战斗延续达三小时。

人八、九十人舍了马匹，穿上滑雪板，向山顶猛冲，又被我小队几阵枪火盖了回去。敌人又组织二百多人，发起第三次冲锋，依然没有效果。可是我们的战士已经阵亡了三人。张炮同志使用的第一挺轻机已经换过了两次备补枪身，子弹也打完了，拿起步枪射敌人。李连长左腿也负了重伤，仍然沉着坚定地指挥抵抗，弹不虚发地射击敌人。“兴安军”攻击不下，受到重创，激起了寇骑的怒火：“明明就只是十几个人，抓不到活的，还不能把他们全打死？”于是寇军全部和伪“兴安军”二百余人，把小孤山重叠包围，向山顶扑来。我们的壮士依然“屹立如山”。敌人不到五十步、三十步不开枪，一开枪敌人就应声而倒。“堂堂威武”的日本皇军、剽悍勇猛兼犷野的“兴安军”，在小孤山一个个失魂落胆了。激战到下午四时，第二挺轻机枪的射手向李连长报告：“我的子弹打完了，机枪打坏了。”李连长告诉他：“把机枪拆卸开，一件件的丢到雪堆里，不要让敌人得去。”他照样做了，拿起一支步枪继续抵抗，但不久便中弹阵亡了。这时李连长右腿又连负好几处伤，下半截不能活动了。其他的战士陆续阵亡。阵地上只剩下五名战士。什么地点敌人聚的多，攻的紧，战士就把李连长抱到什么地方去抵抗，显示“神枪手之王”的本领。

夜幕渐渐低垂，敌人冲锋屡起屡停，山腰和山下的积雪被敌人人马揉成一堆一堆的，敌人卧伏在那里不敢动弹。

最后远处飞来一粒流弹，正中李连长脑顶，他和剩下来的三名战士才安静地躺下去了。

这时，只有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同志还活着。他虽身中数弹，鲜血淋漓，但没有伤到要害处，还能行动。他知道战斗就这样壮烈地结束了，他象平常一样脱去了皮帽，弯下身腰垂着

头，向李连长和其他十一位烈士静默。泪水呀，簌簌地流淌。他猛然站起来擦干了眼泪，把阵地上的空枪，一支一支的扔到雪堆里，自己带着两支手枪和两支步枪，趁敌人慌乱之时，寻找空隙，带着重要的信件，向外突围。

敌军蜷伏达两小时，听不到小孤山上有丝毫声响，才慢慢地、小心地爬上了山顶，蚁聚到棱线上，现出豺狼般的面貌，毁损了战士的遗体，但找不到任何一件武器。

此次战斗中击毙日寇二十五人，重伤十余人。“兴安军”被击毙七十余人，伤十五人。冻伤的日伪军近五十人。军马被打死九十余匹。

我八团一连小队全员十二人，所带弹药约二千粒，平均七粒多子弹打死打伤一个敌人。

二月十日，敌军一个个垂头丧气，人困马乏，狼狈不堪地往宝清城走。前面既无尖兵，后面也无掩护，以为“太平无事”了。上午九时，敌军前拥后挤的经过大顶子以北五里左右的深谷转弯处，侧面两边山头突然出现我军伏兵，响起了爆竹般的枪声，弹丸象雨点一样飞向敌群。敌失魂落魄，胆战心惊，队伍越发散乱了，顾不得组织抵抗，拚命的争先逃跑，敌官兵的尸首和武器抛弃满地。

当小孤山发生激战到下午的时候，二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王效明判定，必系我八团一连李连长被截击，当即召请三师师长李文彬等同志集议，认为必须出援。此处距战场四、五十里，即使部队开到也已是深夜了，乃决定八团全部步兵、总部直属骑兵警卫队、三师骑兵连在先头行进，沿李炮营西北沟山岭向尖山子、大顶子方向试探前进。半夜十一时出发，走两小时之后，尖兵突然在山岭上发现山下有人影往山上走，尖兵要捕捉这

"嫌疑人"。快要互相接近的时候，这个"嫌疑人"由山下往上看，看的比较清楚，看准了是自己人，很高兴地叫唤起来。五军老战士们都熟悉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同志，好些同志包围上来，把他身上的枪支拿下来，诧异地问长问短，张凤春同志总是摇头。见了王效明和李文彬同志后，他把小孤山激战的经过简要地诉说了一遍。王效明和李文彩同志商定，队伍沿山道迅速隐蔽前进。十日拂晓队伍到达大顶子山北方，选择好了向南弯曲接连不断的几座高山，在各个山顶上布置了伏兵。敌人漫不经心地沿着谷地向东北行进，遭受到我军的意外的打击。寇军骑兵死三十余人，伪"兴安军"死三十余人，负伤二十余人。

我军清理了战场，获得了不少武器弹药、军马、军刀、钢盔、铁甲、滑雪板、套马索等等。部队从容地向小孤山转移。王参谋处长、李师长等到达山顶阵地，检查了战迹，升起红旗。部队在山周围警戒线上起立，低沉而庄严地唱起挽歌，向英雄的十二烈士追悼致敬。王效明同志宣布，根据党委的一致意见，从此把小孤山改为"十二烈士山"，永志不忘。

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同志当时写了一篇"宝清烈士山十二烈士苦战记"，印发抗联各军。作者以精辟的、警醒的笔法，撰述十二烈士的英雄形象，刻划出恶战苦斗的情景。这篇文章的每一个读者，无不为之慷慨流涕，对烈士们肃穆起敬，对敌人燃烧起愤怒之火。可惜原文至今搜求未得，仅在我的日记上记载着"十二烈士山后记"，残缺不全的诗一首：

兰棒山顶云雾垂，宝石河边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十二烈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倭奴蒙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胆壮气豪动鬼神。
不惜捐躯为革命，但愿失土早归回。
他年民族全解放，指点沙场吊忠魂。

不到一个月，在同江、富锦交界的西林子，伪“兴安军”又为我抗联七军二、三师的阻击部队所袭击，打死官兵七十多人，负伤二十多人，缴获重机两挺，马枪六十多支，弹药万余发，军马五十多匹。从此“兴安军”既受到抗联的不断打击，也受到民族抗日的教育，该部队日寇教官无论用什么欺骗压迫手段，已不能再煽动起已经低落下去的士气。寇军防卫司令部估计“兴安军”有通抗联的危险，一九三八年四月把残缺不全的“兴安军”调走了。

下江一带老百姓知道了“兴安军”不断挨打的消息，现在又再看不到这般“野鬼”，莫不欢天喜地拍手称快。

突　围

一九三八年一整年，伪满三江省日寇动员七个步兵师团、三个混成旅团和一支装甲部队，还有飞机，在已经完成的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的基础上，要把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联、成千上万的铁骑一网打尽。中共吉东省委早就看出日寇这一恶毒企图，远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初，在北满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吉东省委代表认为，一则为准备配合迫在眉睫即将爆发的全国抗战，再则为打破寇军对我下江各军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提出抗联下江各部队必须早作准备，打破敌人的计划。吉东省委首先执行会议的决定，抗联四、五军主力于一九三八年初

陆续在北牡丹江岸结集，四月向老爷岭西方移动，进入敌后延寿（老游击区）攻打了几个据点；接着向南转移，作最大的机动活动，攻克楼山镇，袭击苇河城，多次袭击中东铁路、拉滨铁路的运输，继续向五常、榆树、舒兰地区会合抗联第十军部队，伸张活动，攻打了十几个小城镇，拔除了许多据点，开展了群众抗日救国工作。歼灭日寇近三千人，伪军警千余人。我四、五军主力部队三千五百人，扩大到五千人。部队所到之处，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颇受广大群众欢迎。从此震动了伪新京、吉林、哈尔滨的日寇，谣传风起，人心浮动。这是日寇关东军司令部料想不到的。它在这一广大地区兵力薄弱，防守松懈，使我有转战余地。但是到了深秋十月，情况急转直下，我军正在经营建立舒兰、蛟河、老爷岭等山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寇军伪牡丹江省地区部队一个师团，吉林、哈尔滨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合围而至，将我四、五军西征部队压缩到拉滨铁路以东，并向敦化出兵，由西南面封锁和搜索老爷岭林区。我军几经苦战之后，部队伤亡甚大，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负伤，暂时回归岭东，四军代理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以下各级干部战死者甚多。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陈明雅）、团长曲成山所率领的一个团及十军部队被敌人割断在舒兰、蛟河间的山区，陷入孤立苦斗中。十月末，我四、五军主力部队二千余人，在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下，拚力冲破敌人在五常、舒兰的包围，打了很多次的仗，向中东路以北转移。大雪已经下了两场，战士仍然穿着单衣，无法立足休整。换上冬装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度从苇河东北翻越老爷岭山脉回到牡丹江东岸刁翎地区。西征的五军部队只剩一千五百人，四军部队只剩二百人。

抗联四、五军西征部队，突破缺口深入敌后，经过半年的积极活动，打破了敌人“三江省聚歼计划”，调动了敌人的兵力，有利于我松花江北岸抗联三路军主力向小兴安岭以西黑嫩地区转移，并减轻了沿完达山脉作依据，坚持下江广大地区游击活动的第五军三师和第七军及三路军、松花江右岸各部队的压力，同时并有助于南满一路军开展鸭绿江岸的活动。这在战略上是成功的，但是敌人处在绝对优势，以及由于我国内抗战形势不利的反作用的客观影响下，加上西征部队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中有单纯进攻偏向，在有利条件下，没有同时积极经营新根据地，以致深秋季节到来，情况急转直下时，被迫退回北牡丹江老区。虽然在这一地区还有被摧残的根据地的支援，勉强换上冬季服装，但又掉进了敌人包围圈的深坑里，情况越来越险恶。

抗联二路军总部是吉东和下江联军各军部队的指挥中心，第五军是联军战斗的基干。敌人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就开始图谋“擒敌先擒王”，处心积虑地搜集情报，用尽一切手段破坏指挥中心和抗联核心部队。一九三八年初，在饶河、同江间设伏袭击我二路军总部，出万元“购求”总指挥周保中首级，同年秋“大讨伐”，“购价”增至十万元。对于抗联第五军除了在军事上不断加强进攻外，还在政治上力图从内部瓦解战斗核心，以求其余可以“迎刃而解”。因而掀起一九三八年末到一九三九年初刁翎地区突围的残酷斗争。

当四、五两军西征部队被迫重新陷入敌人包围网时，敌人迅速调动兵力，在牡丹江地区形成严密的包围。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敌人的基本目的是：

（1）捕捉二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予以歼灭的打击；

（2）以围攻五军主力部队为主要目标，加以歼灭，以后逐渐消灭其他联军部队。敌人围攻兵力部署大体如下：

1.沿北牡丹江岸头、二三道河子、三道通、土城子、江西、马家大屯、大山咀子等地约四百多里的江岸沿线上，配置日寇军一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连队，约一万七千余人。

2.以林口为中心，向北之青山、虎山、勃利，在从勃利向西北经双河镇、新卡伦到依兰这一段约四百多里的公路线上配置一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一个骑兵联队、战车队等，约一万九千多人。

3.由林口、龙爪沟、前后刁翎、土城子、小河沿到依兰配置一个师团、一个独立步兵联队，约一万三千人。

总兵力约五万余人。另外有伪满军步兵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五等团，约七千余人。

4.伪牡丹江中东铁路东线，图佳铁路、穆棱铁路和松花江沿岸另有守军严密封锁。

敌人采用依靠据点，稳步前进，大包围套小包围，来回拉网搜攻的方法；企图用寒冷、疲乏、绝粮等来窒息抗联士气，然后予以猛烈的战争打击，再配合政治进攻，务期达成完全歼灭之目的。

这时期我联军在刁翎地区及北牡丹江东西两岸地区的联军部队有：

第二路军总部及直属队220人

第五军教导团和一、二两师主力1800人

第四军200人　第八军700人

第九军500人　第三军150人

救世军400人　合计3970人

二路军总部和抗联各部队被迫与十五、六倍于我的敌人作斗争。

十一月初，总部由下江赶到牡丹江地区，指示各军部队，就原地赶换服装，补充给养，处理伤病及后方勤务，准备分路向岭西和中东路南突围。但在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的时期内，各部队虽然勉强换上了冬装，而粮食给养却越来越困难，并且在敌人不断地封锁、搜索下和在进攻部队作战中，我方人员继续有损失；八、九两军部队人员逃亡日多，且有少数部分叛降敌人，情势愈趋严重。在联军基干的第五军部队中也发现有企图叛降的，这就成了根本问题。

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本人是小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〇年转为党员，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斗争，因为他表现积极进步，有“理论修养”，作战指挥勇敢、机敏，因而受到党的信任，升以军事政治重职。但党也不断同他的“左”右倾小资产阶级偏向作斗争。当四、五军西征主力回到牡丹江地区时，他背着五军党委同志们，在暗中拉拢动摇分子，进行叛卖活动。他以“抗战胜利遥远、客观形势险恶”为出发点，提出必须“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可以同敌人取得暂时的“妥协”来保存实力等谬论，在部队中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动摇士气。

十二月下旬关书范借口深入侦察，瞒着五军党委，瞒着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秘密前往敌据点三道通会见日寇工作班特务头子小林和斋藤，同他们两人初步“协商”后，一同到佳木斯日寇军管区会见北部顾问，在那里签订了“协定”，主要内容：（1）接受五军投降，以五军为中心，收编牡丹江抗联部

队，改编为一个师独立旅；（2）划定刁翎及土城子地区为特别地区，由独立旅驻防。

日寇在叛徒关书范的帮助下，加强了重兵压迫紧缩包围，妄图把那一地区的抗联部队一网打尽，然后进而消灭整个伪三江省地区的游击活动。

二路军总部估计到关书范等的变节行为，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在牡丹江东岸椰树河子台召开吉东省委干部会议。到会者十九人。主要讨论当前斗争趋势，必须坚持革命，战斗到底；克服五军部队中的动摇情绪，巩固内部。开除关书范、赵子超、郭郁洲等人的党籍，撤销其军政职务，并将为首者关书范判处死刑，捕捉就地枪决。次日召开四、五军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拥护省委的决定。会后积极分子回到各自部队作了必要的传达，揭穿了关书范等的卑鄙恶毒阴谋，进行了教育解释和宣传鼓动。全军战士对叛徒关书范等深恶痛绝，愤激异常，表示愿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坚持战斗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军事行动上，总部决定以警卫部队作中坚，集中掌握八、九军和救世军，向老爷岭西突围，进入方正和延寿地区。五军军长柴世荣、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同志领四、五军部队，向北佯动，然后从东面突破勃利、林口间敌人的二重封锁线，向南宁安间转移，五师陈翰章、侯国忠两同志率部队协同行动。

一月十五日，叛徒关书范等穿着日军服，随带走狗工作班人员张清等二人，乘坐汽车自佳木斯地区赶回刁翎区，企图寻找我五军部队，进行叛党卖国的公开活动。吉东省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逮捕了关书范，示以宣判书，关表示“一时错误”，

后悔莫及，但求宽恕，愿立功赎罪，供出与敌人合谋诱歼我抗联的全盘计划。省委会决定，将关书范、张清等二人立即执行枪决，并向全体战士宣布。真是人心大快，斗志更加坚定。

省委和二路军总部将江岸残留的根据地伤病员作了安置处理，清检和焚毁了党政军各种秘密文件；较好的步枪、轻机及重要文件需保存者，分别埋藏深山密林中，较次的大批武器，包括重机、迫击炮等悉沉江底，准备万一。

当时的斗争方针是：坚持忍耐，力图避开敌人，保存实力，但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即身裹红旗，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埋葬在沙场上，亦在所不惜。宁愿高举革命红旗作光荣的毁灭，绝不苟且偷生，玷污伟大的革命战士气节和贞操。于是，第一次分路相机突围的残酷斗争开始了。

在叛徒关书范还没有被枪毙时，日寇对二路军总部行动方向是捉摸不清的，但是因为关书范案的从犯、五军军需处处长赵子超和教导团三连指导员郭郁洲得到缓刑，趁机逃脱，投降敌人以后，将我方情况全部告知敌人。日寇指挥部深恨其阴谋诡计被破坏而大失所望，但同时已经获知我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的确实所在。叛徒被处死，我部团结更加坚固，因而引起寇军更加疯狂狠毒，以誓必破坏我省委及总部首脑机关为目的。一方面派出大批特务走狗，四出活动，散布传单、流言，悬奖金十万，购周保中首级；另一方面命令在该地区的所有“讨伐队”积极行动，加紧牡丹江沿岸依兰、林口、勃利各地互相衔接的包围封锁。漫山遍野，满坑满谷，四出搜索进攻，并以飞机数十架轮番侦察、扫射、轰炸，还以战车和骑兵交替搜索目标。在刁翎土城子及江岸地区敌人搜索殆遍，敌我接触不断发生。我总部及直属部队与八、九军和救世军部队联络屡

被中断，四、五两军部队亦被割断在乌斯河以北，陷于苦战中，暂时无法突破敌围，只好采用分散活动。延至一月二十七日，我总部及直属部队才和九军救世部队取得联络，在刁翎大百顺沟一带迅速集结兵力，约九百五十人。在极度饥疲困乏中鼓励士气，经两昼夜急行军，穿空绕越敌人三道通封锁线，由柳树河子过牡丹江西岸，进入夹皮沟转四道河子上掌，脱离了江岸敌兵的包围圈，向敌军防守比较松懈的老爷岭西的方正、延寿方面前进。

二月一日，开始在原始森林中行军，正值大雪纷飞，朔风凛冽，气温骤降至零下四十多度，积雪深处达一米以上，没有道路，部队轮番在前按方向踩开积雪行走。寒冻断指裂肤，饥饿困扰士兵，部队在千百处峭壁峻岭、怪石嵯峨的深山大谷中行军。狂风怒吼，参天树木摇曳欲坠，或作霹雳雷鸣声断折倒地，拦住去路，须绕越而行。枯木冻裂有如枪炮爆炸声，俨如敌人骤然袭来，惊心动魄。有时候遮天蔽日的大森林，忽然静悄悄的万籁无声，飞鸟尽藏，走兽绝迹，这种沉寂，格外引人寒噤。我们的战士渴了，化雪为饮料，饿了吞黄豆和粗糠。有的抗不住冻饿，倒下去几分钟后就变为化石般的僵尸。苦况虽然如此，但是部队的战斗意志是坚强的。经过十天的极度困苦行军，没有人掉队落伍或中途逃亡。

二月八日上午七时，越过岭西到达方正县界的陈家亮子，在密林以东十数里搜查敌情，获知该地驻有日寇一百三十余人，伪军三百二十人，经常出巡森林山谷四处搜查，并与驻松花江右岸大罗勒密寇军一个联队取得联络，在那里按月交替入山。

当时西进部队携带的“给养”只有两日份，若无补充来源

势将陷入完全饥饿的苦境。我总部决定：采取短促袭击，消灭该敌，解放采伐工人（千余人），求得给养补充，稍事休整以后，再继续前进。

下午三时，敌人的巡逻兵在木棚附近搜查巡视，未发现我方行动踪迹。下午五时，我方决定部署夜间袭击。部署总警卫大队第一、二中队及救世军部队共四百五十人，袭击木棚西南防所的日寇军；总部第三中队及九军部队三百三十人，袭击木棚东北伪军防所。指挥所掌握其余兵力百余人，控制木棚南方三百米的小山，担任掩护。

二月九日午前二时，我西南攻击部队首先迫近日寇防所土壕边，突击队架设倒木，排除障碍物，猛冲前进，并举火焚烧防所附近储木场，照耀如同白昼，枪声手榴弹声大作，猛向寇军压缩。寇军混乱不堪，仓猝应战，有的被房屋倒塌压死，有的被击毙击伤。经过两小时激战，寇军全数被我歼灭。此时我攻击东北防所的部队已将伪军包围所内，敌人凭借屋角工事固守。直到西南寇军被我消灭之后，才分出兵力增援东北攻击部队，加强火力压迫。伪军在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专打日本人”的号召下，停止抵抗。伪军死伤五十余人，其余二百人悉数向我缴械投降。战斗延至九日九时完全胜利结束。午前十时，我军清扫战场，召开工人大会，解放工人，处理俘虏，收集战利品及粮食，休息整顿部队。此时根据在工人群众中潜伏着的我方正县地下工作同志向总部提供的情报以及讯问俘虏，综合情况，认为方正、延寿、苇河一带寇军虽减少，防守松弛，但对老爷岭山林区的封锁和搜查行动仍未停止。在陈家亮子敌军林区据点兼伐木场被我扫除以后，必然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对我方向西转移是最大障碍，势难避免脱出岭东敌人的

包围，而又陷入岭西敌人的包围。按当前情况，只有两个方案：一是大胆向西冲进，但这是冒险的；二是暂时撤回老爷岭东，在敌人包围圈外边缘地区隐蔽行踪，伺机动作。正在抉择未定，下午九时我方派出的大罗勒密方向的侦察队回来报告称：驻守大罗勒密的寇军骑兵三百余人，步兵五、六百人驰援陈家亮子，估计敌先头部队明日七时可到达。此时总部立即下决心，避免被敌围攻于陈家亮子，命令部队严加警戒，安静休息。二月十日黎明前五时，早餐完毕，焚烧了木棚，毁坏所遗留的物资。部队向东转移，走原来部队西进时踩出的唯一"道路"。

二月十一日午前六时，我军到达老爷岭顶四道河子上掌（地名阎王鼻子），该山西坡山势急峻，地形险恶，料定敌人追兵必来，乃选择精兵百人，附轻机十挺，在该地设置伏兵，山坡上下层层配备，相互衔接，部队在岭顶东坡大休息。下午二时寇军果然跟踪追至。

陈家亮子据点被我消灭，敌人非常恼怒，错误地认为我军是在牡丹江岸长期大包围圈中饥饿困乏之漏网残军，从陈家亮子仓皇撤走，只要跟踪猛追，就能予我以歼灭性的打击。因此，敌人追兵部署秩序不整，断断续续。骑兵、步兵混杂争先，林区地面积雪深厚，天上又降大雪，除了沿着我军撤走的一条狭窄的道路跟踪前进以外，不易分兵分路。

午后二时，敌军人困马乏，埋着头向阎王鼻子山爬行。我军将敌人先头部队骑兵约三百余人放进到伏兵线内——"口袋里"的时候，突然一齐猛烈射击，向敌人猛袭。敌人立不住脚，后退也来不及，不等伸手抵抗，就被打得懵头转向，滚滚爬爬。经两小时激战后，敌人兵马死伤狼藉，敌先头部队几乎

无一生还者，军械弹药遗弃满地。敌后续部队也被我猛烈火力打击，狼狈奔逃。我伏兵一部追出数里以外，直到敌人逃亡无影，才收兵回归。

是夜，我军在岭上安全休息。二月十二日，继续试探东进。陈家亮子袭击战斗中，我九军军长腿部负重伤，救世军曲师长阵亡，其余牺牲干部战士三十五人，负伤二十人，冻死二十人，冻伤三十人，失踪三人。阎王鼻子伏击追兵战斗中，我军无一伤亡。

二月十五日，东进至葫芦崴子、半拉窝集一带，派出侦察判明牡丹江岸敌情：敌之封锁包围部队仍未撤除，对山林区的搜查进扰行动范围则收缩了。同时接获五军军长柴世荣、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两同志的联络报告称：该部队自一月末突破敌寇乌斯浑河封锁后，几次战斗均未越过勃利铁路封锁线，部队续有伤亡，二月初转移土城子江西地区，现在喀上喀一带活动中云云。总部决定，在现地休息数天，处理岭西夺获的武器及战利品，安置伤病人员，暂命九军及救世军部队去四、五道河子江西岸，隐蔽休整，相机活动。第一次突围暂告一段落。

在葫芦崴子，追悼突围战斗及历年阵亡将士，大家肃穆庄严地唱起挽歌：

日寇猖狂，侵我海宇，狼烟遍地起。
工农兵学商齐奋力，抗日旗帜高高举。
为伟大祖国光荣，为民族自由独立。
黄帝子孙好儿女，前仆后继争杀敌。
哪管饥饿病困，断指裂肤。
不顾风暴烈日，雷电雪雨。

捐躯轻鸿毛，荡寇志不渝。
倭奴罪恶须清除，索还血债一笔笔。
同志们，安息！
踏着你们洒下的血迹，
誓将民族解放进行到底。
前面就是胜利！
那是你们伟大光辉，永不褪色的业绩！

第二次突围。从一月中旬处死叛徒关书范以后，总部及直属部队、九军、救世军部队突破敌围，消灭陈家亮子敌人。五军军部在勃利、双河镇、小城子地区几次与敌恶战苦斗，突围受挫后，日寇在林口、勃利、依兰及刁翎牡丹江岸地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包围封锁，搜查进攻越来越紧了。我军各部伤亡、损失不断增加。同时日寇伴随军事压力、经济封锁，仍然幻想着对五军部队施行政治瓦解。寇军特务工作班、宣抚班加强活动，并以关东军名义，大量散发各种标语传单。在“告抗日军诸同志”的一张传单里这样写道“……诸君冰天雪地，饥寒交困，苦痛异常，缺乏生活兴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诸君心惊胆怕，午夜不安。抗日迷梦，应行速醒，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诸君应速归顺。现在是良好机会，凡以前归顺都得安乐幸福，诸君当能面知，何故执拗徘徊。大日本军虽有几百万雄兵，但不愿与诸君战斗，惟望诸君速速归顺，否则不断举行大讨伐，一决雌雄……”

“大日本军对归顺者，保证其生命安全，介绍其职业，使之同沐大满洲国皇恩……”

“……周保中屡屡阻碍归顺者，增加诸君痛苦，实为大满

洲国逆贼，决不可容恕的罪人，诸君何故听其愚惑，而昧于自己新生向上乎？愿诸君勿再自苦，力图脱除周保中逆贼压迫，快来归顺……”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贼恶毒阴狠。

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起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是斗争最残酷最尖锐的四个月，前后对敌作过大小三十七次战斗，破坏敌集团部队十一处；共打死日寇军二千余人，伤三百余人，消灭和俘虏伪军近七百余人；击落飞机一架，毁汽车十余辆……但我军损折亦在三分之一左右，以八、九军、救世军较为惨重。到三月底统计，总部（包括省委机关）有人员二百五十人，五军二团二百八十人及三团二百人，二师五团二百五十人，四军一百人。此外伤病员一百五十人，合计一千九百三十人。

三月二十八日，接到依兰、林口、刁翎的地下组织同志的报告，关于敌情方面，几乎有完全相同的情报：（1）敌人增调兵力，封锁方正、延寿、老爷岭林区，分路不断搜山；(2)在开江化冻以前，林口、勃利、牡丹江岸将举行全面大扫荡……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我总部在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沟里，严设警戒，召开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五军军长柴世荣、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九军主任王克仁、省委秘书处主任金石峰、冯丕让、江童等二十七人参加。会议开了三天，讨论了斗争形势、地下党和抗联的当前迫切任务及今后斗争方向和工作任务问题。

会议认为：（1）由于慕尼黑会议所孕育的恶果，法西斯

① 摘自周保中日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本存中央档案馆。

德国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和捷克，将促成欧洲大战。日德意反共同盟活动加紧勾结，日寇将加紧进攻南部中国，若非同时进攻苏联，即将南进，发动东南亚反美英法战争。中国抗战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局面。（2）完全拥护中共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及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指示方针。满洲党组织必须作更长期的斗争，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直到最后胜利。（3）关于当前紧急措施：更严密的收缩，重建各县地下组织。（4）牡丹江岸、刁翎、依兰、林口地区抗联部队，必须千方百计，保护指挥中心，保存基干力量（四、五军部队）。

会议决定，改变军事行动突围计划：（1）总部（包括省委机关）直属部队及四军部队共三百五十人，向宝清、密山转移，以便今后直接指挥掌握下江地区第五军三师、第七军全部及其他联军部队；（2）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及新调任的代理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克仁两同志，率领五军部队一千二百五十人，向穆棱、东宁、汪清地区转移，适当时机进入宁安、额穆地区，与我二军该地部队协同动作，再向蛟河、舒兰、榆树地区恢复与残留该地区的四、五军部队的联系，并支持抗联第十军部队的活动，沿老爷岭、牡丹江及敦化、宁安东面的老松岭经营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3）冯丕让（五军副官长）、金石峰（省委秘书处主任）两同志率领留守部队四百人，用“麻雀战法”分散在江岸以东的刁翎、依兰勃利地区作广泛地积极活动，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兵力，并适当安置伤病员及处理后方勤务。同时不断同抗联八军、九军、救世军部队进行联络；（4）经过中东铁路以南，将我方情况告知第一路军及经过依兰、汤原告知第三路军。

四月十日，我军在乌斯浑河北岸老头沟一带集结，准备分

兵突围。午前六时发现寇军步兵六、七百人，骑兵二百余人，其他敌军数路约千余人，分布在小锅盔山一带。上午八时至下午一时向我尾追不止，我退至北兴隆沟北方二十余里葫芦崴子。该地区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我军迅速占领绵延不断的各个高地，组织交叉火力，猛烈打击追迫前进的敌骑兵部队及一部步兵，约三百余人。锅盔山一带的敌兵渐渐向葫芦崴子围逼前进，支援敌军。我军坚守阵地，顽强战斗，并不断利用地形迂回出击，敌步兵被我打死百余人，负伤二十余人。敌骑兵争夺高地被我打的人仰马翻向后溃逃。激战至下午六时三十分，我总部及五军部分两部撤退。是夜，急行军百余里，到达腰围子东沟会合，布置警戒，一连停留五天，补充给养，整顿部队，遂按分兵突围计划行动。

四月上旬、中旬，不断降雪，间杂小雨，催促着地面的冰雪解冻。白天的道路泥泞，只有深夜时，地面才又冻起一层浮冰。山水与小河流都在奔流着，牡丹江出现了"清沟"。日寇"大扫荡"果然到处出现，但由于季节的变换，阻碍着日寇活动，不象以前那样的"狼奔豕突"行动自由了。

四月十五日夜，柴世荣、王克仁两同志率领五军基干部队一千三百人，由徐家屯附近渡河，分为两路，利用地形熟悉，穿插空子，选择敌人所料想不到的乌斯浑河左岸山地，经三昼夜的隐蔽行军，于十八日天明到达龙爪沟，横越林口南面的向阳车站附近，通过图佳铁路，向穆棱的犁树镇前进。此时已为敌人发觉，我军沿林虎铁路右侧佯进，作奔袭密山平阳镇的模样。敌人信以为真，由密山、林口两地出动重兵，封锁了铁路线，在前方犁树镇、平阳镇两地布置兵力，准备反击，拟将我军歼灭于黄泥河子——张家街地区。二十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

犁树镇西北二十里的红石砬子附近，前卫改后卫，大队沿山干南走，准备从穆棱站以西越过火车道。敌人部署落空了。但是我军估计到目标既已暴露，战斗接触就无法避免，乃准备通过穆棱车站附近时，主动给予敌人以打击。不料敌人在下城子、依林寿、穆棱站的守备兵力薄弱，我五军部队，乃于二十二日夜间从穆棱站西面擀面石安然越过中东铁路，沿牤牛河山道向南行走。估计敌人必将追击，乃选择泉眼河设伏兵。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时，穆棱、下城子敌人凑集了七百余寇军，二百余伪军缓缓追踪而至，我伏兵齐起，集中猛烈火力打击，激战达五小时之久。寇军在地形不利的情形下，就地抵抗。寇军死伤狼藉，击毙寇军官兵三百五、六十人，伤四十余人。伪军在战斗开始，慑伏不敢动作。

敌军得不到后续部队的增援，步步掩护撤退，我军亦不加以追击。随即撤出战场，向东偏脸子前进。此次战役，我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王克仁及三团副团长王德山同志以下二十人阵亡，负伤十余人。自此五军部队冲破了敌人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的长期围攻，完成了突围任务，在八达岭林区稍事休整，即与宁安镜泊湖一带的我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陈翰章、崔贤等同志取得联系，又一次贯通了对我一路军的直接联络，勾通了四、五两军西征被隔绝在舒兰、蛟河的部队，重新开始了那一地区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的游击活动。

当时抗联战士编了一首小调，欢唱突围经过。

伪三江来伪三江，日本小鬼太猖狂，

多年苦心织罗网，想把抗联一扫光。

抗联英雄如猛虎，日本鬼子反遭殃。

在五军部队向南突围的时候，将冯丕让、金石峰两同志留在刁翎。牡丹江地区部队开展分散活动，吸引了寇军“大扫荡”的兵力，迷惑了敌人的注意力。我总部及直属部队三百余人，四月十五日午前五时自后刁翎围子东沟向马桥河移动，午后四时为该地寇军封锁部队三百人左右兵力所发现。我主动攻击，敌人仓皇应战。傍晚激战结束，敌人死伤三十余人。我向后围子前进，诱惑敌人，半夜向拉拉别河转移。为消灭踪迹，向上流徒涉五、六里，驻守下游堵击的寇军并未发现我军的行动。四月十日晨行至拉拉别河与荒沟间的无名高地，乃在该地大休息一日。十七日至十九日天气或雨或雪，大雾散发，对我隐蔽行军，绕过敌人临时据点颇有帮助，在这三天之内让过好几部分搜查扫荡的敌人。二十日晚到达图佳铁路护山站以西的附近高地。夜间十一时自佛爷岭山洞上方通过图佳铁路，继续向勃利东南大小五站、保安屯前进。密山与勃利之间都有敌军，“扫荡”部队封锁搜查。但都为我方巧妙的行动所让避，并未受到阻碍，得以安全地越过封锁线，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四月三十日宿营密山、勃利交界的老铁仓，在那里发现了我抗联其他部队激烈作战的痕迹。五月一日到达茄子河边宿营，举行了庆祝“五一”突围成功的集会，同日渡河。五月七日到达兰棒山二路军总部宝清的密营留守处，东部突围遂告胜利结束。

当日寇一九三八年加紧封锁包围伪三江省地区时，从十一月起至一九三九年的四月，实际上它把重心转移到牡丹江、林口、勃利、依兰及刁翎、牡丹江两岸地区，因而下江地区我第

五军第三师八、九两团及第七军各师，乃以完达山脉作依据，在饶河、虎林、密山、宝清、富锦、同江、抚远各县进行游击活动。虽然不断地受到敌压迫，接触战斗，但我军建制保持完整，人员损折较少，而敌伤亡损失却数倍于我军。同时我第六、十一各军部队虽有损折，但都陆续渡过松花江右岸，越小兴安岭，脱出敌人包围。敌人的长期准备，要在伪三江省地区"聚歼"和"根绝"抗联游击活动的计划，宣告失败了。这一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在我二路军总部指挥下依然持续。

上面列举的多半是东北游击战争高潮时期，东满吉东、松花江下游地区数以百计较为显赫的战役中的若干战例而已。南满地区第一军占领磐石，袭击清原、金川，攻占三原浦、八道江、凉水泉子等等，以及一九三六年，冲破寇酋三毛司令、伪军司令李树山的"大讨伐"，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我第一路军各部在反"大讨伐"斗争中，歼灭伪军邵本良全旅及伪蒙军索旅，特别是震动伪满的摩天岭一役，全歼日寇全团部队约千人，缴获大炮七、八门。其他如我军进出沈辽及安奉铁路和鸭绿江岸，打了不少恶战，攻破几百个小城镇，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又如我北满抗联两次攻入宾县、占领方正县城，江北方面袭击汤原县城、佛山县、萝北县都曾被我军攻陷。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在松江左岸的铁骊、庆城、东兴、凤山、巴彦、通河县等地区的许多据点为我拔除。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黑龙江平原伸张了游击活动，我三路军攻克德都、讷河、克山，远达嫩江下游的肇州、肇源、肇东等城镇，均被我游击部队攻占。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在乌苏里江右岸，我第七军攻占东安镇独木河，并在同江、富锦地区拔除不少敌据点。一九四〇年袭击宝清的星河镇等等。这些较为显著的以及其他的

一些战例，本文都未能一一加以整理。凡是这些战例，苦战恶斗的实际状况，尤其是寇军成百成百的被我军消灭，在敌人的材料上是不记载的。敌人为遮盖他的败绩，唯恐有伤“大日本军威”，用“讳莫如深”的办法，一律加以掩饰，就连寇军自己无关的部属，亦茫然无所知。我们处在游击运动残酷斗争环境，材料的收集、整理是很缺乏的。抗联许多老同志仗打多了，视为家常便饭一般，打过就忘记。因此直至今日，整理抗联游击战争的史料是艰难的。

结 束 语

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第一、游击战争的特点，战场是孤立的，敌人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因此在战略上我方是防御的，战术上是积极主动，采取有条件的进攻，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保存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为战略上反攻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与全国革命军事斗争有一致性。

第二、军事斗争主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密切配合群众斗争，因此，每一次战斗才能取得胜利。

第三、战术动作上，采取机动灵活行动，用伏击、袭击、夜袭的方法，同时使用数量上优势兵力给敌人以意外打击，战斗就无不胜利；反之硬打硬攻，消极防守，被动作战，没有不失败的，即使勉强获得胜利，实际上是得不偿失。

第四、军队党组织坚强，内部团结巩固（包括民族团结），政治修养好，不断总结战斗经验，提高军事技术技能，加强刻苦锻炼，严肃纪律，凡是这样做的游击部队战斗力就强，能坚持持久斗争，颠扑不破。反之，一遇情况恶化，斗争尖锐，就

不能坚持到底。

抗联的历史作用主要是：

第一、十四年的长期战争，东北大部地区，二十多万人口，卷入或直接影响这一场斗争，人民受到革命锻炼，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建立了人民武装，积累了一些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实际斗争经验。

第二、日寇速战速决（两年平定满洲）、以华制华（建立伪满），把东北当作侵略全中国，进攻苏联的巩固后方的战略计划，受到了严重打击，有生力量受到严重损折，牵制了日寇大量兵力，推迟和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的进展。

第三、抗联后期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保存了基本力量，为参加解放东北和人民自卫战争准备了力量，在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联军（初稿）

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枪口向外一致抗日。但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却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向主张抗日救国的工农红军进攻。因此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抗战，就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而组织和领导伟大的抗日救国的天职便落到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首先在日寇侵略烽火所燃烧起来的东北实现了。东北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日救国，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浪潮。尽管这一游击战争本身还有许多弱点和缺点，并曾在经过长期残酷斗争之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这一游击战争是有伟大意义的。它严重地打击了日寇侵略势力，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的迅速扩张；它有助于全国抗日救国的酝酿；它给有志爱国救国者以示范和鼓舞，给“畏日如虎”者、怯懦者、悲观失望者以当头棒喝。同时，它在伟大祖国面前，在艰巨的考验中告诉了人民：谁是人民的政党，是秉赋伟大民族气节的；谁是反人民的叛卖祖国的政党，是甘心作走狗汉奸的。

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过程

东北游击战争十四年的历程，按其发展状况，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这是自发运动与革命游击战争的初创时期；第二时期，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这是游击战争的发展与高潮时期；第三时期，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这是游击战争遭受严重挫折和困难的时期；第四时期，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这是抗日联军蓄积力量，准备再起的时期，也是最后参加苏军对日作战、消灭日寇关东军、解放东北的时期。以下就是四个时期的叙述。

甲、抗日游击战争的自发时期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初创

第一时期的抗日游击运动是自发的，缺乏组织性，缺乏革命的领导。在这一时期中虽然我党有积极的活动，并开始创造人民武装性质的游击队，但党尚不能在全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只是在运动中取得斗争经验和创造开展革命游击战争的条件。

一九三一年十月，黑龙江省马占山所部（旧东北军二十六旅），在群众抗日情绪激昂之下，起而抗战，坚守嫩江桥，给日寇重大打击，阻止了日寇的北进。同时吉林的李杜所部二十二旅、丁超的二十八旅、邢占清的二十四旅、张振帮的二十一旅、冯占海的吉林警卫团，也都先后发动起来，响应抗日，编成黑龙江省抗日自卫军、吉林自卫军。十一月，延边吉林陆军第八团发生暴动，声势很大，由一个营（王德林的老三营）发

展到几万人，称吉林救国军。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有奉天东部（今属辽宁省）旧奉军唐聚五所部举义，沿沈(阳)海（龙）线扩大到旧东边道及以南十数县。辽东三角地带则有邓铁梅之义勇军，称辽宁民众自卫军。驻守海拉尔的旧奉军苏炳文的一个旅，亦被迫起义抗日。在热河东部也产生了以耿继周为首领的热河救国义勇军。在这一时期，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参加抗日斗争积极活跃；而资产阶级地主，一般的表现是观望的；农民则普遍卷入抗日浪潮，以"无极道"、"大刀会"、"红枪会"等迷信团体出现，为数甚众。九一八事变以前的许多胡匪队，现在也改编为山林队趋向抗日。农民群众涌进山林队的人数不少。根据一九三二年四月满洲省委的估计，东北各地抗日武装人数，总计在三十万以上。

中共满洲省委在一九三二年初期，在政策上，仍保持着某些"左"倾机会主义的残余。例如：企图继续创造红色游击队，以至编成红军，指派杨靖宇同志在磐石红色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红三十二军；在东满延边"苏维埃"的方式还未改变。但同时省委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在政治上即已紧密地注视因日寇武装侵略东北所引起的民族危机和群众反日斗争高涨的形势，认为满洲党必须争取旧的统治者，用合法合作的方式配合秘密工作，积极参加各地的抗日起义，领导与组织那些自发的抗日运动，扩大党在抗日武装部队中的影响，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以便争取领导和创造、加强为党所直接领导的红色游击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党曾积极加强和发展了地方的群众组织"反日会"，派干部和动员工农分子、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甚至"反日山林队"，参加上层与打入下层齐头并

进。例如：王德林所部在延边起义组织救国军时，东满特委事先曾派党员胡泽民、王生柏（毓民）等十数同志参加鼓动与计划起义，事后派李光同志（朝鲜人）组织以党员、团员、革命农民为基干的救国军别动队。该队打击日寇最多，声望最广。延吉、和龙地方亦组织游击队，协助救国军作战。杨靖宇、北杨等同志曾直接由省委派往南满吉奉沿线指导游击运动及组织南满游击队，并动员群众帮助该方面的民众自卫军、义勇军。张寿篯等同志派往耿继周部队中进行活动。周保中、张建东、刘铁刚等同志派往吉林东部专对自卫军、救国军进行活动。冯仲云等同志去松花江下游组织汤源游击队。关于对黑龙江省抗日军的援助和参加，则由哈尔滨省委直接领导，在黑龙江省并曾组织了巴彦和海伦游击队。

省委在这一时期动员了青年干部、工人和学生打入伪满警备军各旅，进行秘密工作。瓦解这些走狗军，促进其起义，转向抗日，携带武器参加红色游击队。

必须指出，以旧军队为基础的抗日军，其中大部分装备相当优良，兵额充足，有训练，有些部队并曾经参加过军伐混战的锻炼，物质供给的条件亦好。但是这些军队的上层领导人物，大多数是反动的。他们抗日是受了广大群众抗日浪潮的逼迫，实际上对抗日救国是动摇、没有信心的。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保存实力，等候南京出兵，等候国际联盟制裁日寇。他们不相信人民力量，不肯帮助和组织群众的自发抗日斗争，害怕群众，脱离群众。在这些军队里，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员越多，国民党的影响越大，则反动性也越大。在这些军队里，国民党各派与国家主义派互相排斥，争夺权柄，借机发财；但是对于反对中国共产党，打击左倾与进步的群众，

则是一致的。同时，他们还勾结和容纳日寇的奸细分子，模糊敌我界限。这一切构成了这些军队后来遭受失败瓦解的原因。

一九三一年十月，马占山抗击日寇北进的时候，吉林自卫军消极观望。后来吉林自卫军开始在双城、榆树积极行动，阻击日寇，并决心在哈尔滨坚持时，马占山则在黑龙江为日寇奸细政策所动摇，一度投降了日寇，变为公开的民族叛徒。吉林自卫军遂陷于孤立，为日寇驱逐压迫于牡丹江之线，在那里与救国军王德林、孔宪荣部又开始了相互间的磨擦、冲突。在辽宁方面的民众自卫军及各部义勇军相互间亦不断火并。他们对于抗击日寇非常消极，而自己内部则互相掣肘；并且到处滥发空白委任状，勾结地主豪绅和伪满官员，委任贪官污吏；借筹抗日经费为名，滥发军用票，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军队与群众关系恶劣，结果引起广大群众对于这些抗日军的普遍不满。

我党派遣到这些部队中去进行工作的同志，曾向这些部队的领导者提出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政策和纲领，但为他们所拒绝。在日寇进攻严重时期，我们党员干部根据党委指示进行斡旋调解，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曾在抚松安图制止了民众自卫军与救国军争地盘的武装冲突，召开了两军首脑会议，议定互助合作攻守同盟的纲领。同年十一月在牡丹江地区亦调解了自卫军与救国军的冲突，并议定组织自卫军和救国军联合军总司令部，以丁超（以后变为民族叛徒）为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为副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参谋长，还计划击败当时盘踞牡丹江西岸日寇的进攻。但是这些军队的反动将领，并不遵守盟约。潜伏在自卫军里的奸细旅长刘万奎，与救国军副司令孔宪荣相勾结，杀害了马宪章（自卫军左路总指挥），于是两军关系决裂。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乘机大举进攻，吉林东部十数万人的抗日

军便土崩瓦解，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宪荣、刘万奎等带着万余残军逃往苏联，其余的溃散。在辽南、东边道吉辽边区，十几万的抗日军在上述相同情形之下被日寇摧毁。唐聚五、王郁文、冯占海、李海清等则企图带残军逃往关内。那时日寇利用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经过其奸细分子国民党人诱致抗日军逃往关内，结果大多数被消灭于半途。即有逃亡入关者，亦符合于日寇“肃清”东北抗日军的目的。

到一九三三年夏初，三十万人以上的抗日军和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由于领导者的反动，脱离群众和拒绝共产党的正确主张，遂不可避免的为日寇所击败而溃灭。当时日寇仅有以多门师团为基干的五万军队，而经常参加作战者不过三万人。此外，为日寇利用的伪满警备军张海鹏、于芷山、于深徵等部也只有二万余人。

在自发运动的最初阶段，党用主要力量去帮助并派人参加反动分子领导的各色抗日军，企图以此争取领导和藉此壮大革命力量，虽未获得预期的结果，但是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组织、领导抗日人民游击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创造了为党所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在游击战争的初期，就已特别表明只有革命兵士、工人、农民、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才是真正抗日的，而农民是主要力量。经验证明，国民党改组派、蒋介石派、国家主义派及其他各种政治的宗教的派别，由于政治上反动，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思想上动摇和落后，军事上守旧，他们经不住日寇军事政治并行的进攻，一遇艰难到来，便牺牲民族利益，抛弃群众，变节投降。经验证明，共产党人若要与那些由反动阶层做领导的抗日集团讲合作，一致对抗日寇，只有在下层群众中有了坚

固的基础，并且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才有可能；否则，分化与破裂终于是难免的。如王德林救国军因周保中、张建东、李延禄等同志组织同盟军和游击军而与孔宪荣、吴义成发生分裂，即为最显著的例子。

乙、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高潮，抗日联军的建立和活跃

一九三三年春，日寇在辽、吉、黑各省击灭以旧东北军为基础及人民自发组织的各种抗日部队以后，接着就顺利的攻占热河。与此同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寇订结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日寇在东北开始其政治上的恐吓和欺骗宣传，如说什么“抗日必灭，治安肃正”，筹备新“满洲帝国”，建立所谓“王道乐土”等等。

在抗日运动初期，满洲党虽然用很大的力量去参加和帮助那些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各种教派武装，但是，党并未忽略从工农群众中创造革命的武装力量。一九三一年末，一九三二年初，在李红光、黑杨（杨佐青）、后来又在杨靖宇、北杨等同志领导之下，在磐石创造了近二百人左右的游击队，其中绝对多数是朝鲜族革命的农民。这支游击队既要不断向日军进攻，又要防御为反动派和国民党分子所领导的救国军的进攻。这支游击队虽然因两面作战，一度遭受失败，但很迅速地又恢复壮大起来，与海龙游击队汇合，在东丰、西丰、海龙（辉北）、辉南各地扩大了活动范围。一九三三年秋发展到二千多人，遂于“九一八”二周年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九三四年初扩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红光，第二师师长曹国安，军长杨靖宇，扩大了游击活动范围至通

化、柳河、兴京（新宾）、宽甸、桓仁、濛江、抚松等县。

“九一八”前夜，在东满地区、延吉北部、汪清西部以及和龙南部等若干山林农村，曾建立过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后被中国地主军伐与日本领事相勾结而镇压下去。九一八事变一开始，延吉、汪清、和龙各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在各县中共县委领导下开展活动，李光同志所率领的别动队则参加救国军。一九三三年初，珲春亦成立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底，在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人数近二千人，师长朱镇，政治委员王德泰。

一九三二年初，在牡丹江地区，宁安中心县委组织了绥宁游击队，人数近百人，枪枝是九一八事变前夜该地区红色游击队失败后埋藏在穆棱的。绥宁游击队后来在战斗中扩充到二百人以上。但这支游击队在日寇与自卫军、救国军的不断夹攻中遭受损失，剩下半数人转移至东满，合并于东满游击队。同年宁安中心县委派张建东、于洪仁等同志掌握了宁安最大的反日山林队——平南洋队（李精璞部），将其改称工农抗日义务队，进行了彻底改造。同年冬，周保中同志得满洲省委吉东局的同意，准备退出救国军领导，建立抗日同盟军，拟包括柴世荣、刘汉兴（陈龙）、史忠恒、于学堂、王汝起、付显明等进步的救国军各部及工农义务队，人数三千人。经过改造与分化，这些部队后来改编为吉东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初，救国军、自卫军大部崩溃之后散在吉林东部和辽吉边区的残部不下五万人。党在这时候掌握了救国军的领导，以周保中、胡泽民、王毓民组成党委，重整残部，分编六路，每路三、四千人。有下层党组织与群众基础者，为柴世荣、刘汉兴同志的第四路，另以经过党苦心改造的史忠恒、王

毓峰等同志的救国军约千余人编为游击军，以李延禄同志为该军司令，张建东同志为参谋长，孟泾清同志为党委书记。该军形成绥宁地区抗日诸军之骨干，但由于领导之错误，违反吉东局与总部党委的指示方针，离开牡丹江地区而向密山转移，在途中不断为日寇截击而遭损失过半。同年秋该部到达密山后，得到密山县委所创造的周子岐同志领导的密山游击队的支持，开始在密山、勃利、宝清、林口一带展开游击战争。

一九三三年初，满洲省委曾派赵尚志以同乡关系而投到哈（尔滨）东的义勇军孙朝阳部队中去当参谋长，在上层展开活动，由珠河县委派李启东等在下层展开活动。同年冬，孙朝阳受日寇奸细政策诱骗而投降，在该部秘密党组负责同志李启东主张之下，遂与老朴、李根植、赵尚志等七人，携带轻机枪一挺、步枪七支，脱离孙部。珠河县委以该批人员武装和珠河县地方秘密的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了珠河游击队。省、县委用很大的力量来扶持这支游击队的发展，并积极打击日伪军，结果，很快的在哈东地区"异军突起"，形成了松花江下游强大的抗日支柱。一九三四年夏，遂在珠河县境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一九三三年，巴彦游击队虽失败，但满洲省委依然不断注意发展松花江左岸巴、木、通、汤的抗日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并创造游击队。汤源中心县委曾以张文藻、王永江、高庆云、王亚棠等同志组织了汤源游击队，但因屡受敌人残酷进攻而两次遭受破坏。最后，在夏云杰同志领导之下才得以巩固，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饶河中心县委即以崔石泉、朴振宇、李学福（葆满）、金天民、朴元彬、李斗文、张文偕等同志为领导

骨干，组织了饶河游击队，一面参加高玉山、陈东山的救国军，协助作战，一面独立活动。一九三三年初，高、陈所部被日寇击溃后，饶河游击队便成为乌苏里江左岸各县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心，并在宝清、同江、富锦境内组成另一游击支队。

一九三二年夏，在编成巴彦游击队的同时，满洲省委企图在海伦地方党的工作基础上建立江省平原游击基点，成立海伦游击队，但开始便遭到日本奸细的破坏而失败。

在东北人民自发抗日运动时期，由党的艰苦工作与党员团员的牺牲所创造起来的——南满、东满、绥宁、密山、饶河、珠河、汤原等反日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质条件困难，但是组织严格，成份好（以党、团员做骨干加上优秀的工农青年和学生），自觉程度高，作战英勇，行动积极。他们在地方党所领导的反日会和各种革命团体支援与配合之下，用新颖的游击战术，积极主动地不断打击日寇，消灭日寇，开辟游击区；并且进行着具体的广泛的宣传，放手组织以农民为基础的抗日救国会，努力发展党组织。

这就是党在自发的抗日运动时期中创造游击队的成果。

一九三三年，自卫军、救国军及其他各色抗日义勇军溃败，其领导人物或逃或降，群众情绪遭受打击，造成抗日潮流的急剧低落。但在此同时，由于党的影响扩大和组织力量的加强，由于满洲省委和各下级党委奉行了党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指示，由于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各地坚强地对抗日寇的进攻不断获得胜利，这样就造成了一九三四年抗日斗争重新抬头并飞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救国军、自卫军溃散的残军，在辽东和沿吉奉线与通化地区有二万余人，在吉林和江省不下五万人。他们受到党的支持

和吸引，未被日寇消灭而继续抗日。例如：邓铁梅、王凤阁、殿臣、德林、双胜（齐永全）及韩国革命军等，完全依靠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屏障，在吉林反日同盟军影响之下的张禹亭、郭司令、于学堂、三侠、李洪滨等以绥宁游击队和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主导，坚持斗争。在哈东的考凤林、汪雅臣，松花江沿岸的谢文东、李华堂、于九江、北来等，都围绕于珠河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周围。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寇“春季大讨伐”遭受失败，抗日军生长活跃起来。日寇控制的吉敦、中东、吉海各铁路线不断受袭击，列车屡屡颠复；许多城镇受攻击。同年十月秋，日寇以通化地区、哈东地区、东满的延边和绥宁地区为重点，以六个师团日军及伪满靖安军警备旅三万余人，举行“大扫荡”。在四个多月的残酷战争中，日寇预期的结果甚微。只有那些领导动摇和组织散漫的反日武装，如殿臣、德林及孔宪荣、李三侠、金三侠、牡丹江八大队等遭受打击损失，殿臣、德林投降，孔宪荣只身二次逃往关里。党所领导的各地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则反而于艰苦战斗中普遍发展壮大起来了。

满洲省委就在反“秋季大扫荡”中着手建立抗日联军，将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扩编为两个师、一个独立团、一个少年营、一个警卫营，杨靖宇同志仍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为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同志任军长，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同志兼政治委员，分编二个师，第一师×××同志为师长，第二师史忠恒同志任师长，汪清县委书记王润成任政委；哈东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三军初编一师，后编三师；李延禄同志领导的游击

军与密山游击队合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初编一个师，李延禄同志任军长，金策同志为政委（未到职），黄玉清同志为政治部主任；绥宁游击队及同盟军各部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同志为军长，柴世荣为副军长，刘汉兴（陈龙）同志为参谋长，宋一夫为政治部主任，分编二个师、一教导大队，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第二师师长付显明，政治部主任陈翰章；汤原游击队编为抗日联军第六军，夏云杰同志为军长，张寿篯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饶河游击队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陈荣久为军长，李学福为第一师，后陈去关内，由崔石泉同志为副军长并代理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郑于一九四一年变节投敌），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景乐亭（后由隋长青（刘建平）同志接替），政治部主任金天民，第二师邹其昌（后由王汝起同志接替），政治部主任张文清（后由彭施鲁同志接替）。

党所组织与领导的这七个抗日联军中，组织好、战斗力强、起骨干作用者为一、二、三、五、六各军，第四军甚弱。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了“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国外出版的《救国日报》发表过）。这个宣言不但对外起了很大号召作用，而且反映了当时党内思想行动的趋向一致，对革命群众颇有教育意义。

依据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中央代表团的指示信，吉东、东满、南满各地党组织在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坚持游击斗争，并在力图蓄积力量的方针下，吸收非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予以改造，以扩大抗日联军；并加强内部的巩固工作，特别注意肃清内奸，克服统一战线部队内动摇叛变的倾向。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抗日联军在不断反对日寇与伪军"讨伐"战斗中，日益壮大。第一军扩编为三个师；第二军扩编了侯国忠、陈翰章的第二师，×××、朴××的第四师；第三军整扩为六个师，辖刘海涛、蔡近葵、常有钧的第一师，关化新、李泰、李福林的第二师，张连科、周庶范、吴景才的第三师，郝贵林、金策的第四师，张光迪的第五师，王德富的第六师；第四军扩编为二个师，李延平同志任军长，王光宇同志任副军长，王毓峰同志任第一师师长，曲成山为政治部主任，张相武为第二师师长；第五军增编李文彬（师长）、张镇华（主任）的第三师和军属教导团；第六军、第七军各扩编为三个师，戴洪宾同志在夏云杰同志战死后继任第六军军长，崔石泉任第七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冬谢文东所部编为抗日联军第八军，初编为二个师，一九三七年夏增编第三师，谢任军长，并派刘曙华同志代表党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华堂所部编为抗日联军第九军，编二个师，李任军长，李熙山同志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后由王克仁同志接替）；汪雅臣所部编为第十军，汪任军长；祁致中同志的明山部队，一九三六年编为独立师，一九三七年编为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分编二个师，祁任军长，金正国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七年初，为适应全国抗日浪潮之高涨，与东北游击运动发展的新形势，将第一、二两军合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同志任总指挥，魏拯民同志任政治委员。分编为三个方面军，周树东同志为第一方面军军长，×××同志为第二方面军军长，曹亚范同志为第三方面军军长，陈翰章同志为独立师师长。以京图路（长春到图门）南、南满路以东，为该路军的游击军区。同年夏，第四、五、七、八、十各军编为第二路军，

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游击军均归指挥，周保中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柴世荣升任第五军军长。以京图路以北、松花江左岸、乌苏里江右岸，为该路军之游击军区。第三、六、九、十一各军编为第三路军。以松花江右岸、东西兴安岭、黑嫩平原为该路军的游击军区，总指挥为赵尚志，因未就职，后由张寿篯（李兆麟）同志任总指挥，冯仲云同志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发展的时候。据"七七"抗战前后的约略统计：第一军6500人，第二军5500人，第三军5500人，第四军2500人，第五军5000人，第六军4500人，第七军5000人，第八军3500人，第九军2500人，第十军1000人，第十一军2500人，共计44000人。夺自敌人手中的武器质量大大提高，每连有轻机枪三、四挺，还有相当数目的掷弹筒、重机枪、步兵炮、迫击炮。骑兵部队除一、二两军外，其他各军平均占全员三分之一。此外，参加南满抗日联军一路军的同盟部队王凤阁救国军1000人，朝鲜革命军1500人，李洪宾救国军1000人，参加吉东第二路军的同盟部队救国军姚司令1000人，救世军王荫武1000人。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也是东北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其特征为：（1）非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形缩减和消失，但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发展壮大了，战斗力提高了。如藤井和李寿山的靖安军全部，先在南满受惨重打击，后在吉东被击溃败；松花江下游富锦一带的兴安军亦受到打击。而党领导的"十大联军"的威望提高了，游击区域扩大了，在满州几乎一半以上的地方，除城市和交通要点以外，广大农村都为抗联控制。（2）在城市的党和群众抗日救国的工作活动曾日趋困难和急剧缩小，但占一半以上的满洲领域卷入游击运动范围，广

大农民拥护党的政策和主张，以人力物力积极赞助和参加抗日救国游击斗争。（3）伪满机构中的一部分军政人员、知识分子、青年，对抗日联军的同情增大。伪满军曾经整营整团的起义，投到抗日联军。甚至日军士兵也因受我打击和政治宣传而动摇，如日军士兵福田投降南满抗日联军，又如宁安“讨伐队”数次发生叛逃及遗弃大批弹药等例。此外，我党的“八一宣言”和红军北上抗日长征的成功，给予了党内和党周围的革命群众思想上政治上一大鼓舞。继绥远抗日战争及双十二事变之后的全国抗日浪潮，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高涨，是有巨大影响的。

随着抗日联军的壮大与游击战争的高涨，给予日伪军不断的军事和政治打击，日寇殖民地化政策的实施遭受重大阻碍。例如：京图铁路、图佳铁路、林虎铁路、绥佳铁道修筑计划的数度迟延；吉海、中东各铁路线的屡遭破坏袭击；金日成部队三次渡过鸭绿江、图们江，突入朝鲜镜北道，斩将掣旗，激发朝鲜人民抗日情绪，使日寇意外震惊。由于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使“满洲帝国人心不好”。日寇感觉到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实为侵略政策之一大威胁，于是自一九三五年开始逐年增调日军，充实关东军之“讨伐”力量。一九三六年初，日军增至十二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和专驻延边之“朝鲜派遣军”一个师团（铁道守备队尚不计算在内）。一九三七年日寇继续增兵。

自一九三三年开始，直到“七七”抗战爆发前夜，日寇逐段逐区实行保甲制连坐法，严刑恐怖，并广布奸细、警察、特务，到处烧、杀、掳掠，实行经济封锁，修警备道，建碉堡，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用这样的残酷政策，对付游击区的农

村。在向抗日联军的“大扫荡”中，敌人还使用了飞机、快速部队以及毒气。敌人的进攻重点是南满、东满和吉东地区，以三毛中将专任南满“剿匪”总司令，烟中将、岩越中将相继任吉东和东满“剿匪”总司令。一九三六年夏，我延边游击区的第二军，外受日寇军事进攻，内受处理反革命的“民生团”破坏案件混乱的影响，不能不离开延边。第五军主力则向北移转。第一军向辽西发展的计划亦屡受阻碍。东南满经营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现。沿长白山脉东西老爷岭、老松岭一带山区农村散户，变为无人烟区。抗日联军与农村广大群众渐渐隔离，物资来源遂告断绝。这就是伴随着抗日高潮而来的尖锐斗争。在这一时期，在牡丹江下游和松花江两岸的“伪三江省”，抗日游击斗争如火如荼的正在发展着，使日寇惊慌地说：“三江省已变为共党乐土。”

丙、游击战争的遭受挫折和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全东北各阶层人民，包括东北党组织在内，所迫切希望的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终因七七事变而出现了。游击区的群众，不顾日寇的烧杀与死的威胁，积极拥护我党所主张的十项抗战纲领，纷纷以人力、物力赞助抗日联军，勇敢地参加游击战争的各种工作。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扩大了，好子弟、好女儿、好枪、好马动员到抗日联军来参加战斗；非游击区的群众兴奋起来了，伪满职员及军官中的爱国者也动荡起来了，特别是士兵群众，成营成团的威迫长官实行举义，投向抗日联军，参加救国。的确，全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巨流，助长了东北游击运动的浪潮更见高涨。东北党在“中代六三指示信”（指1935年6月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指示信）所预示的大事变到

来的面前，由于领导力量本身不足以应付形势的要求，同时估计到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不可能是短期速胜，日寇为实现其顺利侵略我内地的野心，必然要为巩固其后方基地而加紧向抗日联军进攻，因而摆在东北游击战争面前的任务是更艰巨的。因此，当时抗日联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防御，而战术应该是进攻的。有吉东、东满、南满代表参加的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第三路军越兴安岭，依据山区，开辟黑嫩平原游击区；第二路军主力向哈东旧区活动，以避免日寇当时在伪三江省的"聚而歼之"的计划；第一路军围绕长白山西南和西北地区活动，以一部试探伸入辽西。一九三七年八九两月，第一路军、第二路军按预定方针开始行动。但是日寇也加紧了行动，首先打击了一路军向辽西突入的部队，同时也打击了向哈东和小兴安岭西伸张的各部，并加紧对东满老游击区实行"梳"式进攻。虽然"三江省"地区日寇采取守势以监视大量伪军的动摇使之与抗日联军隔离，但一九三八年抗日联军普遍遭受打击的征象已日渐显著了。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寇在其坚壁清野的计划初步完成的基础上，用四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实行"三江省大扫荡"，在军事、政治（招降）和经济（断绝粮食服装来源）上，同时向抗日联军猛烈进攻。例如：吉东省委及第二路军总部所在地之依兰、刁翎区江西即有日军九千人，"围剿"六个月。日寇的"大扫荡"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暂告停止，而代以伪满军继续"搜剿"。

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反对"三江省大扫荡"及我军在东满和南满积极行动中，我军普遍遭受严重损失，部队减员过半，二军军长王德泰，三军师长常有钧、关化新、张连科、郝贵林、王德富、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吴景才、周庶范，四

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师长王毓峰、张相武，五军三师副师长张成第、蒋德，六军师长马德山、张传幅、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吴玉光，七军师长王汝起，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九军政治部主任王克仁、魏长魁，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仅就记忆所及者）等重要干部以及许多团、营、连级干部，均英勇战死。而赵尚志不受党的约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只身逃往苏联，以致影响三、六两军的戴洪宾、蔡近葵所率领的混合骑兵部队千余人逃往苏联。吉东省委代理书记兼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北满下江特委书记白江绪、三军师政治部主任栾志渊、一路军朴德范、四军曲成山等都变节投降。非党的谢文东、李华堂、王荫武、程斌、关文吉等在所属部队被击溃后，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先后各率残部投降日寇充当特务。但同盟部队（救国军）姚振山、闵宪山、孔夫人等所率领的残部近百人，却于一九三九年夏初在穆棱九站南沟的最后一次战斗中，英勇抵抗，全部战死。曾拥有数千之众的著名的反日山林队头领老双胜（齐永全）亦战到最后一人，死于威虎岭上。

一九三八年八月，爆发哈桑湖事件。一九三九年五月，爆发诺蒙坎事件。日寇虽集重兵于边境侵犯苏联，但并不放松对抗日联军的进攻。一九三八年日军正规师团曾增加到五十万人以上，部分使用于“扫荡”抗日联军。一九三九年日军继有增加，对抗日联军“扫荡”亦愈酷烈。

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反“大扫荡”中，考验了党，考验了革命的群众。虽然有为数极少的革命的半路人无耻地变节叛逃，但是党基本并未为他们所毁坏。例如：四军主任黄玉清、五军的副师长张镇华、连长李海峰等同志的部队，和七军师长隋长青同志所率领的一个团在宝清，三军师长侯国忠

同志的一个团在宁安，都曾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和敌人的诱降，但是这些坚定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他们除隋长青同志及其他余部冲出重围外，均英勇牺牲了。吉东特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张中华重伤被俘，死不投降。象这类的例子各军都很多。

有许多地主富农和流氓出身的分子，混到抗日救国阵营里来，结果经不住艰苦的考验而投降到敌人方面去，或回家。但是基本群众、纯洁的工农，他们紧紧围绕着共产党的领导，更提高了民族气节和革命的警惕性与组织性，不顾牺牲与艰苦，坚持抗击日寇。

一九三八年底，东北党接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六次扩大会上关于《论持久战》的报告。它成为东北党和抗日联军了解抗战形势、抗战政策和战略战术问题的指路明灯，坚定了大家坚持斗争的信念。

一九四〇年，东北党在继续不断的反“围剿”斗争中，收集力量，重新正编部队，把第一路军缩编为三个支队，二路军缩编为三个支队，三路军缩编为四个支队，并克服了党内思想涣散和群众的动摇情绪，巩固了党和抗日联军部队。党员、游击队员人数虽锐减，但思想愈坚定，组织和纪律愈严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周保中、崔石泉、柴世荣、季青、王效明诸同志，在图佳铁路以东，松江左岸，指挥各部利用夏秋季节继续反击日寇薄弱据点，攻击破坏日寇屯垦军。张寿篯、冯仲云、金策、李熙山、（许亨植）、冯志刚、于天放、王明贵、王钧、高禹民、郭铁坚、朴吉松、张光迪诸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底即率领三、六、九、十一各军部队坚决向嫩江小兴安岭西挺进。在那里以朝阳山和绥化北和绥化东的山地为依据，展开了黑龙江、嫩江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屡获胜利。曾攻克讷

河、北兴镇、克山县城及其他城镇，并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组织抗日救国会。王明贵、王钧、高禹民所率之三支队，深入西兴安岭，游击于嫩江、布西、甘南、齐齐哈尔各县。郭铁坚、张光迪、朴吉松等同志所率之六、九两支队，伸张活动于青岗、明水、绥化、北安、东兴、铁丽、庆城一带，而许亨植、韩玉书、张瑞麟等所率之十二支队则纵横于哈尔滨西北的三肇（肇州、肇源、肇东），攻破了肇州、肇源县城，造成了震动全满洲的“三肇事件”。在滨绥铁路以南，二、五军混合各支队在×××、陈翰章、陈明亚（陶净非）等同志率领下，曾在舒兰、五常地区展开活动。一九三九年在吉敦铁路的哈尔巴岭，曾前后消灭日寇四百余名，破坏了镜泊湖水电站的设施，拆断了牡丹江与敦化的公路交通。

但是，抗日联军终难避免一切不利条件下的牺牲和损失。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杨靖宇同志不幸于濛江地区牺牲。一路军的周树东、曹亚范，二路军的李文彬、王汝起，三路军的冯志刚、高禹民、张兰生、赵敬夫等领导干部也相继战死。一九四一年初，部队人数缩减至两千五百人。同年三月，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于大病之后，兼以冻饿，死于牡丹岭，遗体被日寇搜获，悬首于敦化。吉东道南五军部队领导者陶净非同志亦战死，所部悉被消灭。同年冬，江省的游击运动局面亦急剧恶化。

自欧战爆发，迄苏德战争前夜，在满日寇不下七十万。在它实行武装进攻苏联以前，这些日军便组织更番交替的“讨伐队”，继续不断地打击抗日联军。一九四一年冬到一九四二年底，日寇在江省北安地区、嫩江上游、绥佳铁路沿线，对第三路军各支队；在抚松、长白、安图、敦化，对第一路军余

部，以及在牡丹江地区和完达山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细密的“搜剿”。在千百里的深山大林里，往复网罗追尽，摧毁了一切密营和地下的粮食埋藏以及地上的种植物，并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在黑龙江、伪三江省，继续实行大检举。有抗日联军活动的县份，成千的农民被逮捕、拷打、杀害。大批武装特务深入山林，纵火燎原，施放毒药。日寇继续其厚颜无耻的诱降，甚至用卑鄙的手段，到处在树上张挂淫秽的画片和妇女的装束，还留酒食和亲恳书。然而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党的事业，宁断指裂肤，铺冰盖雪，吃树皮草根代替粮食，用泥土水草来裹治战斗伤痕，而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我军袭击敌人一般只能在夏秋两季，每次在突然袭击敌人之后，即须急走几百里，以避免敌人的追迫。当敌人“梳篦”森林、追寻踪迹时，就得要巧妙地消灭踪迹，穷力走尽雪季。这样艰苦的行动自一九三七年即在东满南满开始。接着在松花江两岸和黑龙江，我军陷入更甚的苦境。一九四二年坚持黑龙江省的李熙山、徐泽民、郭铁坚、于天放、王明贵、朴吉松、张光迪等同志领导的部队，松花江南和饶河地区的王效明、姜信泰、刘雁来等同志领导的部队，延吉敦化地区与牡丹江地区的部队，柴世荣、季青、×××领导的部队，行动更加困难。李熙山、郭铁坚、朴吉松及其他部队的领导干部先后战死，人员继续减少。在最有利的时机，只能集中百人左右作短促的阻击行动，随即须分散为十五人或十人，甚至三、五人一组活动，否则极易遭受歼灭性的打击。

处境是异常恶劣、困难与艰苦。一九四二年底，抗日联军已不足千人。

还在一九四一年春，在东北党组代表会议上，已估计到日

寇会加重对东北人民殖民地化的残酷压迫，会继续加紧对抗日联军的"搜剿"，同时估计到中国抗战环境的继续恶化，抗日联军人员已减至最少的程度，并且因日寇的并村封锁和基本群众离开，若不改变斗争方法，则将有被完全歼灭之虞。因此，一九四二年秋，依照东北党委员会所决定的保存力量、培养干部之方针，抗日联军将基干人员转移到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去，成立A野营，另一部则在沃罗什诺夫城郊成立B野营。在苏联同志帮助之下，开始进行完全严格的训练，准备应付未来东北形势的发展。另外，东北抗日联军指定了一定的人数，分编为十三个小部队，各为十人至十五人。其中，分遣北满地区者三；吉东及延敦地区者八；桦甸、蛟河地区者二。北安于天放同志率领的部队、桦甸郭池山同志率领的部队、敦化曲玉山同志率领的部队，均留原地区活动。这些小部队的基本任务是：（1）侦察敌伪统治状况（以军事设施为主，特别是邻近苏联边境的要塞工事地带）；（2）经营在必要时期游击部队临时依据的场所；（3）秘密联系群众，并进行口头的、文字的抗日救国的各种宣传。这些小部队以曾担任过连长，营长的最坚定者为队长。每队内有党小组，小组长负责政治领导。这些小部队各自行动，避免互相联系。他们的行动和工作，在A、B两野营党组织内是不公开报告和通知的，由周保中、张寿篯、金日成直接领导。这些小部队，自一九四三年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夜，一般来说，基本上是完成了任务的。

丁、抗日联军的再起

自一九四二年秋组成A、B两野营时起，东北党委员会在领导抗日联军基干部队人员的整训学习中，努力提高干部的党

性和政治军事素养，以求适应可能到来的新形势。但是，在长期残酷斗争中，出身学生和稍具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几乎牺牲殆尽。参加A、B两野营受整训学习者，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不识字的工农分子。他们在长期游击斗争中，虽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过学习，成就并不大。在野营三年以上紧张艰苦的学习中，虽然相当的提高了政治知识和文化程度，但是大多数人的水平仍然很低。最大的缺点是，党没有把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经验及时总结出来。在军事上，野营进行了以现代化为主的学习，大部人员并且学习了航空陆战队的技术，一部分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和医疗卫生，一部分高级干部曾对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学习，并根据所得到的“新华日报”上刊载的整党文件，进行过初步的整风学习。在学习期间，很多同志恢复了身体健康，不能参加战斗学习的伤病残废者和妇孺衰老者二百余人也安置下来。

一九四五年五月苏军攻占柏林以后，周保中同志在苏军远东战线总司令普尔卡也夫同志积极帮助之下，以抗日联军现有干部为领导骨干，准备计划建立六万人至十万人的军队，以便参加大规模对日作战和展开敌后活动。同时加强了东北各小部队的侦察活动，并作了迎接降落敌后游击部队的准备工作。

同年八月九日苏军进军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先由A、B两野营分遣十数小队降落敌后开始行动。主力部队则准备向佳木斯作战地区转移，但日寇在英勇的苏军巨大的锤击之下迅速屈膝投降了。于是抗日联军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和发展计划全部根本改变了。东北党委员会不能不就当时苏军胜利地占领全东北及由此而产生的苏美、中苏新形势和我国内部状况的剧变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

为了执行当时中央的指导方针，争取与组织广大群众重建东北各地党组织，建立人民武装，迎接八路军和党中央所派遣的干部，准备发动新的游击战争，对抗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反动统治，抗日联军干部三百三十人于九月初分配到东满、南满、北满五十余县开始了积极活动。

当苏军攻入伪满边境时，抗日联军在延边分遣小队号召动员群众组织了武装部队，开始向日寇补给线出击，并收缴溃散的日寇武装。战绩最显著的是王洁忱（王亚东）同志所组织的小队，在群众积极参加之下，在穆棱泉眼河消灭了日军一支七百余人的部队，并夺取了全部武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小队亦迅速发展，并参加了饶河、宝清、同江、富锦与汤源地区的作战。指导北满小部队的于天放同志，被日寇判处死刑之前夜越狱逃出。不久，他便组织北安一带的人民自卫队打击日寇，后与王明贵、张瑞麟、陈雷、王钧等之分遣队会合。

自九月初迄十月二十日前，抗日联军配合党中央派来的干部，在各地积极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基础，如长春市委、吉林市委、延边党委和延边各县县委、牡丹江党委和牡丹江市委，以及宁安、穆棱、林口各地方党组织。哈尔滨和黑嫩地区，也已着手建立地方党组织。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那些汉奸、走狗、警察、特务和家里教徒（青帮），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在苏军占领地大肆活动，组织“解放同盟”、“解放会”和“敌产清理委员会”，掌握印刷和出版机关，用各种方法组织武装部队（最大的如长春中国警备军、公安大队等），并且暗中积极开展反共反苏的宣传和挑拨破坏活动。在以长春为中心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指导的各地抗日联军干部，一开始工作便要和这

些“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作斗争。长春国民党的反动活动不断被压下去；警备队被我们解散了；充当“地下军”的特务大批被逮捕；很多地方的公安队控制在抗日联军干部领导之下，或重新组织；长春、沈阳、吉林、延边、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及其他地方的反动报纸被查封了；“解放同盟”等组织被解散了，而代以为党所领导的“民主大同盟”和其他革命组织。

关于建军工作，还在十月二十日东北党委员会完全移交中央局以前，在吉林、长春地区便建立了五个步兵团，二个骑兵连，吉林约一个团，蛟河一个团，延边警备军四个团，敦化地区一个大队，并且开始与国民党土匪、“先遣军”、“挺进军”等进行战斗。特别在延边地区，曾击散了盘踞汪清北部万余人的匪军。在北满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等地区，都建立了或多或少的新部队。

十月二十日以前，统计编队的人数已达四万以上。

截至十月十五日，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约计：步枪近六万枝，轻机枪二千余挺，重机枪八百余挺，掷弹筒五百余个，迫击炮二十余门，山炮野炮共五门，弹药一千二百余万发。

由于党在东北人民中有长期斗争的历史影响，“八一五”以后抗日联军与广大人民重新相见，受到人民的拥护；在配合苏军作战，协助搜剿日伪残余，维持东北解放后的社会秩序方面，抗日联军占着重要的地位，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但是，有少数抗日联军干部缺乏革命的警惕性，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认识不足，造成了工作中的某些损失。如在敦化地区编的八个大队（近五千人），结果叛变了很多。另有个别干部忘记了艰苦斗争的传统，离开了阶级立场，抛开了党的指

示，不但没有在新的历史时期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反而腐化堕落，甚至滚落到敌人方面去。与此相反，有许多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忠贞不拔，始终如一，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个人。这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品质，同时也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必须指出，抗日联军绝对多数的同志，在配合苏军解放东北的短促时间里，以自己薄弱的力量，在极复杂困难的环境下，开辟了工作，初步奠定了立脚的根基，为后来中央局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准备了条件，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游击战争中的群众组织与政权问题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初，满洲省委在原有的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反日救国的各阶层加入"反日会"，而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由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在日寇占领地，采取秘密的组织方式；在自卫军和救国军地区，则争取公开合法的组织方式。反日会的具体工作活动是，用集会、口头、文字和印刷刊物进行宣传。主要的口号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东北人民自动武装抗日"、"打倒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等。这些宣传口号引起了自卫军救国军上层分子的不满与反对，广大群众对宣传口号的反映亦是模糊的。在城市及工业区加入反日会者多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农村中反日会的活动范围较大，加入者较多，但基本群众多为贫苦农民，中国农民仅占少数，地主富农抱着观望态度。那时的反日会或反日救国会多由地方的工会、农会、学生青年反日同盟等联合组成。反日会的具体工作任务主要是：动员号召群众以人

力物力和通报敌情等支援红色游击队及一切抗日军；就地秘密组织青年义勇军进行徒手训练；动员优秀的反日会员到自卫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中去参加作战，做上下层工作，起积极抗日作用；并动员到伪军中去，做争取哗变暴动、带枪逃往游击队的瓦解工作；组织革命的互济、营救；组织敌占区的怠工、罢工（最初有过），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随着抗日游击运动的再度发展，各地党组织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扩大在群众中的活动范围，各地的反日会或反日救国会一律统一改称"抗日救国会"，并制定了纲领。农民群众踊跃加入，会员数目激增，因此影响了地主富农亦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每县建立一总会，区设分会。总会和分会的组织基本上不按阶层与职业类别而另区分组织，只在救国会之下分组青年、妇女、儿童以及自卫队等部门。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是南满、东满、吉东、哈东抗日救国会普遍发展的时期；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是松花江下游抗日救国会普遍发展的时期。在东满、吉东和哈东有些地方的妇女、儿童团，参加放哨站岗，自卫队参加作战。救国会在农村中并起着筹粮筹款的组织作用。抗日联军数万人的战费，粮食供给和军服，主要从农村中按地亩分担，经过救国会筹集，直接交付抗日联军。有些敌人势力大的地方，则以抗日救国会员取得甲长牌长的地位来便利工作进行。抗日救国会可以逮捕和惩治走狗汉奸。一九三六年依中央指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抗日救国青年团，成为抗日救国会的组成部分，增强了抗日救国会的活动积极性。抗日救国会组织最发展时期在宁安一县就有三万以上的会员。该县三区（东京城区）几乎有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加入了抗日救国会。汤源、依兰、桦川、富锦等县亦各拥有三万五千以上的会员，汤源的“凹”区等几个区，全部在抗日联军掌握之下。东满延边抗日救国会的组织与斗争更为踊跃与积极。

在工矿区和季候工人（林业、沙金、工棚、煤作）以及猎户中，则组织单独的抗日救国会。铁路工人的抗日救国会亦单独组织，在中东路曾有发展。工人参加抗日救国工作者异常积极，但其活动范围不大。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党在宗教团体如家理教（青帮）及其他迷信团体中曾进行过艰苦工作。但因为他们在城市为日寇御用，因而在农村中则直接被群众排斥，抗日救国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但抗日救国会并不公开反对他们。

抗日救国会不但是抗日联军的“作战后方”（粮食衣服经费筹集，兵员补充，伤病员的收容），而且是作战补助“机器”（侦察、通信、联络等）；同时它又是对抗日联军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在精神上、物质上进行慰劳的组织。总之抗日救国会是带有行政权能的组织。在一九三四年东北党曾依中央指示方针，筹备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东北人民政府，组织人民革命军；同时主张人民政府应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当时认为：抗日救国会便是人民政府的下层基础与雏形。为此，曾拟制了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制定了上绣地球五星的旗帜为人民政府的旗帜，在游击区群众中，在统一战线的部队中，公开号召，在敌占区进行秘密宣传。那时东北游击战争虽然高涨，抗日救国会的群众基础与作用虽然扩大，但抗日联军还没有相当稳固的根据地，并且统一战线内的其他部队大多数对党的号召表示消极。在这样的情形下，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人民

政府，是困难的。因此，“组织人民政府”只当作宣传号召的口号，以及奋斗之目标而已。“八一宣言”发布以后，党停止了组织人民政府的宣传，一九三六年又取消了人民政府的口号而代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宣传。一九三七年东北党和抗日联军发表了取消旗帜章制，拥护国共合作抗战的宣言。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而造成的发动群众的好条件，迅速发展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而抗日救国会的发展，又促成抗日联军游击战争的有利发展。这证明，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相互结合的不可分离性。

当游击战争趋向高涨时，游击区（甚至非游击区）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分子亦积极参加斗争；但当抗日联军遭受挫折时，便多动摇涣散。在日寇厉行烧杀、归屯并户与保甲制、坚壁清野的残酷斗争时期，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大部分投降日寇，变为日寇在农村统治的工具。由此证明，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不可以忽略阶级性与阶级基础。

四、抗日联军的建制和军事问题

远在九一八事变前，在吉林东部的宁安、穆棱及延边，就有红色游击队的组织，其领导干部有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有自关内革命根据地派来的，有新自莫斯科学习归来的，有参加过苏联内战的。这些同志依据苏联和中国工农红军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军队建制和设施而进行军队建设。在游击队里行政治委员制度，保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上下一致；注意思想教育；提倡阶级友爱，忠实勇敢，自我牺牲，使武力与群众相结合。抗日联军游击战争创始

时期的各地红色反日游击队的建军思想，即由此而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对于东北游击战争和建军有很大影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的逐渐壮大的条件之一，乃由于坚持红色游击队的建军思想和接收中国工农红军经验。

一九三五年统一了抗日联军建制，以后的军队建制设施大体情形略举数例如下：

军队编制：三三制。军为最高单位，下属三个师、一个直属教导大队（或少年营）、一个警卫营。师下属三个团、一个警卫连、一个教导连（或少年连）。团下属六个连，团内无营的编制，连分三个排，每排三班，每班十二人。但根据需要，编制也有适当伸缩。

军政治委员代表党。有些军和师没有政治委员，则军事指挥员与政治部主任，采平行制，而以党委为领导中心。党委会的决议是最后决定。游击部队党组受当地同级或上级地方党的领导。

连内有党组织——支部。支部以下为小组。团为总支部。军师有党委会。有政治委员的部队用民主选举产生党委书记，否则由上级党指定。小组长、支部和总支部书记通常由选举产生。

连内有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为士兵发扬民主、参加军队行政管理、向上级建议及提出批评的群众组织。士兵大会或士兵代表会议的召集，看具体问题而定。连内还有俱乐部（以前为列宁室）、文化组（识字班）、宣传小组（由战斗员组成，专任民间宣传）等组织。连内政治文化教育、群众工作等的领导，以连指导员为中心。

兵员成份：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百分之七十左右为农民（其中百分之五左右为富农），百分之二十左右为工人，余为学生（小学及中学生）。

兵员补充的方法：通常采精兵主义，主要由地方党、农协、反日——抗日救国会动员参加，或由部队在游击活动中直接号召动员。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日联军扩大发展，部队的成份稍有改变，即地主、富农（特别是富农）、知识分子的数目有相当的增加，流氓成份亦有混入，但百分之七十左右仍为工农分子（富农除外）。

党员和团员成份：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为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则降低为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武器弹药来源：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从敌人手中夺取，和收缴非抗日部队武器及在农村中动员来的（地主富农的，为数不多）。九一八事变前夜，红色游击队所保留的近二百支步枪，因埋藏地下日久，只能勉强使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由苏联远东军方面获得少量武器弹药的帮助。

抗日联军的历史经验证明：在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要在旧军队——自卫军、救国军、反日山林队以至伪军起义部队基础上，把他们改造成为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改造这些军队，只有在革命军队有巩固基础而且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抗日联军很注意教育和训练干部。就在那样不固定的游击区和不间断的战斗环境中，也曾在北满汤旺河、伊春河深山里建立了军事政治学校；五军很早就建立了教导队、教导团和研

究班，一、二军在东南满设随营学校，并且在密林里设立了军队和地方合组的军政学校。

战士的政治教育，以阶级思想为基础，启发仇视民族敌人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内容。新战士入伍，主要先进行政治教育，用示范和诱导的方法，促进其自觉自动。对于干部，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理论的教育。

军事教育，注重学习游击战术与一般的军事战术，如射击、投弹、刺枪、伪装、排除障碍、骑术、滑雪（下江部队）等。

教育参考材料，是利用日报（“救国日报”）及自国外获得的原著作加以翻印、编纂，以及收集敌方军事参考材料而加以研究采择。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不断得到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成为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基本参考材料。

军队内的民主：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发扬党内民主和群众的民主。军队内的生活管理、教育经费的开支情形等，上级均须向下级定期报告和按事报告，经过群众讨论提出意见，甚至人员调动、武器分配、奖惩以至军事计划，都要经过讨论。在东满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时期，形成极端民主化倾向，上级的决定如果没有下级的讨论同意是行不通的。这种极端民主化到一定程度，便成为内部不巩固和战斗力减弱的因素，反革命的内奸分子破坏东满游击根据地和破坏东满党破坏第二军，就是利用极端民主化为主要手段之一。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斗争环境的尖锐化，这种倾向被纠正了。

抗日联军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的严格，主要的依靠教育和

启发群众自觉，反对打骂和侮辱，依靠党团员作模范，上级作下级模范；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九三三年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为抗日联军所奉行，帮助了抗日联军进行纪律教育。在抗日联军的部队里曾造成了一种遵守作战、学习和工作规则并互相帮助的良好风尚。

抗日联军的生活状况亦因游击战争环境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别，一般在初创以至发展时期有物质基础。斗争虽尖锐、艰苦，但生活并不单调，精神是愉快的。连队有俱乐会、晚会、唱歌、跳舞（二军特别好）及其他娱乐，还有阅书报出墙报等组织活动。游击活动所到的地方，在环境许可时，组织军民联欢会，或接受群众团体代表的慰问赠送等。

抗日联军内饮食衣服，上下级一律，经济公开。在条件最好的三、四、五、六各军，每月发零用费一至二元。军队服装，除北满少数部队外，一律穿着正齐的保护色的军服（困难时期用树皮草根自已染制）。一年二套衣服，有时还有一套衬衣。关于伙食，一开始便不计好坏吃饱了算，生活一般低于农民，注重正齐清洁，讲求卫生（二、五军最好）。在部队内有不少妇女参加战斗，作各种辅助工作。生活纪律与男女关系是严格的。

一九三六年在东南满和吉东，一九三八年在北满和下江，开始了最艰苦的生活：断粮、绝餐、杀战马、吃树皮草根，粮食大半是要用战斗用鲜血去换取。每一个战士，包括领导者和妇女，除武装外，背囊沉重到二十公斤、三十公斤，帐幕、小火炉、小锅、碗、筷、锹、镐、斧、锯、针、线、药品什么都得携带。越是雪季，日寇越猖獗，因此生活越艰苦。因冻、饿、病、战、伤而牺牲的很多，若干婴孩活活地埋葬在雪里。

一九三九年以后，抗日联军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斗争着，不但不恐怖，情绪反而稳定坚挺。

关于抗日联军战略战术问题：一般的，避强攻弱，乘隙伺虚，以求打击敌人，发展自己，以及让避大敌，保存自己。因此战略性质基本上是防御的。但又不能集中兵力对抗敌人的进攻，故必须迴避每次敌人的“大扫荡”。迨至敌人分散疲惫之后，迅速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薄弱之点，然后再行迅速分散。这是抗日联军战略问题的一般指导思想。但是，这并不完全为领导干部所共同理解。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在延吉的湾湾沟及汪清的荒沟，我们二军部队曾集中兵力抗击进攻的日寇“讨伐队”，虽然曾给敌人几次进攻以严重打击（日寇前后死伤二千余人），但我们的根据地终于被彻底破坏，而部队亦受了严重损失，结果还是要离开该地。但另一种情形：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第三军的脱离哈东而向依兰通河转移，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二、五军部队的离开牡丹江铁道以南地区，都获得了新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三七年二、三路军西征实际上也不是要普遍的进攻，而是分路让避，免被敌人“聚歼”于伪三江省，另图新的发展和胜利。一九三九年三路军部队在黑龙江省广大地面开辟新游击区，也取得胜利。

抗日联军游击战术行动有几个普遍原则：埋伏、夜袭、阻击、急袭，避免与强大敌人接触；有所谓四快：快集中、快分散、快打、快走；四不打：情况不明不打，准备不好不打，不消灭敌人夺获胜利不打，硬仗不打。

以上只是抗日联军历史的片段，全面史实及经验教训，这有待于未来的广泛搜集研究和总结。

伟大的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

（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A野营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一、中日世仇不共戴天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中国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其间尤以所谓同种同文之日寇，乘我国内忧外患，步步行其侵略。一八七二年夺我琉球群岛，一八九四——九五年因朝鲜问题，向我挑衅而酿成中日之战。当时清政府腐败庸昏，因而战败。日寇迫我割让辽东半岛，因三国干涉而寇欲未遂，但我台湾及澎湖列岛，悉为日寇割据。庚子事变日寇为西欧列强之爪牙，屈我沦为半殖民地。一九一四年勾结袁世凯称帝，祸我中国而强迫我承认廿一条约。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战后，夺取旅顺大连，而建立所谓关东州。凡日寇所攘夺，种下侵我全国之恶种子。

日寇不但以经济侵略继其领土野心，更以干涉我内政，制造军阀内战，逐步图谋侵我全华而奴役我成殖民地。

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惨案即系日寇导引国际帝国主义反对我国革命之阴谋。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直接出兵济南，以向我当时之南京政府作更有保障的侵略要求。而寇酋田中义一的灭华全部计划，即于当时暴露于世。

"九一八"日寇实行武装占领我东北，这不但是决行推广侵略我国灭亡我国，并且是要在我东北组成反对苏联大战的根据地，要把东北变为将来在太平洋对英美作战的奥援。

我国自洪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后，无论康梁企图改良运动，无论辛亥革命，护国护法直到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中国本身是要力图把自己的历史社会的车轮推向前进与世俱进，只缘日寇伺隙乘机百般陷害，始则鼠窃狗偷，继则明火执仗，终至奸淫掳掠，抢夺烧杀，要把我大好山河，优秀中华儿女，沦为日寇的殖民地奴隶牛马，永远不能翻身。

芦沟桥的炮响了！这就是日寇最后杀我的屠刀出现。这就是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回声。

中国人知道，要立国于天地间，要保证四万万五千万人伟大民族的生存，要与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善邻友好，要与全世界先进文明国家同等自由和平，非首先反抗日寇不可，非打倒日寇不可。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族国家图生存争自由的伟大政策——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了。这是在中日世仇，你死我活的基本矛盾上实现的。这是伟大中华有其悠久文化历史与进行历程的必然表现。这是中华儿女知道要继承祖先历史，要吃饭穿衣，要自由幸福，必须与世代死仇日寇抗战到底。

二、五年来抗战的历程

日寇以其狂妄无比的打算，速战速决的闪击战，以为十万兵或二十万兵，三个月内就能征服全中国。不错，我们是地大

物博、人多。然而，我们真是一无所有，我们没有具备现代国家政治的组织，没有现代生产经济制度，没有现代国防设备。我们的国际环境除了西北背靠安全得到苏联的善意赞助以外，我们的国际“朋友”最初是用两面帮助，不偏不倚，亦偏亦倚的“好意”来“帮助”我们。归根到底，我们抗战，全凭我们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心和血来和日寇拼命。我们的抗战已经五年了。

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七七抗战起到一九四〇年止，日寇侵华死伤损失如下：

死伤者……………一、九九四、二六七人

被我掠获俘虏　二四、〇〇〇人

被夺及被毁唐克　三、三二二

大炮　一、八二三

步枪　一六五、八八八

飞机被夺被毁　二二、四〇〇

飞机师被捕及战死二、五六〇人

其余军需战具无算

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到现今这一年半，日寇损失尚无确实材料。但估计日寇长沙会战第二、三两次大败及北方“扫荡”战中的损失以及中部战线、闽粤战线，日寇的损失最少亦有上列数目之半。

我们的损失自然是很大，以地方来说有平津为中心的冀察绥晋山东底工业煤铁盐和原料区、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工商业农产品的财富区、以及武汉心脏区、广州汕厦的商业区，北方铁道线、平津浦、平汉北段，平绥、正太、同蒲、陇海东段，沪杭、潮汕、广九、广三、海南岛。

我们的军队活力和武装的损失当然也很重，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保护祖国、为不做亡国奴而牺牲于战场者为数是不少的。在战争的第一时期即武汉失守以前，敌人死一个，我们要死三个；武汉失守以后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情形就完全改变，我们死一个，敌人就要死两个三个。

敌人占领了武汉和广州以后，他们施行诱降主和手段不成，而继以以战养战。在以战养战中依然不能达到其沦陷我国的目的，于是一面作战，一面诱降主和利用民族败类鲜廉寡耻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成立伪南京走狗政府、北平为中心的王克敏等走狗政权，绥察蒙古德王及李守信等做走狗成立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这就是日寇还没有可能征服全中国以前弛就把中国零碎分割而“治”之。日寇所制造的汪走狗和约与所谓“日华协定”，日寇只能自欺。有气节有头脑的中国人谁也认识日寇的狼子野心，非至亡我国灭我种而不可。

五年来抗战，我们还有很多的弱点和巨大困难。无论战地或沦陷区，人民遭受日寇的屠杀、蹂躏、剥削，战争越延长，困难越增加；在后方大后方，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以及民众生活方面都深刻的裂痕。但是我们抗战的基本不但不曾动摇，并且有许多新发展。人力方面，我们只动员了全部堪战十分之一，军队的主力，在各战区依然保有，在后方大后方，建立了不少新的生力军。建立了一些国防工业，修筑了川康藏到印度的公路。我们后方并不缺粮，也不定缺货，只根本取缔了囤货居奇发困难财的。只要善于利用游资，善于利用劳力，那末，国防经济的开拓和人民生活的调节，是不成问题的。我们的抗战政治一方面是在进步着，例如参政会制度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与宪法促成会之进行，如果能实事求是的做去，则全民抗战是

可争取最后胜利的，民力物力全部发挥是容易做到的。在抗战中我们最大的进步，就是民族文化思想的开展，反侵略爱国主义的扩大，成为抗战胜利唯一的精神因素。

三、德苏战争对抗战的影响

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中国人民争自己生存的战争，同时也是中国人对法西斯帝国主义世界侵略者打头阵的战争，也是不仅中国人要谋取自由民主的战争，同时也是为世界自由民主而战。中国抗战是光荣伟大的，它的战争是有世界影响的战争。

一九三六年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同盟"。那时德意在西欧东非侵略行动中，早已臭味相投，行动一致。事实上他们已组成国际侵略同盟。

如果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国际反侵略团结有适当进行，在东方予中国以应有的助力，日寇不但会被中国紧紧拖住而且也会早倒台，则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吸血鬼何至于猖狂肆虐如今日。不错，世界矛盾纽结在西方，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在东方打头阵，其事之坏或有甚于今日，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

在中国新生力量正在继续生长尚未达到反攻获胜的时候，日寇虽已精疲力竭，牠却节省了力量，强制的集中了力量，在一九四一年与西方希特勒匪徒阴谋合伙要进攻苏联，而希特勒遂在西方发动反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改变了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全部形势，也在改变着中日战争力量的对比。苏联肩负全世界反侵略争自由的重负。苏联虽与日寇有中立协定，然而因为日寇要响应希魔，要侵犯苏联，而把精兵百万控置于满洲，这就在实际上减轻了中国在东方单独作战的困难。日寇牵

制苏联，却牵制了自己。但是日寇不能立刻进攻苏联，只起其牵制作用，而去先取突然袭击美英在西南太平洋的阵地。日寇这样冒险企图也有牠自己的打算，因为苏联远东强，不易拼，大陆作战四年多拼破中国的长城也拼破牠自己的脑袋，陷住了自己的泥腿，若遽然侵苏则大陆战线连成一片，日寇虽惯于冒险，但也不敢轻投此著。日寇因利用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军备薄弱和政策的犹移，而以行险侥倖的手段向英美荷印澳领土同时进攻。这样就使中国抗战进入更有利的环境，中英美荷澳建立反侵略联合，改变了中国抗战的全部形势。在太平洋战争暴发初期，不但吾人认为中国将有全线反攻形势，即莫斯科真理报十二月著论中亦认为中国将有全线反攻的可能，在当时是确有依据的。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反侵略联合主角之一，打破以往的孤立局面，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这不能因日寇在南洋一时放肆而移易。

四、反攻问题

我们主张过长期抗战，我们直到现时还准备作长期抗战的斗争。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迫望反攻，迫望完全驱除日寇，在中国领土不许存在一名日寇。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我们有许多有利反攻的外部条件，反攻之有待于外部条件，就是补助内力不足的因素之一。

当中国对暴日单独抗战时，胜败问题解决直接属于中日两方。从苏德战争和西南太平洋战争以后，即中日战争的解决，已系于世界全面战争的范围。如果当苏联红军去年十二月坚决反攻步步击败德军而使德军向后溃退的时候，英美毅然在西欧

发动第二条战线，则德军全溃、希魔必倒无疑。西方的枢纽打开了，东方日寇即或能肆虐一时一地，但是不至张狂遍于南洋及于缅甸，抑或英美荷澳，既受日寇突击，应以可能调动之力量积极应付，攻守并重，则日寇亦必大受挫折，中国各战线更易伸张，日寇溃退可期。

可惜反侵略联盟国在过去这一时期许多弱点既被日寇利用也被希魔利用，所以希魔还能搜括西欧一切力量东调挣扎，而日寇则利用联合国的军事上既不集中、不统一，而政治上军事上甚至还各自打算，不能迅速以大批军火物资运华，不坚守星洲，不充实缅防，中国军虽在各条战线逐有伸张，在缅甸拼命作战，但不能不受到与莱荷印菲岛相继失陷的影响，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最后几陷于孤立。这就导致最近形势的转变，而影响抗战，不但不能实现反攻，日寇且在浙赣及北方发动积极攻势。

然而上述并不是抗战的悲观，不是反攻的失望。因为第一，世界反侵略联盟国的团结正在增强着，缺点和弱点正在改善着，希魔夏季进攻计划事实上又已宣告破产。第二，印度、澳洲、夏威夷对日寇的大包围逐渐巩固起来。第三，日寇不能急切充分利用南洋人力和物力，而其海军半数消耗，补充困难。第四，中国战略基地无变动。第五，中印连络已通，对海连络运输照常。第六，在日寇侵占之南洋各地掀起了被压迫殖民地的解放斗争，许多地带有抗日游击在开展着。

如果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是西方实现第二条战线、希魔溃灭的时候，则东方日寇在太平洋的初步胜利将变为继续损耗、攻守两难与接近溃败灭亡之途的时候。

中国现在从各方面加强着抗战力量，一旦形势转向有利

时，举行全线反攻，驱除日寇出中国，为时并不很远。就是说，过去长期抗战历时已五年，今后实现反攻，不会再要五年，这是无疑的。

五、东北人民底解放斗争

东北人民十一年来受日寇摧残压榨，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日寇每一侵略步骤，每一冒险行动，均从东北人民榨取物资以充军实，并且强征壮丁服军役，替日贼当炮灰，服苦役，担重负。如果日寇真要实行动手抢夺苏联远东，则东北人民所受的重压与遭受的惨苦必十倍于今日。因此，目前东北人民的各阶层的民族压迫的解放要求甚迫切。东北人民避免和反对日寇依据东北来进攻苏联。东北人民解放要求实现，依靠东北人民自己，再不要坐等机会，勉强挺死。等机会因循苟且一时，实无异于帮助日寇，巩固其满洲之残暴统治，便利于日寇依据东北而肆行不断侵略冒险，反而更加削弱东北人民力量，反而增加束缚压迫。东北人民今天应更大觉醒，依靠于自己团结起来同暴日作斗争。同时东北人民依靠于曾经领导人民作过广大范围抗日救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东北组织，依靠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再起，帮助人民领导人民走上解放胜利斗争的道路。

东北四省为中国领土重要构成的部份。过去、现在、将来，对于中国起着重大影响。将来之新中国之建设必须以东北作有力的倚据。中国抗战反攻胜利的发展，必然最后消灭日寇在东北之统治，才能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在内地通行着这样的见解："始于东北，终于东北"。亦即吾人在东北战斗中所认识："吾人发动东北武装抗日在先，而东北抗日救国的最后

胜利问题必须解决在后”。换句话，东北人民的解放胜利，必须东北人民继续起来斗争，而东北人民解放胜利的最后保障，不能不以全国抗战为转移，抗战胜利，东北问题就能解决。

另一方面，我们要确认，东北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日寇依据我东北，日夜企图实行进攻苏联，苏日战争有不能避免之势，战争如果爆发，那时东北人民的解放斗争，必与苏联红军抗日作战结合起来，东北人民在红军救助之下有可能从日寇跌蹄践踏下获得解放胜利。

六、提高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加强解放斗争工作

决定现代战争底胜利底直接因素，是依靠于发动机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技术装备、军队的统率指挥以及驾驭技术的能力等等，以及依靠于人力后备军和战争底物质资源。而间接因素是依靠于战争国家的政治和内外环境。然而一切因素中之重要因素——厥惟精神因素起极大的作用。

“七七”以前，我们确实缺乏一切抗战必备的完全条件。然而，每一个觉悟的进步的黄帝子孙，都感觉到抗战则生存，不抗战则死亡，甚至于宁可抗战而死，不愿屈辱苟生。因抗战而中国统一了，因抗战而力量团结加强起来了，支持了五年长期抗战，克服了不少内外所生的严重困难，这不能不归功于精神因素，即中国人有伟大民族思想支配着，有爱护祖国反抗侵略压迫的至高思想。抗战以后，这种伟大民族思想，反侵略压迫的爱国思想，是随着抗战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今后实现反攻，驱除日寇，有赖于有形物体力量——提高抗战军队的技

术装备和充实抗战物资供给。同时必须有赖于无形物体——精神因素的继续增强扩大。苏联红军与人民在前线在后方能于抵抗希魔暴德而忍受过初步的挫折，能在莫斯科附近毁灭法西斯匪军，能够收初步反攻胜利之功，以及将来能完全毁灭希魔，这都是由于有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伟大思想作有力支柱。

我们十一年来与日寇在东北作艰苦斗争的东北战士，不但要淬厉着这种至高的思想——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而且要推广到东北人民群众中去。

我们更必须要用我们的游击运动的工作活动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我们的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结合起来，巩固起来，就是说精神的因素要在工作实际中表现出来，我们的胜利斗争前途才更有保障。

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英勇地坚持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斗争，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按照毛泽东思想加以系统地总结，这里仅是个人一些粗略的回忆。

一

旧中国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不如说是：“关东有四宝，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东北真是个富庶之地。这里有黑嫩平原的肥沃的土地，有闻名世界的原始森林，还有数不清的名山大川，埋藏着无尽的宝藏。可是“九一八”日寇一声炮响，南京反动政府便在“以和平对野蛮”、“不准抵抗”的卖国政策下，把这片大好的河山拱手送给了日寇。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到处唱起了这样的怨歌：

“攘内安外”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

历史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人民的救星。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野心。事变之后，又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指出：日寇侵略东北的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东北人民的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卖国政策的结果；东北人民和一切爱国军队，不能抱任何幻想，自己组织起来救国自救是唯一的出路。党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意志和愿望。随着东北三省的失陷，一个自发的抗日高潮，便在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旗帜都打出来了。一部分旧东北军，在民众抗日怒潮推动下，也被迫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意志起来抵抗日本。

还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中共东北党的组织便在延边、绥宁以及吉（林）海（龙）铁路沿线组织、领导过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卫队，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而且多用原始武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它对于后来的群众革命武装斗争，却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事变发生后，党一面着手在上述有过武装斗争基础的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面派干部，党、团员，以及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参加到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大刀会等抗日队伍中去，力图在党的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的初期，采取合法与秘密的方式，以及争取上层与打入下层齐头并进的工作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和领导他们抗日。为了同一目的，党还以极大的努力，在各地给那些抗日武装以支援。

那些以旧军队为基础的抗日军，虽然装备优良，兵额充足，有些部队还有过实战的锻炼；但是，军队的绝大多数的领导者是国民党人，反共积极，抗战消极，甚至有的暗中与日本

特务勾结。他们不相信人民力量，不肯帮助和支持群众的抗日斗争，而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出兵”。各派之间又经常为了争名夺利、抢地盘、扩充个人势力、骗取关内外爱国捐款等，相互争吵，相互火并。对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更谈不上接受，甚至多次收缴我党组织的游击队的枪支。日寇充分利用了这些上层人物反动、腐败的弱点，施加政治分化、特务渗透、诱降等活动。就这样，三十多万旧抗日军，不到一年的光景，垮的垮，降的降，跑的跑。名扬一时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摇身一变，成了“满洲国”的国防大臣。原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当了汉奸。李杜、王德林、唐聚五、冯占海之类，纷纷绕道逃回关里。各地方一些自发的抗日武装，有的也因被地主阶级把持，或没有正确的方向，被日寇击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浪潮趋于低落。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些小游击队，冲破重重困难，发愤图强。同志们握着原始武器，去袭击鬼子的据点；有的赤手空拳装成打架告状的，混到伪警察署去摸枪；许多党、团员与反日会员卖短工，发动妇女同志纺线织布，赚了钱去买枪买弹；有的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打入到伪军中去，组织兵变。就是这样，党的武装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先后在延边、磐石、珠河、海龙、宁安、密山、汤原、饶河等地，建立起了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的抗日游击队。虽然，这些游击队在前进道路上曾经受了不少挫折，有的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被日寇打垮了；有的刚刚组织起来被“抗日军”缴了械；有的因阶级路线不明确被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或是被叛徒出卖了，但是，困难与挫折吓不倒坚定的革命战士，同志们失败再起，一次不成再二次，从血的教训中学习领导本领。

东北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是在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游击”的一次指示信到达之后。这时，各地的游击队都已发展了，壮大了。东满延边人民游击队，打破了日寇挑拨民族团结的政策后，汉族与朝鲜族之间更加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因而使部队迅速得到了发展，并且扩编为东满抗日游击队。南满磐石和海龙游击队合并为南满游击队，发展更快。珠河中心县委领导的武装正式成立了珠河游击队，并且吸引着一万多人的旧式武装向它靠拢。后来，汤原游击队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斗争也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开展起松花江下游的游击战争。此外，饶河游击队与密山游击队也在乌苏里江西侧展开活动。同时，党又在各路旧军队中，广泛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重新组成的救国军总司令部，团结了一些救国军的领导人，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并且积极展开了战斗活动。虽然有些队伍整编以后不到一年又垮了，但是从全局来看，由于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政治威信，在统战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后期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和第四军的建立，与统战工作的成绩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抗日联军第五军，多数部队是利用救国军的基础加以改造的。

到一九三三年底，新的斗争局面已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队，先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成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核心力量；南满和北满以统一战线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救国军已基本上接受了我党的领导；各地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几乎普遍组织了抗日救国会。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的挫折之后，又活跃起来了。

二

热河失陷之后，日寇为了加紧法西斯统治，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组“满洲国”为“满洲帝国”。继之又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它签订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的国民政府，承认了长城为“满洲帝国”国境，并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划归日寇统辖范围。这种卖国行为，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与此同时，日寇对东北人民加紧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治。在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所谓“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量地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支，掠夺民族工商业，并实行武装移民和经济封锁。在军事上，则不断地增加日寇关东军，收编扩大伪军，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攻对象，不断地进行大“讨伐”。日寇妄图用这种法西斯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治安肃正”和巩固“满洲帝国新秩序”的阴谋。然而，和侵略者的梦想恰恰相反，由于民族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和我党奉行的正确政策的影响，新型的抗日军队的成长，东北人民的抗日怒火越烧越旺。依兰县土龙山的数万农民举行了大暴动，并在十天之内，在一个县区就打死打伤了日寇饭塚大佐以下三千余名。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队，积极向日寇占领的中小城市、铁路沿线据点袭击，多次粉碎了日伪军联合的大“讨伐”。

一九三四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根据这一人民武装抗日运动新发展的局势，着手把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队伍，先后改编成十一个军，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

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其中第一军到第七军，从创建开始，就是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各军大都实行三三制编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五到七个连。武器装备除了步马枪和轻重机枪外，还有迫击炮、狙击炮、步兵炮。这些武器都是从日寇手中缴来的。军队中建有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有党委会，连有党支部。十一个军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五万五千余人。此外，还有不在联军编制之内但接受统战指挥的武装约二万人。人民喜庆联军壮大，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颂歌：

"十大联军"十万人，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日益成长壮大的联军，不断地向各铁路沿线进攻，长白山下，松花江畔，遍地烽火起。伪靖安军在吉东地区被打得狼狈溃败。南满东边道地区"剿匪"总司令邵本良和大汉奸伪军头子李寿山曾多次向日寇三毛司令许愿活捉杨靖宇，然而一碰到抗日联军的部队，则成团成营被歼灭，最后邵本良自己也作了我军的枪下鬼。摩天岭一战，日寇死伤近千人。辉南、安图、汤原、方正、宾州、依兰等县城曾先后为我军攻克。日寇拚命要修筑的京图、图佳、虎林、绥佳等铁路线，在我军的不断袭击下，其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修筑绥芬河的"国防"公路的计划，在连遭我军五次打击之后而彻底破产。中东、吉海与南满的各铁路线，屡遭我军破坏，成列的军用火车被颠翻在道旁。一些孤立的伪军据点经常被袭击。特务、暗探潜入我游击区，被游击连、农民自卫队、妇女会等组织破获。就是在日寇占领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沿线，也有秘密的救国会展开各式各

样的斗争。一九三五年秋，满洲省委撤销后，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四个省委相继建立。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抗日联军十一个军逐步改编为三个路军。第一路军辖一、二军，活动于西起辽、沈，南达安东，北至长图铁路，东至鸭绿江地区，共约三十余县；第二路军辖四、五、七、八、十军，活动于中长路哈长段东侧、牡丹江流域、松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地区，共约二十余县；第三路军辖三、六、九、十一军，活动于松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东西、黑龙江右岸地区，活动最远时到黑嫩平原，共三十余县。

"七七"事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了最高峰。许多老游击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尤其是松江下游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伪"三江省"，大部分农村为联军控制。伪军纷纷动摇，曾经成连、成营、成团的投诚起义。日寇惊呼着："三江已成共党乐土"。

三

东北三省，是日寇执行"大陆政策"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又是"反苏策战"的前进阵地。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便成了它的"心腹之患"。日寇为了巩固这块基地，关东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增至七十万，同时对东北军民展开了"总体战"。它一面加紧施行"归屯"政策，凡成游击区的小屯子全部烧毁，群众集中到大屯严加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另一方面对我加紧军事"围剿"，采取分区包围、稳扎稳打、轮番"扫荡"的战术，在一块地区内来回拉网，巩固一个地区以后，再向其他地区进

攻。

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我游击区不断遭到破坏，部队不断受到挫折。我军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里露营。

在露营的日子里，部队除武器外，帐幕、小火炉、小锅、碗筷、锹、镐、斧、锯、针线、药品等一切都要携带。生活正像当时流行的一支歌中所说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冬天，地上冰雪三尺，有的部队还穿着单衣。篝火，成了野营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东西。一首"露营歌"里，生动而逼真地描绘了这种生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山果、野菜、树皮、草根以至靰鞡底，都成了食物。偶尔猎取到一只野兽，那是上等食品了。至于医药，更是奇缺，战士们负了伤，连一条白布绑带也没有，从身上撕下一片衣服，包扎起来继续战斗。医务人员的药包里，除了少量的红汞药水，唯一的内服药就是一点鸦片。更严重的是，日寇还经常以"篦梳式"、"踩踏式"围攻山林，到处纵火、施放毒药。同时他们还无耻地把女人画片、女人服装挂在树上，甚至到处留下酒食和"亲恳书"、"招降书"，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我军。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军的坚强意志。战士们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意志不可摧。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同志，在日寇层层包围中，饮冰雪，食草根，率领一支小部队战斗到一人一弹，壮烈殉国。冷云等八个女战士，在重围中英勇奋战，最后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投入牡丹江；一个班的战士在"十二烈士山"上，和数十倍的日寇奋战一昼夜后，全

部壮烈牺牲，宁死不做俘虏。赵一曼、夏云杰、王德泰、陈翰章、李延平、王光宇、张镇华、许亨植、朴吉松、冯治刚……无数抗日英雄的美名，永铭在东北人民心中！

在严重的斗争关头，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负责同志集会讨论，提出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并重新制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将三个路军的各军整编为十一个支队，继续坚持同日寇强虏进行殊死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初，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同志再度集会。这次会议，比较正确地估计了全国的局势，提出了长期斗争的问题；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取消主义”，提出“不论环境多么困难，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抗联的旗帜，坚持到最后胜利”。从此各支队便统一在东北党委领导之下，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游击方式，主力隐蔽整训，另外组织了十五支小部队展开活动。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侦察，联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展地下武装。各队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最有游击活动经验的中级干部　战士都是经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同志。这十五支小部队，在东北党委会的负责同志直接指挥下，分遣在北满、吉东、延边、辽吉边区等地，展开了机动、灵巧的活动。……

四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这一期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日寇自欺欺人所宣传的“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了”、“满洲共产党复灭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日寇的一些孤立的据点常被袭击。

一九四三年初，我军一支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一次伏击战就歼灭了日寇一百多人。我转入以整训为主的部队，更加紧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积极准备迎接新的局势。干部都学习了一些有关党史的文件，并从重庆出版的新华月报上读到了“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等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东北抗日联军处于和党中央隔绝的状态，当读到这些文献时，同志们无不感到鼓舞。对照东北多年斗争的实践，干部进行了思想整顿，政治水平、指挥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经过整训的部队，虽然人数远不能和一九三七年发展最高峰时相比，但是质量提高了，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我们从无线电中收到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更是欢欣鼓舞。东北党委会和抗联指挥部负责同志，估计到新的局势，立即拟订了新的行动计划。八月九日，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东北抗日联军又和苏联红军、八路军一起，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斗争是从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其中有着许多经验教训，有待参加这一斗争的同志进一步探讨。尽管这一斗争还有许多弱点，并且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这一游击战争是有巨大意义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前，首先给了日寇以严重打击，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迅速实现，有助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当“七七”抗战爆发后，又从敌人背后侧击，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像毛主席所说：“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仅据日寇官方缩小了的统计，前前后后被抗日联军毙伤俘的官兵约十八万人。至于伪军被消灭的，不知要超过这个数字多少倍。毛主

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更精确地描绘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面貌，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遇　　险

（1939年）

中华民国廿一年，余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派遣，参加满洲党省委工作。那时，党在东北提出民族革命战争武装驱除日寇，收复东北失地的口号下，开始进行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积极活动。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我在宣一安东召集高丽抗日群众会时，被自卫军把我当高丽人捕去，并且诬我为日本侦探，几次要杀害我，自卫军的军官们其实并不是注重在于办日本侦探，而是在于狭隘的民族成见，小看高丽人，并中了日本强盗民族挑拨的恶毒影响，仇视和疑忌高丽人，而当时抗日的自卫军普遍流行着反共产党的思想行动，当着他们把我捕去的时候，就认为即非日本侦探，是属可恶可杀的高丽人——共产党。兵士们的枪口对准我要开火，刀锋曾几次向我脑顶子晃来晃去，然而我很知道他们的盲目，很自信用抗日救国四个大字能够说服他们，由下属兵士直到他们的白营长本部都被我用沉静和恳挚态度慷慨的说服了他们。消灭了他们对我的杀机，并且感动了同仇敌忾的情绪。我到关外来破天荒第一次吃野味狍子肉，就是那些极度热烈抗日救国的下属士兵，把我从紧缚高吊中释放下来作了上宾看待。

"捉人容易放人难，不知这老哥是真蛮子还是假蛮子，虽然不能肯定是日本侦探，可是一个古怪的人……"这位白营长

是难决定我的释放问题的，结果他们郑重其事的派了全副武装的一排人，依然把我上绑，用一辆"驷"牛车把我装置在车上，长途牛车行，这又算我第一次的新生活，他们程宣（注：可能是押送人）从安东花脸沟押送我到中东路的铁岭河车站，沿途经过自卫军牡丹江东岸高地阵地线，那时正是自卫军与江西岸及牡丹江车站附近的日军对战中，十次以上遇到许多在火线上的兵士，他们看见我乘坐的牛车便问："干什么的？"押送我的兵士们顺嘴答复道："日本侦探嫌疑人……"，火线上看见我的那些兵士们总是一样很愤怒的异口同声的说："唔！送他干吗？问直杀了就是。"我并不害怕，我很快感，我认为抗日战士们的仇恨日寇及其侦探走狗是表现着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战斗意志，押送我的排长和兵士们他们贪吃老百姓的便宜饭一百里的程途走了三天，我不但着急要到他们的司令部受了耽误，使我又感到这些抗日作战军队对民众关系的腐败。

当我到铁岭河的时候，正是火线上很吃紧的时候，自卫军的将领们正在左路总指挥部开会。因为我带着日本侦探的重大嫌疑，不等这些将军的传讯，我到了他们司令部门前，我反对羁押候讯，我便大声叫唤："有要紧事……"他们果然注意到我的叫喊，而立刻传我到司令部的会议厅去。我一进门便昂然给以"不俗"的军礼，会场中的很多位司令和参谋长、幕僚人员便都惊愕。由一位马司令和关参谋长看过白营长的押送嫌疑人犯的呈文后，便向我问话，我以抗日救国从上海反日会派遣援马团的活动人员自承并说明我刚到江省的时候正是在全国正热烈拥护和赞助的时候，马占山已经倒台下做了日本走狗、伪满军事部兼江省长，我算受了骗，我不能不转向吉东，参加宣一安地方反日会民众组织运动，看谁真打日本，真救国，我就参加谁

……经过我两个钟头的滔滔自陈，并夹带一些忠实的批评和有利于抗敌的讽刺，当然我绝对不能把我的全部事情的真实向他们直陈的，这并非我欺骗他们。他们甚也奇怪，听了我的说话以后都表示出自目瞪口呆的，又像很踌躇的样子，一位姓关的参谋长（振寰，后来兵败降日了）和马司令共同决定，认我为抗日好友"南方的高客"把我释了绑，请我上坐，很客气的安慰我道歉！名贵的烟酒肉菜摆满桌子，殷勤劝进。随后他们向我说："张总指挥（振邦）特请先生驾临九站，面谈机宜讨论大计。"

五月十二的当天下晚，由一位军官伴送我乘火车到九站。那时正是前线消息不好，这位家大业大的日本士官出身的张总指挥正准备辞职下野实无异于临阵逃脱。自卫军驻九站总指挥部的李参谋长经周先生耍其手腕，同时司令部有一位饭桶电务员，他是浙江人，在口音方面他不能辩明我是南方人，他们认为我不但或许是高丽人，也许会是伪装的日本人，因此把我送到军法处要从新受审。我真很傲慢的给了那位正襟危坐的军法处长老爷以难堪的机警的回答。引起这位处长老爷的拍案大叫，而又不能不向我作低声的说："请你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就是天大的能人，了不起的人物，你即是爱国志士，就得俯就委屈，应该了解抗日军事破获敌探的重要，应该把你的嫌疑说清。"他这样较有根据的说明，我当然必须给以应有的回答。两个多钟头的功夫，一挥而就给他们交了卷。有一天夜晚关参谋长从前线回来和那位李参谋长一同请我到他们的机要办公室去，向我伸出热烈欢迎和恭敬之手，并且说："现在马总指挥和我们都承认先生你是我们的同志，那么，我们自卫军虽然有吉东十数县的根据地，虽然有十万以上的军队，我们总觉

得敌不住日本军队的分段进攻，现在就请先生你拿出抗日救国大计开展军事的具体办法。……”特别是那位姓李的参谋长，表现他好象是很有聪明才智和具有一切军事政治的熟练的一个专家，关于抗日救国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狡猾话，使我很注意的就是他说：“我们是自卫，不是反日，日寇力量强大非籍外力（即是说国际的不能抗拒日寇，国际联盟空有制裁办法的，国民政府中央是能很快出兵的，就是碍着红军化问题未解决，可是我们现在东北，不反对共产党，而且要藉重共产党（！？）……”并且李参谋长说明自己是国民党的先进份子“左”在东北的重要担负者。我当时说出我的抗日大计，具体办法：第一要联合奉吉黑的一切反日军队，一致行动。第二军队要依靠民众发动组织民众改善对民众的关系。武装参战人民，在战争过程中彻底改造军队，最低限度要像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守必须守的城市和阵地，同时必须广泛的采用革命的游击战法进行游击战争。第四进行十年斗争准备工作，和目前即须有非常变化不利时期的军事的民众的政治的紧急准备。第五抛开国际联盟对南京政府出兵不要幻想。第六苏联是我们中国反日人民的真挚良友，当然要联合友好，苏联为被压迫民族的援助，有其国际革命的政治任务和人道正义。但是不能直接干涉第三国的事。更不能以武装行动帮助我们。因为苏联的国家政策是和平政策……。

脱　险

（1960年）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初春，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年二月中旬一个无风的雪夜，我和电报员卓文义，还有两名随行的同志，踏着乌苏里江厚厚冰层上的松软积雪，悄悄地越过国境线，向抗联七军军部——饶河县十八垧地进发。我背着我的外壳磨得发亮的"三用"（盛文件、当枕头和垫在大腿上代替办公桌）皮包。卓文义他们携带着无线电报话机，电报密码等重要文件、物件。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天还没有亮呢。

留在七军军部负责和五军联系的副官陶雨峰同志，一看见我就焦急地向我报告说："您去苏联的事已被坏人泄露，敌人乘你入苏失去和五军及其他军部队援助的时机，向兰棒山五军密营大举进犯，现在五军差不多每天都和占绝对优势的日寇和伪满军'讨伐队'发生激烈的战斗，守在五军后方密营外口哨所的李海峰等十二名同志，在苦战一天后全部牺牲；五军几次派来接护您回宝清的部队，都被敌人阻击回去了。"

"局势是这样？！"我脱口道出这样几个似问似答的字来，心里想：要是我再迟到总指挥部些日子，局势将会恶化到更加不可想象了。

这时七军代理军长崔石泉同志以及七军的其他几位革命同

志都起来了。我把与党中央取上了联系，特别是把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向他们作了传达后，同志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去苏联前他们脸上的焦急和忧郁不见了，马上个个精神焕发起来。

接着我们便研究起我如何能很快回到宝清我们路军总指挥部去指挥反“讨伐”斗争，以改变五军的危险处境。当时考虑五军很快派人来接护我回去的希望是不存在了，崔石泉同志就要从他们七军派人护送，然而住在当地的这一部分七军部队，成员复杂，有些是收编不久的山林队，又没经过什么考验，我哪里放心让他们护送呢？只好推说：“我再考虑一下吧。”

我想来想去，回总指挥部的较好办法，只有一个：干脆就带几个随行人员走。

等其他人都已离去，我便独个儿对崔军长谈了我的想法。开始他很不满意我的冒险打算，态度严肃地说：

“不要七军派人送就要等五军派人来，现在敌人到处都在抓你，路上麻烦得很，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冒险——只带几个随行人员去！”

五军是第二路军的中坚，他们的兴衰存亡，决定着整个东满的局势，他们既已处于九亡一存的险境，说什么我也不忍心把他们置身于数百里之外，只是消极地听候斗争消息。我便坚持要带随行人员走。经我一番好说歹说，崔军长总算是让步了。但他仍是不放心，很诚恳地劝告我：

“冒险的人才最容易遇到危险，这是您常常用来说服别人的道理。可是……”他摇了摇头，深情地说：“您是中共吉东负责人，又是第二路军的最高首长，东满抗日军民对您怀着多么大的希望，您是知道的。您要多为全盘想想呀！”

听他的话里，好象我只想到五军似的，其实我哪里会是这样呢。因为我心中有数，崔军长的话没有动摇我的意愿。我回总指挥部的事，就这样在同志们担心和不愉快的气氛中决定了。

第二天恰巧是弥天大雪、狂风呼啸的日子。大清早我就和中共下江特委徐凤山、杨德龙，副官乔树贵、陶雨峰，电报员卓文义等七人，离开七军军部。跨上战马，踏上征途，顶风冲雪向宝清进发。我骑在高大的赤红马上，时而仰望灰黯的天空，时而四面瞭望；周围是隐约的高大群山，山上是茂密的森林。和往年冬天一样，高山和森林在暴风雪中挺立着。我们在暴风雪中行进，可算得上无畏的探险者，然而又有谁能保证，在茫茫的“航道”上，不碰到暗礁呢！

风越刮越疾，雪越下越大，风卷雪花打在脸上，就象针刺般疼。雄壮昂扬的战马，在这样恶劣的暴风雪面前，被迫低下头，象病态的绵羊，在厚厚的积雪里没精打采地扳起“慢步”来。至于骑在马上的勇士们，早已冻得脸色青紫，全身颤抖了。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徐凤山同志勒住了马，我当出了什么事，几步跨到他跟前，他几乎是把嘴贴到我的耳朵上大声建议道：

“总指挥同志，现在风雪太大了，我们还是到西沟屋子里去避一会儿再走吧？要不准会连人带马一齐冻死的！”

“嗬！连人带马一起冻死！说的可真够吓人啊！”我以他同我说话同样的姿式告诉他：“不行啊！小徐，我们的骨头硬，冻不死的，再说风雪愈大，就愈碰不到敌人，我们也就愈安全；我们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天赐的赶路好机会呀！”

徐凤山见我赶路心切，无心接受他的建议，他又想说什么，可是只张了张嘴又把话嘘了进去。

我们继续前进着，路，越发狭窄难走，我们摔倒爬起，爬起摔倒，不大会儿就摔得腰腿痠疼，急得浑身是汗。到中午人饿马乏的时候，才赶了四十多里路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风小了，雪也停下了。我们在一个林边停下来，用雪带进几口干粮，又喂了喂马，大家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从同志们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战胜了大风雪而感到心里舒服，我拍了一下身旁的徐凤山同志的肩膀，装得一本正经地问：

"喂！恐吓家，你不是说我们'准会'连人带马一齐冻死吗？"

"我是……"他见我在笑，知道我是和他玩笑，便做个鬼脸说："怎么？你还为没冻死感到'可惜'呀？"

大伙一阵哄笑。

"好了，好了，我算说不过你。"我看不宜逗留时间太久，便说："赶快上马吧！同志们，天黑前必须赶到预定地点——荒上。"

行军又开始了。同志们有的在马上神气地打着口哨，有的轻轻哼起小曲，也有的小声闲唠着。总之，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唯独副官小陶不声不响，老是大睁眼睛，警惕地四面张望着。对小陶这种看来奇怪的神气，我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因为我知道这小伙就是这样事事认真，无论执行什么任务，他都一本正经地，从来不肯有半点麻痹大意。

我自己呢，既不唱又不唠，但也不象小陶那样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周围和前方，而是在默默地想着，"荒上"这个地方。

荒上，这是我不止到过一次的地方。这里闭塞、幽静、险要；北西东三面依山，南面是很大很大一片草甸子，里面水泥齐腰，甸子北沿的山坡上，有我们盖的一个树皮房子。我军的过往通信联络人员，夏季在这里夜宿，冬天在这里生火取暖和躲避风雪；又因为敌人从来没到过这儿，所以比较安全，我们也常把少数伤病人员送来这里休养治疗。我想：要是今儿晚上赶到荒上住宿，可真是太理想不过的了。

我们且谈且走，下午五点左右便到了离荒上七八里路的地方，忽然前面山上跑下来两个军人，离我们三四百公尺就大声吆喝着：

"喂！你们是送周指挥来的吧？我们接总指挥来了！"

"是啊！我们是……"心直口快的杨德龙刚要向来人报露实情，被我一声"杨德龙！"喝住了，接着我抢向前两步答道：

"是啊！我们是送周指挥的先头部队，周指挥跟着大部队不久就到！"我边说边向前走来，故作镇静地问："你们到底是哪个军的？"

"我们……我们是五军的！"对方听说周指挥随大队不久就到，顿时变得说话不自然了。这时我已观察清楚这是敌人的"讨伐队"，心想，何不趁这两个家伙还听得清楚，狠狠吓他们一番呢。于是我把脸向自己同志大声说："嗬！周指挥幸亏走上了这股道，遇上了五军来接他的'同志'，要是跟随到宝清增援五军的七军和四军的部队一起走，遇上了敌人，虽然他们有几千人，可也够麻烦的！"

"可不是咋的！"同志们附和着。

果然那两个敌人上了当，停住脚步听起来。完了便急忙向

山上跑去。

我估计背后可能已有追敌，便决定硬着头皮往前走。

我把我的决定和判断向同志谈了一下，大家都信心百倍，勇气十足，就连一开始反对我的冒险行动的徐凤山同志，此刻也不再埋怨我了，他那有力的拳头在空中一劈，坚定地说："冲过去！"

我们刚翻过一个山岗，快要到我们的那个树皮房子的时候，才又发现附近几个山头上，以及我们走着的这条山谷道路两岸，全都站满了敌人。这时我明白，原来我们已进入敌人的"口袋"门。我想脱逃的办法只有一个了，那就是从口袋底钻出去，沿着河子边的平地向西南方向冲去！

我们勒住马，我把向什么方向跑，然后怎么迷惑敌人等等，刚向同志们说完，敌人就向我们合拢而来，其中还有个头目模样的家伙说：

"周指挥到了，'同志'们赶快去接周指挥来休息一会儿再走！"

我看事不宜迟，便命令道："冲出去！"同志们在前面，我督后阵，大伙机灵地朝我规定的方向拍马便跑。敌人慌忙朝高空"唰唰"几枪，高叫"要活的！要活的！"

"后面的那个就是周保中！"忽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我的耳鼓。我马上明白，我们是被叛徒出卖了。而且这个叛徒是曾经做过抗联比较重要的工作的负责人，现在他象疯狗一样，在我的背后吠叫着。

既然敌人知道我确实是周保中了，那么"要活的"便是他们的真实心意，因为日寇与伪满政府早有捉拿我的悬赏告示："活捉周保中赏洋七千元！"我身后的这些奴才汉奸们，有谁

不在想着“七千元”呢？我判断他们不会打死我的，便放着胆子尽管往前猛跑，约两三分钟光景我们全部从敌人口袋底钻出，并且很快把敌人甩在二三十公尺远的后面。敌人还是拼命喊着：“抓活的！抓活的！谁要把周保中打死了，就枪毙谁！”

“快！你们这些蠢猪！”敌人追赶着，嚎叫着，谩骂着。

我想把敌人甩得更远些，让他们别说是要活的，连“死”的也不给他们得到。于是我向马屁股上猛捅一拳，马一挺身，不幸两只前蹄被坎坷摔倒，我被摔落在雪地上。“三用”皮包压在马肚子下，拉马，马不起来，皮包也抽不出，我向前看看，因为马跑得快，就这么一分钟光景，同志们全跑远了；又回头看看敌人，离我只有几十步了。我猛一拉，皮包带断了，皮包还压在马肚子下，我不能为了皮包而牺牲生命呀！这时敌人觉得有把握抓到我了，便叫喊：

“周蛮子，你可跑不了啦！”

我骑马赶路一整天，乍一下马，两腿麻木，没有敌人跑得快。不一会，一个大个子敌人就气势汹汹地来抓我的衣服，我急回头一看，就是刚才喊叫“后面的就是周保中”的那个叛徒。我简直要气炸肝胆了，恨得全身发抖地骂道：“你这个卑鄙的东西！出卖了革命，现在又想得到日寇的赏金，而拼命来抓我，你你你！”我照准这家伙的前胸“砰砰”连发两枪，因为距离太近，弹弹击中，这东西就没命的“哎唷”一声，扑通倒在雪地上亡命了。我又乘机向靠近我的其它几个敌人开了几枪，这几人伤的伤，死的死，其余的敌人怕死全部在较远的雪地上卧下来。因为他们贪恋着，或者是奉命“一定抓活的”，

依然不敢打死我，只是向高处开枪，吓唬我。

敌人越来越多，很快又要追上我了，我连累带急，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发痛，一股东西从心脏里向外翻腾，不一会便“咔”的吐了出来，“啊！”我顿时心惊肉跳起来，原来我吐的是一口鲜红的血。

我仍不停地跑着，头益发沉重，眼前一片黑花，双脚象是踏在弹簧上，左歪右斜，一跳一蹦，大有即将昏倒之势，然而我心里清楚：我一个人在浩瀚的革命洪流中是微不足道的，生与死都不在话下，但是党和人民在这祖国多难的年代里，却对我抱着一定的希望，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拯救灾难中的东北人民，我丝毫也不能软弱，我要活着，争取从虎口中逃出，继续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当然，无法逃脱也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我就自己结束生命！万不能束手就擒，为敌人利用或嘲笑，为党留下耻辱，让天下人骂我“懦夫！”

我跑着，大口地喘气，汗流浃背，突然，又“咔！”的吐了一口血，马上全身颤抖，两腿也抬不起来了。此刻六、七个追敌离我只十几公尺，我看注定逃不脱了，脑瓜一热，就决定自杀。我把弹已顶上堂的手枪，向前心移动，只消敌人一把抓住我，我就立即搬动枪机，让这些卖国贼、洋钱狂们大失所望。然而却万没想到敌人离我还有十几步远时，我竟被一个陡坎拌倒了，手枪摔到前面一两公尺远的地方，就在这要被敌人活捉去的一发千钧之际，我的前面突然“砰砰砰砰”传来一排急骤的枪声，接着大声的呼喊：

“周指挥！周指挥！后面我们的人到了！”我忙抬头一看，原来是副官陶雨峰同志，不由暗暗称赞他的机智多谋。“后面我们的人到了！”明明是诈吓敌人，哪里会有我们的人到来！

小陶躲到马肚子底下，似蹲似跪地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呼喊“援兵”到了。敌人一阵慌乱，我乘机爬起就跑，这时离我远一些的徐凤山、乔树贵回头不见了我，便也飞马向追敌奔来射击。敌人被迫停下追赶，烦恼地还击着，等他们再想起追我，我已经到了小陶跟前了。

“你快上我的马，周指挥！”小陶不是请求而是大声地命令我。

“你自己怎么办？”

“哎哟！”小陶急得两脚乱跺，头上顿时冒出豆大的汗珠，十分严厉地说：“你是总指挥，抗联不能没有你！”

我见小陶如此坚定、诚心，情势也不允许我再推让，便翻身上马。马儿几经奔跃，就撇下敌人几百公尺，来到了林子边的一条河道的渡口处。我当小陶一定是被我远远撇在后面，或者正和敌人死战，或者是敌人俘去，更可能是已牺牲，我不由回头望望；却想不到他就在我身后不到百公尺的地方，边打边退。敌人没命的嚎叫着：“快追！快追！”然而这声音也是发自在离我们极远的地方，而且充满着失望和焦躁的情绪，它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吓”的作用。

我面前这个渡口两端是数丈高的绝壁，这一丈多宽的渡口，是唯一的过河处，我没有来得及下马，就向河的对岸跨去。三月的北满虽然还常有大风雪，但是冰雪已经开化。这条河朝阳，冰已化得只剩下很薄的一层。我骑在马上，人马一起重量太大，马蹄踏的又猛，还没等我到岸边，浮冰就已裂开，这唯一过河的路被我切断了，我连翻带滚地总算上了岸。但是救护我的小陶却还留在对岸被敌人追赶着。

正在我万分焦急的时候，小陶已到了岸边，他见冰已裂开，

一只手把枪举出水面，一只手拨开围着他的冰块，两只脚三蹬两踹就游了过来。他一上了岸，全身就结成一块整冰，他健壮的躯体被冰裹住后，不由地“得得得得”地哆嗦起来。

天黑了，按照我们预先规定迷惑敌人的方法，林中枪声四起。我和小陶也钻进林中一个较高的隐蔽处，窥视敌人的行动；敌人站在河边，大概见河不易渡过，又因听到我们的枪声，不摸底细，个个如同死了亲爹一样苦丧着脸，木鸡似的失望地站了一会，接着头目们便骂起喽罗“笨蛋！无用的东西！”

已是深夜了，我和小陶在密林深处燃起一堆篝火，小陶翻来复去地烘烤全身湿透了的棉衣，嘴里不断地念叨着：“这么晚了徐凤山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又是什么他“亲眼看见卓文义被敌人击落马下是活着还是牺牲了呢?”小陶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在战场上如猛虎般的战斗员，现在居然变得深情缠绵，对战友们深深地怀念着，他先是声调低沉，渐渐地便哽咽起来。

我自己虽然伤心，但却不忍心看着别人精神痛苦；我尽量压下自己的感情，劝慰和鼓励小陶几句，便闭起眼睛想着心事。同志们被冲散了，事先又没约定集合地点，倘若他们被敌人俘去又会有什么样的恶果？我，虽然人逃出了虎口，可是我那装着党中央重要指示文件的“三用”皮包丢失了，携带无线电报机及其呼号、密码等文件的卓文义遇到了不幸，可能被俘或者牺牲了……这样，敌人将会在了解我们的计划之后，采取新的措施，使我军处于更加危机的状态，而我们因通讯器材的丢失，岂不又要失去和党中央的联系吗？此处离宝清尚有数百里之遥，又有谁能设想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危险呢？马上这许多许多

的问号充塞满脑，折磨着我这颗受了严重创伤的心。然而我终因疲劳过度打起盹来。

“首长！首长！”我刚要入睡，小陶就机警地推醒我说：“下面有脚步声！”

“赶快用雪把火盖灭！”我告诉他：“可能是敌人摸上来了。”

我们立即躲到大树后面，来人已离我们很近，其中一个说：

“周指挥是过来了呀！怎么不见了呢？”

我听得很清楚，这是副官乔树贵的声音，知道自己人找上来了，便激动地叫道：“乔树贵！”

除了卓文义之外，我们全又会晤了。

可是，徐凤山等同志的马，也都丢失在战场上，我们牵着仅剩下的一匹马，继续往前走着。我因为心脏累伤，走起路来非常吃力，林子里又不能骑马，行进非常迟缓。第二天晌午，才到了一个住几户朝鲜人的沟里。会长一听说我们是抗联，热情地给我们安排住的，张罗吃的。我们饱饱吃了一顿饭，又舒服的睡一夜。天没大亮时，会长跑来告诉我们说，东山坡上有五、六匹无人牵引的军马，怀疑后面可能有敌人。我们急忙出来一看，不由一惊，原来最前面的那匹赤红色的就是我的马，其余几匹也全是我们的，其中有一匹驮着无线电报机的马，正是报务员卓文义同志的。只是电报机歪斜到一边去了。说来倒极象神话，马为什么会沿着足迹找我们来呢？我是无法解释的。马一看见我们便一个劲儿地嘶叫起来。我第一个跑到马跟前，突然发现我的马嘴里衔着我的“三用”皮包，我那股高兴的心情，哪里还能找到形容的字眼！我如醉如狂的双臂搂

着马脖子，象久别的情人一样，热烈地吻着它。

五匹马有四匹被主人领去了，只有那匹驮电报机的花马，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显然是在思念它的主人。我走向前去捧着它的下巴抚摸着，并且象对小孩子一样告诉它：

“别伤心了，小花马！你的主人他会回来的。”可是小花马却把头更低地垂下去，一动也不动。我们马上意识到，它是在告诉我们：它的主人——我们的战友卓文义同志，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果然是这样，事后不久，我们路过荒上的人发现了文义同志的遗体。

为了拯救五军，为了扭转东满的危险局势，我们不分昼夜的向总指挥部和五军所在地——宝清县境的兰棒山行进着。这天，离目的地尚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忽然遇到了五军派来接护我们的部队。原来在荒上截击我们的敌人，真的听信了，并且向兰棒山地区的“讨伐队”报告了我散布的七、四两军有数千人增援五军的“消息”。敌人不知虚实，疑心我“周蛮子”真的要来个什么“犬牙交错”的战术，说什么周蛮子狡猾；他既回来，必不能甘心挨打，于是便匆忙撤离兰棒山区。等到敌人弄清实情，被紧紧封锁在兰棒山区的几千名五军部队，早已化整为零，绕到敌人背后展开游击活动了。

这时，我才松了一大口气，兴奋地对同志们说：“五军脱险了，要准备迎接新的更艰巨的任务。”

受　降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纪实之一

七七抗战后，东北抗日联军到处响应，积极活动，配合全国，打击敌人。当时伪满军队，普遍动摇。

号称“满洲帝国御林军”之三十七军二十九团，全部哗变，杀了日本教官和指导官，由团长赫奎武率领，向联军第二路军投降。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指定赫团集中在五道河子，等候他去收编训练。

军部三百多人，由二道河子关家岗出发，昼夜兼程地向那里行进。出发以前总指挥召集了大家讲话，宣布了行军纪律，然后他自己一马当先，后面三百多匹马，一匹跟着一匹，象一条长蛇似地跑下去了。

倪娜是刚刚由地方党介绍，参加到军队里来的。她不但一向没有骑过马，而且从来不敢从马的身后走过，恐怕被马踢着。这时她不但骑上了马，而且骑的是一匹特别高大的洋马。这是同志们的特别关心，因为她不会骑马，恐怕她过河时湿了鞋袜，才选了一匹大马给她。同时还分派了两位同志特别照看她，帮助她上马下马，走在路上时在她一前一后，怕她路上摔下来，上不去马，跟不上队伍。走了两天以后，倪娜腰痠背乏，胯骨痛得下了马一步也走不动，可是她自己横了心支持下

去。幸好她一次也没有摔下马来。

那是八月天气，夜里星光很好，到天亮时，往往有弥天大雾，人就像在蒸笼里似的，什么都看不见。马的目力比人好，它们不管是夜里或是雾里，都能看清道路。队伍常常走在两片高粱地中间，或是穿过长着深草的荒地，高粱穗子、草叶子上的水珠，都洒到人们身上，衣服裤子也常被露水打湿。十几天后，他们到了五道河子。那是清早四点钟光景，眼前只见一片茫茫雾气。首长下令下马休息，大家坐在高粱地头，人吃干粮，马吃草料。

六点钟时，阳光已经射过了雾层。倪娜看见前面是一派大水，水面很宽，不知多深。她心里暗暗着急，不知怎样过法。忽然上面下令过河，各连各排各班都已经准备好了工具，各自按照序列集中站队。原来他们在这两小时内，就已经用木棒、树枝、树条、草梗，扎成了大小各种木筏。熟悉水性的，在河边指挥过河路线，几人一组，划了木筏渐渐渡过河去。有的会凫水的，就骑了马过河。这时有消息说敌人正追来，大家便加紧过河，同时河的这边派下了掩护部队。倪娜过河坐的是小木船，这小船是在早插(藏)在河边草里面的。不到一个钟头，这边岸上已经空了。

木船上坐了六个人，已经是满满登登的，水离船舷只有二三寸远，好象只要船里的人摇幌一下，船就会翻似的。船离岸才走出二十米远时，七架太阳牌飞机追了过来，炸弹顿时落到地面响了。倪娜本来有点发慌，她看见船上同志，都非常沉着，只是加紧划桨，她也就安心了。他们刚刚上岸，敌机已经旋了过来，沿地面低飞，影子像乌云似地掠过大地。他们蹲在河边上一人来高的柳树苇子下面。飞机上的手提机枪嘎嘎地

响着，在他们头上扫射，柳树条子像剪刀剪了似的，一排排掉了下来，过了一会，这七架才飞走了。

总指挥在黎明时分就过了河，他走进赫团的宿营地带，看见随地乱堆着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赫奎武迎接他走进团部，请他脱下水袜子（胶底套袜）坐到热炕上去。他说："先不忙着上炕，要赶快把外头的武器集中起来，派人运走。听说昨天来了两架飞机，到你们这里侦查过，今天敌人可能派飞机来炸，也许还有跟踪追击的部队，我们要立刻准备出发。"这样说过不到三小时，第一批敌机日本重轰炸机七架，就来投炸弹了。

两支队伍刚刚汇合一起，又来了五架轰炸机。老战士喊大家都到离河百米外的树林里去，他们自己隐在大树后面，用步枪射击低飞的敌机。赫团的人马看见飞机到了头上，当下乱成一片，红色白色的马匹从主人的手里挣开四散跑了下去。炸弹响起来的时候，他们有的一下子跳进河里去，只把鼻子嘴拱在水面上，有的连爬带跌躲进树林去，把马匹丢了不管。老游击队员让这些新兵藏到树林里面去，他们分头把马抓回来，一个个拴到树林里面去。

倪娜的那匹大红马屁股上被炸弹碎片打伤了，后腿抖索着像站也站不住似的。倪娜怕看马身上的这片伤，也不忍心骑上马背去。她对同伴说："我牵着它走吧！"那位同志坚决地说："不行不行，敌人一定随后追上来，慢走就危险。这匹马还不要紧。"不由分说，把她扶上了马。果然，走不上三四里，后面七八架飞机轰轰的追了过来，这群马当下像毛（惊）了似的，鬃毛尾巴都扎撒开来，一个冲一个跑得飞快。前面有一道深沟，一匹匹马都跳了过去，倪娜这匹伤马停在大沟这面不敢

过去，挡住了后面的队伍。后面的同志打了它一鞭子，正打在它的伤口上，它一转身冲进旁边树林里面去，树林里枝枝杈杈的就把倪娜刮下来了。当下前面同志跳回来钻进树林把马抓回来，后面同志把摔晕了的倪娜扶起来。幸好她没有摔坏，一会就苏醒了。当时把她两腿捆在马身上，然后这匹马也跳过沟去，跟大队一起走了。

两天以后，他们到了距依兰城七十里的克山，这克山真是一派大山，山山岭岭都是立陡石崖的，倪娜看见这样大山还是第一次。二路军军部和赫团都分散到山里去休息。山里有老树林子，遮天盖日的，说不上有多高，树身子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这时树木已经开始落叶，树林里早晚已经觉得凉。他们吃饭是在露天饭厅里，在树林空荡子里用锯成的长条木板子，支上腿当做饭桌，就地铺的长木板子做凳子。他们吃的是包米楂子饭，西葫芦白菜加上咸菜。倪娜第一次吃这样的饭菜，觉得特别好吃。她这一顿吃了四碗饭。

休息五天之后，赫团被派到勃利县一带去，归二路军第八军指挥。敌人在赫团哗变之后，派了十九架重轰炸机，投了三千枚炸弹，只炸死二名战士，六匹战马。他们非常气愤，把赫团军官的家属逮捕起来。赫奎武本是被部下士兵逼迫反正的，这时就坚决起来，在二道河子和蛤蚂塘两次战斗，杀死日军二千余。后来有人教唆日本把这批家眷放出来，加以优待，同时派人找赫奎武接头，许他回来之后，不但不计前仇，还升做少将旅长，这时他在第八军长谢文东的错误领导下，正在不满与不安情绪中，加以敌人勾结利诱，赫奎武就带了亲信的几个军官，拉出去了不到二连人，投到伪满那面去。二十九团多数士兵，仍然坚持抗日。而且接着他们就有伪满二十七团，三

十八团，三十四团，相继哗变，投降到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来，给敌人很大的震动。

（周保中讲述，魏东明整理）

杨靖宇和他的队伍

东北抗日联军纪实之二

一　杨靖宇的音容风度

五年前我在关里时，曾根据一些传说，写了一篇《东北抗日领袖杨靖宇》，编在延安出版的高小国语课本里。那里说他是安徽人，是大学生出身，九一八后为了抗日到关外去的：这都还对，但应该加上一句，他是一九二八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里又说，他身材细长，面貌清癯，因为工作操劳，他失掉了健康，又在一次作战中腿部受伤，成了残废，但仍然由同志们抬着，亲自指挥战争。这就有了许多失实之处。那文章是在四〇年秋天写的，其时杨靖宇已经逝世，我还没有听到。他体格高大健壮，总是精神奕奕的，并不清瘦衰弱。他确乎总是亲自指挥作战，但并未残废，让人抬着。

他一向不生气骂人，碰上无理可喻使人无法的队员，他最多只说一句："你真糟糕!"还是继续耐心说服。骂起满洲队来时，也只骂一句"这群狗崽子。"他讲演开始声音很低，越说声音越高，往往说到后来，一二里外的岗哨都听得清楚。他说话是皖北口音，管"鞋子"叫"孩子"，因此闹出过笑话，他管"搞"（做点什么之意）叫"割"，后来队员们都学他说，

"割点饭吃吃""割坏了"……就好像解放区的人说"搞"字一样的流行。

二、少年铁血队

杨靖宇最喜欢孩子。有一次他问部下的孩子们：

"我们大家革命是为的谁？"

孩子们说："为的老百姓。"

他说："不对，是为了你们。我们大人把日本打跑了，也就老了死了。你们小孩子是要做中国的主人的。"

一九三八年间，一军组织了一支孩子队伍，是选拔十二岁到十八岁的二百五十多个孩子编成的。杨靖宇给他们起名叫"少年铁血队"。这些孩子总跟在他的身边，宿营时他住东屋，他们住西屋，行军时他们也在他的前后左右。后来让敌人知道了，飞机来了，就挑个子矮小的队伍里去炸，为的是要炸杨靖宇。这样，以后行军时才把少年铁血队分插到其他队伍里面去。

杨靖宇常跟少年铁血队的队员们讲话，教他们学习政治和文化。他们读的是副司令魏拯民亲自编的"政治课本""抗日千字文"。他们常常清早去到林子里，各自找清静地方，对了大树练习演讲。每次有老百姓到了队上时，杨司令就叫少年队员去和他们谈话，宣传抗日。

那正是最困难的年头，杨靖宇亲自领导小部队到处游击。为了避免暴露，大家不管他叫"军长"或"司令"，管他叫"二团团长"。总部韩参谋长代号是"韩参谋"，韩参谋常常领着少年铁血队冲锋作战。

三、过水甸子

一九三八年，一军在濛江、抚松、临江、通化、辑安、桓仁、宽甸一带活动。六月间，军部一千五百多人，走过濛江县三道老阴府的大甸子。那是水草结成的一片沼地，浮面上有深到膝盖的一层泥水。人必须走在草堆子上，一失脚踏在草团子中间的空隙里，掉下去就没有影。可是要把手臂张开走，掉在草缝里也不会沉底，只是搁置在两堆草团子中间，自己爬不上来，须要两个人从旁拉一下。

过水甸子时，少年铁血团担任娱乐工作。他们采了甸子里出产的哈棠果，吃起来很甜的，放在帽子里慰劳大家。又先跑到前面等着，大队走过的时候他们唱着欢迎歌。这一片难走的地方，常人平时要走七八天，他们四天就走过去了。

出了水甸子，走到硬地上以后，大家都高兴极了。队伍休息时，孩子们爬到树上去睡觉。为了庆祝同志们平安渡过了水甸子，杨司令下令放了一排子机关枪。孩子们正在树枝上躺着坐着，突然听见一阵枪响，有的吓得摔了下来。

四、伏击

这时期敌人正集中兵力，包围下江一带，进攻五军周保中的队伍，通化一带兵力薄弱，一军就到处活动，打局所，缴警察的枪，遥遥策应五军。敌人从热河抽了三十二团和三十四团两个团，都是在热河打八路军最凶的部队。一军事先得到消息，在路上等着他们。这时候游击队缺乏粮食，队员每人每天

只发碗口大的一张薄饼。等到第五天，三十二团运给养的大车，被我们的五十几个伙夫和妇女们卡到了，大家才有了米饭吃。第七天，敌人大队到了，前面有警察队拉道。走到岗子上，五十多个警察看见游击队围上来，一枪不发就举手缴械。原来他们知道杨靖宇厉害，劝三十四团不去打，这些人不听，他们只好在前面开路，心里早打好了缴枪免死的主意。他们说“满洲讨伐队”随后就来，游击队又埋伏起来了。

这正是七月时候，晌午太阳很大。队员们躺在汽车路旁边小河岸上的草里，热得无法，就用手巾蘸了河沟的水，蒙在头上。过午不久，敌人从大道上开过来了。游击队一声不响，静听着指挥部的指挥枪。三千多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卡子里面，团长下令在道旁休息。一个满兵跑到河边去灌水，一脚踏到埋伏在草里的人的身上，他看出是一个人，“啊呀”叫了一声就往回跑，被埋伏着的这一个一枪放倒了。随后紧接着指挥枪也打响了，一千多游击队员一齐冲锋射击。敌人三千多乱成一团，乱冲乱打，把我们的指挥部冲散了。军部韩参谋领了少年铁血队冲上山头，占好地势，向敌人描准射击，打了四个钟头，俘虏了七十余名敌人，其余都死伤溃散了。他们捉住了三十四团马团长，他说他打八路军都没有吃过这样的大亏。还抓住了一个吴连长，他上嘴唇留着一撮牙刷胡，像小日本鬼子一样。还捉了几个日本指导官，拉去枪毙了。对待中国俘虏是每人发给十块钱，放他们回去，受了伤的都给洗了，上了药，包扎好了才放走，武器都留了下来。这次缴了七十多支步枪之外，还有十几门小钢炮和两门野炮。

五、人民

八月间，庄稼院开始割地的时候，他们住在辑安小仁沟屯子里头。三十二团开来了。一个小猪官哭咧咧的回到屯里来，说岗上来了黄衣裳的满洲队，一定是又来作践咱们来了。军部派了监视兵出去，知道是敌人三千多人一个团。那是快到晌午的时分，我们队伍煮好了饭还没有吃。杨靖宇下令转移，当下就整队出了屯子。

他们走了不远，就听见后面人声嘈杂，回头一看，全村老百姓扶老携幼的都跟了出来，身上背着各色包袱，孩子哭大人喊的，拼命来追队伍。杨司令叫队伍停下来等待他们。他们赶上来说，要跟抗日军一起走，免得受满洲队的害。杨靖宇当下决定队伍开回去打，他安慰人民说：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们把他们打回去再带你们走，免得他们追上来。"

抗日军回到村子那边，敌人正在树林下面休息，枪支都架在一起，风衣铺在地上，三五成群的在睡午觉。杨司令举起指挥刀下令冲锋，号兵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虎入羊群似的，一阵刺刀和子弹，只经过一个钟头的战斗，就把一团人都消灭了。他们缴获了全部枪支之外，还有机枪五十多挺，重炮两门。俘虏了官兵七百余人，让各人都把衣扣解开，露出白布衬褂来，排成一队，两边游击队员持枪监视着。

抗日军又折回来，又到村外大道上，看见成百成千的男女老少都静悄悄的跪着，脸对着远处的一座大庙。杨司令派人跑去问什么事，一位老人领头回答，说他们向老爷庙许下了愿，

请关圣帝君保佑抗日军得胜，全村老小都跪着求神，等着他老人家显圣。那位战士说：

“不用许愿了，我们已经把敌人消灭了，你们看那不是七百多个 俘虏吗？”

当下只听见一片欢呼，许多人拿了扁担镐头，像一阵风卷着尘土，冲到队伍旁边，就下手来打俘虏，战士们连忙拦挡，满洲队挨了几下打，十三个日本指导官都被镐头、扁担打死了。

六、突围

这年秋天的日子是用子弹打发过去的。他们每天经过二次到四次的战斗，用子弹开路，用生命换饭吃和住处。他们到处打屯子里的满洲军警。伪警民团们望而生畏，或逃或降，即使抵抗，也不堪一击，往往后面队伍还没有听见枪响，前面已经把屯子枪都缴了。敌人连忙调兵遣将来围他们。

这年冬天，一军军部走到临江县申家堡子。堡子后面是一条死山沟子，叫做里外沟岔。敌人预先集结了几万兵力，把四面层层围住，拂晓时候开始进攻，把他们压到了沟里面去。游击队退到沟里，四面山岗上都出现了敌人。这时队员都只有很少的子弹，每个步枪只有不到一槽的子弹，机枪子弹也只有十几发了。幸好每人都有两枚手榴弹。

杨靖宇异常沉静，他命令队伍分散休息。他说：

“山沟树林就是我们的家，现在到了老家，以后就容易活动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一定能够出去。”

大家一向信他的话，都安下心来。他叫跟队的老百姓呼（煮）包米饭，吃过以后，大家枕着雪地，躺下来休息，只派

少数同志监视敌人，任四面重机枪瞎打乱响，一声也不回答。过一些时，敌人喊起话来了。他们喊：

“趁早出来投降吧，今天不投降，明天早晨八点钟都抓活的。我们来了十一个军管区的五万军队，出了村子就是电道，你们有翅膀也飞不出去。”

军部一位安参谋站起来向他们答话，敌人重机枪向他一阵扫射，他当时就牺牲了。

到了夜里十一点钟，杨司令下命令说：

“现在即刻出发攻击敌人，谁得的子弹就是谁的，谁冲出去谁就有命。少年铁血队领头打冲锋。”

孩子们都想多得子弹，听说他们先去，非常高兴，每人准备好了手榴弹，蒙上一块白布，作为雪地上的伪装。韩参谋亲自率领他们。他看见这群孩子跳跳蹦蹦往沟口那面走，就说：

“你们这样走有缺点。”

“怎么样走呢？”孩子们问他。

“要匍匐前进。”

“怎么叫做‘匍匐前进’呢？”孩子们都不懂。

“就是‘骨辘’着走”。

孩子们说：“你早说骨辘着走不就明白了吗。”

孩子们把衣襟掩好，皮带结紧，趁着山坡地势，一骨辘就滚到了敌人宿营的帐篷旁边。岗哨正冻得在那里跺脚，听见一片响声，就问起口令来。

“攻！”他厉声的问。

“击！”游击队是预先就知道了他们的口令了的。

孩子们答完口令，就一枪把岗哨打死了。帐篷里一个人开门来问：“谁打枪？”

孩子把手榴弹拉线用鞋跟踢开，顺手一下子扔到帐门里头去，同时自己滚开了。只听见轰隆一声，整个帐篷都炸飞了。

孩子们把整个帐篷都肃清了，发现子弹箱就堆在帐篷外面的雪地上。他们把箱子砸开，把背兜里的干粮倒出来，尽量的装满了子弹，看见子弹还多得很，就坐在箱子上看着。后面大队过来了，他们怕子弹被别人装走，一定交给一位队长负责照管，才又跟着冲锋。这时已经扫除了四十几座帐篷，打通了出去的道路。少年铁血队又向两旁伸张，被一排重机枪打了回来。他们就陪着掩护排作战，各自卧倒了瞄准射击。他们人小胆大，动作灵巧，伤亡的很少。

大队刚刚过完，五辆大板汽车开到了这里，下来的一连伪军，每人围着一条军毯，他们问这伙孩子“口令”，孩子说一声“攻”，就攻了上去。他们说：

“你们别开玩笑，打错了自己人！”

少年铁血军一阵围攻，把一连敌人都解决了。他们赶着俘虏给背子弹，追上了大队。

这支队伍平安的走出里外沟岔之后，满洲队里互相传说着“杨靖宇没法打，纵深八层的帐篷都被他们打开了。”

七、打开仓库

一九三九年旧历正月，游击队去打大蒲柴河。那天夜晚，天下着清雪。队员每人吃了一把生包米粒子，就出发了。路上走过大河，不小心掉在水里的，裤子冻得棒硬，走起路来格崩格崩响。

走到“集团部落”前面的大道上，正赶上敌人马队查夜，遢遢

的跑了过来。游击队员连忙躲在背黑地方。少年铁血队的一个孩子，外号叫“小吵吵”的，平时就有抽筋病，这回来的路上跌到河里受了点凉，他忍不住咳嗽了一声。马队上的问：

“谁咳嗽？”

“是我”，“小吵吵”背后的一个孩子回答。敌人听见是孩子声音，没有理会，就一直跑下去了。

摸到了部落门口，他们敲了三下门，里面问口令，口令已经由老百姓告诉给他们了，他们回答了口令，大门就皇啷啷打开了一道缝。民团探头出来一看，喊了一声“土匪来了”，大队已经冲进大门，缴了他的武器。随后一场巷战，把走狗队的警长营副都打死了。

少年铁血队首先发现了仓库，他们把大锁砸坏，拉开铁门，见仓库里面，一只老虎正对着大门，张着嘴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孩子们回头就跑，后面的听说有老虎，也吓跑了。他们跑到指导员那里去报告，他说他们胡扯。孩子说，虎还张着嘴要吃人呢。旁边一个伪警说：

“是有一个死老虎，日本鬼子打猎打来的，虎皮剥了下来揎满了棉花，嘴是用棍子支开的。”

大家听了，才又跑了回去，把死老虎打翻了。

他们看见仓库里有许多枪支，子弹，衣裳，用具。他们也不管身上有汗屋子又冷，脱下了旧衣服就换新的，把旧枪砸了换上新武器，把背兜和衣裳口袋里装满了子弹，到空地上放枪玩。

八、日本同志福健

孩子们走到大街上去，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听见一声枪

响，一个少年队员倒了下去，同伴去扶他，看见他已经手脚瘫软的死了。

孩子们连忙跑回去报告。游击队里唯一的一位日本同志福健说，一定是那里有“地包”，从地下面打枪打死的。他让孩子们领他去，快到那地方时，再藏在一边，听他喊他们再出来。

福健走到拐角，就用日本话问下面门在哪里，里面日本人告诉了从哪个门进去，怎样走法。他进去就用手电筒照着埋伏射击的那个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然后他走出来喊孩子们：“伙计来吧！”大家进去，到处搜索敌人，一共打死了十三个日本鬼子，给这位小同志报了仇。

福健是日本苦力出身的，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军，他本来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作战坚决勇敢，为人聪明机警，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快到天亮的时候，游击队准备撤退了，他们通知附近木帮的苦力，到街上来搬东西。工人们拿了铁锹、斧头、木棒，把日本商店金库都抢光了，把仓库里的东西也搬了出来，然后帮助游击队拉马背给养。许多木帮工人当时就参加了抗日军。

八天以后，他们打进了辉南厅，去搬了许多给养。那儿局所里有一架机关枪，是坏了的。福健同志把它修理好了。第九天开来了满洲队来打他们。机关枪一阵猛烈射击，把敌人都打退了。老百姓到处传颂着：

“机关枪在警狗子手里不响，一到中国军队里去，就肯出力气了。”

九、伪装伪军

到了二三月开始化雪，道路泥泞，游击队到了烂泥沟子，三道柳河，头道柳河，把屯子里武器缴了，就住进去，来了敌人就打，打不过就拉到山里去住。住在山里头空气很好，但是要吃饭还得回屯子去打敌人。

四月时候，道路干了，敌人越来越多，情况越发紧张了。

伪满炮兵十五团有两个特点，一是听说杨靖宇就使劲跑，二是见了老百姓就凶极了。游击队把自己的电话线接上了敌人的军用电话，冒充炮兵十五团，告诉桦甸的民团等待检阅。然后由福健假扮日本将军，团部黄参谋装做翻译官，游击队穿了新打来的走狗军衣，大摇大摆开到桦甸县城的大道上去。

快到桦甸时候，城里驻军站出五里路来迎接他们，一个个丘八排在大道两旁，端平枪支，面向野地，立正站着，都不敢回头向街上看看。福健将军走到城门口，县长，官吏，各界代表，男女学生都列队持旗欢迎。他们住在县公署里，下令给警察说是另发新枪，站齐队把旧枪收了。当天晚上，福健找来了驻军团长，大骂了一顿，说他纵容土匪，让他明早预备好过河的船只，配合"讨伐"，不然就枪毙了他。那个团长被福健打了几个嘴巴，回去之后，就把一团人都拉了出去，藏到山里去了。

第二天，伪装的伪满十五团到一些组合和会社去搬东西，把一些合作社、银行都给抢了。老百姓偷偷跑到韩参谋那里去报告，请抗日军来打他们。韩参谋领了另一支游击队把黑石头驻的一连伪军解决了。消息传到桦甸城，这一支冒牌的伪满炮兵十五团，装得像真的一样，一听说杨靖宇的队伍快到了，

就藉口到别处检阅，抬了胜利品排队开走了。

十、密营

一九四〇年冬天，游击队员在不断作战中牺牲了很多，敌人到处封锁，派出“讨伐队”和大批特务，抗日军连给养也难筹到了。

一军化分为小部队到处游击，少年铁血队由韩参谋率领着，在濛江一带活动。他们在清家岗和一位同情抗日的警察所长接头，他答应给筹办一百石包米，二十石豆子，还有白菜、萝卜、咸盐，作为抗日军过冬的给养，可是被特务得了消息，这位警察所长被调走了。

敌人调了几连人来“讨伐”他们。他们二百多人，在猪市河两个屯子中间的树林子里藏了起来。这树林有十里方圆，他们用松枝把顶上盖满，再用日本帐篷在上面遮上。白天不举火，免得冒出烟来给敌人看见。一天吃的饭都在夜里煮出来，夜里烧剩的火炭，就留到白天烤火取暖。

林子里木柴是方便的，粮食就要靠到屯子里去打。出去要经过雪地，大家都踩一个人的脚印，然后由最后的一个人，用麻袋装满了雪，撒满脚印窝，再用筛子筛些细雪放在上面，这地方就和别的没人走过的地方一样了。福健同志最会埋“蹓子”（足迹），所以常常由他押后做这工作。

十天半拉月出去一趟“割给养”，平时就呆在密营里，这样过了半冬，也没被敌人发现。

十一、依恋

孩子们闷在树林里，不能尽情活动，就天天想念杨靖宇。他们常常互相叨咕着："军长怎么还不来？"他们去问参谋长："军长怎么还不来？不要我们了吗？"清早起来就有人说："我昨儿晚上梦见军长了，军长跟我拉拉手，问我一句我说上了一大堆，军长就笑了。"

盼来盼去，有一天军长果然来了，他带了第五团来的。十里见方的小树林子，忽然增加了七百多人，可是热闹起来了。孩子们在外面放警戒，帮同志挖帐窝，晚上围着火开娱乐晚会，唱高丽的游戏歌，跳游戏舞，一刻也不肯消停。

军长看见他们忙，就说："小鬼们，休息休息吧，明天敌人就要追来，留点气力对付敌人吧。"

孩子们说："敌人还没有见过吗？我们等着他们呢！"

第二天清早，就有信说敌人出动了。军长派原先住在密营这队人担任掩护，孩子们自己商量，让大队走上半天，我们也赶得上。

正是"太阳冒嘴冻死小鬼"的时候，鬼子就出来了。孩子们用望远镜看到以后，就用白布伪装把一百多人埋伏在崖边雪堆后面，敌人走进几步远的时候，一阵步枪刺刀，把敌人冲垮了，缴了步枪之外还有机枪和掷弹筒。

大队派人来联络，叫他们快退。他们说："来的敌人都被我们消灭了，我们还没有打够呢。"过了一会，军长又传来了命令，说后面不是几百敌人，而是成千上万的敌人，要他们小心。并且命令韩参谋这支队伍，不必去赶大队，就自己拉一趟

蹓子，把敌人带走。

后来敌人果然被这支队伍诓着，抛开大队，跟着他们的蹓子追下去。敌人夜里宿营拢火时，把半天空都烧红了。孩子们没有一个害怕敌人的，他们住下时就念叨着："要有三千六百道鬼画符就好了，一下子把这些狗崽子都吓跑了。"

有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把他们的蹓子埋上了，敌人蒙头转向了，找不到他们。他们又转到猪市河十里树林那块老地方。住了两天，敌人大部队又驻扎在对面地方，一个兵士到小树林子里打柴。他走到只离六步远的地方，还没有发现这位伪装得很好的游击队员，可是放隐蔽哨的这位沉不住气了，开枪打倒了他。敌人主力这才又发现了追击的目标。

他们继续诓着敌人来追，又走了几天，忽然敌人不跟他们了。他们向老百姓打听，原来敌人听了叛徒的报告，知道这一队里没有杨靖宇。

他们赶紧写信告诉军长，请他特别小心。送信的带回了军长的手书，告诉他们说，他又藏住了，现在很安全，请他们不要挂念。

十二、困顿

敌人分派许多队伍驻在这一带"集团部落"里头去，把老百姓和抗日军分开，又用大队伍追赶各个游击队。在濛江马屁股山有五百游击队员被二万日满军队围住，敌人用飞机炸，用大炮轰，用机关枪扫射，游击队员在这地形不利的山头上支撑着，打了一天，五百人打死了四百多，到了夜间，剩下的人才拼命冲了出来，到了集合地点，只有五十多人了。

这期间也没有吃的东西了。东北老百姓有句话是：“你这人吃一百个生豆子都不嫌腥”，意思说这人是个怪物，游击队员饿到吃一千个生豆子也不嫌腥的程度了。没有豆子吃，就把木棚里的日本大牛拉来杀了吃，吃完了牛肉吃牛皮，实在没有吃的了，把破靰鞡也洗洗煮了吃。把榆树松树的里层皮剥了捣碎煮熟吃。没有烟抽，抽葡萄叶子和榛子叶子，没有水喝，就化雪喝，就是没有粮食咸盐不好办。几十天不吃米盐，人就没有力量。岗位只有十几步，要休息两三次才走到。站岗要找个树靠着，站着站着就坐下了。这时候有些游击队员受不了苦，就一个两个的逃跑投敌了。游击队员死的死，跑的跑，人数一天天减少了。

尾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部的日本指挥官牛岛，给抗日军领袖杨靖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你投降吧，没有法子打下去了。我们是一个国家，而你们是连根据地都没有的游击队，你们几千几百人，能和一万万人的一个国家作战吗？”

杨靖宇将军回信说：“我们作战是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侵略者没有赶走，我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我活一天就要打一天日本，而你们最后是一定失败的。”

十三、杨靖宇之死

这年冬天，杨靖宇同志冻坏了脚，到四〇年初，又患病走不动路。他离开了大部队，带了五个人，两个通信员和三个战士，从那里往烘沙河子，投奔韩参谋的小部队去养病。走到烘沙河子这边新开河的一个木棚里，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想花钱买点干粮，临时在木棚住下来养一养病再走。随从他的三个战士

中，有一个外号叫“老狗”的，因为姓张，相貌有点像张逆景惠，大家开玩笑也管他叫“张景惠”，这时他叛变了，投到敌人那里去，告诉敌人说前面五个人里就有杨靖宇。

那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杨靖宇同志被敌人重重围在木棚里，他知道他这时已无法脱身了，就问他身边的四个游击队员：

“你们为了什么活着？”

“为了民族革命和抗日活着！”四个人一齐回答。

“你们为民族革命活着，能为民族革命死吗？”

“能！”大家同声这样答应。

“对，我为抗日救国而生，为抗日救国而死！”他说完用匣枪抵在自己胸口上，一枪把自己打死了。

大通信员说：“我为抗日救国而生，也为抗日救国而死”，掏出匣子，也把自己打死了。

二通信员说：“我也要为抗日救国而死，和军长死在一起”，也自己打死了。

剩下的两个机关枪射手，一个正要自杀，另一个外号叫潘歪脖子的，是从小跟着司令员，由他一手教育大了的，他说：

“你等一下，如果我们都死了，人家不知道我们怎样死的，敌人或许会造谣说我们投降了，那时就没有人出来讲话了。我们两个应该拼命打出去，留一个活口，带信给别的同志们，让大家知道军长怎样牺牲的。”

他俩打着机关枪，冲了出去，幸喜都没有死掉，就一直跑到韩参谋长那里说：

“军长死了！”

潘歪脖子说完这句话就晕过去了，参谋长也哭得闭了气，

好一会才苏醒过来，全体同志都躺在地下哭，他们再也看不见他们敬爱的领袖了。

敌人把杨靖宇和他的两个通信员的尸体搬了去，竖在墙边站着，通信员站在两边，把他们的眼睛都扒开来，照了一张像，像片上从杨靖宇的嘴里吐出一口气，两条弯线里写着："投降满洲国从今不抗日，东北抗日联军快快投降吧。"敌人把这照片印到传单上，用飞机到各地去散发，撒得各城，各村，山里，沟里，到处都是。又开了祝捷大会，说杨靖宇死了，东南满的抗日运动就要肃清了。老百姓听说杨靖宇死了，都难过得流泪叹气，抗日联军其他军的同志更是痛哭流泪，伤心极了。

韩参谋长他们印发了无数的传单，说明了杨靖宇将军殉国的经过，并号召东北抗日军民为他报仇。在事实对照之下，恶鬼疯狗们的徒劳的无耻污蔑，就完全被揭穿了。

（周保中讲述，魏东明整理）

一支文化工作的队伍

东北抗日联军纪实之三

一、山里的编辑部

他们是四十多个人，有知识分子，有工人农民，也有武装的警卫部队。

负责人正的是金石峰，高丽人，知识分子，老革命职业家，会高丽、中国、苏联、日本四国的语言文字。副的是姚新一，原名唐尧普，北平大学学生，依兰县中的教员。两个助手都是他的学生，倪娜是十九岁的女孩子，曾经由他教过英文，胥杰曾经在中学上过他的国文和英文课。三个交通员，老李六十多岁，曾经在苏联作工多年的，爱讲些苏联生活的故事；老于多年做地方上秘密工作，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顾全民才十二岁，他的名子是周军长给取的，他从小死掉了母亲，后娘常常打他，稍大时在地主家里当猪官，抗日军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偷偷的跑出来上队了。

他们孤零零的住在离克上克五十里的山沟里，几间架木垒土筑成的小抢子，隐蔽在大树林子里，有几十人的小部队担任警戒。粮食是由游击队送来的，送到山沟的指定地方，由他们去背回来，这样免得暴露了住处。老李老于是到处跑的，依

兰、佳木斯、哈尔滨以及南满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从各地带回许多材料和消息。顾全民只跑近路，买油墨、纸张、腊纸、铁笔都是他的事。这里离土城子集镇五十几里，他夜晚自己走过森林，进城去买东西，装在背兜里，到了天黑，再自己走回来。这样小的孩子进城买东西人家不会注意，而黑夜穿过树林单身走路他也不怕。敌情特别紧张的时候，这孩子也照常担任交通联络和深入敌后的侦察任务。

他们依靠交通员收集一些地方消息、敌情报导、国际和国内时事工作的报导和指示，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和活动等等。再选些从敌人报纸透露出来的内部不安和黑暗的情况，编成一期的稿件，由倪胥二人整理，金姚等人看过后，再交倪胥两人誊写。关内出的新华日报和巴黎出的救国时报，他们间或也能收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翻印过油印版。胥杰会写仿宋体的美术字，油印出来，字体的大小粗细完全是一致的。腊版写出后，他们大家动手，印刷、折叠、装订。装订开始是用钉书机，书钉没有了以后，改用针线，针线再没有了就改用浆糊粘。装订好了，就由交通员分发出去。他们出版的报纸和各种小册子传单，最为人民大众和抗日军人广泛传阅，日本鬼子恨他们，总想破坏他们。

油印刊物每半月出一期，遇有重要文件，需要紧急印出的，就昼夜赶着做完再休息。工作是有规律的。工作之余，他们读书、看报、开讨论会。倪娜教顾全民识字，让他默写，或是给他讲故事。李老看待倪娜像女儿一样，常常答应她的请求，唱苏联歌，和金石峰一起跳苏联舞。他们常年累月不出去，也不见任何外人，只是埋头工作，没有什么娱乐。姚新一是一位“文学家”气质的人，到了这个环境，他生活里最越常规

的事，也只是请顾全民进城时买回一点酒来，喝得有点醉意之后，自己坐在抢子附近的月亮地上去，看看树林和白云。

二、战斗与流动

一九三八年春天，正是大年初三那天，清早四点钟，一向安静的山沟里，忽然听到了炮声。过了一点钟，交通员来报告，敌人的“讨伐队”摸到了这里，头道卡子响了，很多同志打牺牲了，他们退守第二道卡子，因为那里地势比较好守。他们告诉里头准备撤退。里面工作人员赶忙吃了早饭，把重要文件都收拾起来，插（藏）到大林子里挖洞埋起来。他们去时带了一麻袋雪，回来就把脚印埋上，用树条子扫一扫。

到了晌午，外面响声近了。警卫连长滕玉和对留在家里的二十几位战士说：“保卫省委秘书处是我们的光荣任务，除非我们死光了，不能让秘书处受到损失！”（秘书处是这个编印机关的名子）他派四个人把守后山，四个人守在前山高岗上，监视着敌人，不瞄准敌人不放枪。其余的人布置在预先挖好的防御工事里，把机关枪架在敌人的来路上。他来回的跑着，指挥部下作战。敌人来了二百多，其中五十多个是鬼子，滕连长头一枪就放倒了一个领头的鬼子，接着警卫战士都开枪了，又打死了几个，敌人前面的往后退，后面的又往前冲，堵在沟里乱成一团了。游击队的机关枪，打了几排就卡了槽，不响了。敌人乱往上涌，被打死了五十多，雪地吸满了血液，一片片的殷红和晕红。警卫战士也牺牲了一名，重伤了八名，滕连长身上负了伤，他用手巾塞住伤口，仍然继续作战。他们弹不虚发，使敌人不敢往前冲了。两边相持到下午三点钟时，山沟里的天

色已近黄昏了，敌人恐被伏击，就撤退下去。

当天夜里，秘书处就搬开这里。他们另选了秘密地方，大家用锯子斧头砍杨木做椽子，挖土坡修小抢子。没盖好抢子的时候，就扫雪铺草，露天睡觉，大家围着一个火堆。这年敌人到处“扫荡”，往往住上十天半月，就被敌人发现了，于是又背起文件纸张油印机向别处移动。他们穿的是大胶皮水袜子，有乌眼拴带的，里头絮上靰鞡草，包上包脚布。化雪时候，树林子里头气候格外阴冷，他们把两脚走得又湿又冻，休息时就拢起几堆大火，把水袜子脱下一只，烤干了穿好了，才烤另一只，准备随时有敌情。这年冬天，敌人“讨伐”更加厉害了，他们不能单独活动，就带了枪跟着军队走。他们不去打仗，背给养，但一坐在山坡上，他们就把钢板铁笔拿了出来刻腊版。那年队伍里有许多人逃跑叛变，被敌人利用做引线，来追击游击队。他们到处打仗，看见不利，就撤退，避免损失力量。他们的队伍行动那么机密，因此常常走到敌人邻近，听见敌人打柴说话，队长赶快发出耳语的命令，毫无声息的传遍了全队，当下大家朝后转，悄悄地退走了。

三、几个同志的牺牲

三九年初，吉东省委秘书处到达了指挥部。正月间一个大雪天的早晨，他们奉命回到原住地方去取插下的文件。倪娜因为年轻体弱，背不了多少，而且此去须走一百四五十里路，所以第二路军的总指挥没有让她去，去的是金石峰、姚新一、胥杰、朴同志和另外一个金同志，定了半月以内要赶出来。那天下鹅毛大雪，一片连一片的，几个人走出去六七步就看不见

了。他们就是利用这机会出发，好使敌人找不到蹓子。他们奔着大方向，各人拉荒散开走小道，就走下去了。

过了半月，不见他们回来，指挥部准备的小米每天喝粥都喝完了，不能尽等他们，就派了金秘书和葛副官两个人带了两匹马去找他们。游击队里马不单能骑而且是活给养。他们走到一个破房框里避风拢火，看到怪石嵯峨的石洞边，那是他们的“保险邮政箱”，果然找出了金石峰留下的字，告诉说五个人在拿回文件后，在路上遭到敌人袭击了，跑出了他一个。金秘书看信后，要去看看他们怎样死的，也许文件还插在附近了，葛副官主张回去，说敌人会等在那里的。他们在回来时，走进了敌人卡子，幸亏是夜间，只有金秘书的马受了伤。他们用马盖子装了两槽子弹，骑上马就跑了。这时他们带的给养已经吃完了，就把马杀了，拢火把马肉插在木棍上烤熟，使它份量轻了好带，每人背兜里装满着马肉，一路吃着回来了。

后来，他们在牡丹江西岸一个炭窑里，托老把头给买咸盐、火柴、黄烟的时候，包回来几张报纸，其中一张上登着，某月某日在某地打死四个人，得了重要文件，证实这几位同志真的牺牲了。

（周保中讲述，魏东明整理）

逃　跑

东北抗日联军纪实之四

一九三九年五月，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指挥部，由勃利向宝清移动。

他们二十几个人，为了避免和敌人大部队遭遇，不从有道的地方走，净“拉荒”走大树林子和深山沟子。

山沟子里，老把头房子（猎户）和炭窑，一个个都空了，有的炭窑里，烧好的炭还没有起出来，有的房子里，锅碗瓢盆都砸了。他们走了十几天看不见一个老百姓，穿的衣裳让树杈子刮破了，鞋子也让石头河跟生荒地磨坏了。没有粮食吃，山牲口（野兽）也很少看到。青草野菜，刚长出不大点，野茄秧、野芹菜都才长出一条梗，费了挺大劲割了一堆，没有盐，用白水煮一下，一顿就吃完了。有的吃不下去，吃了就吐出来，有的吃了下去，填满了肚子人仍然没有力气，走路时脚都抬不起来，碰到一块石头，一条横在地面的干葡萄藤子，就绊倒了。吃了几天之后，脸就浮肿起来，皮肤透着青色。

走到离黑背不远的地方，总指挥派了三个同志出去，设法找老百姓买点粮食和水袜子。去的是陶雨峰、靳云祥和孙玉山。他们清早就走出树林，沿着山沟有泉水的地方去找老百姓，一次次看到趟子房、炭窑和种大烟的住的窝铺，绕了远路走进去看，都失望了回来，原来里面都是空了的。到了午间，整个大

山没有一点炊烟。他们走得都疲倦了，孙玉山和靳云祥慢吞吞的跟在后面，陶雨峰还拼命挺着，看见抢子窝棚就使劲快走过去，然后回来告诉同伴，不必费脚步去看了。

他们跟太阳一道出的树林，太阳巡遍了群山，他们也走遍了附近的山沟。现在太阳偏西了，他们也必须回去。陶雨峰走在前面，他知道同志们正着急等他们。

走了不远，忽然后面两个追了上来，靳云祥首先发话了：

“陶雨峰，把两只手举起来，我认识你，枪子可不认识你，把枪放下来！”

陶雨峰同志转过身来，看见孙玉山的步枪和靳云祥的马盖子都朝着他支上了。他一下子心里明白了，仍然两手下垂着，厉声回答：

“姓靳的，你要叛变吗？你还是分队长呢！干了四五年革命，想当反革命了！”

“陶雨峰，你说的我都知道，我实在遭不了这份罪了。前几天见天还有一碗小米粥保命，这十来天连一个米粒也没吃，我们不走就得饿死了。兄弟，你回去报告总指挥，我到哪也决定坏不了，我若当汉奸走狗，天打五雷轰……我知道你，你是饿死了也不会走的。我知道咱们的枪都是拿命换来的。可是，我不下你的枪，你一定打死我。你知道我是山东人，说一句算一句，你把枪放下，我放你回去。”靳云祥仍然枪口对着他，说了这么一堆子话。

陶雨峰站了一会，一句话也没说，慢慢把步枪从肩上拿下来，放在脚边了。

“把子弹带也解下来！”孙玉山在旁边端着枪，加上了一句。

“你们要子弹干甚么？我能用子弹打死你们吗？靳云祥，你知道我们子弹缺，你把你的子弹也留给我们吧！”陶同志先对这一个，后对另一个说。

“好吧，我们每人留下五粒子弹，剩下的留给他们。”靳云祥想了一下，对孙玉山说完，又对陶雨峰说：“你在这里等着，不许动！我们走出一里地，就把子弹给你扔下，你再去拿上。没有别的话，老孙，你把他的枪带上，我们走，将来再见吧！”

陶雨峰站着，用眼睛送他们两个，看见他们使劲往快走，还不时回头看他，走了半里多路以后，把两条子弹带解了下来挂在树枝上，也不招呼他，低着头一个劲奔屯集的方向去了。

家里（就是火堆旁边）的人，看着火堆烟气越来越重，天黑下来了，三个人还都不回来。总指挥说：“大概发生了叛徒，把陶雨峰打死了。”大家心里像天色似的，渐渐阴暗起来，谁也不说话。忽然有人发现：“他们回来了！”火堆旁边的人都鼓起掌来。

大家看出只有一个人，就猜想道：“一定是找到了关系，留下了两个，派一个送信来了。”

等到他们看清是陶雨峰，而且是空着一双手，身上背的枪没有了，大家都愣了。总指挥说：“那两个大概叛变了。”

总指挥周保中同志听完了陶雨峰的报告，沉默了一会，下令把队伍集合起来，二十几个人站成一排，听他站在前面讲话。

“同志们，靳云祥和孙玉山两个人逃跑的事，你们已经听到陶雨峰同志讲过，不用我再讲了。现在是抗日军最困苦的时候，是要我们为抗日救国牺牲性命的时候，你们谁不怕死，愿

意为抗日救国而死，就同我一道走下去。不能的人，可以放下枪放下子弹，背上背兜，请假回家去。抗日救国工作是凭自觉自愿来的，不是谁强迫干的，谁没有决心干到底，不必客气，趁早离队另找活路，我决不处罚他。我自己是活一天打一天日本，有一口气的时候决不放下武器，除非打仗打死了，或是冻死饿死在山沟子里。你们现在受不了这苦的，尽管说，不要怕丢脸。”

他说话像平日一样诚恳和沉静。大家都静悄悄的听完了以后，首先是陶雨峰说：“我至死也抗日到底，只这一句话。”总指挥又问别的队员，他们每个人都表示了意见，轮到倪娜时，她对总指挥说：

“我无论如何要跟着你走下去。我是个女的，行动上累赘大家，如果你们顾不了我，就不要管我，我甘心冻死饿死，是为了抗日死的，我没有一点怨恨！”

她这时没有一点眼泪，只觉得心里难受，嗓子说话也硬了。

大家站在露天雪地上，没有一个人蹲下坐下，没有一个人去烤火，好象由于血比平时流的快，谁都不冷了似的。

大家都表示了愿意继续走抗日的一条道路之后，总指挥宣布，现在就移动宿营地点，提防叛徒告密，敌人追了上来。

于是他们整队出发了。

（后来听老百姓说，那天有两个人徒手进了屯集，以后到金坑当工人去了。那三支离开抗日队伍的武器，大概是插到了地里去了，并没有成为屠杀抗日军民的工具。）

（周保中讲述，魏东明整理）

一个电话生的上队

东北抗日联军纪实之五

一

这里是敌人的耳神经，朝阳镇的电话总机接线室。敌人的无数触角！日本宪兵队、伪满讨伐队、山林警察队、大屯警卫队，都经过这里，互相传递着恐怖的消息。“来了！红军来了！”“杨靖宇的队伍离这里只有三十里路了。”铃声拼命的响着，接着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发抖的声音，在耳机子里听到的不是外面宣传的皇军胜利，而是真实的消息：“远藤小队长阵亡了。”“五连一百多人都交了枪，刘连长领头投降了。”“张排长跑回来报告，满洲队伍被俘虏的一个都没杀，把枪留下，每人发了十块钱放了回来，日本皇军五十几个被土匪活捉了以后，脱光衣服，在树林中间空场子里排着队伍跑步，土匪拿他们当活靶子，一个个都打死了。”

十几岁的电话生们，一个个正是心灵耳快的年龄，被敌人利用来做传声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是十一个人，两人一班不分昼夜的耳朵上装着听话机。像一张白纸似的纯洁的脑子里，从这里受了些抗日的教育。平日作威作福的疯狗们，现在听出了是兔子一样的懦怯和畏惧，他们听到了感觉的是欢喜和快意。

十五岁的季喜林，下班回到家里，坐在饭桌前面，耳朵里仍然嗡嗡响着方才的声音。他对母亲说：

“妈，我要参加红军去，痛痛快快的打日本鬼子！”

“红军是红人红马红枪，浑身上下一色都是红的，你要参加红军，得找到这样的人马去参加，那才真是红军呢。”妈妈是高中毕业生，知书明理的人物，这样郑重其事的告诉儿子。

“是的，”大学毕业以后一直闲在家里的爸爸，笑着告诉喜林说：“真的红军还没有到我们这块来，咱们这附近的都是马胡子。”

季喜林闹得胡里胡涂的，他相信爸爸妈妈，却不大相信这些话。这些抗日反满的人是胡子还是红军呢？他心里存着这个疑问。

镇上有个大烟鬼，人家说他是参加过红军的，后来向日本宪兵队自首了，就在镇上当街溜子，常常溜到电话局里找孩子们扯闲白。有一天，季喜林问他：

“你真当过红军吗？”

“怎么不是真的？”

“你骑过红马，拿过红枪吗？看你满脸灰气，一辈子也当不上红军！”

“红军不是甚么红马红枪的，是抗日的革命队伍，——你小孩子懂得甚么！”

“你当过红军有甚么证据？”

“我家里还有红军油印的报纸和歌本子呢！”

“你为甚么现在不干了呢？”

“红军好是好，就是那种苦法可真受不了。”

“人家受得了，你怎么受不了呢？”

“我有这口累呀！”这家伙把右手中间三个指头卷起来，其余两个指头比成一个人字，把大拇指放在嘴唇上，然后又说：“他们那里不许抽这个。”

季喜林从此非常瞧不起这家伙，他把那份报纸和歌本借来看完了之后，再也不许这个大烟鬼到电话局里来玩，一来就被他撵了出去。

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个常来打电话的人，这人总是抽着季喜林当班的时候来打电话，事前事后常跟他烙闲科（闲谈），烙来烙去，两个人熟了。有一次，季喜林问他：

“甚么叫做革命？为甚么革命队伍叫做红军呢？”

“革命就是去掉旧势力，建立新的天下。现在日本鬼子和亡国奴队伍不让人民抬头，人民非有军队不可。红军就是老百姓组织的军队，因为打着红旗，旗上写着“东北人民抗日军”，所以叫做红军，也叫人民抗日军，它是抗日最坚决最彻底的队伍。”

二

桃花盛开的时候，河里的冰都化了，柳叶长满的时候，河里的鱼也游来游去的了。旧历四月中旬的晌午，天气暖洋洋的，已经有了夏意。大田少尉穿了身皇军军服，裤缝旁边拖着一把长刀，两只脚却光溜溜的，穿着一双趴打板（木屐）。他一手拿着钓鱼竿，一手提着鱼篓和鱼食罐子，闯进电话局去，约季喜林一起去钓鱼。季喜林平常倒是爱钓鱼的，可是不大喜欢这位四不象打扮的鬼子做同伴。他待要推辞，大田把他的钓竿却拿了去，连推带拉的把他扯到了街上，说话出气一股烧酒的味道。

季喜林决定钓就钓，敷衍一下子就回来，免得和这醉鬼闹翻了。

走到河边，季喜林挑了一块柳树荫凉地，把钓钩上放好鱼食，下到水里去，自己坐下，毫无思虑的瞧着鱼漂。大田在另一棵柳树下，钓了一会就凑近这边来，把帽子摘下坐在屁股底下，和季喜林攀起话来。大田的中国话讲得满好，就是满嘴“大大的”，“小小的”，“甚么的”，“的”字太多，一套“协和语”的句法。他讲了许多许多家乡的风景人情，讲像桃花的一种花，讲像秧歌的一种舞，又讲男女在一起洗澡。他尽管自己讲，季喜林一句话不讲，一心用在钓鱼上，到了太阳偏西，大田一条鱼也没钓到，季喜林已经钓了十来条了。大田讲了一大簸箕话，看见季喜林不理他，就停下来不讲了。过了一会，又挨过身来，用胳膊肘碰一碰他说：

“花姑娘的，你的找一个来玩玩。”

季喜林不理他，他更重的碰胳膊肘，又说了一遍。季喜林生气了，他把身子挪开了点说：

“滚你妈的！中国姑娘给你糟践玩，你回老家玩你妹妹去吧！”

大田虎的一下子跳了起来，抽出军刀，用刀背打了他两下子说：

“甚么的中国，你的满洲国的。”

季喜林站起身来，眼睛里满是厌恶仇恨的神情，看了大田一下，提起钓竿鱼罐就往回走。大田愣了一会，随后跑过来拉了季喜林说：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酒喝了大大的，打你小小的玩玩的，五块钱的给你买点心，你回来钓鱼的。”

季喜林一下子挣开大田，把鱼罐子一扔八丈远，十来条小鱼

在地上乱跳，他又把钓竿用两手在膝盖上一折两段，也扔开了。他说：

“你钓你妈的黏鱼吧，你当是哄孩子呢，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

季喜林在道上越想越气，想哭又使劲忍着，回家见了母亲，眼泪几乎要流出来，却仍然忍住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对母亲说：

“妈，我要到二姨家里住几天去！”

“眼看就要到五月节了，你在家过了节再去吧。”

“甚么年啦节啦的，在姨娘家过节还不是一个样子？”

后来母亲听喜林的同事说，他和大田吵架了，她怕孩子在家憋出病来，也愿意他出去跑跑，就答应他了。

三

季喜林从电话中间听说杨靖宇队伍正打濛江的大杭园，他两天走了一百来里赶到那里，不巧抗日军已经拉走了。他气得不行，第二天垂头丧气走了五十里，到韩家街老同学家里去。那人也在街上电话局做电话生，告诉他局里电话生还有缺额，把季喜林介绍了进去。

季喜林在韩家街电话局工作的第三天，晚饭时候和街上警长一起喝酒，警长灌了他两盅，他就醉了，回到住处躺着睡觉。他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黄昏时候，老太太喊他起来去上班，他在接线机旁边坐下不久，就挂来了电话，报告说：“杨靖宇的队伍今天夜里要打韩家街”，让街上警察戒备起来。他当下就打电话告诉警长，说上面来电话，今天

晚上平安无事，打完电话，他就离开总机回到住处去了。到了晚九点光景，街上枪响了，老太婆告诉他说“红军来了”，拿了一套老百姓衣服，让季喜林赶快把黄制服换下来。刚换好衣裳，外面有人敲门了。

老太太出去开门，引进来的是一个穿着满洲队军服的人，肩章是少尉阶级，他进屋就说：

“我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我们不扰害老百姓，你们不要害怕。”

“你明明穿着国兵的军服，怎么说是抗日军呢？你有甚么证据呢？”季喜林这样问他。

“这军衣都是我们从日本仓库里打来的，你看我带的书报都是我们油印的，我姓潘，是军部的秘书。”

季喜林从潘秘书手里接过来一落子油印刊物，他打开一张报纸，看见上面登载着抗日军战斗消息和工作成绩。他又打开一个歌本子……

“小弟弟，你不要看了，我们忙得很，你领我去搬日本鬼子的给养吧！”潘秘书着急了。

“别忙，等我看清楚了，要多少给养跟我走！”季喜林看这个歌本，正正和那个投降日本的大烟鬼拿来的一模一样的。他就把一落子还给潘秘书说：

“走吧，我先领你抓汉奸走狗，再替你找些老百姓到仓库去背给养。”

他把鞋带捆紧，领着潘秘书到大街小巷各处去，把走狗密探的窝都指了出来，搜出一些枪枝和粮食，又领他到仓库去，取了一批给养和被服。他在路上跟潘秘书讲起自己的故事，告诉说他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赶上九一八事变，两个好老师都让鬼子抓

去杀掉了，后来换的坏教员，让他们念亡国奴书，学鬼子话，动不动就用烟袋锅子往脑袋上打，所以他就不上学了。又讲了他挨大田少尉两刀背子，跑出来找抗日军没有找到的经过。他要求潘秘书介绍他参加队伍。

潘秘书领他去见军部韩参谋长。参谋长听他讲完想要参加抗日军的经过，就说：

“你才十五岁，生活又一向很好，恐怕吃不了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常常几天吃不着饭呢！”

“你受得了的，我就受得了！”季喜林说。

“你没受过苦，光嘴说不成，你还是不要参加吧。”

季喜林看见参谋长不让，他急得哭了起来，他说：

“你不答应我参加，就拿枪打死我吧！我不是因为鬼子砍了我两刀背，赌气来找你们的，我早就想参加了。我为了抗日冻死饿死打死杀死都心甘情愿，我死也不给满洲国做事了，活一天就跟你走一天。”

参谋长去报告了杨靖宇同志，军长就叫了季喜林进去，拉着手问了许多话。军长是个大个子，头发胡子都没有剃，脸上是使人见了从心里高兴的笑容。他最后对季喜林说：

“好吧，小同志，我们欢迎你上队，咱们大家一起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那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正是旧历五月初五，过端阳节的那一天。

抗日小英雄姜墨林

牡丹江边出英雄

黑龙江省有条牡丹江，江水清澈见底，由南往北流去。牡丹江两岸，有着广阔的原野，长白山脉起伏的山岗和原始森林。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广大的各兄弟民族的人民，虽然处在旧中国封建统治的压榨下，然而他们还是顽强地劳动着，生活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各族人民，在这个地区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坚决有力地回击了侵略者。

牡丹江两岸的宁安县，有个地方叫做"红土墙"，那里有一带红色的山岗，这就是抗日小英雄姜墨林的故乡。早在宁安的时候，我在吉东抗日同盟军军委工作时，就认识了姜墨林。他人小、胆大、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二十多年过去了，烈士的高大形象、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姜墨林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漆黑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对机灵的大眼睛；只是个子不高，总不肯长，而且身体很瘦，和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比较起来，显得又瘦又小。但是，他却很有力气，爬山上树，更是飞快、利落。

一九三二年，姜墨林十一岁的时候，参加了地下组织"中

国共产主义儿童团”。他人虽小胆子却特别大，又聪明、机智，意志坚强，地下党委很爱护他，把他作为一个革命工作者，经常派他到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去，与那里的地下组织联系，传递信件和消息。出入敌占区，是一项艰巨危险的工作，但姜墨林却热爱这项工作，从不畏惧。别人听了伸舌头的事情，他却觉得平平常常，一点也不在乎，尽管情况险恶，他仍然坚定地工作着，从来没有耽误过工作。他喜欢跳舞，唱歌，一有机会，他还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因此，姜墨林的名声传开了，引起了日本鬼子和伪满特务的注意。

这时，为了保护和培养姜墨林，宁安县委领导同志把他找来，对他说：“你的名声闹大了，太红了，小鬼子要逮你哪！”

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不怕，他们逮不住我！”

“问题不是怕不怕，你还要做更多的抗日工作。”县委同志似乎发觉自己的态度太严肃了，停了一会儿，又亲切地解释说：“小兄弟，胆大轻敌也不好啊，容易闯祸。这样好不好：你还是换一个地方，到咱们部队里去吧！……”

初出茅庐，后生可畏

一九三五年初，十四岁的姜墨林参加了党直接领导的吉东抗日同盟军绥宁游击队，并且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向党宣誓：不怕流血牺牲，一定把日本侵略者扫光！

姜墨林心情舒畅，胸脯也挺了起来，做什么事情都很积极、愉快，服从指挥，遵守纪律，样样都好。可是，他究竟还是个小孩子，有时免不了耍顽皮。

姜墨林在“红土墙”工作的事迹，自然也传到了部队。可

是有的同志，却不太相信："瞎吹牛，个子和步枪一般高，能有那么大的本事？"有的战士赌气对他说："回到你那'红土墙'去吧！"这可把姜墨林气坏了，他鼓足劲头，勤学苦练，学文化不到三个月认识了一千来字，半年后就能够写文章了；学习军事技术进步也很快，机枪、步枪射击准确，撇手榴弹也和老战士不差上下；至于伪装，超越障碍，更是灵巧。战士们对他的看法虽然有了改变，却还是说："了不起是了不起，没见他上过火线，听见枪响还不给吓跑了！"

不久，姜墨林头一次上火线，却出人意外，是那么勇敢、机灵，就象个小老虎。

有一次，抗日联军第五军有三、四百人的一支部队，在镜泊湖北边的杨胖子沟，与兵力相等的三、四百个鬼子打响了。姜墨林伏在地上，不慌不忙，放一枪就打死一个鬼子。后来，他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军官，在前面摇摇摆摆地扛着一面膏药旗，嘴里哇哇地叫着冲过来。姜墨林沉着地取出手榴弹，照直掷过去，随着爆炸声，鬼子军官倒了下去。

战斗胜利结束了，抗联五军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在部队的评功大会上，同志们都说姜墨林的功劳大。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小看他了，战士们说他"真有种"，"人小胆量大"，政工人员说他："初出茅庐，后生可畏。"政治处长拍着姜墨林的脑袋，笑咪咪地说："这小子真了不起，应该表扬……"姜墨林心眼里可乐坏了，活蹦乱跳，又唱又闹……青年人嘛，就爱听这个。

小英雄当小队长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抗联五军军部直属部队转战在宁安南边的老松岭一带。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也和五军在一起行动。

这时候，那位平日活泼愉快的小英雄，忽然间变得闷闷不乐，愁眉不展，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部队扩大了，姜墨林被调到五军军部直属教导大队，并且当了一名小队长。他觉得，当个战士可以自由自在，一身轻松，有点顽皮捣蛋，还没多大关系，既然当了小队长，一切行动要起模范作用，光管着自己还不行，还要管着一、二十个小伙子，再跟谁去要顽皮？姜墨林思想斗争了一番之后，还没想通，便去见大队指导员。

“指导员，不要叫我当队长，我还是当个队员……”

“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也没有，就是不想当队长。”

指导员心里明白了，态度很严肃地说：“哦，原来是因为负担加重了，不能自由自在，调皮捣蛋了，对不对？小老弟，你是共青团员，老背着一百斤，给你背一百五十斤就不行了？要扩大自己，消灭敌人，这话怎么说？同志，要不断提高自己，想办法当好小队长啊……”

姜墨林接受了党的教育，愉快地担负起小队长的职务。他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尽一切力量关心战士，服装、武器、吃、住、行军他都管，结果管得很好。用指导员的话说：“他完全可以胜任小队指挥员的工作。”

双河镇痛歼日寇

十二月下旬，大雪覆盖了原野和山岗。森林中的积雪有一丈深。气候十分恶劣，不断有风暴——刮起"大烟泡"来，飞雪遮天盖地。这时候，敌人派出了大批兵力，来"围剿"抗日联军，敌情很是紧张。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抗联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二军一部分队伍混合编为一个行动部队，决定突袭延吉县双河镇的敌伪军。这支部队，包括姜墨林所在的教导队，统一由二军二师副师长侯国忠同志指挥，从宁安县南百公里的平岗密营出发，翻过大雪积压、满山密林的老松岭，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在天将拂晓时来到双河镇附近。

这座紧靠图佳铁路，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镇子，却盘踞着二百多个日本鬼子和二百多个伪军。镇外深沟高垒，筑着四、五个据点，遥相呼应。其中关东据点地势较高，是敌人的核心据点。先攻下它来，其它的就好解决了。

姜墨林小队里的十几名队员，都是十六、七岁的"小老虎"，被选拔为参加摧毁关东据点的突击队。虽然在暴风雪中连续行军两天两夜，但他们仍然精神振奋，立即进行编组，配备火力，准备战斗。姜墨林率领的突击组，有两挺轻机枪，他亲自掌握一挺。初上战场时，他是一名普通战士；而今天，他是一名指挥员，要带领突击组投入战斗，必须做好战斗前的准备工作。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机枪冻了要出故障，步枪冻了拉不开栓，因此，姜墨林抱起轻机枪，就象抱孩子那样，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用自己的体温，保护武器。战士们看到队长如此，一个个都向他学习。

拂晓，突击队利用黑暗和风声的掩护，越过一丈多宽的壕沟，静悄悄地接近鹿砦，距离敌人的地堡仅百米左右。突击手刚把铁丝网剪开缺口，就被敌人发觉了，刹时间，地堡里和炮台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密集的火网盖在姜墨林和突击手们的头上。接着，敌人从四处放出了照明弹。雪地上亮光光一片，突击手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姜墨林很沉着，指挥战士们利用地势把身子埋入深雪里潜伏下来。他知道摧毁眼前的地堡，是解决战斗的关键，决不能后退。他情急智生，想出一条办法，立刻指挥战士们分散成四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挖雪沟，顺沟前进；即使敌人听到响声，一时也摸不清方向。突击组爬近地堡，姜墨林首先冲过去，提着一捆手榴弹，堵住机枪眼。在爆炸声中，姜墨林向敌人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枪不要命！投降吧！"果然，伪军动摇了，七、八十名伪军，有的逃跑了，有的举手投降，顽抗的被打死了，三十多名日本鬼子孤立了。抗联的后续部队赶上来，用猛烈的火力，干干净净地消灭了鬼子，占领了炮台。

攻击其他几个据点的部队看到关东阵地上竖起了红旗，士气大振，也都把自己当面的敌人消灭了，一拥而进，占领了双河镇。战斗胜利结束，共计打死日本鬼子一百多名。这时已是下午两、三点钟，再过一两个小时，天就要黑了，部队处理了战利品，向群众进行了抗日宣传，带上粮食、武器，胜利而归了。

"小老虎"坚决打掩护

部队进入森林，又走了大半宿。计算来起，已经连续行军两天三宿，还打了一天仗，早已是人困马乏，精疲力尽了。走

到一座岭上，决定打火堆，大休息。战士们立刻生起篝火，化雪做饭，大吃大喝一顿，庆祝双河镇战斗的胜利。姜墨林倒在篝火旁的雪地上，立刻睡着了。

大风怒吼。篝火燃烧得劈啪直响。突然，一颗火星子飞落在姜墨林的身上，棉衣立刻烧着了。一个战士喊姜墨林："棉衣烧着了，快起来！"可是，姜墨林一动不动。战士们围过去，只听得鼻孔里呼噜呼噜响，拉胳膊，打屁股，对着耳朵大声喊叫，怎么也弄不醒他，睡"死"了！大家急急忙忙往他身上堆雪，外面的火灭了，可是棉花里的火还在蔓延。战士们急中生智，推着姜墨林在雪地里象擀面条般骨碌过来骨碌过去，火还是没有扑灭。而姜墨林呢？依然睡得香甜。大家可真是急了，不能眼看着让火烧坏身子啊！九名"小老虎"七手八脚地把姜墨林抬起来，就往雪地上扔，扔下去滚两滚，抬起来再扔，……这么一扔两滚，一冷一热，姜墨林果然醒过来了。他揉了揉大眼睛，闷声闷气地问："你们干什么？"

战士们哈哈大笑："干什么？不这么干，那你早被烧死，该留给狼虫虎豹吃了！"

姜墨林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烧成了七零八落的碎片，急急忙忙脱下来，另找了一件棉衣，刚刚穿在身上，黑暗中猛烈爆发了激烈的枪炮声。他愣了一下，只听侯副师长高喊："掩护队占领阵地！"姜墨林知道是敌人追来了，请求参加掩护队。他立刻取过枪弹，率领自己的小队，飞奔到山岗上的一堆石砬子后面隐藏起来。

黑乎乎一大片敌人的骑兵，从岭下拥上来了。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姜墨林和他的"小老虎"们，沉住气，又稳又准地射击敌人。他们虽然只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却人人精力充沛，斗

志昂扬。而敌人虽有五、六百骑兵，因为地势不利，跌跌爬爬地暴露在掩护队居高临下的阵地前面，处处挨打，不敢冒进。而且，骑兵在森林里，在一丈多深的雪地上，更吃不开，连人带马不断掉在雪坑里，互相拥挤，乱作一团。

天快亮了。为了摆脱敌人，侯国忠决定撤退。姜墨林请求留在掩护部队，率领二十多个“小老虎”战斗在第一线，并且号召说：“同志们，我们的胜利不能让敌人抢回去！”

姜墨林小队打死了七、八十个鬼子、百多匹战马，越打越有劲、越痛快。鬼子吃了苦头，急忙拖着伤兵，扔下死尸往回跑了。

“克上克”收留“徒弟”

一九三六年二月，部队向北转移，五军军部到牡丹江一带活动。这时，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姜墨林所在的第五军教导大队，改编为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教导团。

当时，党的省委机关与二路军总指挥部一起住在大森林里，有些紧急的指示要传达给各地党委和抗联各军部队，没有合适的人担负这项任务。考虑了很久，最后想起了姜墨林，他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有办法的，在宁安出了名，引起敌人的注意，但是现在部队已经不在宁安，而是在勃利、林口、依兰地区活动了。这一次，决定派他到牡丹江克上克屯抗联办事处以及勃利县、依兰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几天以后，姜墨林回来了。他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带回来一名“小徒弟”——十一岁的顾全民。

顾全民是北牡丹江四道河子屯一家贫农的儿子，给地主当猪倌。他的后母成天打他，每次挨了打，他都要跑到抗联办事处来。同志们觉得他怪可怜的，劝他说：不要哭，不要顽皮，要听妈妈的话……。大家关心他，爱护他，经常讲抗日故事给他听。有一天，顾全民挨了打，哭着来找抗联办事处冯丕让处长，说："我妈妈不好，尽打我，她不是我亲妈妈。你们给我枪，让我打日本鬼子吧！"这孩子很聪明，体格也不坏，就是个子不太高。冯处长用好言安慰，劝他长大了再打日本鬼子。顾全民说：那时日本鬼子已被你们打光了，还有什么打头。他每天都跑到冯处长那里苦苦哀求。人民军队嘛，对穷苦的孩子自然十分亲切。冯处长说："好啦，好啦，留下吧！给我们做饭的同志帮点忙，留下吧。"

从此，顾全民就高高兴兴地在办事处住下了。有时候，冯处长就派顾全民到三、四、五道河子，江东江西送个信、传个话。顾全民很机灵，事情办的不错，冯处长很高兴，觉得他很可靠。这时，姜墨林从总指挥部到办事处送信，见到了顾全民，又听了他的情况，就请冯处长让他跟自己做交通，工作上可以互相掩护。冯处长摇摇头不开腔，一会儿又笑了，说道："我想顾全民有阶级觉悟，不怕吃苦，就批准了吧。"姜墨林高兴极了，于是就带走了这个"小徒弟"。两个人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一双发臭的胶皮鞋，头戴一顶破棉帽——最重要的信件就藏在帽子里。到依兰县城去跑交通。一路上，姜墨林不住地"开导"顾全民。他教什么，顾全民就学什么。有时候，两个人就亲密地在一起啃"窝窝头"。走到警察多的地方，他们就打起架来，姜墨林往顾全民身上撒砂子，顾全民照着姜墨林扔石头，就这么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地从警察身边跑过去——

小孩子顽皮，谁去管他？至于那批日本宪兵，对这些流浪的小孩子，自然也不放在眼里了。他们把文件交给地下党组织，然后带上党委给省委的报告，仍然是一路打闹着走出县城。

在牡丹江东岸，和姜墨林接头的，有时就是李升老人——党的特别交通员。李升有六十来岁，身板挺硬实，红光满面。为了进行地下工作，他化装成七、八十岁老头的样子，反正是越老越好，越能够骗过敌人的耳目；并且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倚老卖老，走到那里，腰里都别着把酒壶，一根长烟袋吊着烟荷包，总是不离手。姜墨林却相反，要装得越小越好，身上越脏越好，样子越顽皮，工作起来越方便。一老一小碰到一块，非常亲热，李老头对于姜墨林那算是喜欢到心眼里去了。

依兰城巧运棉布

一九三七年冬天，日寇调动了十多万大军，企图把牡丹江、松花江下游的抗日联军消灭掉。敌人施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的全面进攻，进行残酷的封锁；到处杀人放火，派遣特务，活动的很厉害，造成了严重的斗争局面。

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和在外作战的一部分队伍，被敌人割断了联系；省委机关和上、下级组织的联系，也被敌人破坏、割断了。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下大雪了，不解决粮食和冬季军服，住在森林里的总指挥部和省委机关人员就会冻饿而死。从敌人手中去抢粮食和服装，就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要用血去换，哪有那么多血！

总指挥部决定派姜墨林小队突破敌人封锁，把指示传达给

有关组织，在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帮助下，补充粮食、棉花和布匹；如果地方组织解决不了，就直接动手买。总指挥部并且把骑兵的好马挑选出来，以应付紧急而严重的情况，必要时进行军事活动。

姜墨林率领着一支经过挑选的精悍的轻骑队，穿过森林，绕过敌人的集团碉堡，来到依兰县城南边约七、八里的一个大洼子里。这里地势复杂，有汽车道、江道，日军常来常往。敌人绝没有想到这里会潜伏着抗联一小队骑兵。姜墨林命令战士们把马藏起来，准备爬犁。他自己换了衣服，背了一条破麻袋，装着又脏又坏的黄豆——两万块钱就藏在里面，独自一人走向县城。

姜墨林装作傻里傻气，歪歪扭扭，却是一路顺利地进了县城，找到了地下党委。党委研究了严重的形势，决定通过抗日救国会组织，把钱分下去，发动群众买棉花、布、靰鞡和胶皮鞋，分别送到城外指定地点，然后集中交给姜墨林小队。计划安排好以后，姜墨林把钱交给党委，便回到城外。途中虽然遇到日本宪兵的盘问，由于姜墨林回话神态自然，没有漏洞，才混过了敌人。

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布和棉花限制的特别严格，每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抗日救国会发动了爱国群众，有老头子、老太婆、青年男女，还有小孩子，每人买三、五尺布或一斤半斤棉花，象走亲戚似的带出城外。虽然有敌人的监视，但群众都很巧妙、机警，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集中起来上千斤棉花、百多匹布和其他原料用品。姜墨林率领战士们，把这些东西分散开安放在爬犁上，前后派出侦察员，便向驻地前进。

姜墨林心里明白，回去的路途一定不会顺利，因为事实本

身已经暴露了，从城里偷运出这许多棉、布，敌人必然会利用雪地踪迹找到去向，跟踪追击的。姜墨林选出一部分身强力壮的战士，在运输队的前后护送，碰到敌人就打，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打着运输队——它关系着森林里两千多人的生命啊！

小队保护着爬犁，顺着江道急驰。遇到有敌人的地方就绕过去。走到牡丹江东岸，离依兰城九十里的土城子附近，果然不出所料，发现了敌人的搜查队，大批日军随后紧紧追来。姜墨林对运输队说："我们打我们的，你们跑你们的。不要管后面。"说完，他带领着十多名战士——大部分是党员和团员，在灌木丛中把马藏好，立刻占据有利地势，埋伏下来。姜墨林对战士们说："我们的目的，就是缠住敌人，好让运输队安全返回后方。运输队如果受到损失，总指挥部和省委没吃没穿，对抗日影响太大了。我们宁肯牺牲也要把敌人挡住，无论怎样，一个活的也不要被日本鬼子抓去。"

下午三点多钟，六、七百敌人骑兵暴露在深雪的地面上，黑压压的一片，追上来了。姜墨林要战士们沉住气，等敌人走近了再打。敌人的骑兵突然遭到截击。猛烈的火力打过去，不少敌兵人仰马翻，横躺竖卧，有的马脱缰向后狂奔。等到敌人清醒过来，勉强布成阵势，一时又摸不清我们的兵力多少，迟疑着不敢硬冲。战斗持续将近两个小时，敌人才判明我们的人马不多，但天色已经黑了。姜墨林利用这个机会，命令战士们跨上战马，终于摆脱了敌人，追上了运输队。

十分疲劳的战士们，稍事休息，不等天亮，便又出发了。下午，到达刁翎河口，与总指挥部派来接应的部队汇合了。恰在这时，又发现了敌情，部队返身投入战斗，掩护运输队转移。结果还是敌人吃了亏，我们的部队带着棉花、布匹，胜利

地回到了森林中的后方。我带着感激的心情向姜墨林和全队战士说："你们获得全胜归来，真是一个奇迹！"

姜墨林赴苏留学

一九三八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王效明同志，率领部队在宝清县西方大锅盔山与日寇和伪兴安军的一次作战中，缴获了许多马匹，其中有东北马、蒙古马、也有日本鬼子的阿拉伯种战马。这批马送回指挥部后，战士们挑选了一匹日本指导官骑的好马送给我。

这确是一匹好马，一小时能走二十公里的"千里马"。经过很好的军事训练，而且经历过战斗。看到这匹雄壮的战马，战士们十分喜爱，个个跃跃欲试，都想着骑它一阵，显显威风。有一个战士走到跟前，和和气气地拍拍马屁股，刚想骑上去，不料那马大发雷霆，扬头翘尾，又踢又叫。好几个战士经过试验，都没有骑上去；有的战士虽然骑了上去，尽管使劲勒缰绳，用鞭子抽，结果还是被摔了下来。战士们气得直骂："当了俘虏，还不服气？"

姜墨林知道好马的脾气，它是不让拍屁股的，也不能用鞭子打，更不能拉着缰绳使劲乱勒。这时，姜墨林走过来，想试试看。战士们笑他："豆大点个子，也想骑它？小心把你踢死！"

姜墨林很有把握地接过缰绳，并没有拍马的屁股，那马不踢也不跳，只是扬着头。姜墨林得意地说："怎么样？稳稳当当拿在手里了。"战士们说："吹牛，骑上去看看，不摔下来才怪呢！"

姜墨林检查一下马肚带，勒得挺紧，就说："没关系，鞍子翻不了，我就摔不下来。"说着，他左手握住缰绳，右手勉强的又很迅速的往后鞍桥上一伸，飞身上马。那马象触电一般，立刻翘起尾巴，又跳又窜。姜墨林骑在马上，两只脚勉勉强强够着马镫，两条腿却夹的很紧，他既不用鞭子抽马，也不乱勒缰绳，稳稳当当坐在马上。那马示威一番，没有结果，就驯服了。

战士们立刻议论纷纷："怪事，它怎么就服姜墨林？"

这事正好叫我看见了，我对战士们说："没有什么奇怪，姜墨林懂得凡是好马不喜欢人们乱拍马屁。马也通人性，你既不要畏惧它，也不要吓唬它；没有骑上去，你如果就先害怕，骑上去动不动就使劲乱勒缰绳，用鞭子抽它，你这样整它，它当然不干了。"

不久，二路军总指挥部在宝清兰棒山停下来，我们得到机会，可以送一批同志到苏联去学习。我考虑到姜墨林年轻有为，六、七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应该培养他更好地为党工作。

于是，我把姜墨林找来，告诉他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不料他却说："我很愿意学习。可是，让我离开战斗的部队，我实在舍不得。等我学完了回来，也见不到日本鬼子了。总指挥，是不是能派别的同志去？"

这时，我们已经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了。我就向姜墨林解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长期抗战，在我们东北，更是长期的了。即使关内的问题解决了，说不定东北还要打一阵子。

一九三八年八月，姜墨林向东走了。

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一年以后，为了适应十分困难的环境，坚决打击敌人，抗联把部队分成许多小队。这些小队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搜集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寻找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联系群众，在群众中建立抗日宣传据点和地下抗日组织，在必要的情况下，确有把握时，可以打击、消灭小股敌人。各小队都是单线联系，独立活动。在一定的时间，总指挥部通过无线电台指示工作。

姜墨林从一九四一年由苏联学习归来，到一九四三年单独率领小部队，活动在牡丹江中东铁路沿线，有时到宁安、敦化，有时越过老爷岭往苇河县、舒兰县一带活动。小部队做了许多工作，从来没有受过损失。

深秋的一天，姜墨林的小部队从牡丹江以西地区向东转移，来到乜河镇附近。乜河镇是个战略要地，驻有上万敌兵。距乜河镇南二十公里左右，有一个敌人据点，约二十多名日本鬼子驻守，其目的是：监视抗联小部队的活动，镇压林区的伐木工人和监视伪警察队。姜墨林觉得这个据点比较孤立，敌人兵力不多，再加上好些时候没有和日本鬼子交手了，乘机在这里打一仗，不会犯错误。战士们都拥护队长，愿意打一仗，然后再往东奔向目的地。

据点的工事是土木工程，并不坚固。黑夜里，当姜墨林小队摸上去时，敌人竟连个站岗的都没有。小队突袭敌人，一顿猛烈的枪火和爆炸，不到半点钟的工夫，二十多个鬼子就被消灭干净了。姜墨林带小队立刻转移，向绥芬河大青山方向走去。

他们还没来得及跨过中东铁路，乜河镇敌人已经派出几百名骑兵和几百名步兵，进行搜索和追击。同时，敌军指挥部还通电各地日伪军，下令把中东铁路牡丹江以东一段地区严密封锁。

姜墨林发现前面的道路行不通，当即改变方向，从东北转向东南，打算到东宁县南方的山区去。走到离东宁西方一百多里的二十八道河子，他们突然发现已被包围在河谷里了。姜墨林立刻命令战士们散开，伏在大石头后面，和敌人展开了战斗。四面八方是层层的敌人，火力很猛，姜墨林知道已陷入重围，就和几名党员商量，把文件烧毁了，用石头把无线电砸碎，扔到急流的河里。这时，有几名战士已经在敌人的火网下面英勇牺牲了。最后，连姜墨林只剩下四个人，其中有两名战士还负了伤。形势十分严重了，姜墨林一边用机枪扫射敌人，一边沉痛地对三名活着的战友说："我犯了错误，不该冒险行动，……只认为那是个孤立的据点，其实，这个据点是处在敌人的重兵范围内，算是什么孤立据点？错误由我负责……。"他瞄准前面一排敌人，狠狠扫了一梭子，继续说："你们三个人，不管负伤没有，立刻突围。这里由我一个人顶着。无论如何，你们要活下来，回去报告总指挥。"

三个战士不愿意丢下自己的队长。姜墨林急了："总得有人回去报信啊！我是队长，要我离开这里，就不能留下一个活着的战士！你们赶快突围吧。我一个人顶得住，没有问题。即使我牺牲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也必定会胜利的……。"

突然，一颗敌人的子弹打在姜墨林的腿上，战士们刚要靠拢过来，姜墨林用力把手一挥："快！立刻突围，执行命令！"

三个战士犹豫了一下，转身顺水沟往外跑去。姜墨林也顾不得包扎伤口，对着敌人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以便掩护同志

们突围。他偶尔回过头时，却见一名负伤的战士跑了不远就倒下去了；幸而那二名战士已经冲了出去。正在这紧急关头，机枪突然哑巴了，子弹打尽了。他急忙卸下机枪零件，一个个扔掉，然后，从腰里抽出二十响盒子枪。

敌人发现只剩下一个人，便叽哩哇啦地从四面围上来，一心要抓个活的。姜墨林毫无惧色，瞄准最前面的敌人，一枪打倒一个；看看几十名敌人来到近前，伸手要抓他，少年英雄姜墨林举起二十响盒子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火热的胸膛。

一群日本鬼子蜂拥上来，象饿狼一样张牙舞爪地举起刺刀就要往姜墨林遗体上扎，一个鬼子军官大叫"住手！"跑来一看，突然跺脚说："可惜，为什么不抓活的！？"敌兵在姜墨林遗体上开始详细翻检，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在外衣兜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是红铅笔写的："中国必兴，日寇必亡。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救国胜利万岁！"这样的汉字标语，日寇官兵是不用翻译一看便知的。日本军官赶快把它揉搓掉，生怕更多的日本兵看见受"赤化"。周围看见过标语的日本兵一个个呆若木鸡，站立不动。

噩耗传来，全军上下万分悲痛，默然向英雄牺牲的地方哀悼。多么可亲可敬的英雄啊！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那暂短的一生。他那英雄的行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那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抗联战士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日小英雄姜墨林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松江长虹

——袁珍杀敌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以多门师团为主力的万余日寇军队，以走狗张海鹏的降军八千人为前驱，上空有几十架飞机掩护着，从长春大举北进。日伪军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占据哈尔滨的反日吉林自卫军。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哈尔滨市委紧张地向市民进行着反日救国宣传，并在已经组织起来的反日会员里募捐、动员参战，号召保卫哈尔滨，支援正在松花江右岸双城县一带作战的自卫军。

可惜，深受南京蒋介石政府不抵抗和投降政策影响的自卫军首脑们，各有私图，动摇不定；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军队团结、军民联合的主张，没有很好地利用激昂的士气，反而去抑制它。因此出现民族叛徒张景惠敢于公开卖国投敌，使为数十余万人的吉林自卫军前线作战部队崩溃下来，纷纷退走。北满的中心——哈尔滨市也被放弃了。

人人仇恨的太阳旗，插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头顶钢盔，枪上刺刀的日寇兵，到处耀武扬威，横冲直闯。日本宪兵带着“巡警狗”，白天黑夜挨家挨户的搜查，群众一言不顺就饱受其毒打。青年妇女遭到调戏污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成为被特别追查迫害的对象；敲诈勒索，抢夺居民的财物，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人们在街上遇见日寇兵的时

候，必须立正道旁，鞠躬致敬，朗诵："太君大大的辛苦了！"如果你面带愁容或横眉冷眼的话，那么你定会受到一顿拳打脚踢！

三月一日清晨，青年工人袁珍，从江北淞浦镇家出来，去哈尔滨市区马家沟他叔父袁品富家。半路上，在道里花园遇上开庆祝"满洲国建立大会"。

会场上七零八落有气无力地正在喊着："大满洲国执政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等口号。人们被强令"静肃直立，遥拜日本天皇，致敬感恩！"有很多人，忍耐不住，眼泪簌簌地直往下淌；有的人咬牙切齿要往外跑，却被"巡警狗"挡住……

自从哈尔滨被日寇占领后，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亡国耻辱事，都深深地刺痛了袁珍的心。

袁珍的父亲是辽阳人，一九二〇年间在抚顺煤矿铁道当技工。母亲曾在沈阳纺纱厂做过工。父亲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因得罪了日本监工，而被开除。为了寻找职业，父亲和母亲带着童年的袁珍来到了哈尔滨。父亲在江北中东铁路淞浦站当车辆检修工，母亲在纸烟厂做工。

袁珍满十七岁时正在中学二年级读书，因为家境不好无力再继续读下去，就中途辍学去哈尔滨中东铁路机车修理厂当了徒工。他壮实魁梧，聪明好学，工厂里的工人们都很喜欢他。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九一八"事变前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机车修理厂里有个老技工袁品富，同袁珍的父亲同姓不同宗，两人感情亲密，结为义兄弟。袁珍便把袁品富当做自己的亲叔叔。

袁品富的隔壁住着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工作者绍元同志①，一天晚上，他正在草拟“如何实现东北人民武装反日”的讨论提纲，突然从袁品富屋里传来激愤的语调声。

“不行！我非走不可，这种亡国奴的滋味我实在受不了啦！”

绍元一听，知道这是袁珍的声音，又听袁品富说：“你别着急，惊动了隔壁那位先生是不好的，半夜三更，吵吵嚷嚷，弄出差头，被鬼子把咱们逮去，那就吃不消了。”袁品富解释地说，“既然你父亲赞成你走，我是不会不同意的，不过你是一个青年团员，行动要有组织，何况反日救国是一件艰苦复杂的事情，必须多方商量妥当才行，但凭一股子牛劲，就以为称心如意，那是不成的……”

袁珍不等叔叔说完，抢着说：“横竖我一定要离开哈尔滨，我们团区委的一位负责人，今早到江北去找我谈话，要在我们的地下工人义勇军分队里挑选四个得力小伙，准备派到军队去扛枪打日本，我真高兴极了！但是，区负责人说我是江北‘青工’的组长，又是地下义勇军队长，不能把我调走，我真火了，不管怎的，叔叔得帮我想办法。我若能扛上枪，包管勇敢杀敌，替民族出气，把日本鬼子打跑，收复国土。”

“党组织不直接管青年团的工作，但我可以把你的志愿向省里的领导同志提一提，也许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绍元在隔壁屋子佯装熟睡，叔侄俩人的对话，全被他听清了，心想：象这样优秀的青年为什么不派他到军队中去呢？若

① 绍元即周保中同志。

派去，一定会起作用的。

刚天亮，袁珍起床，生火煮饭。

早饭后，袁品富就要走了，袁珍一再嘱咐叔叔："千万别忘记，三天后，我来听回信。"

"你走吧，年轻人唠叨啥！我得先走，要赶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呢。"

袁品富走后，袁珍收拾好屋子，将秘密文件放进半麻袋玉米面里，扛在肩上，腋下挟着"滑板"和拄棍，锁好房门，便离开了。到了江岸，他踏上"滑板"，在江面的冰道上飞快地往江北岸滑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傍晚，青年团区委会的领导人来到了袁珍家里，"你请求参军，离开哈尔滨，这个志愿虽然值得重视，但是按地下工作需要，区里决定是不能把你调走的。"

袁珍睁圆了明亮的眼睛，漆黑的两道粗眉毛挤上挤下，很不自然地回答：

"嗯，就这样办吧，别看我想不通，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能同意的。"

区委会的同志，紧紧地握着袁珍的手，满意地离开了。

日军趁着冰冻有利于野战行动的季节，沿松花江右岸和哈尔滨以东地区，分两路向自卫军进行新的进攻。

三月二十日的夜半，袁珍正在酣睡，父亲急促地把他摇醒。他惊诧地问："啥事？爸爸。"

"区里来人找你谈话。"父亲点亮一只小蜡烛。

在闪烁的烛光下，袁珍看清是团区委书记在进门的左侧壁炉旁坐着，脸冻得通红，两手不断地揉搓，吸着烟。

袁珍急着问："同志！有啥重要事，半夜三更，顶着寒风过江来呀？"

区委书记不说正题，继续抽着烟。

"到底啥事？"袁珍更急了。

"团省委已经决定：派另外同志接替你现在的工作，要你离开哈尔滨，明天就去通知那四个早已准备要调动的同志，分成两组，后天午前一定到江南，你自己一个人到你叔叔袁品富那里，他会告诉你要去的地方，并且有交通员安排你的旅途。"区委书记转过身来问袁珍的父亲："你看，袁珍是不是可以离开？"

"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商量妥就行。"

区委书记向袁珍说明了这次要派遣他去执行任务的简单内容和重要意义，并慎重地嘱咐：

"虽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但如果你认为有啥困难或者不能去的话，还是可以商量的。"

"既然组织决定，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何况我个人早就有这个愿望呢。"袁珍坚定地说。

区委书记高兴了，拍着袁珍的肩膀，又叮咛了一番。

袁珍的父亲送走了区委书记，感到屋里有点冷。他打开壁炉门，在残余的炭火里添上几块木柴，顺手移过一只小矮凳，坐在炉边抽起烟来。一会儿，壁炉里熊熊的火光照射着小屋。父子俩人都好象忘记了睡觉，默默地对坐着，谁也不做声。袁珍忍耐不住了，向低头沉思的父亲说：

"爸爸，我以为要离开哈尔滨是不会有希望的，可是今晚

得到这个好消息，真高兴极了！您为什么不吭气，难道后悔了么？”

“不，一点也不后悔，我一直愿意你远走高飞。”父亲忽然精神抖擞地站起来，用烟袋指划着说：

“救国是大事，鬼子侵占我们祖国的大地，要把我们同胞当牛马奴隶使唤，这是经过了好多年向我们一步一步逼近的。如果不是地主、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欺压老百姓，如果不是买办大资本家卑鄙倒灶，献媚外国强盗，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投降，不卖国，那么日本鬼子也不敢这样大胆地侵占我们祖国土地，祸害我们同胞。”他的语气越来越沉重，“孩子，我高兴你离开家。莫说你们青年小伙，就连我，在心里也时常盘算着说不定哪一天，即使手里抓不到枪，也得抡起斧头、铁棍同敌人拚斗一场。”他的话停了一下，“孩子，你就收拾收拾离开哈尔滨吧！可就有一件事使我放心不下。”袁珍的父亲沉默了。

袁珍不解地问：

“啥事？”

“前年给你订婚的时候，你总是埋怨我和你妈妈，说我们是老封建，包办婚姻，男女双方都不愿意，硬要退婚，如果那时退了婚，现在不就好了吗？但是从去年年底，你和桂贞难分难舍，厂里的男女工都当笑话传。现在你走了，她能安静地呆下去吗？”

“您不知道我和桂贞为什么起了变化，我没有告诉您。去年十月鬼子打到嫩江桥的时候，‘老巴夺’烟厂开会支援抗日，桂贞被厂里青年女工选为职工会的代表，在区里讨论青年工作活动的时候，我和她常常碰到一块，说也奇怪，从那时起我俩

闹离婚的恶感一点也没有了，感情反而亲密起来。有一次区委的一位同志向我俩开玩笑：'反日战友的钢绳子把小两口绑在一起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时间找桂贞当面说说，写一封信，请您交给她。桂贞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她是厂里妇女反日会的活动分子，因为她是有品德又有本事，我深信桂贞是能够踏踏实实地站稳脚步的，请爸爸不必有什么顾虑。"

袁珍的父亲幽默的说："哦，原来如此，既是这样我和你母亲就放心了。我这个封建佬，从前是包办婚姻的穿针引线人，现在成了你们革命夫妻的传书递信人了。"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们年轻人，也懂得怎样去处理个人的事情。"袁珍羞涩地说。

的确，袁珍家里在一夜间，出现了慈和爱，忧虑和激动，轻松和愉快的各种感情。

隔了一天，袁珍按预定时间到达江南他叔叔家里，接受了地下党负责人给的行动指示，乘坐东开的火车离开了哈尔滨。

三月下旬，向东进攻的日寇，好象执行预定的军事演习实施计划一样，以走狗军于深澂部队为前驱，而日军的主力紧跟在后面，压迫着宾县、延寿一带；另一路寇军沿着中东铁路东线阿城、珠河前进。在战区的某些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枪声和炮声，天空中的敌机盲目地到处轰炸。吉林的自卫军与敌人稍一接触就向后退。广大地区的居民却遭到侵略战争的灾殃。

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在反日军队中创造反日武装的核心力量，在自卫军里一个要求走彻底抗日的革命路线的步兵团，是着手工作的对象。省军委书记绍元同志，为了执行这一任务，

前往哈尔滨以东地区进行活动。

绍元到达珠河县以后，看见从车站到县城都是日寇军队，势态显得很紧张。地下党委把当地的一些情况通知了他，他即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袁珍是在二月二十二日到珠河下车的。地下交通员引他到车站后面一家大车店住下，他已乔装为苦力工人的模样，在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他肩上搭着两条麻袋，腰上围绕着一条粗麻绳，在大车店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懒洋洋地走着，手里攥着一个苞米面窝窝头，边走边啃，眼睛不住的东张西望。突然对面来了一个熟识的人，他不自主地惊慌起来，停住脚步，心里想：为什么住在哈尔滨他叔叔袁品富隔壁的那个可疑的教书先生在这里出现了呢？袁珍心里正在继续思索，但是那个熟识的人表示出很平淡的样子向他打招呼：

"张老师今天没什么好活干吗？天已晚了，还是回到咱们堆栈里去吧！"

袁珍一愣，这是规定的接头暗语，但他立刻心里醒悟似的平静下来，回答说：

"好吧，就到你们堆栈去吧！"

袁珍跟在绍元后面向北小道街走去。夕阳在他俩前面极远的方向渐渐地下垂到地平线上，远近的村落缭绕着炊烟，从遥远的珠河县街和它周围的村镇传来马的嘶叫声，群犬的狂吠声，在人声嘈杂里有尖声，嚎啕声，看光景这又是侵略者的军队宿营引起的骚扰。绍元引袁珍走到一片谷地里，望了一会儿星星点点各自独立的农户，然后他俩象被邀请的熟客一样，一直向一家朝鲜族农民家走去。女主人操着流利的汉语欢迎客人进屋。他俩分坐在小炕桌的两旁。女主人热情地向客人问候，

并且把早有准备的一大木盆热气腾腾的苞米糙饭端到炕桌上，拿过两个大铜碗和铜匙子摆在客人面前，接着就是一土瓷盘满盛着大葱煎鸡蛋，堆尖的一大碗腌辣白菜，又一大铜碗白开水汤——摆满了桌子。女主人慰劳似地请客人用饭。

袁珍边吃边说：

“说真的，你虽然是我的老熟人，在哈尔滨我就不相信你是什么南蛮子草药医生或教书匠，我怀疑你是日本鬼子的侦探，你的真实情况我叔叔从来不肯向我透露，因此今天在珠河车站碰见你的时候，使我十分诧异，我判断你一定是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盯梢跟我到珠河来的，我当时心里盘算把你揍死再脱逃呢？还是不理睬你，赶快脱身为妙？主意还没有打定，忽然你用规定的暗语向我打招呼，我仍然有怀疑，但我不能不大胆地答话……”

“你什么时候到珠河？看到些什么？”绍元问道。

“昨天上午十点钟到珠河下车，住在一家大车店，听说日军主力和于大头的走狗军往延寿和方正开去了，后续部队昨晚和今天还有到来的，这次寇军决心要追上自卫军，把他们通通消灭……”

绍元吸着烟，倾听袁珍激动的叙述。

“昨天下午，差点儿出了乱子。”

绍元急问：“出了什么乱子？”

“昨天午前交通员送我到大车店住下，觉得大白天蹲在店里没事干，反会引起坏人的注意，因此决定到街上走走，看看光景。当我路过十字街口的时候，那里聚集着一大堆人，看样子又是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欢迎日本皇军大会’，会场上人们虽然手持各种颜色的小旗在摇晃着，但表情是十分冷淡的，有

几个日本军官和'维持会'的士绅在台上轮流讲话，会场周围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巡警狗'把守着。鬼子军官讲完话，几个鬼子和'巡警狗'搬出了几只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箱，从里面拿出很多糖果，还有针、线、一盒一盒饼干、小纸本、铅笔……向参加大会的群众挨个分发。据翻译宣布说：这是大日本天皇所赐'日满协和'的赠礼。我也得到一条小手巾和一支铅笔。正在要散会的时候，县街南头突然'砰、砰、砰'发出几排枪声，人们惶恐地向四面八方乱跑开了。枪声很快就不再响了，街上呈现出一片静寂，除了日寇兵来往走动以外，居民几乎没有行走的。

"与其说我为好奇心驱使，不如说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我就大着胆子往南街走去，希望能在枪响的方向看到些什么。当我走到距离南街口外数十步远的地方，蓦然发现鲜血淋漓染满全身的两具男尸横在道旁，十来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尸体附近走来走去。其中一个日本鬼子正在用脚不断地踢那两具死尸，好象踢皮球一样，并且做着鬼脸向其他的日本兵开玩笑。四个'巡警狗'分做两组站立在尸体南北方向，好象在封锁行人的样子。我当时料定这两个死者一定是刚才枪响时被日寇残杀的，我立刻觉出自己的脸、手发烧，心头涌起愤慨的火，但是我暗自吸了一口气，正想转身照来路往回走的时候，头顶'哧溜'一声飞过一颗子弹，是一个日寇兵向我开了一枪，接着几个日本兵咿哩哇啦叫嚷着向我追来。我拔腿就跑，钻了好几条小巷，一口气跑出了东城外，背后没啥动静，我才放慢了脚步。"

绍元听得入神便插问：

"你后来往哪里去了呢？"

“因为地方生疏，没有个另外的落脚处，天色又已经傍晚，我寻找方向，又回到大车店住下。店客拥挤，大家唧唧哝哝在谈论今天珠河街发生的事情，有的用叹息的语调，有的人表现出愤怒的心情。靠近我的铺位的一位长者，回答了我的问话，我才明白，被日寇打死的那两个居民，其中一人姓王，是因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前曾经揭露过在珠河开当铺的日本人小林如何重利盘剥，如何仗势欺诈居民，并同小林打过架，他怀恨在心。现在日本军来了，他气焰嚣张，到日寇军宪兵部队诬告姓王的是当地仇日派领头人，因此姓王的就被日寇宪兵抓住枪毙了示众；另一个被害的是一个小学教师，曾经在姓王的被捕以后，到‘维持会’要求士绅们去保释他。小学教师义正辞严的责备‘维持会’，不是维持中国人的生活秩序，而是维持日本侵略者对人民横施蹂躏的秩序。就这样，小学教师也被日寇宪兵抓去，同姓王的一块枪毙了。自从出了这件事，全县居民心里都愤愤不平，但谁也不敢多嘴多舌……”说到这，袁珍气愤地攥紧拳头往小桌子上狠狠一砸：“说真的，当我看到两个死者的惨状和鬼子兵象畜生样儿的时候，我真想同日本鬼子拚命算了，可是我又不由自主地命令自己忍气吞声向后转走了，我的脑顶上竟因此飞过来一颗子弹，假使枪口稍稍低一点的话，不正把我的脑瓜盖揭开了么？那不就白白送死了吗？！”袁珍睁圆了眼睛又补充了一句：“真气死人！”

绍元弹去烟头上的灰，仿佛讲演似地向袁珍说：“同志，你何必上火，为革命牺牲这是必不可少的，但要看死得是否有价值。你不能拿一把削铁如泥的降魔宝剑，去乱砍你路上遇到的顽石。你的大胆勇敢，而又机敏，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是为同志们所重视的；你虽然没有进过大学堂的门，但你写的工

作报告和宣传单是那样的通俗明了，生动活泼，有很好的革命文气。然而你有缺点，你象梁山泊好汉李逵一样，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就抡起板斧乱砍一顿，这对于革命的地下工作是不好的。张飞什么时候粗中有细，什么时候就打胜仗，什么时候使性子“暴虎冯河”，就坏了事，连脑袋都搬了家。”

袁珍把刚才的激动心情转为沉静，注意倾听绍元继续说下去。

“看光景，自卫军是不会有什么认真的抵抗，日寇军将继续东追，这就造成我们要达到的工作目的，将有很多困难。你作为工作小组长，要使用你的聪明和机警，在情况复杂里考虑自己的行动，千万别忘记：混杂在敌军作战行动地带，进行我们的工作活动，是带有危险性的，一切必须估量到可能碰到的危险，也就是要在不可避免地出现危险的时候，必须能够脱离危险。”

谈话兴趣正浓的时候，女主人同着一位珠河地下党负责人走进屋来。女主人从炕头搬出两床破旧的棉被给客人铺在炕上，向客人说了声明天见，就出门往隔壁屋去了。地下党的同志向绍元介绍了情况和商讨了工作。不久，便告辞走了。

绍元再一次向袁珍说明，这次要到自卫军去的具体任务：将在自卫军的一个步兵团里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组织，在全国范围展开军队革命化，实现彻底反日的活动。袁珍是这个核心组织成员之一。他们商量了当前的一些行动计划，快到半夜就都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女主人从隔壁屋把准备好的早餐送过来。袁珍和绍元吃过早饭，化装为小商贩的模样，离开了朝鲜族农民的小村，奔向大道，混杂到日寇行军纵队后尾，跟随着民间

运输大队向延寿去了。他们傍晚便到达了延寿县城。那里寇军活动频繁，居民秩序混乱，谣言多，人心惶惶不安。根据可靠的消息判明：日寇原来打算把自卫军主力压缩到方正及其以东松花江右岸狭长地区，然后加以歼灭。但是，自卫军在敌人未到时放弃了延寿和方正一带的抵抗线，继续顺江右岸向东退走，敌人急速地向东追击。在珠河一带集结待机的日军，也沿着中东路向东进击。看样子寇军的目的是要占领松花江右岸的依兰县和中东铁路东线的牡丹江市——南北呼应，组成沿牡丹江通到松花江的一条战线。后来的情况发展证实，就是这样的。

事情出乎意外，中共满洲省委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求绍元赶回哈尔滨。因此，绍元紧缩在自卫军中的工作活动范围，指派了袁珍坚持执行东去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在自卫军中，找到做工作对象的部队去开展活动。

三月二十四日黎明，绍元带着一个从比利时回国不久的留学生，和一个皮鞋工人返回哈尔滨去了。袁珍感到接受独立工作的事情是很突然的，但他并不着慌，并不犹豫，和同组行动的另外三个同志商量了行动计划。他们分成两组，冒着满天弥漫的大雪，顶着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刺痛肌骨的狂风，迈向目的地——依兰地区去了。

袁珍和他的同志在寇军前进部队和运输队的间空里穿插着走，有时必须避开大路另寻小路绕越行进，有时必须夜间行走。饮食住宿失常，疲乏和紧张交错着。这样旅途的艰苦，袁珍虽然未曾经受过，但他好象一个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老战士一样，艰难、困苦、危险并没有使他低头，他的精神仍然是饱满的、愉快的。一到远离大道不为敌人注意的地方，他就低唱着

流行的歌：

黑水、长白是祖国壮丽的河山，
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三千万，
哪能忍受倭贼侵凌摧残！
大家起来斗争，救国保家乡。
……

经过四天多的曲折复杂的行程，袁珍和同伴到了松花江右岸、大罗勒密附近，和同组的同志们接头，并在那里打听消息。据说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到依兰江西岸，袁珍估量日军占领依兰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再顺着敌军前进的大路去依兰寻找工作对象的自卫军部队，结果会是白费，不如舍弃大道，改走江道，赶过敌人先头部队，绕往自卫军的后方，这样就可以绕越敌人警戒线；同时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依兰以东，接近工作活动的目标。

袁珍和同伴往西走了三十多里，到了江岸小镇德莫力附近，得到地下"反日会"的帮助，坐上为他们准备的爬犁出发了。

大雪纷飞，风的狂吼在夜间显得分外凶猛。气温骤然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马不停地奔跑，汗水如注，皮毛光滑的身躯冻结着串串冰柱，宛如琉璃珠子，挂满了全身。冰串相互撞击，发出细碎的叮铃当啷的响声。他们倾倒歪斜地挤坐在爬犁上。

约七、八个钟头，走了一百五六十里的途程。东方出现微白，驭手用长鞭遥指着十里左右的地方，小声说：

"那就是依兰县街，在我们右侧江岸前面鸡叫狗咬的那个村子，就是牡丹江西岸的马家大屯了。"

袁珍心里发生惊异：为什么战争中心地区，昨天下午还可以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大炮轰鸣，和飞机扔炸弹声，而现在却是这样沉寂？难道敌人已经占领了依兰重镇，自卫军又退走了吗？既然如此，也得越过依兰深入到后方去。袁珍知道这是旅途的重要关头，不能松懈。他向驭手和同志们说："我们必须再紧赶一段路程，越过依兰以后，再找地方打尖(吃饭)。"大家非常赞同，振作起精神，继续赶路。

忽然江右岸响起几排枪声，子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驾爬犁的辕马被打倒了，拉套的马也摔倒在地，爬犁翻了。驭手急忙卸下被打死的辕马，狠狠抽打另一匹马。马拉着翻过去的爬犁，刚刚跑几步，突然，第二阵排枪响了，两颗飞弹击中了袁珠的右腿，只听"搀"的一声，袁珍从爬犁上跌下来。接着，马又中弹倒在地上。大家惶恐地向袁珍围来，其中一个同志撕下一块包袱布给袁珍包扎流血不止的大腿。他们搀扶着袁珍向江北拚命奔跑。这时天已大亮，十几个双手持枪的日本兵，包围过来。袁珍清楚地知道，虽然伤了不是致命的地方，但若脱逃是困难的。他不忍心同志们为救助他而被拖累，以至完全落入敌人魔掌。他拒绝搀扶，告诉副组长带一个同志去执行任务，另一个同志同着驭手反回方正，向哈尔滨联络站报信。他竭力地推开同志们，命令他们分头逃跑。袁珍跑了几步，摔倒在地。这时敌人上来了。

十多个寇兵不去追逐分头逃跑的四个同志，而把他一个人团团围住，嘴里唧唧咕咕问话，用枪托和拳脚踢打着他。

这时的袁珍现出安然无事的样子，好象一块钢铁的砧子，任凭寇兵捶打。

日军带着胜利的骄傲，象豺狼一样，连拖带拉把袁珍押到

马家大屯去了。

日寇认为袁珍现在是他们的重要虏获物，将从他身上得到“理想”的东西。宪兵严刑讯问，袁珍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无住所的小商贩。日寇逼迫他说出同行的人们的来历和去向，他严词拒绝招供，推说和他们素不相识，只是在途中搭载偶然碰上的旅客。日寇队长大发雷霆，拳打脚踢，并吩咐鬼子兵卒向袁珍鼻孔里倒灌辣椒水，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胸和背，用木杠压他的两肩和两条腿。袁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终于不省人事，昏厥在地。

当袁珍被凉水浇泼苏醒过来的时候，一个宪兵少尉，离开座位，亲自扶起袁珍，给他解去捆绑的绳索，要他倚靠着墙壁坐在一块板上，接着用生硬的中国话和蔼地说：

“你的同伙的四个人，跑脱一个，三个人通通的被抓住了。你说实话吧。哦，是不是肚子饿了想吃饭？”

袁珍点点头：“嗯，吃点东西再说。”

少尉叫一个兵卒端过一大碗用开水冲开的麦片粥。袁珍接过来，很快就把他吃完，向那个少尉说：

“大大的谢谢！”

少尉微笑了。

袁珍早就识破少尉的奸险，他心里想：四个同志可能脱险了，即使有人被抓住，也不会叛卖祖国，向日寇低头，万一真的有人被捕变节，也不能动摇我自己的革命贞操。袁珍在暗笑宪兵少尉愚蠢的诡计。

“是时候了，照直说吧，大日本皇军是来帮助满洲建国的，黄种人自强是我们神圣的任务，大鼻子红党，中国赤匪，我们统统的反对。日满协和，太平日子就有的，你要说实话，

好处大大的有——快说！”日本宪兵少尉指手画脚，象训话般地向袁珍说了一大堆。

袁珍带着十分疲困的神情，喘息着向少尉回答：

“我愿意都说出来，但是伤口十分疼痛，稍稍歇息一会儿才好。”

“好吧，就让你歇歇，你生翅膀也飞不了的！”少尉说着用手一指，叫两个宪兵把袁珍带到东厢房的一间小屋里。马上来了两个哨兵，一个在门外，一个在后窗监视着。

袁珍料到事情已经陷入绝境了，总得设法寻找机会逃脱。快到中午的时候，袁珍虽然不能往外瞻望，但听到不远的大道上发出大批军队向东行进的沉重的脚步声，夹杂着炮车、汽车、大车的隆隆声。袁珍认为依兰已经失守，心里有些难过。散驻在这里的日本宪兵，虽然动作并不紧张，但已在作移动准备。袁珍心里着急，虽然自己的腿负伤两处，但未伤筋动骨，还可以跳跃奔跑。他正打算冒着最大的危险从后窗逃跑，突然一个宪兵军曹闪进屋来，手里拿着绳索和手铐要给袁珍上刑，袁珍央求着说：

“你们不是叫我要说老实话吗？请你去禀报太君，我现在就说。”

军曹让两个哨兵把袁珍架到上屋。

宪兵少尉改变了以前的态度。袁珍一跨进门，他就声色俱厉地说：

“再没有时间拖延了，若不说实话，归顺满洲国，报效大日本皇军，就要砍掉你的脑袋！”

“一个破产失业的小商贩，要到富锦去投亲靠友找活干，这是已说过的实话……”袁珍睁圆了眼睛大声地回答。

“八嘎，胡说！”少尉跳下炕，一拳向袁珍劈面打来，袁珍头一偏躲过去了。少尉如饿狼一般，怪叫几声，指挥手下的人给袁戴上手铐。宪兵军曹在一旁抽出亮晃晃的马刀，袁珍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便使尽全身力气，从两个哨兵挟持中挣脱出来，飞起左腿，正正地踢到军曹的右腕上。军曹手一松，马刀落地。袁珍抢夺到手，猛地一刀劈去，少尉的脑瓜盖削去了大半边，登时倒地死了。七、八个日本宪兵慌做一团，用枪刺和马刀向袁珍乱砍，都被袁珍搪过。小小的屋子变为激烈的战场。

袁珍从小就跟父亲学过少林寺派的拳脚棍棒，使刀弄叉，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大显身手。宪兵军曹也被劈死了，其他的几个宪兵有的被削去一只手，有的负了轻重不同的伤。日本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大大丢了魂。最后从另一个小院落跑来两个宪兵军曹，用手枪连发十数响，将袁珍打倒，但是袁珍的两眼发出炯炯的光亮，呼吸还没有停止。

日寇宪兵抓来村里的六个农民，强迫他们卸下一扇门板，要他们带上大锄头、鹤嘴镐。袁珍被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日寇从大屯调来一排人，在前面开道，农民抬着门板上的袁珍横穿大道向松花江走去，一群宪兵象送丧一样的跟在后面。

袁珍的头、脸、全身染满了鲜血，他张开嘴唇想要说话，但被勒紧的脖颈发不出嗓音。他心里很明白，他将离开亲爱的祖国，自信自己的血不会白流的，所可惜的是过早的牺牲，没有给祖国河山收复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样的表情是抬着他的农民们从他微微转动着的眼神和平静地呼吸里看出来的。

袁珍被抬到离开小屯三、四里的江心，日寇指挥农民把门板放下来，要农民动手在冻得厚度几乎有一公尺的江面上凿开

一个大窟窿，下面水流湍急，不断往上涌出，这时在门板上捆着的袁珍突然从沙哑的嗓子里高喊：

“中华民族革命战争胜利！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袁珍的行动，引起敌人的各种不同的反映。有的似乎在默默赞佩，有的发出狗吠狼嗥的仇恨声。

一个身躯粗大、形态丑恶的宪兵举起锋利的马刀，对准袁珍的脖颈砍去。英雄的头颅飞离了躯体，满腔的鲜血，溅注着松花江的冰流……

几个鬼子宪兵将袁珍的尸体连门板一块儿推入冰窟窿里去。英雄的头颅被宪兵用两条重叠着的麻袋包裹起来，带到上司那里去请功。以后，悬挂在依兰市街，显示“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

被迫参与埋葬袁珍的农民，为英雄的气概深深感动，他们仇恨寇兵的残暴，他们忍受着痛心的眼泪，回到村里，把烈士慷慨就义的经过遍告深受苦难的同胞们。

松花江上年年出现的长虹，是烈士爱国捐躯的光荣的伟大的象征。不到两年的光景，在松花江两岸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游击战争。爱国的工、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踏着烈士的血迹，向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一九五八年

松柏常青

纪念杨靖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1960.2.3）

古话说："盖棺论定"。这是指一个人在他毕生活动中是好是坏，到死时就可以评定。但是也有另外的说法："周公握发吐哺时，王莽谦恭下士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又是说一个人的一生是好是坏，即使在他死后也是难于肯定的。然而，杨靖宇（马尚德）同志，在他从容就义英勇战死之时，就表现出他是一个忠贞不贰的无产阶级革命坚强战士、品德优秀的模范共产党员、民族英雄，这在他为革命生活着战斗着的时候，也是早已肯定了的。

靖宇同志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家湾贫苦农民家庭，不可避免地受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但是他冲破了这种思想影响的束缚，走上了跟随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道路。从他参加革命的行列接受革命工作那天起，就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他参加革命既不带着个人的任何自私的打算，更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也不是"走着瞧"的革命同路人。

"五四运动"、"中国大革命"时期，靖宇同志正当青年时代。一方面，他亲眼看到，在旧中国"天下有事，中原必

争”的河南省故乡的土地上，代表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劣绅怎样的横行霸道，残酷无情压迫着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旧中国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进步，毁坏着中国民族的生机，首先毁坏着亿万劳动人民的生机；另一方面，他受到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和中国大革命的趋势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当前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影响，从而抛开了在开封纺染工业学校时的“烦闷”，找到了自己毕生的出路——为中国民族解放，为被压迫阶级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在1925年毅然参加革命的实践，以一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战士的身份，深入农村，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半公开的革命宣传活动。1926——1927年间，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在北伐军进军的京汉铁路河南南部地区组织农民万余人，得到铁路工人的支持，举行了暴动，占领了确山县城，给那一带的地主军阀官僚统治以严重的打击，帮助了北伐军顺利的北进。虽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但是在豫南广大地区的农民运动，并未熄灭，相反的，农民和广大其他的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有组织地、目标更明确地开展了豫鄂皖边区的人民革命的初期斗争。靖宇同志成为当时出色的群众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共河南地下党组织坚强的工作干部。

1928年底1929年初靖宇同志被党中央调到上海进行短期学习，总结大革命斗争经验。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革命是复杂的、艰巨的，并且是较长期的。要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1929年春，党中央派靖宇同志到东北地区“中共满洲省

委”做工作。他深知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日本侵略中国，必先攫取满洲。满洲又是国际帝国主义准备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东方前哨。在满洲做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责任是重大的，必须和东北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得到支持，进而联系广大群众，在那里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烽火，这将有助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靖宇同志带着满腔热忱，挺身走出关外。在“满洲省委”领导下，他深入工厂、矿山、学校，组织过本溪、抚顺的矿工罢工斗争；在沈阳、大连等地某些学校学生、教职员和市民中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对反革命南京政府压迫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向坚持和平政策的以平等待我之苏联进攻。在抚顺和沈阳，靖宇同志曾被日本特务机关和东北军阀两次捕去，但和他在河南工作时期三次被捕一样，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地抗拒敌人无耻的诱骗和刑讯威逼。他把法庭变为揭露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的场所；他坚定地保卫了党组织的地下工作活动。

“九一八”事变日寇军进占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这一时期，全中国人民、全东北人民，反抗侵略、保卫国土的正义要求被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百般压抑；而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总方向，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靖宇同志这时期在哈尔滨积极开始新的工作，先后担任过哈市党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军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在工厂、铁路、码头工人中，在农民群众中，在学校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中，不断地以抗日救国为当前紧急任务，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各阶层实行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参加抵抗日寇向北伸张进攻。虽然“满洲省委”当时还未能掌握全盘的形势发展，来贯彻各阶层团结一

致、军民团结一致来实现巩固双城阵地，抵抗日寇，保卫哈尔滨；但是群众抗日自救的爱国情绪广泛的被激发起来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发动人民武装游击战争的实际准备开始了。这与靖宇同志日夜不停地积极工作活动是分不开的。

当我同靖宇同志在哈尔滨一同工作的时候，常常发现他每当寒风凛烈、砭人肌骨的凌晨，出现在大江中同摆冰滑子的工人一块劳动，借此联系群众进行秘密工作。有时又出现在铁路和工厂中同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分别接触，进行商讨；他深更半夜在自己住房来回踱着漫步，深思熟虑地准备着明天的工作，或伏案写作党的文件、宣传教育材料等等。他善于使用不同的语调，向不同的人们解释和答复问题。语句明了、具体、生动，引人深思，鼓人劲头，给人们信念。他象戏剧演员一样，妆扮什么就象什么，他要做什么就会做什么，或者一定学会做什么。他常常以机智的技巧动作结合大胆勇敢的行动，躲过敌探走狗的跟踪，冲破敌人的防范。的确，他是一个革命工作的艺术家。他个人生活是俭朴的，能忍受艰苦，宁可自己省吃俭用，经常洗补自己的衣服、鞋帽，节省住房燃料。他从不乱花党的一文经费，相反的，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费贴用到工作活动上，或其他同志身上，以帮助解决困难。他的身体是健康的，生活情调是高尚的。

靖宇同志的最大优点是经常专心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文艺和党中央的各种指示，把原理、原则和实际工作相结合。他坚持真理，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日寇占领哈尔滨，形势紧张的时候，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草拟一份《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组织人民武装进行游击战争提纲》。靖宇同志事先搜集了有关资料，结合东北具体情况，作了详尽地

研究，他意识到，中国民族的危机与中日的民族矛盾，将因东北被占领，而扩大加深，阶级矛盾将推到次要地位。但解决这一民族矛盾，反抗日寇侵略，必以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工农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主流，东北尤其是如此。东北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条件，武装自己，拯救自己，对日寇进行较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在反复讨论题纲决定问题时，采纳了靖宇同志许多好意见。省委在检讨保卫哈尔滨的斗争经验时，靖宇同志切实地有分析地批评了市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缺点和错误，也批评了省委在掌握指导斗争中的缺点，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1932年4月初，省委决定我去吉林东部，靖宇同志代理我的工作。深夜，我俩作了临别的谈话。我对他说：“与君相处几个月，胜读马列多年书。”他恳切地回答我：“我们是反对旧礼教的，但是可以这样了解，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改作‘劳动人民之寄希望于共产党，党的寄望于共产党员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而临阵脱逃的，有如朝露见阳光即散失，有如秋草经风霜即枯萎；一个普通的人都应该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况是共产党员呢？党员对党的革命事业必须具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当时使我深受感动，但想不到相别八年之后，他竟慷慨捐躯，战死沙场，他的这席话竟成为留给革命同志的诫语。

1933年5月我们在桦甸漂河口子，聚会讨论当时辽吉地区的工作，靖宇同志身体健壮，精神奕奕。在过去一年左右的光景，他离开哈尔滨代表省委到南满地区，整顿和巩固盘石游击队，使这支四面受敌的游击队，在不断地战斗中壮大起来，成

为奉吉铁路沿线各抗日武装的主导力量和模范；同时，把那一地区被日寇镇压下去的抗日救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不久成立了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靖宇同志亲任师长和政委。他深知人民军队是离不开党，离不开群众的。因此，他用最大努力，在奉吉铁路沿线和旧奉天东边道地区整顿发展地方党和群众的抗日救国会、人民代表会的组织。因而人民革命军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赞助，在战斗胜利中扩大为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6年抗联第一、二两军主力在濛江、抚松间会师后建立抗联第一路军，靖宇同志是这个路军的指挥员，魏拯民同志担任东南满省委书记。靖宇同志并不因此减轻对党组织和群众工作的责任。他服从党的集体，尊重魏拯民同志领导，凡是政策性的重大原则问题，军事行动计划，重要的干部提拔使用，他都事先提到党的会议或与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共同商讨决定，从不主观臆断，独行其事。

"七七抗战"爆发前后，到1938年间，第一路军第一、二两军在东南满地区与在东北满地区的抗联各军相呼应，加紧进行着牵制寇军后方的游击战争。东起鸭绿江岸，西迄辽沈，南越"安奉铁路"大小数十战，攻克了抚松、辉南、金川及其它较小的市镇十数处，歼灭日寇近两万人、伪军五千人，使日寇关东军遭受严重打击。参加一路军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数度跨过鸭绿江，袭入北朝鲜临津、甲山地区，扩大了游击区，造成日寇关东军在南满地区的严重形势，不能不从日本本土及我国北方战线抽调兵力回援"后方"。这一场艰巨斗争所获得的辉煌成绩，固然首先是由于南满党的正确领导，群众运动的高涨，抗联将士的英勇顽强战斗造成的；但与靖宇同志远谋深

算，果敢刚毅的卓越的指挥天才，也是紧相联系的。

1939年至1940年初“东南满省委”根据党全国处于“持久抗战”的精神，作了决议，编了抗联第一路军，重新划分游击区，以长白山林区作根据地，准备更长时期的坚持苦斗。靖宇同志指挥着分散活动，在通化地区及鸭绿江右岸的各部队，不断地进行胜利的战斗，但是敌人也不断地厚集绝对的优势兵力，进行长期的分区封锁包围，企图压倒抗联各部队。斗争形势越来越险恶。敌人的打算，不但要消灭抗联各部队，根绝南满游击战争，而且要用尽一切方法，迫靖宇同志于绝境，达到最后生获，以遂其卑鄙恶毒的目的。靖宇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做了抉择：到了最后不可避免的关头，宁肯战死，不望幸存。

他终于被敌人重重包围。在那狂风怒吼、大雪满天的濛江林区里，他已处于饥寒逼人、精疲力尽、伤病交作之时，依然奋力死战，最后慷慨捐躯沙场。

残暴的日寇，解剖了靖宇同志的身躯，割去了靖宇同志的头颅，向日本天皇遥拜，“献俘新京”，额手称庆，以为从此东北游击战争根绝了。但是就在靖宇同志就义后的1940年1941年间，东北抗日联军游击战争依然在东北满广大地区持续着。由南满地区保留下来的游击部队，成为1942年——1945年东北抗联合并组织有力的组成部分，参加了1945年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八一五”光复东北的大战。屈膝投降受历史审判的是日本侵略者，胜利的是坚持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东北人民的子弟兵抗日联军。

靖宇同志虽然英年早逝，但在他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斗争生活的十六年过程中，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人，真正共产党员高贵的品质。他爱护党，在党内经常致力有原则性的团结一致，

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来约束自己，来影响和教育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他爱护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因此南满广大地区的群众，敬仰他，爱护他，用各种方法在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支持第一路军。靖宇同志对部队干部和战士，爱护周到、热情。平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常亲自进行教育；就是在战斗中工作中，也尽可能对几乎每个战斗员每个工作人员作必要的照顾。他对部队的纪律要求是严格的，而在生活上和战士同苦共甘，打成一片，因此部队的干部和战士，敬他为师长，爱他如父兄。执行指示和命令，虽赴汤蹈火也不辞。靖宇同志是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好榜样，他不仅在第一路军巩固地团结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朝鲜人民革命组织——祖国光复会，为着共同的目标，坚持反对日寇；并且还团结了“白俄”义士和日本革命者参加了第一路军，英勇战斗，流下了他们的鲜血。当1938年——1939年间，日寇两次挑起苏蒙边疆冲突时，靖宇同志号召全军战士，把东北游击运动与反对日本进攻苏联的行动结合起来，加紧打击敌人后方。

松花江源，鸭绿江岸，辽沈以东，洒遍了东北人民英雄战士的鲜血。这一高尚的代价，不是白白付出的，它换回来祖国山河的光复，劳动人民的解放。今天在长白山脉肥沃的大地上，到处放射出新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芒。所有的人们怀念着靖宇同志，怀念着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无数英雄战士。他们崇敬烈士们的奋斗榜样，将鼓起更大的劲头，争取祖国建设事业，出现更大的辉煌灿烂的成就。

靖宇同志的英雄事迹，先烈们的好典范，有如苍松翠柏，四季常青，永不凋谢地矗立在地平线上。

回忆陈翰章同志

一九三一年十月，旧东北军吉林王绍南旅之第七团第三营① 在延吉起义，建立救国军，人数达数万人，分兵攻敦化日寇。占敦化北山，歼敌数百，攻入城。后不久敌援兵至，救国军撤出。时已翌年初一。

先是，陈翰章同志自"九一八"事变之日，即在敦化组成反日会，在教师、青年学生、市民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动。救国军建立之后攻打敦化，翰章同志组织群众支援救国军攻敦化。救国军撤离敦化北山时，他毅然参加救国军，在前方司令② 吴义成的司令部担任秘书。救国军领袖之一的吴义成，号吴傻子，不识字，大老粗，山东阳谷人。远在一九一〇年前后，为吉林著名土匪王德林的"炮头"（前锋），后随王一起被招安，编入旧吉林军。从救国军起，王德林为总司令，吴任前方司令，所有前方救国军，吴有调动权，作战指挥权。吴为农民出身，但极狡猾剽悍，地主、军阀观念强烈。翰章同志年青俊秀，能写文章，沉默寡言，但遇事决断、果敢，颇为吴所

---

① 周保中同志此处所叙述的"老三营"起义，在部队的番号上有出入，应该是："第十三旅（旅长吉兴）第七团（团长王绍南）第三营，这是老的番号，后来的全国统一番号为"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此处显然是记忆上有误。

② 当时的正式称呼为吉林救国军前敌总司令。

赏识，吴器重之。

一九三二年夏初，我到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初任参议，实际上迅速掌握了参谋长作战指挥权，并就在救国军中，与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同志胡泽民（参谋长）①、王松柏等组成了党的秘密特别支部。王润成同志也随我到救国军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宣传队长（处长），在宣传队内形成了党的组织核心。

翰章同志不为吴义成小恩小惠所软化，坚定的站稳抗日救国立场，与当时另一姓杨的（后来参加党，又叛变了）和姓李的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记得介绍陈翰章同志入党的就是王润成同志（现名马英，在舒兰煤矿筹备处工作）。翰章同志加入党后，更为积极，受党的嘱咐，要他保持一般群众的政治面貌。在救国军前方司令部，他要担负繁重的秘书工作，并须保持对吴的照常交往。并且，他也参加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到七月间，前方司令部占领安图县城的群众宣传组织活动和发展党员等工作。以此同时，他还要参加一些同友邻部队的交涉活动，如反对当时辽宁民众自卫军代表团英若愚（参谋长）、王××（政治部主任）的军阀主义，反对他们向救国军争安图、桦甸的地盘。陈翰章同志不仅在宣传写作上是党组织的一个好助手，并且已能很好的执行党组织的政治活动任务。

一九三二年八月，由于党的积极倡议和军事活动，救国军调集了二万左右人，由我任战地总指挥。以安图为根据地，出兵分攻蛟河、敦化、哈尔巴岭骚扰日寇抢修的京图铁路。敦化县曾两次被我军围攻，并占领了县城，给日寇以重创。翰章同志深入战地，积极参加战斗，表现得英勇顽强。同年十月，救

---

① 胡泽民烈士时任救国军前敌参谋长。

国军五万人，转战宁安，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强渡牡丹江作战中，翰章同志也积极参加。

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日寇集中两个以上师团于牡丹江、宁安地区。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内讧闹磨擦，眼看十万人左右的队伍有垮台的趋势。我那时直接掌握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中党的领导，准备“应变”。然而在救国军中，虽有较完整的党组织，但力量不大，自卫军中则更小。当时象陈翰章同志这样的新党员，已成为对日寇斗争和内部保持统一战线，以支撑全局的重要分子之一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自卫军全部瓦解，救国军领袖王德林、孔宪荣等亦率万余人退逃苏联。党稳住了吴义成所辖前方部队，并且以吴任总司令，我任总参谋长，整顿救国军残部二万余人，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当时，将部队分编为五路，并编李延禄为游击军，重新展开吉东广大地区的游击活动。翰章同志此时仍任秘书，实际上参与了重大的军事行动及党内的策略行动，成为我的有力依靠之一。是年二月底，前方司令部转移到安图吉洞河大甸子。四月攻安图，打下大沙河，占领安图县城，并分兵进出桦甸及吉海铁路沿线。翰章同志此时已是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不遗余力地参加了各种战斗及党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初秋，在救国军中，我党与吴义成的统一战线已初步呈现分裂趋势。那时我决定留守安图，指挥吉辽地区军事部署，准备分裂后，形成我党单独领导的军队，由我决定把翰章及其他一些同志留在前方司令吴义成的直属部队里。陈翰章同志则由于取得吴的信任，专留在吴的周围，他的任务是：（1）稳住吴义成，继续坚持抗日，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

（2）留心察看吴本人的变化，若出现动摇投降或逃跑的迹象时，即应作出相应处理，以防将部队带走。一九三三年十月，吴在我东满党和汪清、珲春游击队领导同志的鼓舞下，在绥芬镇（东宁——汪清地界》集中了数千之众，打响了袭击东宁城的战斗。这次战斗不幸失败了。失败后，部队退回绥芬镇。此时救国军内部的分化已经日见明显，一方面是以吴义成为首的救国军中少数有排斥党的领导倾向的领导人物；另一方面是以我救国军中党组织王润成同志、陈翰章同志等及东满游击队党组织为中心的坚持团结抗日的力量；第三方面是柴世荣（当时是救国军第四路军司令）等居中摇摆的势力。内部斗争的结果，因为救国军中有王润成、陈翰章等同志坚持革命路线，柴世荣部队中刘汉兴（陈龙同志）等坚持革命路线，结果使吴义成等少数救国军领导人要想破坏和收缴我东满各县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武器的阴谋宣告失败，这与翰章同志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四年初，吴义成屯兵宁安东部林区，他还以为陈翰章同志不曾参加共产党，是他的心腹可托的人。他派翰章同志去关里，找王德林、孔宪荣，找关里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家，为救国军探听关里要不要打日本的虚实情况，要求关里给予援助。当时我已经从安图转到宁安，驻天桥岭平日坡工农义勇队。这时吉东抗日同盟军已经成立，我担任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兼党委书记，决心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准备和吴义成救国军分立、破裂。

翰章同志遵守党员的守则，向我报告请示，经过党组讨论后，由我指示翰章同志：（1）可以到关里去，借此以掌握救国军从关里到关外来往活动的线索，并参与其活动；（2）到关里去，在宣传上要坚持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

党南京政府卖国投降不抵抗的罪恶，并说明在国民党影响下的东北自卫军、救国军都瓦解了，只有那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与共产党合作的才保存了抗日武装实力，并重新壮大起来；（3）要尽可能在平津一带找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配合行动……。于是，陈翰章同志就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的资格，到了北平、天津一带进行活动。在北平救国会会长朱庆澜召集的东北支援问题座谈会上，陈翰章同志痛切陈说东北抗日救国军武装斗争现状，并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东北以及旧东北军不抵抗的罪恶，指责在关内以支援东北抗日救国军为名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借名募捐，实同讹诈，发国难财的人们，号召以人力物力支援东北艰苦奋斗的义勇军。由于陈翰章同志短期的积极活动，引起当时平津一带抗日救国组织内部各阶层人们的极大注意，使政治上投机分子和发国难财的人们有所警醒或收敛；而真正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者则大大兴奋，为之鼓舞，更加积极。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翰章同志在天津遇到救国军的领袖王德林。王是一个有救国心肠的老好人，一九三三年初经苏联逃回关内，虽然受国民党西南派陈济棠之摆布，但仍然继续抗日反蒋。他从南方转到北方，又受国民党和旧鲁系军阀余孽的包围。那时华北旧军阀官僚在日寇政治特务策动之下，有组织"华东共和国"的阴谋活动，以便为日寇进一步分裂和侵略中国的张本。陈翰章同志向王德林指出，不要被拉进那个圈套。翰章同志并在天津、北平一带的东北同乡青年知识分子中，阐明东北人民武装抗战的重要性和必胜信心，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

翰章同志从王德林手里得到关里捐助东北的大洋八千元。王德林颇有自知之明，他告诉翰章同志，有些自卫军、救国军

的领导人，借东北抗战之名，在关里到处募捐肥己，有的仅以所募捐的百分之几、至多十分之一汇到东北去给自卫军、救国军。而在东北的自卫军、救国军的领导人，其中又有很多接到募款后，反而又把它重新汇回关里落入私囊。这样的坏现象，引起翰章同志的极大不满。因此，他决心不让这八千元抗日募款落入那些利己者的腰包。大概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底，翰章同志回到东北宁安，先到吉林抗日同盟军军委，向我报告了入关三个月的活动经过，并坚决主张把带回来的八千元募款交给军委。当时由我决定接受了这笔款项。问题不在钱多少，而在政治意义方面作用甚大。因为当时在同盟军影响下的救国军残余部队和其他抗日队伍，对关里国民党抗日，对救国军领袖抗日仍然抱着幻想。翰章同志由关里回来后，我们就利用这一行动，在牡丹江、宁安、敦化一带各抗日队伍中召开群众大会，散发募集的款项，近者每人一元，远者慰问，充分揭露关里关外、南京政府、西南派、天津和北平救国会中的国民党右派和其他投机分子，假借抗日发国难财的各种丑行，指出全国人民是抗日的，中国红军是抗日的，关里人民是同情和用实际行动支援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就是要东北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后将击败日寇，收复东北失地，解放东北人民。翰章同志作了很大政治鼓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多动摇的抗日部队群众稳定了，积极性加强了，党的影响扩大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党决定翰章同志脱离救国军吴义成部。在正式脱离吴部之前，为了表明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诚意，党指示要翰章同志回到吴义成司令部，交代去天津、北平经过，以及带回的募款交吉东军委发给就近各部队的情形，恳切的劝

告吴义成坚持抗日，并与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陈翰章同志执行了党的指示。当时吴义成虽衔恨入骨，恨不能吃周保中的肉和杀陈翰章的头，但是迫于正义的压力，有士兵和干部的拥护，不能不强为容忍。翰章同志从此脱离了救国军，被党派到抗日工农义勇队去做政治领导工作。

抗日工农义勇队，是当时同盟军的有力支柱，总队长是李荆朴同志（现任沈阳军区某步校校长）①。他原是宁安县的警察巡长出身，"九一八"后，因反对降日，而被日寇捕去，后来逃出拉起很大数量的反日山林队，报山头"平南洋"。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在东京城、宁安一带，有很大活动力，党派于洪仁同志到这支队伍里去作党的秘密工作，李荆朴接受党的领导，愿改造自己的部队。后来党加强该总队党的干部，又派了张建东、陈翰章、王光宇、陈明雅（陶净非）等十几名有力干部去该队进行改造教育。在长期对敌和对内部斗争中，这个部队已经到了改造成功的程度。但是，由于李荆朴同志当时还迷信个人影响，不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不开除混到党内来的第六队队长。结果第六队队长勾结早已被驱逐出队的另一队长——日本内奸戴海亭进行秘密活动。一九三四年八月，工农义勇总队全体党员团员开会的时候，为反革命暴动所袭击，当场打死了党委书记于洪仁同志，李荆朴、陈翰章、王光宇等以下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被解除武装。这次反革命暴动只是数百人里的十几个凶手，所以当时李荆朴、陈翰章等同志被放走，回到吉东军委，又重新武装起来，积极打击敌人，创造新的吉东游击队。新的游击队的创立，和后来的壮大，主要是

---

① 这是周保中同志撰文当时李荆朴同志的职务。

由于陈翰章同志及其他党团员、革命老战士的努力战斗，孜孜工作的结果。

一九三五年初，编抗日联军第五军。陈翰章同志任第二师参谋长（兼党委书记）。一九三五年底党派他担任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副师长侯国忠同志（后战死），政治委员王润成同志。一九三六年该师改为二军五师，翰章同志仍任师长（兼党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五月南满辑安会议，将第一路军第一、二军合并整编，翰章同志改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直到一九四〇年作战牺牲。

一九三五年初秋，陈翰章同志的父亲和妻子为敦化日寇拘捕，并强迫敦化士绅连坐，强迫其父把他找回来，投降伪满有重赏重用，否则杀其父，连坐保人。陈父迫于淫威，带着陈妻辗转到宁安陡沟子（图佳线）附近见到陈翰章同志诉说来意。陈翰章同志在家是有名的独生孝子。“九一八”事变以前对父亲百依百顺。但这次见到父亲，态度非常坚定，不顾一切，坚决拒绝日寇的阴谋诡计。他安慰了父亲，并告诉妻子回家后即改嫁他人。陈翰章同志就是这样以“义无反顾”的坚决态度遣走了父亲和妻子。自此以后，他与家庭完全断绝关系，从不闻问。

一九三六年间，日寇不断向抗日联军发动政治攻势，想从思想上瓦解抗日联军。他们派出各种人物，散布各种流言，并利用日本社会党政治浪人雄谷进行“微妙”活动。驻宁安日寇宪兵在浪人雄谷的配合活动下，在廖家船口找到了老廖头（地主、两面派）。这个日寇的忠实走狗向我军散布空气，说日本要人要见抗日联军领导人有重要谈话。那时陈翰章、侯国忠同志的部队正在宁安东南活动。翰章同志得到日人要求见面的消

息，报告到五军军部。那时我决定，派翰章同志去接见，并指示注意事项。陈翰章同志布置了警戒，在唐头沟东山接见日人雄谷（自称雄谷太郎）雄谷一见陈翰章同志，甚为客气，并致敬意。谈话一深入，他就露出日本社会民主党改良派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套“理论”，并向陈翰章同志提出：（1）抗日联军力量不能胜任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徒然破坏社会物质基础；（2）在满洲应借日军帮助，建设新社会，改变旧面貌才是进步；（3）积极与日军合作，建设满洲国，其发展前途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这与共产党的目的是殊途同归的；（4）如果抗日联军不愿与日军积极合作，那就退出吉林、哈尔滨以东地区，把力量转移到三江省（佳木斯、牡丹江两岸）地区，在那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雄谷的这一切胡说，引起陈翰章同志的大笑。他义正辞严地指斥日寇侵略中国、侵占东北的暴行，揭露日本统治阶级的危机与日本社会的不稳，自谋自救不遑，岂有为中华民族求发展谋进步之可能！翰章同志声色俱厉地警告日本政治浪人：“勿为日本军国主义作鹰犬，下次来杀勿赦，这次宽恕你带着脑袋回去，传话给日本军阀，抗日必胜，胜利的将是中国人民，失败的将是日本军阀。”雄谷饱受谴责之后，唯唯诺诺，抱头鼠窜而去。这次谈话再次证明了当时日寇对抗日联军的全部战略意图是：“由南而北，由西而东，将抗联主力诱至三江省地区聚而歼之”。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翰章同志的部队，在敦化南牛心顶子设伏，袭击安图支援讨伐的日寇军一个中队及伪满走狗队百余人，大获全胜。此役打死日寇军官六人，打死日兵七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日军几乎全被消灭。伪满走狗队“作壁上

观”，不敢加入作战即逃归敦化。在打死的日本军官中，有一人是日寇敦化县副县长。当时伪军向民众散布谣言，说陈翰章同志用假投降诱捕日寇，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在党所领导的抗联各部队中，在对敌斗争中，什么革命斗争艺术都可以采取，唯独不许可用假投降的手段。陈翰章同志是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和遵守纪律的好干部，他绝不会采取所谓假投降的办法。

翰章同志从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年间，身经百战，既英勇顽强，又机敏灵活，很有军事天才。他不但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钻研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历史掌故、文艺创作，也都有所长，对于革命游击战争理论、战略战术问题都有研究，并能结合实践运用得当。他写了许多党的理论学习、宣传文件和教育材料，个人日记写的也不少，可惜这些材料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翰章同志生活简朴，勤奋，平常寡于言笑，态度严肃。但遇有重要的政治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谈起来津津有味，滔滔不绝。为争持真理，甚至激昂慷慨毫不迁就与退让。他既谦恭好学，勤问师友，又能亲切耐心地教导自己部下的同志。一九三四年间，他为研究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曾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一九三九年初研究《论持久战》，为之废寝忘餐，对其他历年党的重要文献和指示的研究亦莫不如此。

翰章同志与士兵同甘苦，经常关心战士生活，他的身体并不伟岸硕大，但却精悍结实。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战士不吃，他不先吃，战士不换军衣，他不先换。在地冻天寒、风雪交加的露营生活中，他除了做自己领导上必须做的工作以外，还经常参加战士们采伐柴草，架搭火堆，煮饭融化雪水等项活动。一有工夫，他就在战士中进行文化教育。广大农村抗日救国男女会员

以及广大农民对翰章同志是很爱戴的。因为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他本人又善于联系群众，农民都把他看作是自家人。他对部队中的女同志特别尊重和照顾，在她们面前从来不苟言笑，男女间关系严格。同志们赞佩他，也取笑他是“圣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曾和女战士张爱莲结婚的事情，那是不确切的。

翰章同志一九三九年间，应该收集力量，逐渐东移，以便在必要时集中到苏联去，但由于当时总指挥杨清同志正处于敌人严重进攻压迫之下，再则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同志（兼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在安图、桦甸地区也正处于困境，又常常患病，因而翰章同志的部队就不能不加重负担，无论如何必须在蛟河、敦化、额穆、舒兰等地坚持游击活动，同时支援在舒兰五岭一带的第五军陶净浙和曲玉山两个同志的部队。这是陈翰章同志照顾大局，牵制敌人，不断加强打击敌人，誓死不离那一地区的基本原因。

陈翰章同志在救国军中，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对于我党创建人民游击队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军二师有过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年抗日游击战争高潮中，给予日寇兵员上的损失和日寇国防建设上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困难时期，他坚持在辽吉地区和京图铁路进行游击活动。日寇在蛟河、敦化、宁安、牡丹江地区的损失也是严重的。这对于活动在伪三江省北部地区的抗联起着支持作用，也掩护了南满抗联部队一九四〇年冬的东移。

陈翰章同志除在救国军参加作战以外，他和他所领导的部队，在抗日游击战中所取得的战绩是数不尽的。从一九三四至

一九四〇年，他直接率领的部队，北起林口、勃利，经过牡丹江、宁安，西南到敦化、安图、桦甸等广大地区，都和日伪军不断战斗过，多数是主动进攻、袭击或伏击。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四年秋，宁安三道河子、团山子、卢家屯各次战斗；一九三五年敦化东的官地镇、额穆黑石镇，南湖头小沙滩等战斗；一九三六年夏袭击林口龙爪沟、庙岭、前刁翎、三道通；八月袭击中东铁路待马沟车站日寇的东运兵车……这些著名战斗，打死日军不少，缴获战利品甚多。这些战斗有的是与第五军部队配合行动，有的是陈翰章和侯国忠两同志的二军二师部队单独作战。只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宁安西南东京城西的莲花泡战役是失败的。但那次战役的指挥不是陈翰章同志，而是由其他同志的错误造成的。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北起宁安东京城，南到桦甸、安图，并且越过牡丹岭、老爷岭直达舒兰地区，东到哈尔巴岭延边的这一广大地区，陈翰章同志和他的二军部队神出鬼没，不断袭击、攻打、伏击，骚扰敌人，使日寇应付不暇，不仅在兵源上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京图、图佳两条铁路经常受到破坏，有时完全断绝了运输。在敦化、宁安地区日寇许多永久性的军事建筑设施被迫停止，其中最显著的是镜泊湖发电站，被迫停工达三年之久。“镜波学园”军事大兵营的建设被迫完全放弃了。

一九四〇年陈翰章同志壮烈牺牲，那时噩耗传来，抗联战士无不悲痛万分。如今事隔已二十余年，翰章同志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特此撰文以表怀念之情。

永不褪色的红旗

——人民英雄车老四殉难纪实

“九一八”事变已经三十年了，在整个抗日救国斗争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获得了胜利。无数的优秀儿女，人民英雄，为争取最后胜利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车老四就是这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之一。

吉林省宁安县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基本游击区和根据地。在东京城（五区），这广袤百余里的农村中散居着七千多户人家，青年几乎百分之八十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被日寇视为“赤匪区”。

车老四家住在上马兰河西沟，他家是贫农。父亲车双义，四十多岁，但显得苍老，为人正直，性格刚毅，热爱家乡。“九一八”事变后，他告诉二儿车兴、三儿车旺说：“你们参军上队去吧，拿杆枪，多打死几个鬼子，这不只是为老百姓出口气，而是要为赶走日本救中国尽义务……留着老四在我身边，好替抗联多做些支援工作。”从此，两兄弟参加了抗联第五军，成为抗联部队中优秀战士，立了许多次战功。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北湖头袭击日寇战斗中，车兴战死。他父亲接着亡故。国仇家恨，使车老四更加坚强起来了。一次宁安县委派车

老四到五军军部送信，军领导同志接见了他。这时的车老四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了，浓眉大眼，身躯健壮。经过问话，军领导同志了解他是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有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非常喜欢他，把他留在军队教导团，指定专人负责教他政治常识、射击投弹以及地下工作活动的技术训练。经过一个月以后，派他回到了地方组织。他做了不少出色的地下交通联络、运输、侦察工作，成为东京城“抗日救国会”的青年领导骨干之一。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严冬的残酷游击战争刚刚过去，是敌我斗争的间歇时期，抗联游击部队正积极准备展开新的战斗活动，首先需要从地方上获得粮食补充。五区的“抗日救国会”也在积极动员群众加紧运输。

一天夜里，马兰河西沟“抗日救国会”会长张成寻找车老四，让他负责带队给抗日联军送粮食。车老四欣然同意了。

粮食运输队共三十二个人，九十五匹马。半夜两点钟，车老四带着人马出发了。

他们机智巧妙地越过图佳铁路的敌人封锁线，向卧龙河南方老松岭方向走去。第二天正午到达平岗，向抗联二、五军后方管理处交了粮食。抗联的同志招待他们休息，并召开了欢迎晚会。第三天下午东北风骤起，雨雪交加。车老四带着空载的人马往回走，刚出林子边，突然发现日寇“讨伐队”二百多人，距离不过六、七百米。先头的寇兵一面叫喊“站住！”一面散开包围前进。车老四心里明白，如果跟大家一齐逃跑，总有些人逃不脱，会被逮住的，抗联平岗后方的粮仓可能会暴露，送粮的村屯也要暴露，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他立刻吩咐各组长带着所有

的人和马迅速返回林子里，大距离地散开隐蔽，不要暴露出踪迹，连夜向西南方逃走，各自直接奔回家。之后，车老四一个人牵着自己的两匹马，迎着敌人慢腾腾地走去。寇兵果然被他的行动吸引住了，蹒跚地闯上来包围他。一个寇军队长用指挥刀背劈了车老四两下，问道："共匪的通通的有？你的什么的干活？"

车老四沉着冷静地说："通通有、通通有，他们在林子等候皇军的有，我是来回话的有。"

寇兵抢过车老四的马匹，用绳子绑了他的两臂，牵着他向林子走去。到林子里一到，空无人影。寇军队长大发雷霆，狠狠地打了车老四一顿。一旁的翻译追问："这么多的人和马明明是为匪送粮入山的，到底往那里去了？是你有意欺骗皇军，把他们放跑的嘛？！"

车老四镇静地答道："大概是他们趁我来见你们的机会跑了的。"

寇军队长愤愤地暴跳起来，挥舞指挥刀连劈带打，车老四立刻变成血人。但他始终硬挺着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住地，不肯说出给抗联送粮的实情，一口咬定他是一个到处为家的中国人，这样更激怒了日寇队长，跺脚疯狂嚎叫。

寇军追问不出结果，怕深夜受抗联游击队袭击，仓猝地往回走了。经过两天之后，车老四被押解到东京城街里，寇军宪兵队进行严刑审讯，车老四遍体鳞伤，对日寇坚持斗争，始终不说一句话。最后日寇把几个特务走狗叫来，对着面目模糊的车老四脸上细细辨认。其中一个姓梁的走狗大声叫出："这不是马兰河西沟的车老四么！"

在民族败类面前，是难以隐瞒真面目了。车老四睁大了眼

睛，愤怒地骂道："汉奸！走狗！日本鬼子迟早要被中国人民消灭的，你们这些卖国贼，将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东京城街里的日本守备队，这些日子正在阴谋计划，到处搜查民间抗日线索，寻找借口，准备对五区全体农民实施"赤区肃正"的大屠杀；对于车老四的案子十分注意，希望从车老四身上，获得口供。认为非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不可，立刻松开被绑着的车老四，扶他到炕上躺卧着，嘱咐其走狗们好好的"照应"，不得怠慢。

一连五、六天，车老四被"优待"起来了。每顿饭有人送，医生给治疗伤口；特务们轮流和他闲谈，"安慰"他，"劝解"他，要他照实把全部实情招供出来。然而，车老四始终坚不吐实。

从车老四被捕送到东京城那天起，上马兰河、中马兰河、西沟一带各村屯，表面上虽然平静无事，可是农民们都悬心吊胆，深怕车老四抗不住刑法的折磨，说出实话来，那么整个五区就将大祸临头。区"抗日救国会"会长不断派人到东京城街里打听审讯情况，并希望能营救车老四。但是日寇封锁消息很严，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因此，村民们十分焦急，暗地里捏着一把汗。

车老四被日寇宪兵"优待"的地方是街西头一个土院套，院套的围墙不高，正房是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这是没有居民住的空院子。车老四被安置在正屋东头，前后窗户都被堵死。有三、四个特务住在房西头，每天夜晚有二人轮流住在车老四的屋里，坐卧不离地监视他，一盏半明半暗的灯通宵放在小炕桌上。每到天黑就有四名日寇来到东厢房住下，担任夜间巡逻。

以往，车老四常来东京城街里进行交通联络和搜集情报活动，对这里的大街小巷及周围的设防是熟悉的。他下定决心要逃走，装出伤势很重，体力不支的样子来麻痹特务们，暗地里对着院内敌人设防和活动情况留心观察。

有一天，半夜刚过，车老四突然听见屋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接着刮起大风，车老四见对面炕上躺着的那两个特务都已沉睡，还交替地发出鼾声。他故意弄出动静来试探，悄悄起来把灯吹息。两个特务象死狗般依然熟睡。车老四侧耳再向屋外细听，雨声很大，风也刮的很急，却没有听到日寇巡逻兵的脚步声。逃跑的机会到了。他轻轻地走到对面炕角，把两个特务的胶皮鞋抓到手中，一双穿在自己的脚上，一双紧扎在腰里，偷偷地开了房门，进到外屋，站在灶台上用力撬开后窗户，轻轻一跃，跳出窗外，迅速地走了十多步，到后院墙角下，又返身一跃，两手掌紧紧地反贴到墙头上，一个鸽子翻身，上了墙头，转身跳到墙外，顺着熟悉的小胡同，往街西舞风楼方向飞也似地跑去。他越过防护壕沟，上了通往长岭的大道，拚命的奔跑。

他跑了十多里路，感到筋疲力竭，全身发酸，便在春柳依稀，土堆起伏的小沟边坐下休息。突然听到马声嘶吼，人声嘈杂，距他二、三百步的大道上，日寇的骑兵急驰而来。为躲避日寇的追捕，他趴在地上隐蔽起来，日寇从雨后泥泞的路上辨认出他的踪迹，向他隐藏的地方搜索。

他已经暴露在敌人眼前了。

不等敌人接近，他起来拔腿飞跑。敌人在他身后追赶着，开枪射击。他的右腿连中数枪，倒在地上再也不能动了。敌人围拢过来，生擒了他。然后将他捆在一辆马车上，由两名日本兵、四个警察押解着。他们得意洋洋，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往回

走。

车老四再一次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东京城和五区，人们更加仇恨敌人，牵挂着英雄，难以避免的危险和忧郁气氛绞着人们的心，都沉痛的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敌人就要下毒手了。车老四被捕的第二天，上自图佳铁路的鹿道车站，下至东京城附近的大小荒地一侧，沿铁路线的居民，男女老幼两千多人，被大批日寇宪兵和伪警察驱逼着，聚集到上马兰河西沟沟口的空地上，围成一个圆圈。西沟屯的农民二百多人被日寇威逼，拳打脚踢，强迫跪在人圈的前面。午前十一时左右，车老四被绑在三匹马拉的大车上，押解到西沟沟口，后面跟着日寇步骑兵各百余名。守备队长小林少佐，杀气腾腾，冲进人群中央，将绑着的车老四从车上解下来摔到地上。

长着一副凶恶面孔的小林少佐，拔出指挥刀，瞪着两只豺狼般的眼睛，抬起腿用力向车老四头顶上狠狠地踩去。踩累了，又用皮鞭抽打，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狂叫："今天最后说实话的有，说实话的，皇军通通地放了你们，好好做大满洲国的臣民，实现大东亚共荣，日满协和，友好……"

车老四猛地爬起来，破口大骂："住嘴！什么日满协和、友好？杀中国人，占中国地方，抢夺中国的财富，这叫友好吗？东北是中国人民的，小林你休想夺走！"骂声不绝。

聚集的人群都屏住了呼吸，敬仰着英雄，几千双眼睛迸发着愤怒的火光。小林少佐被骂得嗷嗷乱叫，他挥舞着手中的皮鞭，发泄着野蛮的兽性，鞭抽、脚踢……车老四还是不住地骂。小林少佐打红了眼，随手拿起战刀，喀嚓一声，割下老四身上的一块肉，血淋淋地拿着，威逼他："你说实话的有，运

粮的有，送到哪边的去？”面对豺狼的屠刀，铮铮铁骨的车老四，声如铜钟，边骂边回答：“送粮的，就我一个人！”小林气急败坏，向鬼子兵一挥手，两条凶猛的军犬牵来了，向小林摇着尾巴，等待主人的命令。小林奸笑地说：“不说实话的，死了死了的！”

车老四轻蔑地斜了小林一眼，毫不惧怕。

小林少佐看车老四坦然自若的样子，气得更加咬牙切齿，喊着两条军犬的名子，向车老四腹部一指，军犬立即扑上去，撕裂了车老四的肚子，顿时血肉模糊，地上殷红一片。小林向两条畜生命令地又喊了声什么，它们立刻驯服地停止撕咬。小林上前一步，冲着车老四，一句一顿地说：“现在 的， 实 话说，活命的有。”向翻译一摆手。这个两条腿的“狗”，蹲到车老四跟前“劝说”：“少佐的意思是：你现在把送粮实情说出来，还不晚，狼狗咬的伤，皇军一定能给治疗好。”

车老四怒目而视，向这个无耻之徒啐去。小林看到这种情形，沉思片刻，感到面对这样的中国人，已黔驴技穷，再无计可施了，遂命令两条军犬再扑向车老四，咬裂了前胸，掏出了肠子。车老四的骂声越来越微弱下去了，直到停止了呼吸。

安息吧，杰出的民族英雄！你的鲜血没有白流，浇灌了灿烂的革命之花；你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间，与日月共存；你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人们昂首奋进！

一九六一年于北京

……梦……

强盗，日本帝国主义者——财阀，地主，贵族，军阀——寄生虫，他们驱使下的异域的送死者日本兵，寇贼大队依据着南区农村的中心芦家屯。

密林里积雪尚未融解尽净，溜滑的荒道，我们的战士足迹所踏成的小道，接通山道，行军总是拖泥带水。

然而，目光为森林障蔽，顶远看不清百米以外的景物，行着总比住着强。

镇日，接收不愿意听的报告，愿意的和时刻希望的消息，却成“沉鱼落雁，横受阻碍，隔膜。”

无论外部有任何天大地大的变动，无论从军部和干部同志们所决定的一切工作，一切计划，总是为着吃的问题弄得七零八落。

呵！移动，出发向着农村去，离开这水火牢似的老爷岭密营。

寇贼日兵在芦家屯，走狗队警备骑兵三十二团最可恨，今天就出扰，明天屯防，二区南边村落还未到着。

上山，大休息，天气好，阳光和暖，不高不矮的小阔叶树前后围绕着。我们的瞭望哨远眺，可以看见敌兵的行动，敌人却不易发现我们的踪影。

好些日不曾安眠，盖上蔚蓝的天幕，挂起久恒不动的暖

炉，好在是北地春深洁净的草路。

睡呀，神经总是围绕着：日帝帝国主义强盗，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睡呀！脑筋里并不迫切的，有时也许是很平淡的，稀薄的，忆念到经常忆念的人们。

睡呀！很美的翻来翻去的睡，翻身并不是睡的不舒服，正是迎就暖炉的太阳的光，浑身晒遍。

真是舒服，真是妙不可言！

什么长春大楼，用不着铁丝床上睡呀！足足的睡了四个钟头。

醒来的时候，农村中半秘密造作的饭，好几里路程，四五个农民，挑着绕过好几架山，找到了我们大休息地点。

如果不是肚子饥饿，如果不是农民很辛苦蒸就的黄金色的椭圆形的薯黍大饼，还有很久不曾尝试的豆芽汤和可吃的酱，那末，情愿睡，情愿睡很长很长时间。

快吃呀，同志们！吃饱了好向另一目的地移动。

可是，我却慢慢地吃着，回想刚才睡梦的一幕一幕的影片似戏剧似的梦景……

呵！看前推后拥的黑海浪潮，好象要洗荡历史的一切污痕。你快把晒的浴衣收拾起，我们快走吧！

不，我们移到用手一指，那尖削可爱的石壁和排列着行树绿荫下。

——我们到那儿去吃完葡萄，让你把昨晚因跳舞唱歌而打断了的话说清楚，应得出很必要的结论——究竟我们应该规定一种……

走吧！

哗啦啦，崖崩，树倒，拥抱着惊惧，浑身发汗。

呵！这不是梦么？

呵！太阳光真听受我的要求，使我浑身晒的汗流。

伸伸腿，用布巾把脸盖上，朦胧又入“黑憩乡”了。

不言语，微笑，远远地站着忽然又愁眉深锁，就好象嫌怨着我的不果敢。

嗔笑着说：“成天家，大胆豪放，为什么假装斯文，临阵退缩？人生的时光几何？你怕的谁个？”哈哈——又笑了。

我真难过，我无话可说。

突然到另一处所，队伍好几个连散开卧倒，在一个极纵长很高的山上，相对着的高山棱线发现敌人，有埋伏兵的模样，我大声喊叫：“史同志，赶快带着队前进，防着敌人侧射呀！”话未说完，对山上的日本寇兵目标显露，轻重机枪，向我们阵线猛烈射击。敌人居高临下，我方仰蒙弹雨。

战死的，多于负伤的，状况极其悲惨与不利。

我的左右两臂贯穿十数敌弹，两臂已经不能动弹。

噫，敌弹中伤遍体，为什么还不死呢？一面退却跑着，自已这样想。

啊哟，痛极了，两臂。

哈哈，睡的时候太多了，原来是侧身的臂被压麻木了……

然而，为什么做这样的梦呢？莲花泡战役的惨败印象太深了！侠妹和她，精神多少役使了我。时光易过，既然这样，就这样，哪能有这么许多，那么许多？！

陈同志，

集合队伍走吧，

今晚经头道沟晚餐后，

夜行军向马厂前进！

1936.4.16夜，马厂东南宿营中

偶　　感

人生哪能就这么？
就这么你可又奈何。
年华好景象风卷残云般的度过！
这可奈何！？
这又怎么！？
人生真是神秘么？
神秘是人生的做作。
活动呵！
事物的影儿受时光层层不断的翻印着，
远的河海汹涛，
近的山岳嵯峨，
纵横往复跋涉征战过。
前进呵！
前进呵！
步步紧跟上去，
把这一切景物，
把这一切时光，
吻合，
消磨，
为伟大的民族解放，

为先进阶级革命，

经得住九天九地的坎坷。

1936.8.28，绍黄写于林口军次

怀　想

少年时的好梦多多，
少年时的幻想和希望是无穷呵！
好的不愿就便消受，
美的留待后日，
恐怕暴殄太早，
恐怕薪丧夭伤将来无穷的美妙。
鼓舞，
淬砺，
总觉得一生的时光无限的长着，
谁知时光是一支善飞的妖魔，
一秒钟一秒钟从身旁掠过，
俏丽的姑娘倏忽成了蹩脚老婆婆。
花开花谢，
风起云落，
景物色象不断的递嬗化蜕，
连尘埃也不会在那里丝毫固著。
你虽然知道很多，
会说又会做，
毕竟与你少年的甜蜜的梦不符合，
哪里再去寻找少年时美妙的天真的线索啊！？

一切只是我违反了别个人，
一切只是人们违反了我。
尽人是这样在时代和历史的舞台蠕动和悲啸着，
谁又能够纯独地跳跃摆脱？
只有在历史与社会天翻地覆的改造过以后，
到那时的时光和想象也许能够，肯定能够，
希望人类的真正解脱……

1936年8月

夜　　战

（记古城镇北沟日寇守备阵地袭击）

紧急传令，四方八面步骑兵奔来会合，
狂飙乍起，乌云遮盖了天上星河。
大地漆黑，寇贼入穴，狗兵进窝，
有光景消灭敌人真难。
喏，时机不可放过，何况士气高昂难驳回。
出机智，轻巧动作，
手挽手，脚顶脚，
结成条条锁链，千难万难地往前摸，
迫近寇巢狗窝，深沟高垒被突破；
几阵阵雨张网罗，纵然倭贼逞顽强，
一个个小鬼见阎王，好象扑火灯蛾。
这一场猛勇奇袭的经过，
唱起来是一支胜利凯歌。

1936年9月3日于林口西军次

纪念李海峰等十二烈士

兰棒山顶云雾垂，
宝石河道雪花飞。
寇贼凶焰犹未尽，
十二壮士陷重围。
神枪纵横扫射处，
倭奴蒙狗血肉堆。
竟日鏖战惊天地，
胆壮气豪动鬼神。

1938.12.4

誓将倭寇抛海洋

五军1939年4月25日突围后编的小调）

伪三江来伪三江，
日本小鬼太猖狂，
多年苦心织渔网，
想把抗联一扫光。
抗联英雄如猛虎，
日本鬼子反遭殃，
铜墙铁壁被冲破，
誓将倭寇抛海洋。

挽　　歌

（牡丹江西岸葫芦崴子半拉窝集）

日寇狂猖，
侵我海宇，
狼烟遍地起。
工农兵学商齐奋力，
抗日旗帜高高举。
为伟大祖国光荣，
为民族自由独立，
黄帝子孙好儿女，
哪管饥饿疲乏，断指裂肤，
不顾暴风日烈，雷电雪雨。
捐躯轻鸿毛，荡寇志不渝！
倭奴罪恶须清除，索还血债一笔笔。
同志们！安息，
踏着你们洒下的血迹，
誓将民族解放进行到底！
前面就是胜利！
前面就是胜利！
那是你们光辉伟大不褪色的业迹！

1939年3月20日

凯　旋　歌（歌词）

炮声隆隆，同志们齐奋勇，抖擞精神勇敢前进，拚命作斗争。进兮进兮抗日联军锐气贯长虹，不收失地，不灭日寇宁死不目不瞑。

枪声堂堂，个个精神壮，冲向敌人杀得敌人魂飞胆又丧。进兮进兮长驱直入，直捣阴山旁，不除倭奴不得胜利誓不转回乡。

号声乌乌，好似擂阵鼓，风云变色，杀气冲霄战士为猛虎。进兮进兮手提敌头征衣血涂糊，白山黑水我作主人万岁齐高呼。

金声扬扬，得胜搜战场，凯旋凯旋唱歌跳舞红旗乱飘扬。进兮进兮羊羔美酒欢迎建国忙。人民政府开始建立大家享太平。

民族革命歌（歌词）

中华民族，黄帝子孙，受侵略，受侵略。日本强盗军阀，日本强盗军阀，快打倒，快打倒！

工农商学，团结起来，向前进，向前进。高举革命旗帜，高举革命旗帜，齐奋斗，齐奋斗！

中韩内蒙，弱小民族，快协手，快协手，向着日贼冲锋，向着日贼冲锋，争自由，争自由。

你 是 哨 兵

（1942年）

你是哨兵，你是保证战斗准备的人，
你就应该圆睁巨眼，监视着敌情；
保护着兄弟们底战斗的生命。
——稳固地站在自己底岗位上，
不许敌人轻易接近；
时刻警戒着敌人来偷我们的阵营。

哨兵要有坚强的毅力，要有高度的警觉性。
遵守则，服从命令。
聚精会神，视听要锐敏。
枪挽紧，拚生命，
完成任务，尽到责任。

记着吧！
十一年光荣斗争的中国健儿，
黑水白山间底抗日男女游击战士们：
我们有些部队遭受过惨败、流血、牺牲；
曾经是哨兵在岗位睡觉，或者松懈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经验足够教训了自己，

何况又看过了好几回英雄查巴也夫的电影。

的确，日本强盗军阀的丧钟是越敲越响了，
它底覆灭不远了，
然而，你知道么？苏日中立条约下掩盖
着日寇的面目狰狞。
大家应该紧防着它；
防备着它，它会象希特勒匪帮突然侵犯劳
动者祖国底边境；
日寇的伞兵虽然不多，但也能够随地降临，
随地降临。

哨兵！应该稳固忠诚的站在祖国的岗位上，
不论吹风、下雨，昼夜阴晴。
谁要站岗睡觉，
谁就是帮助敌人，
是祖国防卫底破坏者，
是对革命事业底罪行，
我们要反对站岗睡觉，
向他明白解释，向他坚持斗争！

备 忘 录

为东北民主联军起草的“备忘录”（三则）

（1945年）

组织备忘录

要遵守系统规定，　要保持密切连络，
要到处学习进步，　要利用一切经验，
要考虑周到，　要有正确决心，
要行动紧张，　要敢作敢为，
要靠近群众，　要尊重人才，
要重同志互助，　要与友党合作，
要有坚定主张，　要有手段方法，
要团结内部，　要纪律森严，
要熟知事物，　要到处检点，
要正常工作，　要准备应变。

政治备忘录

中国人民艰苦抗战，　民族解放胜利来临，
苏联红军吊民伐罪，　东北河山复见光明，

共产党员坚贞稳定，　对我中华祖国竭诚，
统一建国党派不分，　是非曲直但求其实，
勿忘爱护人民同胞，　处处力求廉洁公正，
耻与国贼专暴为伍，　占地位只尊重人民，
争取全民民主自由，　极力避免阋墙内争。

同胞久苦水深火热，　合求公平合理民生，
国家完全独立自由，　主张民族一律平等，
赞助国际和平友好，　首先巩固中苏联盟，
过去孤军长期奋斗，　而今还须继续求进，
海亦可枯石亦可烂，　志趣宗旨绝勿变更。

行为备忘录

小心酒肉钱财引诱你，
小心美丽女色沉迷你，
小心甜言蜜语欺骗你，
小心华衣丽屋拘住你，
小心日寇遗毒沾染你，
小心走狗叛徒暗算你，
小心法西斯式杀害你，
小心偷安懒惰杀害你。

给北京市八十五中初二少先队员

（1958年5月底在北京）

每天都出现惊人的成就，
这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跃前进，
你们准备庆祝党三十七周年的生日，
表达你们炽热和愉快的心情。
讲给你们两个青少年历史奇迹，
答谢你们邀我参加集会的盛意。

（一）

在我的革命战斗的第二故乡，
长白山脉成千里地向各方奔放，
一条清澈透底由南往北湾曲的江水，
美丽的名字叫牡丹江，
在各民族兄弟共同生活广袤的地面上，
日本法西斯侵略带来无穷的灾殃。
抗日游击运动在这地区普遍掀起，
无数的革命人民鲜血抛洒各地；
也埋葬了野兽日寇成千上万臭尸体。

（二）

在牡丹江中流的西岸，

耸立着一带赤色的山岗，人们把它叫做红土墙；
这里是革命小英雄姜墨林的家乡。
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十一岁才刚满，
就参加了半地下的共产主义儿童团。
眉毛粗黑眼眶大，
面黄肌瘦个儿不肯长。
手粗惯上树，腿短好爬山，
聪明伶俐胆特大，性情刚直带顽强。
地下党委爱重他，常派他做战地联络兼侦探。
不管饥饿与疲敝，出入敌区不惧难，
惊险动魄常遭遇，小姜看来很平常，
任务紧急忘饥渴，情况恶劣那管炎暑与酷寒，出没敌后穿梭般。
从来没有耽误事，件件工作都做完，
又快又好又及时，不怕多来不畏艰。
红色声誉小英雄，城乡远近把名扬。
党委怕他落敌掌，指示要他把军参，
临行指点性格评长短，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眉飞色舞，挺胸膛，举手宣誓：学马列，
跟共产党，为解放，立志要把敌人全扫光。

（三）

十四岁人儿个子不肯长，步枪杆子比他长，
人们轻看，劝他回转红土墙；
小姜气愤不吭声，昂头睁眼鼓足劲，
勤学苦炼有自信，

不到三月识千字，过了半年通顺写文章，
步枪轻机射击准，手榴弹撇出胜老兵。
穿越障碍如飞鼠，伪装掩蔽不露迹，
大家都说小姜了不起，还要看实战高与低？

（四）

小姜初把战场上，又勇敢又顽强。
现出吃雷的胆子，大眼儿分外睁圆，
机敏沉着的动作，伴随准确的枪火，
盯住日寇兵，弹无虚发。
听命令冲锋跃进，好象虎入狼群，
接过机枪纵横射，鬼子三三五五被清扫。
手榴弹儿飞到处，膏药旗手命归阴。
擒斩虏获得胜利，战功簿上先写小姜名，
从此个个伸出大拇指，再不小看年青人。

（五）

一九三五年的严冬。原野被大雪压平，
遮天蔽日的风暴怒吼，江河冰冻半丈深，
气温低到零又零，豺狼虎豹深藏不出洞，
鸦雀无声，路上绝行人。
一支勇猛游击队，由二、五两军精锐临时编成。
轻装疾走，千辛万苦行军，越过老松岭顶，
夜间奇袭双河镇。
东关据点先拔除，突击队长小姜被指定。
土木工程筑坚垒，一队日伪混合守备兵，

死守巢穴不出洞，射界广阔护壕深；
姜墨林把主意拿定，号召全队机敏、细心、要死拼。
十五个人分三组，摆成钢鎚三角形，
穿开深雪当掩体，纵跳如山兔，匍伏蛇爬行。
敌人火舌满地伸，空中探照明；
小姜指挥巧，躲开照明，步步逼敌营。
战士宁肯脚手僵冻，征衣紧裹武器免失灵，
砍断铁丝网，飞跃堑壕边；
机枪步枪猛烈射，集来炸弹连续抛，
敌伪死伤大半了。
“专打日本鬼，不打中国人！”
白旗悬起丈多高，敌人举手跪地请投诚。
东关胜利传各部，八方四面冲入双河镇，
纵横扫荡敌守兵，擒斩日寇又缴胜利品，
打开仓库发粮给人民，
抗日救国大欢心，唱起凯旋歌，
威武雄壮，回军老松岭。

（六）

行军战斗五昼夜，饥渴困敝苦煞人，
岭顶选就好地势，大家休息把队整。
小姜累的如醉汉，迷迷糊糊眼难睁，
篝火傍边横躺卧，鼻鼾如雷唤不醒。
火星烧着棉军袄，看来要成焦炭人，
着了慌的同志们 抬起小姜就往雪里扔，
雪化火灭人冰冷，小姜醒来问原因，

大家给他换衣裤，忽然步哨响枪声，
敌人援队变追兵，步骑联合八百人，
踏着雪踪向上撞，盲目开炮打头阵。
小姜如同睡狮醒，抖擞精神，
请求自己的全队，参加掩护退敌兵。
雪筑壁垒倚崖石，居高临下如山鹰，
枪弹如雨点，手榴弹象雷鸣，
半小时激战，敌人瓦解土崩，
抛下死尸百余具，活的逃命不见影。
小姜带头把歌唱，激昂悠扬满谷回应
论功评奖收兵后，小姜又列第一名。

（七）

一九三七年的严冬天，抗日游击高潮到顶点。
号称十万日寇军大蠢动，扬言要把三江抗联完全歼。
我军纵横被隔断，衣装粮食两缺欠。
不怕苦累与战死，只愁冻饿添危险。
小姜奉命领精骑，大胆冲出封锁线。
先将命令传各部，再传地下组织区和县
风暴卷雪蔽天日，敌兵密布如网罗。
小姜精骑巧妙多，避实就虚如穿梭，
出奇行动几昼夜，情报疏通粮源多。
化装顽童瘪三样，小姜混入依兰城，
腰缠巨款三万余，分给地下救国人；
棉花布匹零碎买，靰鞡胶鞋铺店寻，
数千冬装缝制好，男女老幼日夜运出城。

苦战难关得度过，残暴日寇枉费心。

（八）

宝清县西宝石河，抗联总部驻屯处，
小姜天才受培育，指派学习专攻读。
技术巧，文化高，三年之后归军伍，
滨绥跌路连图佳，小姜部队常进出。
炸断桥梁毁军库，杀敌兵，不记数，
纵横扫荡屯田兵，国奸家贼夜泣哭。
消息震撼伪“新京”，关东军酋直叫苦。

（九）

一九四三年的深秋夜，狂风起雪压地，
铁岭河南，遭遇大敌。
小姜部队被包围，密如蛛网无空隙；
他一身是胆，跃马当先，杲敢抵御，
枪弹无几粒，刺刀显神奇……
征骑尽射倒，战士都把血洒地。
小姜身中六、七弹，举腕瞄已无力，
敌人狂叫投降吧，妄想活捉奇货居。
小姜圆睁大眼，眉倒竖，
咬牙切齿扑又起，剩有三个手榴弹，
裹进文书军机密。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抗日救国胜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
拉开手榴弹机关，挺身向敌群冲去，

炸死敌人和自己，白雪战地红光起。

（十）

苦战立范例，慷慨创奇迹，
少小非凡事，远胜古往纪，
小姜多史话，难以尽一一。
不到二年后，倭寇屈膝，倒竖太阳旗，
人民愁颜变欢笑，岭上寒鸦不再夜夜啼。

为东京城镇革命纪念馆作

（1960年1月7日于北京）

（一）

顽恶日寇，三十年代发疯狂，
伸铁蹄，践踏我东北领土百万方，
南京政府，国民党，不抵抗，步步投降，
看啊，国未亡，东北人民先遭殃。

（二）

牡丹江流长，葱郁森林夹两岸，
各族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
眼看要荒凉，生机将绝望，
起来干，高举抗日红旗，围绕着中国共产党。

（三）

时间表，十四年游击苦战，
宁古塔——东京城儿女好榜样，
不怕狂风怒吼，哪管暴雪飞扬；
忍饥渴，耐地冻天寒，
流鲜血，抛头颅，为祖国争光，为人民解放。

（四）

老黑山上埋丑虏，镜泊湖里荡腥膻，
揭开夜幕见天日，大好河山庆归还，
无名英雄功绩伟，子孙后代永难忘，
跃进建设新社会，继往开来放光芒。

在首都少先队的“万岁亲爱的党”萤火大会上的致词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

三座怪石嶙峋的、凶恶的大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阻挠住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几千年古国文化被摧毁；亿万人的聪明才智被压抑；劳动成果被吞噬；亿万人的生机被扼杀。

啊！如果老是让这三座大山冥顽地盘踞着，那么伟大的人民，锦绣的河山，不仅是千疮百孔，最后只有死亡！

（二）

俄国十月革命炮声响了，在地球上第一次竖起人类生存前进的灯塔。

中国工人阶级找到了复兴民族拯救自己的榜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创建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党，它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它巩固地团结着亿万农民；它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团结着民族资产阶级；党，它把前人未完成的革命任务，融合到新的民主革命的洪流里推向

前进。

为革命事业，奋斗、流血、牺牲了成千上万英雄儿女。

（三）

党，刚一诞生就开展着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经过二十八年，三座大山终于崩塌了，被削平了，中国人民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接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飞跃地在前进着。人们歌唱：不再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不再是帝国主义者的牛马奴隶。全国人民获得了新生，前面敞开了康庄大道，人们生气蓬勃地迈进。

（四）

新的生活，伟大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鼓舞着亿万人民前进。

在前进的道路上，依然要越过许多崇山峻岭。但是，任何困难，吓不倒已经矗立在世界上独立自由的、发奋图强的亿万人民，他们将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坚韧、刻苦、英勇顽强地克服前进中的障碍，去扩展前进的道路，拿出忘我的精神，创造性地建设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五）

祖国首都的少先队员们，高举起你的火炬，大踏步地前进！你们的先辈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四十年走完了四次大革命；刚刚坐上摇篮的婴儿——新中国才诞生，鸭绿江那边，燃起了美帝国主义的火警，党、毛主席鼓舞着祖国人民，英雄的好儿女奔向战场，保家卫国，援救朝鲜兄弟，打败侵略

军。保障了我们祖国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六）

祖国首都的少先队员们！更高的举起你们的火炬，前进！前进！任何凶顽敌人，不能侵犯我们的领土完整；任何困难重重，阻碍不了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跃进。

亲爱的小朋友们！有党、有毛主席指引着我们，大家努力奔向前方，奔向更美好的远景。

你们今天争取做一个好学生，明天是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盼望你们健康地活泼地成长。

盼望你们迅速承担起接班人的责任。

赠战友李永镐大使暨夫人

李永镐大使同志暨夫人柳庆熙完成中朝战斗友谊使命将返朝鲜祖国，写诗数句，作临别纪念。

相依战斗十四年，同仇倭寇不戴天。
千辛万苦犹欢笑；九死一生只等闲。
岂止民族获解放，社会主义扣心弦。
中朝友谊如雷霆，粉碎美蒋南鲜奸。

倭贼蹂躏东北日，乌苏松水血染赤，
中朝儿女同抗斗，阿父阿母共支持，
历尽人世艰辛苦，饶力河畔堪回思，
革命成果基石固，待将美帝消灭之。

（一九六二. 二. 十七）

祝何香凝八十五寿辰诗

欣逢

何香凝副委员长八十五寿辰，谨撰诗一首祝贺：

大仁大勇苦坚持，
革命贞操一代师；
建设艰巨犹奋斗，
长寿愿同壮年时。

周保中
王一知　敬祝

一九六二．六．廿八

给赵荣光同学的信

荣光如弟：

七月中接你六月十六日由榆寄来给我的信，此时正值我和洁民五弟及内人寄居南京。你这封信的最末尾说叫我不要鄙弃你，要常给你通信，这话可说的不对了。我两三年来，虽说于戎马倥偬中过生活，然一年以内，总有几次很恳切的信寄给你，不知着落什么地方去了？不惟使你怀想失望，就是我的时间经过报告，也甚觉失掉可惜了。

我于十五年春，在西北国民军失败后，重复回广东，此时已深能了解中国的环境，是需革命的。外受帝国主义者的种种压迫，内受军阀官僚贪污土劣的摧残，不惟中国民族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垂死的生命，也快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在我个人有了这种认识，定要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这并非我个人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好乱以流血为快，实乃物质环境所趋使，历史使命所召示，更加上现制度的催迫着；于是乎毫不犹豫的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的对着目标走。当初由广东北伐由湘而鄂而赣，以至于去春攻下南京，革命情景不为不好，真的——军队与人民合作——并且很容易的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贪污土劣……起了很大的震惊，假使一往直前的做下去，那么缩短革命的历程，距成功之期不远了。不幸中途变生，宁

汉分裂，继以国共分家，于是乎联合战线土崩瓦解，革命势力分化复分化，复杂复复杂，使一般反革命者摇身一变，扑索迷离，挂着招牌，欺骗民众，而帝国主义者防范愈密压迫更甚，旧的封建残余，尚未扫除尽净，而新的一切恶势力，风起云涌，使中国民族，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现在北京虽然攻下，然而前途惨淡，实未可乐观，唉！唉！！中国革命呵，回首往事，瞻顾未来，实有令人不堪追念者。然而革命事业非常重大，且是人类社会的整个问题。诚然，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大部分，岂是轻轻容易，就会咄嗟可办到的吗？艰难险阻，振起颠仆，是必然的过程。我很相信最后胜利终属大多数人需要革命者的胜利。并且我个人的主观革命概念，是要站在大多数人方面。我更需拿全副力量，真挚确实的努力去做，决不因一时现状不良而灰心。

今年阴历正月初，肃清湖南以后，深知环境的恶劣，决不能再继续下去，极力求去，而不得当局的许可。继后因为奉命带两团人到湘东剿匪，为根本肃清计，有种种严密准备，需费时日，而且于剿匪清乡之中，决不愿妄杀无辜，于是嫉于当局，飞短流长，意图中伤，我因此愤然求去，再不愿在这不死不生的环境中讨饭吃。四月间，在西湖略为休养，五月初来到上海，准备出国游学，一则避开现在的恶环境，再则再图深造，随时都可卷土重来。不料我五弟洁民和妻、子，突如其来，使我走动不得，出国之举，渺不可期。这就是受旧家庭的毒，受旧社会的毒。我本想抛弃不顾，又不可能，因此才到南京来暂住，嗣后究竟怎样？又另给信与你罢。

荣光啊！你来信说自恨是落伍者。大概是你以不能参加革命为恨的落伍，抑或是时代思潮为落伍者？如系前者，幸好你

是个落伍者。不信你看数年来跟着时代走的青年们，受人骗了。青年因不愿落伍而抛了几许头颅，流了不少的赤血。这些头颅和赤血，铸成了特殊阶级的艺术之宫，染成了新反动派的招摇撞骗的幌子。唉！那么还是落伍的好？由后者说，时代思潮的落伍，青年人是不应该的，还须扩大认识，努力前进，因为今后社会人类生存问题，是要现在的青年来解决，而且要现在的青年负责任去做的，那么凡所欲为者所根据的思想，是不容他落伍，更不能由他消沉下去。

每个人的家庭问题，很不容说清楚，在现制度下，更无法根本解决的。但是决不要为家庭环境完全征服，把自己弄成呆呆板板，成了一个旧社会的战败俘虏。

溽暑逼人，余容后谈，回信寄南京洪武门西街十六号李绍新先生转交。

敬礼　　潭福

绍　黄

17.7.25南京

（即1928.7.25）

给塞克（注）同志的信

亲爱的塞克同志：

很久就想写信给你，但终于推迟到今天。我和你十五年前大概不是偶然吧！（注：指一九三二年时，两人曾在东北抗日自卫军左路军指挥部的宣传部共过一段事）仇恨的眼看见那武士道的畜类，在东北原野是在怎样狂暴而又愚蠢的到处横行着，愚蠢、横行毕竟埋葬了他自己。

塞克同志，你看今天东北老百姓比起十五六年前又怎样了？我是深信人民是终于会创造出自己的历史的。我祝你健康，我更愿与你在不同的形态活动中走同一的道路——老百姓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我想，如果不是突然的话，再经过第二个十五六年，也许光景就要大大改变。

合江是被日寇称为“共党乐土”为“王道所不容”的地方，是东北人民因争民族生存气节，最受毁灭的地方，“八一五”事变前二三年我和那些骷髅、死皮、白脸不愿离去的地方，使我今天增添无限流连，今天正是要集中力量去摧毁新的人民之敌，更应把那些被抛弃或埋藏起来的、虽然是很小的一点，也要使他成为力量。我在十分的热望着你的努力！！！

并致

敬礼

周保中

（1947年）四月廿七日于敦化

注：标题是后加的。塞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歌词作家和艺术家，现在北京。

给田孟君同志的信

孟君同志：

来信接读，感谢您对旧战友的关心。去秋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不知您在京，未能见面，引以为歉。

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在长春欢喜若狂地见到从延安来的许多旧东北战友，曾经打听过您的消息。同志们清楚告诉过我关于您的一切。那时正当异常复杂紧张的斗争环境，只满足于知道您坚强地站在革命斗争岗位，也就不再去替您设想个人有什么甘苦。从您的来信上表现出，你是愉快地并且是倔强地在战斗着、前进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应该如此。但望您倍加努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多多付出贡献。

东北是我的第二故乡。东北人民给我不少的培养和教育，鼓舞了我，使我能够坚持党底战斗旗帜。直到日伪溃灭，美蒋惨败，我能蒙受党的光荣，人民的光荣，这不能不是我的幸运。但每一念及：十四年亘长时期，白山黑水之间，抛洒了无数男女英雄中朝同志的鲜血，数千里广袤肥美的田园，曾经被日寇夷为渺无人烟的荒野，又不禁低徊感慨难于遣置。好在鲜血染成了五星红旗，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中华民族的光荣和伟大。先烈们已有了预期的代价。当东北重获解放之后，我是极难舍得离开东北的。但我当时设想：在战斗与艰苦中生活惯了的人，应该投身于江以南的最后解放，藉以加强锻

炼。一九四九年春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允许，使我能够参加大西南的解放斗争。一九五〇年春初返回云南，两年以来是有收获的，惟工作负担繁重，吃力甚于东北，好在依然倚靠着党的领导，倚靠群众支持，一切还能勉力支撑，缺点虽有，尚无大错，健康状况不算坏，工作的兴趣是愉快的。所深恐慌者，实际工作纠缠太紧，思想理论学习颇欠缺；已经勉强能说能读的俄国语文，渐渐消失将尽，虽然时刻企图弥补，但都成幻想。在三反斗争中特别感觉，不把这个幻想变为现实，将无法顺利的向资产阶级腐蚀与破坏作斗争。

孟君同志！期待着来日见面吧。祝您健康，并致

敬礼

周保中

一九五二．二．廿

给翟学忠同志的信

翟学忠同志：

收到来信，知你工作不断有进步，党已给你恢复了组织，这就很好，但绝不可以此为满足，要在三反斗争中，在一切工作和学习中，努力的提高自己，不断前进。共产党员的一辈子就是自己的全部精力以至生命为革命事业。过去反对武装侵略者日本军阀和独夫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虽是不容易，但比起今后国家建设，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真是象毛主席所指示的——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因此，不休止的刻苦奋斗，有组织有纪律的加强工作和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象样的共产党员，这就是光荣和革命的享受。若是只为自己欲望打算，不愿看见或忘记工厂里工人紧张的八小时或十小时工作，田野里农民一锄头一锄头的挖，一切不从广大群众出发，那么不管你过去如何革命，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希望你努力自勉，并互勉那些有落后意识的同志。我手边没有像片，以后再给你寄去。王一知同志和我都日夜忙碌，身体还好，请告同志们勿念。

此致

敬礼

周保中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

给金广才(注)同志的信

金广才同志：

你三月三日的来信，日前收读了，关于你以往参加东北地下党和抗日联军及经组织同意介绍到苏联边疆工作，后来又转往集体农庄等经过情况，这些我都还回忆得起来。回想当年你是一忠诚老实、勇于执行党给予的任务的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这是光荣的革命历史，但不是向党向人民索取报偿的包袱。我想这点你是会了解的，希望你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认真地做好工作，必须从政治上、文化上努力提高自己。我们祖国社会主义过渡是光荣的、伟大的，并具备有利的一切条件，首先是苏联给我们的榜样和帮助，必然按期和提早完成国家建设伟业。但是，在进程中也会有各种艰难复杂和阻碍，这就是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周围的革命战士努力去克服。

关于你的党籍证明，你着急这也是应该的，请你等候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请后，很快就能给答复。

我的病现已日有好转，但短期间不能离京，以后如有来信，寄北京颐和园介寿堂王一知同志收即可，此复，并致

敬礼

周保中

一九五四．三．九

注：金广才同志系一九三三年参加"抗联"部队，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二年被派往苏联，因脚伤复发，被转到农庄，失去组织联系。一九五二年回国，现在松江大海林森林工业局工作。标题是后加的。

给杨茂材老友的信(注)

茂材老友!

今年二月末接到你的来信。该信是去年旧历年底寄出,今年二月我才收到,正值我患病很重,不能作复,延搁到现在,才给你回信。虽然为时已经很晚,但我以为还是必要的。

的确,你我之间的友情是深厚的,不平常的。自少小时代,天真相倚,切磋琢磨,互相砥砺,直到成长,一同踏入人吃人的社会,为生存、为进步搏斗,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一直到我参加中国大革命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我们才分飞远离。然而并未因云山阻隔、天各一方而使友情熄灭,内心里是深藏着对你的想念的。首先念及你自粤回乡后,惟恐你陷身封建社会的浊流里,或为并非小康的家庭恶劣环境所束缚,而妄图"上升"为剥削阶级以至于与反动统治阶级成为一丘之貉,那么你我之间的友情就会真正断绝了。但是我总想你是不会自甘暴弃而不努力自拔的,你是能够领会最初的遭受流离颠沛以及经受非常的挫折。换句话,我相信你对当前时势潮流历史变迁必能作出适当选择。你也是非走革命道路不可的。我的这种心情,在我的革命生活过程中,不仅仅迫切地希望你是这样,也希望其他的相知好的朋友们都能是这样。

1950年初,我回到故乡工作,曾接你的来信,知道了你的一些生活情况。你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也没有成为革命斗争

的对象，这怎么解释呢？这只能归之于你所处的环境与你的个人意志所促成。当时也知道你的生活处境是困难的，需要我给予援手。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献身革命事业，一切为了社会整体的变革，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人们才能得以自由地劳动，自由地生活，由“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此以前，用旧社会的方式徇私情而作个人的救助，不但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即使这种救助，在某种条件下是有其必要，也能产生一些较好的结果，但终归无补于人们生活的社会整体的改变和改进；我不能为个人情感和一般所谓的“人性”所趋使，我只能用理智和阶级性对待事物，处理问题，因此我对于故乡知好故旧，包括我的两个贫困的手足兄弟都各有迫切的求助，我都好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置之不问。我想我只能尽自己的革命天职，勤勤恳恳地努力为完成党所赋予的革命任务坚持奋斗，参与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生活。希望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前发展中，造成一种新环境，使人各尽其才能，得其所应得。这自然比旧社会的只顾私情而忘公义有根本区别。当时我的这种想法，应该得到你和同乡知好故旧的原谅。

十多年来，云南省和全国一样，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旧社会的面貌，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国人民自己创造了美好生活的条件和环境，旧社会是一去不复返了。老友！我想你不仅是向往和赞成这种新社会新环境，你并且已经实际生活在这种新社会 新 环 境 里了。但是从你的这次来信上看出，你自己觉着生活处境仍然是困苦的；思想意识是不宁静的。你不能不追想到你所认为以往热闹的家庭（！？），又耽忧于爱女当前所遭

遇的苦痛，好象能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帮助。老友，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我现不能拿一文钱、一粒米来帮助你，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替你解除困难，只有把我个人对生活问题的理解坦率地告诉你，这就算是对你的帮助。

回忆旧中国处于极端贫穷与落后的状态中，不断的军阀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阶级社会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使中国人民遭受无止境的深重灾难，这是你我少壮时代亲历目睹的，虽已远隔数十年，但仍历历在目，令人永难忘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巨的革命斗争，从死亡无日中杀出一条血路，开辟了新生活。然而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被人民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蒋介石匪帮，日夜妄图复辟，狂想再骑在中国人民头上。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制造各种障碍，增加我们建设事业中的困难，何况我们在主观上有缺点，有错误，也产生了一些可以避免的困难。但是，对于无论外部的或是内部的，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困难，中国人民一如以往，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将一一加以克服，有些困难已正在有效地克服着。

老友！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希望你不要徘徊，不要泄气。要振作精神，老当益壮，和人民一道奋发前进。希望你尽自己所能，在乡村中起一点点作用也是好的，即使为农村群众当“康熙字典”使用也是有益的。千万不要自卑。

至于你的爱女，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劳动者，并且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她遇到困难，她会倚靠她的集体，倚靠她自己的劳动与智慧，能自己解除困难的。你有掌珠之爱，盼望她百事顺畅，这是自然的合理的。但是，你不必主观的强求满

意和过份地为她焦灼，这是无益而有损的。

老友！当我在故乡工作时，日夜忙碌，你我接触甚少。到北京以后，又长年与病魔搏斗。希望争取再一次登西山而极目滇池，游洱海而望点苍。我想，我们是后会有期的。祝你努力和健康。

敬礼！

周保中

1962．7．4北京

注：标题后加的。

给杜秀清四哥的信

秀清四哥：

六月十六日来信，廿五日收到。我虽远在京都，但怀念故乡颇为殷切。去冬今春，天旱少雨，禾苗枯萎，在这样严重天灾威胁之下，忽降大雨，补人力之不足，挽救了夏季栽秧，使秋后有丰收的希望，这是一件大喜事。

关于四哥你的生活晚景，也是我所系念的。年遭眼目失明，不能不是一大遗憾。但好在你的身体还健康，又有侄儿杜源的照顾，虽然不很满意，但总算好的。

新中国比旧中国完全两样。在旧中国社会里，外受帝国主义侵略抢夺，把中国人当奴隶牛马看待；内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几家欢笑几家愁”。四哥你是过来人，知道的很清楚，希望你给晚一辈多多指点，使他们诚心诚意地接受人民政府的、党的教育领导，努力热心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处处谋求和尊重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向前迈进一步，个人的生活要求和幸福也就随之改善和提高。我想，这种教导作用，你是能够做到的。希望你乐观地、愉快地度过你的生活晚景。

多年来，我一直身患重病，直到今春，健康情况才开始有些好转；弟媳王一知同志日夜忙于工作；侄女们读书勤奋，请

勿为念。祝你健康。

敬礼！

周保中

1963.6.27

北京

注：标题后加的。

后　　记

很多读者久已渴望的《周保中文选》现在同读者见面了。这里选辑的只是周保中遗稿的一部分。在这里，特向为这个文选提供文稿、书信、实物照片的周夫人王一知同志、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黑龙江大学、东北烈士馆、延边展览馆以及周保中生前好友们，表示感谢。还要向为收集这些文稿作了努力的杨美清同志致以谢意。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责 任 编 辑：程　方
封 面 设 计：马　佳

周 保 中 文 选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15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1116·117　　定价：1.90元

统一书号：11116·117
定　　价：　1.90元